HZ BOOKS
华章经管

KEYNES HAYEK

The Clash That Defined Modern Economics

凯恩斯大战哈耶克

[美] 尼古拉斯·韦普肖特（Nicholas Wapshott）著

闾佳 译

梁小民 何帆 专文推荐

机械工业出版社
China Machine Press

目录

梁小民

经济学史就是一部国家干预与自由放任的争论史。最早的重商主义是主张国家干预的，以后的主流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则是主张自由放任的。其间，德国历史学派又回归到国家干预。近代凯恩斯主义和哈耶克的自由放任则是经济学争论的焦点。

一直到今天，经济学的争论涉及了广泛的内容，但主线仍然是国家干预与自由放任。可以预见，只要人类社会存在、经济学存在，这种争论就会持续下去。这种争论的“源”当然可以追溯到重商主义和古典经济学，但在经济学理论与方法已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况下，这种争论的“源”还是凯恩斯和哈耶克。

20世纪30年代，面对市场经济出现的经济危机等各种问题，凯恩斯和哈耶克争论的中心是市场经济是否完善。凯恩斯承认市场经济的作用，但认为市场经济是不完善的、有缺陷的，因此需要政府进行适当的干预，这就是“市场与政府的结合”。哈耶克则坚定地相信市场经济是完善的，各种问题都是市场运行中由于货币、投资的问题所引起的，但市场经济完全有能力自己纠正这些问题，因此不用政府来干预经济。他们在30年代都提出了解释自己观点的资本投资、货币和周期理论，而且围绕这些理论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尽管他们双方提出的理论在今天看来也相当复杂，对方的驳斥也不无道理，但争论的中心始终如一。了解双方的观点，对我们理解20世纪30年代以后的经济学极有帮助。

理论是为实践服务的。根据凯恩斯的观点，国家有各种调节经济的政策；根据哈耶克的观点，就应该让市场经济自我调节。30年代之后，现实问题迫使政府不得不干预经济，因此凯恩斯始终占了上风，哈耶克及其支持者影响日益减少。但这决不意味着哈耶克失败了。随着国家干预问题的显现，70年代之后哈耶克的影响又日益增强，他不仅在1974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而且80年代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和美国总统里根都把哈耶克及其支持者的主张运用于政策，形成了“撒切尔经济学”和“里根经济学”。如今，这种争论仍没有谁胜谁负的定论。可以说，以后某个时期一种观点会占上风，但不会有最终的结果。

本书以凯恩斯和哈耶克的争论为中心，实际上包含了20世纪30年代后国家干预与自由放任这两大经济学思潮的争论及其对政策的影响。要了解当代经济学，本书

应该是必读书。

何帆

想象一下有一个买卖思想家股票的股市。过去和现在的思想家都可以上市交易，他们的行情有涨有落。有些经典的思想家是蓝筹股，他们的沉浮主导着时代的精神。也有些风光一时的思想家很快就被人遗忘，甚至被迫退市。有时候，会出现一匹“黑马”，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思想家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突然受到热捧。活跃在股市的交易者有的是投资者，坚信长期持有、价值投资，对自己信仰的思想深信不疑；也有些交易者是投机者，他们并不看重思想家的内在价值，而是更关心同一时代的人们更偏爱哪个思想家，只要站队站得准，他们就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不要以为这个股市只是少数知识分子参与的市场，这个市场上的行情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思想家即使在死后也难以得到清净，后来的崇拜者和反对者会不断把他们抬出来，或是祭奠，或是鞭笞。我们想要完全做到特立独行亦是难上加难。思想界就是一个江湖，江湖多恩怨，有时候你已经得罪了别人，自己还莫名其妙。

哈耶克和凯恩斯是经济学界两个最大的蓝筹股。如果说爱情是文学家最喜爱的主题，那么自由放任和政府干预之争就是经济学家最喜爱的主题。尽管他们心里也知道争来争去争不出个什么，但从来没有什么话题能够如此激发经济学家的狂热。在追随者看来，哈耶克就是自由放任的代表，而凯恩斯则是政府干预的代表。你是哈耶克一派的呢，还是凯恩斯一派的？你必须要做出选择。每一派都认为自己才是正宗。他们之间的恩怨，甚至超过了金庸小说中华山派“气宗”与“剑宗”的门户之争，而是达到了“正教”与“魔教”间水火不相容的程度。

正如拉罗什福科曾经说过的，“大多数虔信者让我们对虔诚感到厌恶”。哈耶克和凯恩斯之间的分歧究竟在哪里？他们的大多数追随者其实也说不出来。正因为如此，我觉得读读尼古拉斯·韦普肖特的这本《凯恩斯大战哈耶克》或许能给我们更大的启迪。在作者的笔下，凯恩斯和哈耶克不再是抽象的教条，而是还原了他们有血有肉的真身。他们的命运和时代的命运交织在一起，他们之间的恩怨情仇交织在一起。要想把他们的思想分歧区分开，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凯恩斯比哈耶克年长16岁。尽管哈耶克同凯恩斯一样，也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但和凯恩斯相比，哈耶克一直有一种隐隐的自卑感。凯恩斯身上有一股高高在上的贵族气质，他当时已名满天下，而且辩才无碍。哈耶克则从奥地利刚刚来到伦

敦，连英语都讲不好。他跟随米塞斯学习的奥地利学派，在英国经济学界几乎无人知晓。就像作者所说的，这是一场龟兔赛跑，一开始，凯恩斯就像兔子一样一溜烟冲了出去，而哈耶克还在起跑线慢慢地爬。但哈耶克自有一股不服输的倔劲。1931年，哈耶克在伦敦进行了四场讲座，招招指向凯恩斯刚刚萌芽的经济学新思想。之后，哈耶克又发表了一篇对凯恩斯《货币论》猛烈批评的文章，发表在伦敦经济学院的《经济学刊》上。这篇措辞激烈的评论文章激怒了凯恩斯，他马上写了一篇文章回应，并在文章中顺带着把哈耶克几年前的《价格与生产》一书批了个体无完肤。这样的辩论丝毫无助于学术的进步。远在大洋彼岸的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奈特关注着这场辩论，他倍觉失望。他说，根本弄不明白这两个人究竟要争论什么。

凯恩斯很快就休战了。不是出于绅士风度，而是因为他正在构思一部更宏大的著作，那就是《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以下简称《通论》）。凯恩斯发现他无法赢得政策决策者的支持，也无法说服像哈耶克这样的同代经济学家，于是他希望借助这本《通论》，在年轻学者中传播自己的思想。这本《通论》尽管晦涩难懂，但它很快引发了一场“凯恩斯革命”。尤其是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哈佛校园，《通论》吸引了所有35岁以下的经济学家。著名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思回忆当时的情景，说凯恩斯的新思想就像一种病毒入侵到太平洋的一个孤岛部落，所有的人都被传染上了。比加尔布雷思他们年长的经济学家汉森起初怀疑凯恩斯的思想，后来成了坚定的支持者，他写了一本《凯恩斯理论指南》，俨然成为十字军东征的领袖。没有一个人在传播凯恩斯主义方面比萨缪尔森的贡献更大，他的《经济学》教科书影响了几代经济系的学生。希克斯原本是哈耶克阵营的大将，后来改投凯恩斯阵营，正是希克斯发明了IS-LM框架，把艰涩的凯恩斯思想用图形清晰地表达了出来。

哈耶克也失去了和凯恩斯争辩的兴趣，他转而开始了对极权体制的批判。他在1944年发表了《通往奴役之路》一书。此书为他赢得了世界范围内的声誉，反对政府干预的学者将此书视为一颗重磅炸弹。但在当时，哈耶克的思想仍然显得与时代脱节。1947年，哈耶克邀请了60多位好友在瑞士佩尔兰山顶的杜帕克酒店开会。这些自由主义的坚定支持者站在阿尔卑斯山巅，感到了一种深深的疏离感，犹如圣人遭到了宗教迫害，才躲到了这个与世隔绝的地方。在这次会议上，成立了佩尔兰山学会，由于佩尔兰是朝圣的意思，因此佩尔兰山学会又被称为朝圣山学会。参加第一次朝圣山聚会的大家包括：哈耶克的长期支持者、英国经济学家罗宾斯教授，哈耶克的老师米塞斯，芝加哥大学年长一代的奈特教授以及年轻一代的施蒂格勒、米尔顿·弗里德曼、哲学家波普等。朝圣山会议之后，哈耶克的个人生活陷入低谷。他

因为离婚之后赡养开支增加，急于到美国找一个薪水更高的教职。原本他希望能够到芝加哥大学经济系，但遭到了拒绝。一些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家说，《通往奴役之路》太畅销了，受人尊敬的学者不应该受这样的罪。最后，哈耶克成了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的社会与道德学教授。

哈耶克是那种坚持己见、一肚子不合时宜思想的学者。他的思想受到了左右两派的攻击。当时蒸蒸日上的凯恩斯经济学派认为他已经完全过时。奇怪的是，极右派，如极其活跃的安·兰德也说，哈耶克是“完全、彻底、恶毒的混蛋”。支持他的人也不一定赞成他的思想。比如米尔顿·弗里德曼在政治主张上力挺哈耶克，但弗里德曼的经济学套路却直接师承凯恩斯，他一上来就是货币总量的概念。在哈耶克看来，在一个知识分散的社会里，怎么可能会有总量的概念呢？另一些支持哈耶克的学者，尤其是在东欧等地的学者，满怀激情地支持哈耶克，但并不清楚哈耶克赞同的只是个人自由，而对所谓的民主制度忧心忡忡。《通往奴役之路》刚刚问世，芝加哥大学的赫尔曼·芬纳就写了一本《通往反动之路》，声称哈耶克的著作是“数十年来民主国家里出现的对民主制度最险恶的攻击”。从某种意义上讲，芬纳说的是对的，民主制度中天生含有大政府的基因。

哈耶克苦苦等了40多年才扬眉吐气。1974年，哈耶克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但令人尴尬的是，这一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同时授予了左派的缪尔达尔和右派的哈耶克。结果是两头不讨好。哈耶克发表获奖演讲时说，诺贝尔经济学奖荒唐可笑，缪尔达尔则谴责颁奖给哈耶克。不管怎样，诺贝尔奖让哈耶克彻底重生，多年的抑郁症转眼间消失。尤其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之后，由于凯恩斯主义的补药吃得太多，西方经济出现了滞胀的难题，反对政府干预的经济学思潮再度占了上风。当时，撒切尔夫人在英国，里根总统在美国，大刀阔斧地反对政府干预，实行私有化，创造出奇迹般的辉煌。撒切尔夫人把哈耶克奉为精神导师，说她上大学时就读过哈耶克的书。20世纪90年代后苏东解体，原来的计划体制纷纷转为市场经济，更是让哈耶克名声大噪。

风水轮流转。凯恩斯主义者也开始体会到当年哈耶克经历过的遭人冷遇和嘲笑的感受。直到2007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前夕，如果你自称是一个凯恩斯主义者，其他经济学家一定会用鄙夷的眼光看你。一批凯恩斯主义学者打算自己办一本《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Keynesian Economics），最后发现，这个杂志的缩写将是JOKE（玩笑）。这可谓经济学家的黑色幽默。但是，正如加尔布雷思

曾经说过的，只需要再来一场衰退，凯恩斯主义就会复活。如今，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到来了，一时间凯恩斯的股价又开始飙升。

本书中讲到一个有趣的细节。当凯恩斯读完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后，他给哈耶克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表扬信，但他也不无善意地提醒哈耶克：“你赞同必须在某个地方划下界限，也赞同逻辑上的极端是不可取的。但是你从未向我们说明在哪里、怎么划下这条界限。诚然，你我画线的地方可能有所不同。我猜，照我的观点，你大大低估了中间路线的可行性。”凯恩斯在内心深处是信奉自由经济的。但和别的学者不同的是，他随时愿意做出必要的妥协。他相信，为了保住“核心阵地”，放弃一些“外围工事”是可取的。总之，我们一定要干些什么。

这场争论的最终结果会是什么呢？天知道。但我只知道的是，大部分关于凯恩斯和哈耶克的争论，都与凯恩斯和哈耶克无关。

这或许是20世纪经济学思想两大巨头之间常年厮杀角力中最不寻常的时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和哈耶克一起，或是独自一人，整夜站在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小教堂的屋顶上。他们的任务是凝视天空，提防德国轰炸机飞到英格兰风景如画的小城市上空倾泻燃烧弹。

1942年春夏两季，为报复英国轰炸了德国中世纪城市吕贝克（那里是U型艇的老巢）和罗斯托克（制造亨克尔轰炸机的地方），德国飞机轰炸了一连串毫无战略价值的英国城市。埃克塞特、巴斯和约克都变成了一片火海，城里的古建筑危在旦夕。英国新闻记者想出了“贝德克闪电战”（The Baedeker Blitz）这个词，因为德国空军的指挥者似乎是按照贝德克这本德文旅游指南（根据城市的文化价值为其评分）来选择英国的空袭目标。尽管剑桥的重要军工企业寥寥无几，但它有创办于中世纪的大学，所以它铁定进了纳粹的破坏名单。

夜复一夜，国王学院的教师和学生以铁铲作武器，轮流站在华丽的哥特式教堂顶上巡逻（这座教堂的基石，是1441年亨利六世铺下的）。伦敦圣保罗大教堂的火警员发现，燃烧弹一旦爆炸，那就无计可施了；可要是燃烧弹落在屋顶上还没被引燃，赶紧把它扔到屋檐的墙壁外边去，损失就可以减少到最低限度。所以，年近60岁的凯恩斯和41岁的哈耶克，双双把铁铲靠在石灰石护栏上，坐在屋顶上静待德国人的空袭。他们都担心自己不够勇敢敏捷，救不了剑桥脆弱的石头房子。

此情此景，跟两位素来反抗纳粹威胁的经济学家分外相衬。他们都曾以不同的方式，预见到了暴政的到来和希特勒的崛起。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凯恩斯是国王学院年轻的经济学研究员，他应征加入了英国财政部，从华尔街替协约国筹措资金。到战争临近结束的1918年，英国财政部留下凯恩斯，要他建议怎样从战败的德国榨出战争赔偿来。

在巴黎和会上的所见所闻令凯恩斯震惊。正当获胜的协约国领导者在复仇心的怂恿下，用严厉的经济处罚给德意志民族降下苦难时，凯恩斯却从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看待这一问题。他认为，蓄意让德国这样一个现代贸易国家沦入贫困境地，会让它的国民陷入赤贫，为极端政治、暴动甚至革命创造条件。凯恩斯认为，《凡尔赛和约》非但没有以公正的方式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反而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埋下了种子。回到祖国之后，他掏笔写下了《和平的经济后果》（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Peace），痛斥了协约国领导人的蠢行。这本书畅销全球，将凯恩斯以“平易近人的经济学家”身份送上了国际舞台。

哈耶克同样具备凯恩斯刻薄而犀利的雄辩。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是奥地利军队的年轻士兵，从意大利前线回到几乎成为废墟、民众信心尽失的维也纳。没过多久，哈耶克和他全家经历了席卷奥地利经济的可怕的通货膨胀，他亲眼目睹双亲的积蓄荡然无存。此后，凡有人主张用通货膨胀修正破碎的经济，他无不厉声反对。他打定主意要证明棘手的经济问题没有简单的解决办法。他逐渐认识到：以大规模公共开支计划来解决失业问题的主张，不但会带来不可控制的通货膨胀问题，而且会带来政治暴政。

尽管凯恩斯和哈耶克对《凡尔赛和约》的不足之处有着默契的看法，但20世纪3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们都在争论未来的经济走向。分歧之处包括政府本身的角色、政府干预经济对个体自由的威胁等。这场辩论逐渐升级，甚至蒙上了宗教世仇的气息。1929年股市崩盘引发经济大萧条后，就如何帮助糟糕的世界经济恢复健康一事，两人给出了南辕北辙的意见。到了最后，尽管两人已对始终不能达成共识一事做到泰然处之，可即便两人故去多年，他们各自狂热的信徒仍然继续论战。

2008年9月，华尔街出现了另一轮崩溃，新一场世界金融危机爆发。美国总统乔治·布什表面上支持哈耶克自由市场神圣不可侵犯的观点，实际上却要面临一个严峻的抉择：要么静观其变，哪怕市场要经历一场可跟80多年前相匹敌的大萧条，也坐

视不理、袖手旁观，等它自个儿消停下来；要么，迅速采纳凯恩斯的补救措施，用政府借来的几万亿美元拯救岌岌可危的经济，以免造成更大的损害。一想到纵容自由市场不断恶化会带来怎样触目惊心的前景，乔治·布什来不及多做考虑，就放弃了哈耶克，投入了凯恩斯的怀抱。新上任的美国总统贝拉克·奥巴马督导了新一轮的大规模举债，把借来的钱注入经济。但刺激资金还没完全花出去，茶党运动就发起了暴力抗议，反对前所未有的公共债务水平，要求政府改弦更张。2008年10月，茶党支持者萨拉·帕尔（Sarah Pal）斥责财政部长亨利·保尔森（Henry Paulson）："听好了，美国人民不喜欢政府到处紧急援助。"政治评论员格伦·贝克（Glenn Beck）恳请美国人民重读哈耶克于1944年出版的《通往奴役之路》（Road to Serfdom），这一举动重振了哈耶克的声望，早已遭人遗忘的奥地利人登上了畅销书排行榜榜首。凯恩斯过时了，哈耶克当红了。

是自由市场好还是政府干预好，各方观点争论之激烈，毫不逊色于20世纪30年代。那么，到底谁是正确的呢？是凯恩斯还是哈耶克？80年来，这个问题把经济学家和政治家划为两大阵营。时至今日，两位杰出学者之间鲜明的立场差异，仍然是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思想之间难以跨越的鸿沟，本书尝试对此问题给予解答。

经济学历史上最伟大的辩论始于一个小小的借书请求。1927年年初，一位年轻的维也纳经济学家写信给英国剑桥国王学院的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借一本写于50年前的经济学教科书，是弗朗西斯·伊西德罗·埃奇沃思（Francis Ysidro Edgeworth）所著的名字怪怪的《数理心理学原理》（Mathematical Psychics）。凯恩斯在一张明信片上写了一行回复："很抱歉，我也没有多余的《数理心理学原理》。"

为什么名不见经传的哈耶克，找到了尽人皆知甚至可算是全世界最著名的经济学家凯恩斯呢？对凯恩斯而言，哈耶克的请求无非是他胀鼓鼓邮袋里的一封寻常来信罢了。剑桥大学的经济学异闻录里并未收入哈耶克的请求，可他本人却早有自觉，深知自己大胆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会给后代留下馈赠，颇有先见之明地留下了每一份潦草的笔记、每一封简短的信件。他过世后发表的论文，尚在编辑时就足足有13卷。而且，哈耶克当时似乎就充分意识到了自己借书请求的重要意义。他把凯恩斯平淡的回复视若珍宝，当成私人纪念品和事业奖杯般保存了整整65年。如今，这张明信片留在加利福尼亚州帕洛阿尔托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哈耶克文存里，它确凿地证明：有关政府在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世界经济之命运这一激烈辩

论，发起第一轮试探的是哈耶克。

哈耶克之所以对埃奇沃思感兴趣，是因为后者详尽探讨的一个主题，后来也吸引了凯恩斯和哈耶克两人的视线：稀缺资源怎样能最好地将“追求愉悦的能力”发挥至最大限度。书名令人望而生畏，叫《数理心理学原理：数学在伦理学中的应用》（Mathematical Psychics：An Essay on the Application of Mathematics to the Moral Sciences），出版于1881年，是埃奇沃思最出名的作品。它预料到下个世纪经济学家缠斗不休的大量辩论主题，包括“自由竞争”、“博弈论”等概念，以及经济将达到每一个身强力壮的成年人都充分就业的“均衡”状态的信念——这是凯恩斯与哈耶克之间漫长战斗的最重要议题。埃奇沃思还是货币理论及货币体系的早期论述者——在这一领域，到1927年时，凯恩斯和哈耶克也分别做了详尽的阐述。这里有一个促使哈耶克向凯恩斯求助的小借口：1911年，凯恩斯接任了埃奇沃思在《经济学杂志》（Economic Journal）的编辑职位。

但哈耶克为什么会认为凯恩斯家里囤积着《数理心理学原理》，就好像后者偷偷藏了一地窖埃奇沃思那令人望而生畏的著作，原因实在很难揣测。虽说哪怕英国经济学家也没几个人记得住埃奇沃思，可《数理心理学原理》这本书并不难找。英国经济学派（以凯恩斯在英国剑桥的导师阿尔弗雷德·马歇尔为中心）和欧洲大陆经济学派（以资本投资理论为焦点，以哈耶克在维也纳的导师路德维希·冯·米塞斯为首）固然有着深刻的分野，但两大阵营的接触却很频繁，误解也不浅。马歇尔的经济学以对这门学科的常识性认识和企业实际运营为基础，源自将英国造就成历史上最成功商业国家的浓厚重商主义传统。奥地利学派的诸多概念则更侧重于理论和机理，源自对企业如何运作的智性理解。

奥地利人大多懂英语，熟知英国传统，甚至为之折服；而英国人基本上不懂德文，也忽视奥地利和德国理论家的作品。但对学者们而言，国境线并不能阻挠思想的交流。书籍和期刊的交换往来，在整个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都不曾中断，哪怕学者们置身战壕的两边。哲学家维特根斯坦是凯恩斯在剑桥的朋友，又是哈耶克的远亲，他曾在奥地利军队服役，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驻扎在意大利前线。当时，他写信给凯恩斯说：“你能不能寄一本剑桥哲学家伯特兰·罗素的新书给我，等仗打完了我付钱给你。”凯恩斯及时地照办了。

就算哈耶克在维也纳大学藏书无数的图书馆里找不到《数理心理学原理》，接下来就向素昧平生又举世闻名的凯恩斯伸手，也未免有失分寸。凯恩斯可不仅仅是剑桥大学国王学院教研究生经济学的普通教员。42岁时，他因代表英国财政部出席巴黎和会而名满天下。巴黎和会上签署的《凡尔赛和约》，结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凯恩斯向公众揭示了巴黎和会上弥漫着强烈的排外心理和民族仇恨，他不光在英国成了名人，在整个欧洲尤其是德奥两个战败国也成了名人。

凯恩斯对经济学和公共财政的成熟认识相当引人瞩目，英国1914年9月刚一宣战，政府就延揽他去跟美国债权人磋商一笔巨额贷款。这笔贷款数目极大，不仅是因为英国在全世界的战争活动都靠它资助（那时英帝国的领地覆盖了半个地球），还因为美国银行家不信任法国和意大利能偿还贷款，所以宁可把钱借给英国，让后者去给协约国撑腰。凯恩斯的努力极为灵巧，又懂得在官僚机构里迂回跳跃，到战争结束时，他加入了顾问团，建议德国人如何为巨大的战争伤亡和损失进行赔偿。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破坏力在历史上达到了巅峰。德奥同盟国和英法俄（后来美国也加入进来）协约国的斗争根源，是国家版图和世界贸易。短短几个星期，双方挖出了绵延上千英里、距离近得喊话都能彼此听见的阴冷战壕，发起自杀性突击。这场战争标志着骑士时代的终结、摩登时代的到来。骑兵和刺刀肉搏慢慢让位给了坦克战、化学武器攻击和空中轰炸。恐怖的4年过去，德国人因为饥饿而无奈投降，到1918年停战时，数千万军人战死沙场，还有800万人“失踪”，2100万人受伤，近700万平民罹难。整整一代的欧洲青年不是死了，就是成了残疾人。

哈耶克回忆说，凯恩斯是“我们中欧人的英雄”，因为他勇敢地谴责英国、法国和美国的领导者对战败同盟国的人民课以沉重的战争赔款。《凡尔赛和约》签订短短几个月之后，凯恩斯就拿出了声讨巴黎和会的《和平的经济后果》，瞬间引发全球轰动。它猛烈抨击了协约国的领导者，对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法国总理乔治·克列孟梭（Clemenceau）、英国首相戴维·劳埃德·乔治（Lloyd George）都有不敬之语。凯恩斯预言，沉重的赔款会带来政治上的不稳定和极端政体，引发另一场世界大战。这是相当一针见血的批评，而且最终应验。哈耶克第一次和凯恩斯通信时，并不了解这位年轻的剑桥导师背叛资产阶级立场的前因后果。

凯恩斯出生于学术之家。他的父亲内维尔写过有关经济学的书，是剑桥大学的

行政管理员。他的母亲佛罗伦斯也是知识分子，是剑桥纽纳姆女子学院早期的毕业生，也是剑桥的第一任女市长。凯恩斯比自己的父母拥有更多独立和原创的心态。从伊顿公学（英国最出名的贵族中学）毕业后，凯恩斯成了国王学院的本科生，钻研数学。他父亲的导师白胡子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很快将他收为弟子。马歇尔是英语世界最权威经济学教科书《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 of Economics，1890）的作者，在书中，他介绍了一些基本的经济学概念，如供给满足需求时价格就出现了均衡，以及物体的用途决定了其价值等。马歇尔对凯恩斯的才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劝他放弃数学，把精力转到经济学上来。

在剑桥，凯恩斯和一群朋友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后者波西米亚的思想成为他余生思想和行为的指引。布鲁姆斯伯里小圈子的构成包括未来很快就成名的几位作家，如李顿·斯特雷奇（Lytton Strachey）、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E.M.福斯特（E.M.Forster），还有视觉艺术家邓肯·格兰特（Duncan Grant）、凡妮莎·贝尔（Vanessa Bell）、罗杰·弗莱（Roger Fry）等人。这些人都钦佩剑桥大学三一学院道德哲学家G.E.摩尔（G.E.Moore）的思想，摩尔高度重视个人友谊和审美的价值。这个小圈子抛弃了死板的维多利亚时代习俗，尤其是它清教徒式的性道德，圈子里的成员会说一种自创的语言来排斥他人。圈中人错综复杂的爱情生活是它的凝聚力所在。他们门对门地住在伦敦广场布鲁姆斯伯里街区（小圈子的名字就是这么来的），有时也住在英国南部乡下的复古寓所里。

凯恩斯长得不帅，也自认没有魅力，但他有一副存在感很强的好身板。他身高差不多有1.97米，略微驼背——他小学时就这样了。离开伊顿公学时，他就留起了一蓬大胡子。他最吸引人的地方是那双深邃、温暖、流露出关注之意的栗色眼睛。男男女女都为他倾倒。他醇厚的嗓音，连那些刻意抵挡他魅力的人都不禁入迷。正如哈耶克所说：“我们这些人运气好，有幸亲眼见到了他。他才华横溢又健谈，兴趣广泛兼有一副好嗓子，很快就折服了我们。”

凯恩斯和布鲁姆斯伯里的其他人走得不那么近，倒不是因为他的个人癖好——他狂热地收集当代绘画，是个多产而雄辩的作家，而是因为他所选择的领域。其他人可以欢天喜地地在传统社会之外过艺术家的生活，肆无忌惮地嘲笑既定秩序，但凯恩斯的经济天赋却让他很受战时政府的欢迎。这一点，他在布鲁姆斯伯里的同伴们从不讳言：凯恩斯跟他们鄙视的统治阶级“同流合污”了。和这个小圈子里不少人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看法一致，凯恩斯认为，政府想要明明白白的决定性胜利，

但这个算盘恐怕会落空。要阻止战壕里每天都上演的血腥厮杀，必须承认这是一场没有胜利者的战争，尽快休战。

1914年11月，战争几乎还没开打，凯恩斯就发现西线的战事惨烈得几乎让人无法容忍。“我彻底地痛苦难耐，”他写信给斯特雷奇（指英国历史学家和传记家Lytton Strachey，也是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里的成员），“日复一日地看到年轻人走上屠宰场，让我忍无可忍。这所大学已经有5个人，还是本科生，甚至刚毕业的，阵亡了。”随着战争陷入僵持，越来越多年轻朋友丧命的消息传了回来。“昨天传来消息，我们学校的两个本科生死了，他俩我都认识。”他写信给自己某段时期的秘密情人邓肯·格兰特。“今天，鲁珀特死了。”28岁的诗人鲁珀特·布鲁克在前往加里波利战场的途中阵亡，这一消息震惊全国，他在国王学院的朋友们尤感悲痛。

尽管凯恩斯有着浓重的和平主义倾向，他仍然乐意把自己的智慧借给战争活动，倒不是说他特别爱国，而是因为他对战时公共政策难题感到好奇。较之其他特别任命的官员，凯恩斯在战争期间所扮演的角色都更为重要。他做得也很好。替他写作传记的R.F.哈罗德（R.F.Harrod）解释说：“他在协约国的跨国经济活动中占据了关键地位，无人能挑战。他思考政策，实际上，还要承担决策的最终责任。”这是凯恩斯人生与哈耶克最大的不同点：哈耶克单纯地沉浸在经济理论当中，刻意地与政治保持着距离；凯恩斯感兴趣的却是应用经济学，改善他人生活。

战争进入第二年，即1915年，凯恩斯在财政部的职位和他“战争非道义”的信念发生冲突，逐渐影响到他在布鲁姆斯伯里小圈子里的友谊了。1916年年初，他在压力之下，和他们一起做了拒服兵役的登记，以免应征。斯特雷奇（他的情人格兰特移情别恋了凯恩斯）极为直率地表达了对凯恩斯职位的不满。财政部财务秘书埃德温·蒙塔古发表了一篇针对德国的血腥演说之后，斯特雷奇剪下一篇报道评论，放在凯恩斯的晚餐桌上，并附了纸条说：“亲爱的梅纳德，你怎么还在财政部呢？爱你的，利顿。”斯特雷奇还对弟弟詹姆斯说，“我本来要写信给他，正巧他跟我同在戈登广场用餐，所以我就把信搁在了他的盘子上。他真该辞职。”斯特雷奇接着说，“他还幻想着为这种人帮忙吗？有什么用？……这可怜的家伙觉得这事儿挺正派，他还承认，有能力把事情干好，让他感到愉悦，这是他留在财政部的一部分原因。他好像还以为，每个星期帮国家省下几百万（英镑），是为国家做了不起的贡献。”

压力让凯恩斯考虑辞职，他开始用大量的时间帮他拒服兵役的朋友们开脱，免得他们被送进监狱。但他仍然相信，他参与战争管理的做法是正确的，他的努力带来了更温和的政策，要是把他的工作交给别人做，恐怕更糟糕。到1918年11月，和平终于降临，他很高兴自己顶住了不负责任地辞职回国王学院的念头。但战争结束并没卸下他肩上公职的担子。1919年1月，他以英国战时政策负责人的身份，动身去参加巴黎和会，为首相劳埃德·乔治提供谈判策略方面的建议。

凯恩斯对会谈并不心存幻想，他的态度和他为自己参与战争管理的辩解一样：如此密切地参与国家事务，他感到很愉快。他认为，如果有他参加，会谈结果会更公正、更文明。他对自己喂养了战争机器这么久一直心怀愧疚，他希望确保条约公平，借此释怀。诚如他的传记作者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Robert Skidelsky）所说："他一直在为自己寻找赎罪的办法。"

协约国最关心的是要让"德国人用土地、海洋甚至空气，补偿因其侵略行为而对协约国平民及财产造成的所有损失。"在瘦高总理乔治·克列孟梭的率领下，法国人最为固执地坚持，要让发动战争的战败国偿还对物质和人力造成的破坏，但协约国很快就陷入困境。它们越是要求没收德国的国内资产和海外投资，清算其煤炭和钢铁行业、商业船队等，德国人就越是不可能偿还每年的现金赔款。匈牙利、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竞相独立（它们从前是德意志和奥匈帝国的领土，会把盈余物资送往帝国首都），进一步削弱了战败国的还款能力。

其他的并发症也不少。冲突导致的后果之一是，在俄国，先是孟什维克民主党人结束了沙皇尼古拉二世的统治，与轴心国和谈，接着布尔什维克又发动武装起义，推翻了孟什维克的民主政府。如果协约国对战败国一味搜刮，很可能会破坏战败国的民主制度。事实上，在德国战败看似不可避免的1918年11月，德皇威廉二世刚遭废黜，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就领导斯巴达克斯同盟（Spartacus League）发动了革命，挑战新成立的民主政府。然而，协约国还是继续为极端分子创造着滋生的条件。他们一面为怎样榨干魏玛政府而争吵不休，一面继续对德国实行封锁。不久，一场人道主义灾难就席卷了德国和奥地利，民众的苦难为革命者拉拢人心创造了完美的条件。

在巴黎，凯恩斯成了战败国的无声支持者。他认为，不应该把德国给活活饿死，又进而着手确保奥地利得到更仁慈的待遇（维也纳人都知道这件事——年轻的

哈耶克也刚从意大利前线回来）。凯恩斯结识了卡尔·梅尔基奥（Carl Melchior）博士，后者是汉堡沃伯格家族银行（M.M.Warburg）的合伙人，也是德国在巴黎的首席谈判代表。两人秘密会面（此种行为是协约国严禁的），谋划了一笔交易：只要德国商船队向协约国投降，就送粮食到德国去。

1918年5月，凯恩斯代表奥地利挨饿的妇女和儿童提出恳求。根据奠定梅尔基奥协议的会议纪要，“凯恩斯先生声称，对奥地利所处的可怕情况，他但愿自己能设身处地地加以设想。民众大规模地挨饿，（英国）已经借给他们大笔资金来购买食物，还有大量民众没有衣服穿。人民置身绝境，他们已经为参与战争遭受了可怕的惩罚。”面对奥地利人民的困境，凯恩斯反对战胜国，反对《凡尔赛和约》，这让他在哈耶克和维也纳的朋友们中获得了英雄般的地位。

凯恩斯相信，庞大的赔款会给欧洲带来灾难般的影响，让永久和平的前景越发黯淡。“我彻底筋疲力尽了，一部分是因为工作，另一部分是因为邪恶围绕着我，让我感到抑郁。”他给母亲写信说，“《凡尔赛和约》太离谱，根本做不到，只会带来不幸……我想，我已经成了这一切邪恶与愚昧的帮凶了，但现在它很快就会有个了断。”他写信给当时假作农场工人逃避征兵的格兰特，说协约国的领导者“本有机会以仁慈甚或宏观长远的立场看待世界，但他们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他写信给财政大臣奥斯汀·张伯伦（Austen Chamberlain）：“首相要把我们带入毁灭的泥沼。他提议的欧洲战后安置计划会扰乱经济，让数百万人送掉性命。这场悲惨的闹剧，你指望我怎样为它出力呢？”此前的一个星期，张伯伦曾表示，“我强烈感觉，您目前继续为国家出力，极为重要。”但这一回，财政大臣未作回应。

凯恩斯搬出了财政部谈判团队所住的马捷斯蒂克酒店，在巴黎市西边毗邻宁静的布洛涅森林找了处公寓躲了进去。他患上了神经衰弱，写信给母亲说：“我有一半的时间都躺在床上，只在和财政大臣、财政大臣的盟友，要求对战败国施以惩罚性赔偿的南非战场元帅J.C.斯马茨（J.C.Smuts），首相劳埃德·乔治会面时才起来……上个星期，我真的到了极限了，我完全不喜欢那样的前景，直接睡到了床上。”因为深信自己再无法让条约恢复理智了，凯恩斯写信给劳埃德·乔治要求辞职，“我应该让您知道，上周六，我从这场噩梦里开小差了。我在这儿帮不了更多忙了……战役输了。”

巴黎和会上的所见所闻，让凯恩斯难耐心中的怒火，他决定把这次经历好好利

用起来。他躲到格兰特和妻子瓦妮莎·贝尔在东萨塞克斯郡查尔斯顿的一间农舍，于短短两个星期里，他热烈地写下《和平的经济后果》，以冷静、全面、无情也略带打趣的口吻，揭露了战胜国索赔主张危险至极的荒唐。他的整体观点是，和谈与和平无关。贪婪地复仇，渴望看到德国永远臣服脚下，有可能会唤起另一场导致世界冲突的“欧洲内战”。“受疯狂的妄想和鲁莽的自利所打动，德国人掀翻了我们所有人居住其上、建设的根基。”凯恩斯写道，“但法国和英国民众的代言人，却还要冒险把这片废墟毁得更彻底些。”

凯恩斯希望读者们理解，协约国对德国施以重罚犯下了弥天大错，德国根本没有能力履行其条约义务。他从斯特雷奇的讽刺作品《维多利亚名人传》（Eminent Victorians，这是一本揭穿英国偶像真实面目的书，比如克里米亚战争中涌现的护士英雄佛罗伦萨·南丁格尔等）汲取了灵感，对齐聚在威尔逊总统巴黎会客室里的人物做了一番刻薄的白描，调动了公众的想象力。克列孟梭，“一位年迈的老人，平时总把力气留给重要的场合……常常闭着眼睛，面无表情地靠在椅背上，带着灰色手套的双手环扣，搭在前面。”法国总理的态度是“你绝不要跟德国人谈判，不要安抚他们，你必须对他们发号施令”。克列孟梭相信，“公正公平的和平条约太宽宏大量了……只会减少德国人恢复元气的时限，加快它东山再起、再次蹂躏法国的进度。”

凯恩斯对劳埃德·乔治的评价同样尖刻，尽管他在母亲的劝说下，省略了一段辞藻华丽的形容：“（劳埃德）这塞壬女妖，这山羊脚的诗人，这半人的访客，从凯尔特巫女横行的古老魔法森林穿越到我们的时代。”但凯恩斯仍然保留了如下批评：劳埃德·乔治为确保自己所在的自由党政府获胜，竟在巴黎和会谈判的过程中召开换届选举，而后又跟保守党对手竞相投标，赌谁能最快让德国一贫如洗。

对凯恩斯而言，和约的邪恶之处体现在细节当中。德国要把它在1870年普法战争中占领的煤炭基地阿尔萨斯-洛林地区归还给法国，还要让出本属于自己的产煤大省萨尔和上西里西亚。凯恩斯判断，“没有了煤炭，德国的工业会遭到破坏。”此外，德国还要把莱茵河等可通航的河流交给一家国际机构，放弃自己的商船队还有大部分的铁路。他认为，“欧洲工业的未来为黑暗笼罩，革命的前景大好。”

还有赔款。凯恩斯揭穿，法国的主要目的是确保德国再度沦落为贫穷的农业国，同时，法国和意大利还有一个次要目标：挽救本国破产的经济。虽然人人都知

道，德国业已破产，破产导致了它的投降，它本身再也无力通过税收或借贷来筹集资金，可这没关系，没人在乎。凯恩斯指出，恨意深重的协约国复仇心切，“德国偿还能力的预测值，远远满足不了民众的期待。”条约坚持的数目大大超出了德国的能力。“事实上，德国是把自己的盈余产能永远地交给了协约国。”凯恩斯断言，条约“年复一年地剥削着（德国的）民众”，未来终将证明，《凡尔赛和约》“必定是文明史上残忍胜利者所做出的一轮最残暴行径。”

1919年11月，《和平的经济后果》一书手稿交到了出版商麦克米伦手里，次月付梓上市。就连把情人格兰特输给了凯恩斯，又爱对朋友的文学成就吹毛求疵的斯特雷奇也掩盖不了内心的喜悦。“亲爱的梅纳德，”他写道，“你的书昨天送到了，我一口就把它给吞了……它绝对惊人、绝对可怕。”凯恩斯半开玩笑地回答，这本书的反响是“它淹没在了……如洪水般的赞美里”，他写道，“每一位内阁大臣都来信说，书里的每一个字，他们都深表认同，等等。我猜隔不了多久，连首相大人也会告诉我，这本书代表了他的观点，写得妙不可言。”

强硬的大众媒体指责凯恩斯亲德，说他不明白狠狠教训德国人有多么重要。一家报纸建议给凯恩斯授铁十字勋章，那是德国最高的英勇奖励。凯恩斯的东家张伯伦斥责他不忠，“坦白说，我很遗憾，人坐在一个凝聚了如此之多信任的职位上……竟然如此冲动地歪曲他的祖国所扮演的角色。”他写道，“我不禁担心，这样的评论恐怕不会让我们的外交路线变得更顺畅。”这本书，哈罗德形容是“最优秀的一部英语论战之作”，斯基德尔斯基则称之为“20世纪文学史上最独特的个人声音”。它注定要改变凯恩斯的生活。从那以后，他成了世界各地报纸的宠儿，媒体争着要他对和约、对任何世界贸易与经济的相关事件加以评论。

这本书的销量证明了一切，美国初版的两万册立刻卖得精光。到1920年4月，英国总共售出18500册，美国售出70000册。它被译成了法语、荷兰语、意大利语以及俄语、罗马尼亚语、西班牙语、日语和中文。到6月，全球销量超过了10万册。更让凯恩斯高兴的是，它还被翻译成了德语。它的德文版在维也纳大受欢迎。正如哈耶克所说，“他的《和平的经济后果》让他在欧洲大陆比在英国还出名了。”

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的战争经历和年长他16岁的凯恩斯非常不同。1914年战争爆发时，哈耶克不过是个15岁的中学生，可惜他个头挺高，陌生人看到他，总问他为什么不入伍。冯·哈耶克一家都是爱国的奥地利人，19世纪末维也纳的完美产物，毫

不怀疑皇帝要和德国人并肩作战的决定。不过，弗里德里希·哈耶克要到1917年3月快满18岁时（他是三兄弟中的老大），才进了部队当上军官。

他的父亲奥古斯特是名医生，也是个郁郁不得志的大学讲师，因为没能成为全职学者，总怀着一种失败感。为了安慰自己，他在维也纳大学兼职教授植物学。和凯恩斯家族一样，哈耶克一家也多是知识分子。奥古斯特的父亲古斯塔夫是中学的自然老师，他的岳父弗朗茨·冯·尤拉舍克（Franz von Juraschek）是奥地利最知名的经济学家之一。奥古斯特受挫的雄心似乎遗传给了弗里德里希·哈耶克，他入伍服役时，打算一恢复和平就努力到大学当讲师。“我小时候一直怀着这样的念头——人生中没有任何职业比大学教授更崇高，虽说我并不清楚想要钻研哪个科目……我甚至想过当个心理医生。”他回忆说。

和学业出众的凯恩斯不同，哈耶克是个差生，两次被学校除名，他坦言：“（那是）因为我跟老师惹出了些麻烦，我本来有能力，但懒惰，显得缺乏兴趣，老师生气了……我始终不做作业，指望着上课攒够足够的分数，好胡乱应付过去。”让他感到宽慰的是，哈耶克发现，超群的智力让他在军官训练班上脱颖而出。“虽说没什么特别的天赋，甚至还有点笨手笨脚，但我在七八十名候补军官里总能排进前五六名。”到他训练结束时，战争已进入最后一年，他到意大利前线当通讯官。他至少有4次差点送了命，有一回，弹片割开了他的头盖骨。另一次，他完全暴露地去攻击南斯拉夫的机枪阵地，事后，他干瘪瘪地形容说，（那是）“挺不愉快的经历”。他从观测气球里往外跳伞，却忘了摘下耳机，差点儿给勒死。他搭乘的侦察机遭意大利战斗机的狠狠开火。

但大多数时候，战争意味着无止境的等待、拖垮人的无聊。哈耶克通过阅读寻求慰藉，他读完借来的经济书之后，找到了自己激情所寄的学科。“（我碰到的）前两本经济书……糟糕透顶，没把我的激情永远浇灭，倒叫我惊讶。”他说。哈耶克感到好奇，当自由市场让位给国家需求，和平时期的经济怎样转化为战时经济。他读了瓦尔特·拉特瑙（Walter Rathenau）的著作，瓦尔特本来是经济学家，后来进入政界，负责奥地利战争期间的原材料供给。“我认为，他关于如何重组经济的设想，是我对经济学发生兴趣的源头，”哈耶克说，“这些想法，都绝对有些轻微的社会主义倾向。”

“我从来不算正式的社会民主派，但要是在英格兰的话，我会被算成是费边社

会主义者。”哈耶克回忆说。故此，他比终身的自由党人凯恩斯偏左。自由党是一个呼吁在社会民主主义（目标是以民主的方式在主要产业中引入公有制）和保守主义（以追求自由市场为目的）之间走中间路线的进步党派。“马克思社会主义从没吸引过我，”哈耶克说，“拉特瑙笔下温和的德国社会主义，是我从事经济学研究的诱因之一。”轮休时，哈耶克到维也纳大学登了记，一等战争结束就去修读经济学。

1918年11月11日停战后，哈耶克回到了维也纳，但它不再是哈耶克记忆中那座丰富多彩、成熟而自信的城市了。战争让哈耶克变得身体欠佳。战争的最后几个星期，他染上了疟疾。战败之后，奥匈帝国（拥有5000万人口）的皇帝卡尔一世隐匿起来，不再领导以前领土残存的疆域。战争结束后，分裂主义运动在混乱中抢占了优势，独立国家相继成立。奥匈帝国70%的领土都变成了新国家，如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和南斯拉夫。匈牙利也脱离了奥地利，宣布自己是马克思主义的共和国。剧变甚至影响了冯·哈耶克家族的姓氏：按照奥地利新共和政府的法令，名门望族不得再使用“冯”这个姓氏前缀。

《圣日耳曼条约》（Treaty of Saint-Germain-en-Laye-EN-Laye）之于奥地利，并不比《凡尔赛和约》之于德国更轻松。奥匈帝国解体后残存的“德国人的奥地利，”就像是一具没有身躯的头颅。战胜国禁止它把自己称作“德语地区”，未经国联许可，它不得与德国结盟。奥地利人民因为轴心国在战争冲突中破产而遭到掠夺，可战争结束后，这掠夺却变本加厉了。哈耶克回忆说：“维也纳，欧洲最伟大的文化和政治中心之一……成了农民和工人共和国的首都。”没了帝国的供应线，维也纳很快用光了匈牙利小麦和捷克煤炭的储备；面包和电力等基本商品价格奇贵；妇女和儿童上街乞讨。

就在这场地狱般的风暴里，凯恩斯的《和平的经济后果》降临，让哈耶克和朋友们如饥似渴地捧读起来。一如既往，凯恩斯怀着减轻痛苦的愿望，形容奥地利人经受的贫困是战后安排明显最不平等的地方。他控诉协约国领导者对奥地利人的困境冷血地袖手旁观。“在他们眼里，欧洲的饥饿和瓦解问题，不可能唤起（协约国）四巨头的兴趣。”他写道。四国成员彻底痴迷于复仇，对战败国陷入混乱和革命风潮似乎视而不见。“我们面临的危险，”凯恩斯写道，“是欧洲群众的生活标准，已经降到一些人真正会挨饿的地步（俄国已经到了这一步，奥地利大概也快了）……这些痛苦的人，恐怕会推翻政府的残余，淹没文明本身。”奥地利人没有能

力偿还强加给他们的沉重债务，“因为他们什么也没有。”凯恩斯写道。在奥地利，“饥荒、严寒、疾病、战争、谋杀、无政府状态，就是实实在在的现状。”

凯恩斯援引了德国政府的观点：赔偿金会让时光倒流半个世纪，让德国回到前工业化经济，只能维持当前人口比例中的一小部分。“签署这份条约的人，就是签署了数百万德国男女的死刑判决。”他写道，“对奥地利人的处置结果，和德国人至少相当。”凯恩斯援引维也纳《工人报》上发表的社论：“《圣日耳曼条约》的每一条款，都充斥着残忍无情的气息，觉察不到人类的同情心，践踏了人之为人的一切意义，是对人类本身、对一群饱受苦难和折磨的人的犯罪。”凯恩斯评论说：“我对奥地利条约的细节很熟悉，起草它时，我也看过部分条款，但我很难反驳（奥地利人）这股怨气里的正当之处。”

凯恩斯指出，物价飞速上涨威胁着德国和奥地利的市民社会。就连哈耶克这样的战前维也纳小康之家，也免不了生活水平大打折扣。1913年一双卖12马克的鞋，10年后转手竟然卖到32万亿马克。一杯啤酒需要10亿马克。百万元的大票子用来点炉子。由于生活用品价格飙升，哈耶克这样家庭的现金积蓄变得一文不值，不动产的价值也大幅缩水。忠诚而爱国的奥地利人买下的战时政府债券，更是成了废纸一堆。

对19岁的哈耶克来说，战争的结束让他的事业道路发生了变化。尽管他在维也纳大学注册了经济学，但他还穿着军装时，也为避免战争“无限期”持续而安排了备用计划。他打算从前线的危险里光荣逃生：参加奥地利外交使团。他申请转移到空军，漫长的培训过程给了他充分的时间研究外交学院的入学考试。“我不希望做个懦夫，所以我最终决定，志愿参加空军，证明我不是懦夫。”他说。“如果我在战斗机里活得了6个月，我想我就有资格退伍了。现在，一切都因为战争的结束泡汤了——匈牙利分裂了，外交学院消失了，光荣退出战争的动机垮了。”

哈耶克回到了自己先前的打算，进入维也纳大学法律系。当时，法律系教经济学。他开始熟悉奥地利经济学派。哈耶克开始学经济学的时候，奥地利学派还不像它后来那么特立独行。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奥地利学派碰上了马克思主义者，于是它开始大力宣扬自由市场的美德，要对经济采用放任自流的方法。奥地利学派特别关注价格，尤其是产品的“机会成本”，也就是说，消费者在购买竞争货品时可选择的替代品。如果有人买了啤酒，而放弃了买红酒；如果有人拿钱进行投资，而

放弃了存款所得的利息；如果有人变卖投资，而放弃了投资稍后可卖到的价格——后者就是他们选择前者所付出的机会成本。诸如此类。这就是蕴藏在资本理论背后的机会成本概念：在不同的“生产阶段”，生产者为稍后提供更有价值的货品而放弃了制造另一种货品。哈耶克最开始读的是卡尔·门格尔（Carl Menger）的《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 of Economics）和《社会学方法探讨》（Investigations into the Method of Social Sciences）。门格尔最先提出了边际效用的概念：商品的数量越多，人们就越觉得它价值不高。哈耶克师从弗里德里希·冯·维塞尔（Friedrich von Wieser），后者主张：价格是理解市场运作的关键，企业家是确保开拓新市场取得进展的关键环节。

对哈耶克来说，战后的维也纳是一个探讨经济的完美所在，他免不了要受身边汹涌的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影响。他的父亲是医生，可以随行就市，上调出诊费，供得起儿子上大学，但没有闲钱资助他到别处游学了。1919~1920年，由于取暖燃料短缺，维也纳大学整个冬天都不开学，哈耶克到瑞士苏黎世过了8个星期，出钱的是他父亲的植物学家朋友们。哈耶克说，这些朋友“想对营养不良的德国和奥地利孩子表表心意，给老朋友刚从战场上回来的儿子帮帮忙，他虽然不需要养活，但也同样得了疟疾”。

“1919年到1920年的苏黎世，让我在战后时期头一回品尝到‘正常’社会是什么样子，那时候，维也纳仍处在通货膨胀和半饥荒的阵痛当中。”哈耶克说。因为仰慕在慕尼黑大学执教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他曾打算到那儿去修第二学位。可1920年6月，56岁的韦伯因为流感过世，这个计划泡汤了——虽说这并不是哈耶克改变主意的主要原因。他解释说：“到了奥地利通货膨胀的后期，我的父亲无论如何都付不起让我去德国留学一年的费用了。”但失望里也带来些好处。他没去巴伐利亚读一年书，而是尽力找了份工作。在这个过程中，他遇到了对他人生和事业最重要、影响最大的人，维也纳大学的经济学讲师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米塞斯在奥地利政府有些过硬的关系，得以研究席卷全国的涨价。米塞斯鼻子长，性格自恋，难打交道，留着卓别林式的小胡子，后来成为市场经济之父，为相信经济体中货币数量是理解通货膨胀关键的后世学者带来了灵感。

哈耶克用了差不多的时间学习经济学、心理学和法律（他认为法律是自己的“副业”），1921年11月，他用了不到两年时间拿到了学历，从大学毕业。老师

维塞尔把哈耶克推荐给米塞斯，到监管奥地利和其他国家之间战争债务处置问题的政府机构去做法律助理。故此，哈耶克得以在一个类似凯恩斯的领域里工作。哈耶克与米塞斯的第一次见面并不愉快。维塞尔在推荐信里对米塞斯说，哈耶克是个“有前途的经济学家”，而自负的米塞斯却对哈耶克说：“有前途的经济学家？我从没在我的讲堂上看到过你。”但不管怎么说，米塞斯还是把工作给了哈耶克，1921年10月，哈耶克正式上岗。

每个月领薪水支票的时候，哈耶克都要领受一番奥地利失控的通货膨胀。他第一个月的薪水是5000旧克朗伦（奥地利的旧制金币），但接下来的一个月，他拿到了15000克朗伦，作为币值下跌的补偿。到1922年7月，哈耶克的薪水涨到了100万克朗伦，才跟得上超级通货膨胀的脚步。短短8个月里，哈耶克享受了200次涨薪。1919年1月，1美元可兑换16.1奥地利克朗，1923年5月，1美元则可兑换70800克朗。为了跟上需求，奥匈银行（Austro-Hungarian Bank）夜以继日地加印钞票。

在《和平的经济后果》中，凯恩斯指出了通货膨胀失控造成的威胁，但他所用的语言日后遭到了哈耶克及其“健全货币”追随者的驳斥。凯恩斯意识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货币与黄金价格挂钩的固定关系，但由于政府超发货币来为战争提供资金，这种关系业已失效。凯恩斯提醒读者，货币破产相当于在邀请革命的到来。凯恩斯写道：“通过持续的通货膨胀，政府得以神不知鬼不觉地悄悄没收相当大一部分的国民财富。”他写道：“要颠覆现有的社会基础，再也没有比破坏货币更微妙又稳妥的手段了。”按凯恩斯的推算，1918年11月，“俄国和奥匈帝国（印刷钞票）进入这个阶段后，货币对外贸易的目的其实已经没用了。”但凯恩斯告诫说：“然而，用法律的力量进行价格控制，维持货币的虚假价值，本身就孕育了经济最终崩溃的种子。”对像哈耶克那样蜷缩在公寓里，因为买不起燃料而裹着冬天大衣的人来说，凯恩斯的警告是完全真实的。

凯恩斯又把思路转到物价通胀和币值猛跌的实际补救措施上。《曼彻斯特卫报》（Manchester Guardian）的编辑C.P.斯科特（C.P.Scott）委托他编辑了系列副刊，建言解决欧洲重建的问题。很快，凯恩斯提出的这套新论点在国际上大获成功。副刊翻译成了德语等其他语言，哈耶克、米塞斯和其他学者热切地拜读了每一卷。

“我们全都热切地捧读他的名作……他在《货币改革论》（A Tract on

Monetary Reform，凯恩斯1923年出版的书，大部分内容都来自他在《卫报》上发表的文章）中预料到了我最初的小小发现，叫我更是好生钦佩。”哈耶克回忆说。凯恩斯“预料”到的“小小发现”指的是将货币价格跟黄金挂钩，也就是“黄金本位”，国内价格就会出现波动，并无法控制。各国政府都面临着以下选择：是要价格稳定的货币，还是要稳定国内价格。正如凯恩斯所说：“如果外部价格水平不稳定，我们就无法维持自己的价格水平和汇率。我们必须做出选择。”这时候，凯恩斯和哈耶克是顺着同样的线索在思考（或许是同时冒出了灵感）——尽管米塞斯警告哈耶克，凯恩斯“在用一些非常糟糕的经济论据支持一桩善良的事业。”

凯恩斯接受了《卫报》副刊极其优厚的报酬。C.P.斯科特常常在面对凯恩斯时感到挫败，他说凯恩斯是“才华横溢的原创思想家”，但同时“是我遇到的最顽固、最以自我为中心的人”。凯恩斯说服了一大群名人供稿，其中有英国的战时首相H.H.阿斯奎斯（H.H.Asquith）；未来的英国工党首相拉姆齐·麦克唐纳（Ramsay MacDonald）；日后连任三届法国总理的莱昂·布鲁姆（Leon Blum）；英国费边社会民主运动及伦敦经济学院创始人西德尼·韦伯（Sidney Webb）和他的妻子比阿特丽丝；美国记者沃尔特·李普曼；俄罗斯作家马克西姆·高尔基；伦敦经济和政治科学学院的哈罗德·拉斯基（Harold Laski）；牛津历史学家理查德·托尼（Richard Tawney）和G.D.H.科尔（G.D.H.Cole）；德国在巴黎和会上的首席谈判代表卡尔·梅尔基奥（Carl Melchior）；甚至还有罗马尼亚的王后。凯恩斯又为这事儿增添了一丝布鲁姆斯伯里的花边：他委托邓肯·格兰特和凡妮莎·贝尔绘制图书的封面。

在1922年4月出版的第一期副刊里，凯恩斯独自写了三篇文章，其中两篇都收入了《货币改革论》。文章的主题激起了战败国读者的极大兴趣，因为这些国家的货币自1914年以后无不大幅贬值。凯恩斯认为，要是这些国家将货币恢复战前的币值，必将付出高昂的代价。他建议，这些货币以当前价格和英镑挂钩，英镑每年价值上浮不得超过6%。这和英国财政部及英格兰银行的意见相反，后两者都希望英镑恢复战前币值。

货币回到战前汇率的代价是巨大的通货紧缩（价格持续下跌），此外还伴随着高利率，进口多少商品就要出口多少商品。正如凯恩斯所说，“辛苦工作，如同奴隶。”尽管米塞斯心存疑虑，但哈耶克赞同凯恩斯绝大部分的分析。凯恩斯主张，只有价格稳定，才能让欧洲家庭避免更多不公正的伤害——通货膨胀（价格上涨）和通货紧缩都做不到。事实上，他笔下所说的“很少花钱，也不‘投机’，为‘家

人提供适当的储蓄’ ……这样的人却遭受到最沉重的打击，” 这正是哈耶克一家的遭遇：爱国心把他们带到了近乎赤贫的状态。

凯恩斯在增刊中推荐的补救措施第一步，是由政府管理经济。这一思路，让他与米塞斯、哈耶克及其他自由市场信徒区别开来。欧洲政府被迫要在通胀和通缩之间做出选择。在凯恩斯看来，这证明了放任政策不再合适。他主张，政府要采取行动，避免价格波动。

米塞斯以及后来哈耶克相信，市场走向“均衡”的“自然力量”能够让波动的经济恢复秩序。对凯恩斯而言，“袖手旁观”以及受“因故意取消中央控制而带来的机会”敲打，这样的做法不可接受，因为它会严重伤害不可动摇的价格水平。凯恩斯认为：“我们必须摆脱对 ‘有意识地决定监管价值水平’ 的深刻不信任。”

凯恩斯无情地批评了美国为维持美元币值而将之与黄金挂钩的做法，他说：“兰德的矿工们辛辛苦苦地把黄金挖出地面，华盛顿却又把它埋进了白宫。” 与此同时，他评论了自由市场与管制经济的相对优点。根据他的推算，金本位（即货币价格与金价挂钩）并不是真正的自由市场机制，因为它的交易价格是由中央银行规定的。“现代世界使用纸币和银行信贷，不管我们愿意与否，没人能离得开 ‘管制’ 货币。” 他辩称，“（货币）可兑换成黄金，并不能改变以下事实——黄金本身的价格取决于中央银行政策。” 未来的哈耶克亦采纳了这一思路。

凯恩斯还着手检验了经济会随时间达到休止点、人人都上岗就业这一概念背后的逻辑，这是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传授给他的“真理”，也是奥地利学派的主要信条。凯恩斯诊断了货币和价格随时间推移的关系之后，得出结论说，“就长期而言”，系统内的货币数量和稳定价格之间必然存在一个恒定的关系。然而，“这一长期，对当前事务而言起到了误导作用”，他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改变价格与货币数量关系的是货币的花销速度（“流通速度”），它能调整价格与货币数量的比例。均衡状态固然取决于“长期”，但他话锋一转，给出了自己最出名的一句评论，“长期而言，我们都会死的。”

尽管凯恩斯旨在观察货币与价格的关系，但他发现，对所有意图评估均衡理论在经济中所扮演角色的人来说，“长期而言，我们都会死的”具有更普遍的意义。虽然要到几年后凯恩斯才逐渐放弃对均衡理论的信念，但此刻的他，找到了一种解释的途径：为什么理应出现的均衡状态无法治愈居高不下的失业率。均衡理论认

为，从长期来看总会达到人人都就业的状态，凯恩斯却发现，长期是一个可望不可即的时限，总是设定在未来某个不确定的地方。这就像棍子上拴着胡萝卜哄驴往前走一样，长期永远遥不可及。所以，当后来者提出，长期而言，用公共支出解决失业率会造成通货膨胀，用凯恩斯的这句话来还击方便又好用："长期而言，我们都会死的。"

说到汇率在决定通胀中所扮演的角色，凯恩斯的观点对哈耶克及其他奥地利学派信徒尤为切题。大多数欧洲政府允许货币自由浮动，视整个大陆是否能恢复到1914年的经济状况而决定，奥地利政府却打算立刻提高克朗伦的币值。政府以削减公共开支为条件（包括削减70000个政府岗位，取消食物补贴），从国际联盟贷到了一笔款项。1925年，克朗伦以高币值和金价挂了钩。凯恩斯的《卫报》文章点明了包括汇率管理在内的原则，哈耶克和同事们则从近距离见证了提高克朗伦币值等举措带来的惨痛后果。

哈耶克很快感到不安，决定亲自到美国去看一看不受约束的资本主义如何运作。多亏了政府薪金一直按通货膨胀加以调整，他的收入跟得上涨价的步伐，还能省下来一点点。1922年春，米塞斯把哈耶克介绍给了纽约大学教授耶利米·惠普尔·杰肯斯（Jeremiah Whipple Jenks），后者正随同包括凯恩斯在内的一群金融专家访问维也纳，他们受德国政府的聘请，为如何稳定马克币值提供建议。杰肯斯打算写一本有关中欧国家经济饱受战争蹂躏的书，便邀哈耶克到曼哈顿做该项目的研究员。

因为手头的钱太紧了，哈耶克买的是横跨大西洋的单程票——往返票他买不起。为了节省电报的费用，他也没告诉杰肯斯自己到的日子。1923年，哈耶克口袋里揣着仅仅25美元，在曼哈顿西城的客轮码头下了船，赶到杰肯斯在纽约大学的办公室，接待人员却告诉他，教授暂时联系不到。哈耶克站在一块陌生的土地上，身无分文，一个人也不认识。他决定在杰肯斯回来之前先找份工作，就到第六大道上的一家餐厅去洗碗了。他刚把双手埋在泡沫里一个小时，就接到了杰肯斯办公室打来的电话，说经济学家回来了。这是哈耶克最后一次从事体力劳动。事实上，他活了整整92个年头，从来没为私营部门工作过。

哈耶克立刻有滋有味地在美国展开了新生活。他在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J.D.迈吉（J.D.Magee）手下进修博士；参加了商业周期（即经济快速增长、兴旺繁荣的

时期过后总跟着经济衰退、经济活动收缩的时期）权威韦斯利·克莱尔·米切尔（Wesley Clair Mitchell）大受欢迎的讲座；还到哥伦比亚大学参加了德国社会学家J.B.克拉克（J.B.Clark）举办的讲座。哈耶克对联邦储备委员会的诡秘运作很感兴趣，凯恩斯曾详细说明了该机构囤积黄金、操纵货币的做法。接下来，哈耶克还为威拉德·索普（Willard Thorp）短期工作过，索普是威尔逊总统在巴黎和会上的经济顾问。这一时期，他收集了德国、奥地利和意大利的工业绩效波动信息，并开始对商业周期的性质和可预见性展开思考。

1924年5月，用光了金钱和运气，哈耶克再度起航横跨大西洋。刚回到家，他便收到一封授予自己洛克菲勒奖学金的信，要是这封信来得早些，他还能再在美国多待一年。但奖学金来得太晚了。接下来的25年，哈耶克都没回过美国。

1924年，哈耶克回到维也纳，继续从事监管奥地利债务的政府工作。米塞斯把哈耶克拉到自己的羽翼之下，开始担任他的导师，甚至帮他在奥地利行业商会找工作。哈耶克开始追求海伦·伯塔玛丽亚·冯·弗里奇（Helen Berta Maria von Fritsch）时，米塞斯还替他出力，邀请两人到自己家共进晚餐。

也是米塞斯，对哈耶克赞美社会主义优点的想法表示了怀疑。1920年，米塞斯写了《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计算》（Economic Calculation in the Socialist Commonwealth），1922年又写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社会主义：经济与社会学的分析》（Socialism：An Economic and Sociological Analysis）。这两本书扰乱了哈耶克的社会民主主义信仰，让他逐渐意识到：集体主义是一尊伪神。正如哈耶克所说：“社会主义允诺满足我们的愿望，建设一个更理性、更公正的世界。可米塞斯拿出了《社会主义》这本书。我们的希望破灭了。社会主义告诉我们，我们寻求改善的方向找错了。”

米塞斯在《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计算》中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主要产业（“生产资料”）由政府所有，故此，商品的价格以及价格的关键目的（分配稀缺资源）就变得冗余了。他声称：“让我们脱离生产资料私有制和货币使用的每一步，也就是在让我们脱离理性的经济。”米塞斯的观点后来成为凯恩斯与哈耶克辩论的核心。

米塞斯尝试为哈耶克寻找政府资助的研究岗位时，哈耶克正着手撰写自己在美国学到的东西，他提出，美国的廉价信贷导致了资本商品业的繁荣，但他相信，这

种情况是不可持续的。哈耶克是根据商业周期（他称之为“行业波动”）的性质来做的推断，这成为他对经济理论所做的重大贡献，也成为他与凯恩斯发生遭遇战的战场。要想当上全职的大学讲师，哈耶克必须发表原作的部分内容。为此，他开始整合事实与论据，为货币理论构建重要的贡献。这一点，也将让他与凯恩斯发生冲突。

在美国，哈耶克得出结论，商业周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在商业周期中，经济定期在高活性的繁荣时期与企业破产、高失业率的时期之间切换。熟悉了在美国已得到广泛应用但欧洲经济学家尚未接受的实证研究工具（如对工人行为的时间和动作研究，记录工厂和机器的产量等）之后，他希望确立一种机制来深入研究商业周期。哈耶克把想法告诉了米塞斯，米塞斯表示怀疑，甚至有点儿不屑一顾。米塞斯根本不相信经济学也可以当成自然科学一样被研究，他认为，记录商业周期的因素会造成误导，毫无意义。

与此同时，在英国，凯恩斯的脑袋也飞快地转动着。他正准备把在《卫报》上写的文章编撰成一本书。这本书于1923年12月正式出版，此前的几个月，他开始着手写一本新书，探讨货币在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这就是《货币论》（A Treatise on Money）。他直率的经济辩论文章大受欢迎，不论是老牌的《泰晤士报》还是民粹主义的《每日邮报》都找他索稿。1923年3月，他担任《国家文艺杂志》（The Nation and Athenaeum）的主编之后，又为该刊的专栏撰写时事文章。

20世纪20年代初，英国迎来了居高不下的失业率，凯恩斯把注意力转到了这一领域。他同情那些没有工作的人，同时也感到愤慨：人们竟然真的认为经济有必要容纳如此庞大的失业群体——到1923年7月，英国共有110万人失业，占总劳动力的11.4%。他开始怀疑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教给他的关键假设：随着时间的流逝，经济会进入充分就业的均衡状态。随着失业数字持续上升，凯恩斯大力宣扬起自己的观点：政府应当通过发行债券的方式，降低利率。此外，凯恩斯还相信，政府应当责无旁贷地直接聘用工人从事修路等公共工程项目。

英镑的汇率成为经济辩论的核心。早在1920年年底，凯恩斯就提出，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恢复英国经济健康，最好的办法就是让英镑和美元的汇率保持在1:3.60的市场水平（从战前的1:4.86一路滑下来的），因为政府为了给战争筹资，向美国银行借了大笔贷款。他相信，要是1英镑能固定兑换3.60美元，失业率就能维

持在6%~7%。财政部和英格兰银行的官员们一心想着恢复英镑的战前汇率，对他的主张视而不见。

1921~1922年，英国经济遭受了高利率、高工资、价格下跌、英镑升值（让出口变得太过昂贵，导致贸易不平衡）和高失业率的同时蹂躏。尽管英国的经济状况大大不妙，1923年7月，英格兰银行为了把英镑的汇率抬得更高些，把银行贷款的利率从3%提到了4%。凯恩斯怒斥银行行长，称这项举措“从指标来看，最具误导作用……英格兰银行受一套狭隘且过时的教条影响，犯下了弥天大错”。

接下来的一个月，他在剑桥的自由暑期学院（Liberal Summer School）发出警告，资本主义本身正处于危险之中，非得政府或者英格兰银行插手管理经济不可。同年12月，他在威斯敏斯特的全国自由俱乐部（National Liberal Club）发表致辞，火力全开地批评了政府依赖自由市场观点解决经济问题的做法。

“显而易见，一个全靠自己的个人主义社会无法妥善运作，甚至无法在尚可忍受的层面上运作，”他宣称，“时局越艰难，放任的制度运转就越糟糕。”同月出版的《货币改革论》以典型的凯恩斯式大胆讥讽做派，“谦卑地献给英格兰银行行长和理事会。”凯恩斯认为，挽救处在危险经济状况下的不列颠，英格兰银行完全力所能及。无须重新订立新法，只要降低利息，发行债券，它就能管理好英国经济和商业周期。他再一次对无所作为发出了严厉警告。“我预言，除非（银行行长）及时投奔智慧的怀抱，不然，他们所依附的制度会病入膏肓，并被他们恨之入骨又抵挡不了的事情彻底压垮。相比起来，他们现在只要提供温和而有限度的措施就能逃过一劫。”

事实证明，哈耶克在美国的1924年，是凯恩斯反对自由市场运作论点飞快发展的关键一年。1月，拉姆齐·麦克唐纳把下议院的多数派保守党赶下了台，当上了英国第一任工党首相，但它是一个少数派的政府。1924年4月，《国家》杂志刊出一封信，号召政府启动一项以纳税人资助的公共项目，把国家带回正常的运行轨道。该提案是前自由党首相戴维·劳埃德·乔治耍的把戏，他想让自己所在的政党显得比工党更保护劳动阶层。在工会的支持下，工党大有永久取代自由党在下议院席位、成为保守党对手的势头。次月，凯恩斯加入论战，拿出一篇名为“失业需要大力补救吗”（Does Unemployment Need a Drastic Remedy？）的文章。在他看来，答案绝对是肯定的。

“我们必须求助于繁荣需要积累这一原则。我们停滞不前太久了。我们需要冲动、震撼和提速。”凯恩斯主张。他认为，“治愈失业的终极举措”是，拿出1亿英镑来，用在公共住房、兴建道路、改善电网方面。他说，刺激经济能恢复企业的信心。“让我们大胆地尝试这一思路吧，”他写道，“哪怕有些项目最终会失败，这很有可能。”

凯恩斯对纳税人的钱毫不在乎的态度，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连工党大臣菲利普·斯诺登（Philip Snowden）也不例外。斯诺登对如何管理经济的认识，比大多数保守党人更保守。“身为财政大臣，把公共开支提案呈交下议院不是我的工作，”他对议员们说，“据我所知，财政大臣的任务是抵挡同事们提出的各种公共开支要求，实在抵挡不了，也要把它们限制在最低程度。”但凯恩斯立场坚定地认为，公共开支必不可少，浪费一点是“小恶”。“依靠住宅投资，哪怕它推行得不那么明智，哪怕它一掷千金，”他写道，“国家至少会有所改善。即便是构思最糟糕、用度最奢侈的住房计划，最终也能给我们留下一些房子。”

凯恩斯写给《国家》杂志的第二篇文章，回到了他起初的激进主题。“在考虑如何刺激国内投资的时候，”他写道，“请允许我呈上自己的异端邪说——哪怕它真的是异端邪说。我主张依靠国家，我抛弃自由放任……私营企业不受限制，又得不到扶持，这是注定要让公众受苦的。私营企业早已不再处于不受限制的状态；在许多不同的方面，它都受到限制，受到威胁……既然私营企业并非全然不受限制，那么我们就不能让它们完全得不到扶持。”

对主题做了预热之后，凯恩斯准备好迈出他谨慎克制的思想革命的下一步了：他认为，自由放任是虚假的、不合逻辑的，而且早就时过境迁了。在牛津大学的悉尼球纪念讲座（Sidney Ball Memorial Lecture）上，他提出了这一论点，题为“自由放任的终结”。两年之后，他又带着它到了柏林大学，一个字一个字地重复了它对德国人（以及像哈耶克那样说德语的奥地利人）的好处。凯恩斯展现出了彻底的布鲁姆斯伯里风范：聪明，雄辩，讽刺，激进，颠覆旧秩序。他从思想上引领了一场对自由放任的攻击，远远地跳出了经济理论的局限，进而提出了如何确保个人享受最大幸福的观点。那时候，理解这一观点的人比今天还要少得多。

凯恩斯的演讲内容从启蒙时代的思想家一直谈到当下，一举囊括了所有认为自由放任值得尊重、理当如此、公正合理、实属必然的人。他称赞“经济学家”解决

了“保守的个人主义者”[如约翰·洛克（John Locke）、大卫·休谟（David Hume），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和“民主的平等主义者”[如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威廉·佩利（William Paley）和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的矛盾主张。他辩称，“靠着自然规律的运作，受自由教化的个人追求自利，总是倾向于促进整体利益的。”或者，简单地说，公共利益就是所有个人私利的总和。查尔斯·狄更斯《艰难时世》（Hard Times）中的反社会人物比泽尔表达过同样的看法：“我猜你知道，整个社会制度就是一个个人自利的问题。你必须始终对着人的自利去呼吁。”在凯恩斯看来，依靠自利的结果是政治的终结，因为“政治哲学家可以退休，把位置让给商人，因为后者靠着追求利润，就能达成哲学家的至善境界”。

凯恩斯还把达尔文放入这些思想家的行列，因为有些人已经将达尔文适者生存的进化理论延伸来解释经济行为了。凯恩斯写道，尽管经济学家们认为，自由竞争塑造了伦敦，“达尔文主义者却进一步提出——自由竞争塑造了人。”有人说，自由市场为各种矛盾的主张提供了一条公平的解决途径，凯恩斯则解释说：“说人的经济活动具备‘自然而然的自由’，这不对。并没有什么条约将永久的权利授予了那些拥有或得到了此一自由的人。世界并非总是自上操控，让个人与社会利益保持恒久的一致。两者利益在实践中的不谋而合，也并非总是靠着对下的管理。经济学原理推导不出这样的结论：开明的自我利益总是依照公共利益行事。说个人利益整体上开明有见识更加不对；更多时候，个人单独行事想实现自己的目的，却傲慢或渺小得根本连这也办不到。经验并不曾表明，个体构成社会单位就一定会比单独行动时欠缺清晰眼光。”

为免遭人批评自己是深藏不露的社会主义者，凯恩斯还抽空驳斥了保护主义和马克思式社会主义，这是反对自由市场的两大政治传统。后来，他又批评国家社会主义，“倘若有一套方案，建立在对100多年前某人学说的误解之上，又旨在解决50年前的问题，（国家社会主义）不比这套方案的残渣余孽好多少。”凯恩斯煞费苦心地解释，他和马克思主义者以及某些社会主义者不一样，他从不主张让国家取代私营企业。“对政府来说，”他写道，“重要的不在于去做那些个人已经在做的事情——做得更好或更差姑且不论，而是要去做那些眼下完全没人做的事情。”

时至今日，仍然有人坚称凯恩斯和凯恩斯主义者是没“出柜”的社会主义者，有一点很值得强调：连哈耶克都曾短暂支持过社会民主主义，凯恩斯却从来不曾是

任何一种形式的社会主义者，从没跟社会主义（哪怕是社会主义的英国改良版——费边主义）眉来眼去过。凯恩斯是坚定的自由党人，为了生存，跟工党的社会主义者奋力作战。他认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保守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之间，甚至在两派的原教旨主义之间，存在着一条“中间道路”。诚然，有一派会说他是资本主义的辩护士，想要复兴一套失败的体制；另一派则会说他是狡猾的社会主义者。

凯恩斯和哈耶克的争论唤起了保守派与自由派那么多观点的碰撞，有一个原因乏人提及：人们经常放肆滥用政治术语，把争论的浑水搅得愈发看不见底。对有些人来说，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分界线存在于统治形式；对另一些人来说，分界线则在于愚人善事一类的社会行为，甚至在于代议制民主。凯恩斯在悉尼球纪念讲座上指出，“在我看来，明智管理之下的资本主义，比眼下任何其他的社会制度都能更有效地实现经济目的。”但他同时也承认，“它本身（资本主义）有很多极端讨厌的地方。”他写信给英格兰银行董事查尔斯·阿迪斯爵士（Sir Charles Addis）说：“我力求改善社会机制，不是要推翻它。”

从这个角度来说，凯恩斯的讲演杀掉了自由放任主义的恶龙，可他又还没能找到一套能取而代之的理论结构。在精彩纷呈的指斥过后，他的结论倒像是把想法大声说出来罢了。他的另类想法既不革命，也不惊人。他提出了初步建议，诸如大学和英格兰银行等非国有机构能提供更有效、更公平的结果，应该做得更多。在读过悉尼球讲演文稿的奥地利学派成员们看来，凯恩斯玷污了他们的指导原则，即自由市场是良性的，所有试图驯服它的人，不是居心险恶，就是在做无用功，甚至两者皆然。

虽说对一部分政府人士来说，凯恩斯就是一只嗡嗡作响的飞蝇，但各国部长们还是争着向他讨教。有一段时间，政府为英镑是否应按战前的4.86美元水平跟金价挂钩一事征求意见（即“金本位”），凯恩斯属于极少数主张英镑完全不应该跟金价挂钩。之后，等他发现这个观点找不到支持者时，又转而建议应该按4.44美元的现行浮动价挂钩。简而言之，在这场争论中，凯恩斯左躲右闪，力求找到折中之道，最大限度地降低英镑固定价值给应急带来的损害。他预测，英镑恢复战前价值，会造成巨大的通货紧缩（物价下跌），大大降低煤工等关键行业工人的薪资和生活水平，其产品按新价格将不再具有国际竞争力。

1924年10月的大选中，保守党了结了麦克唐纳短命的工党政府。1925年2月，保守党的新财政大臣、前自由党人温斯顿·丘吉尔，向财政部的金融总长奥托·尼迈耶（Otto Niemeyer）写了一封刺人的便签。特立独行的丘吉尔一贯不受传统观点束缚，又在《国家》杂志上读过凯恩斯反对英镑回归战前币值的观点，他相信，英镑若是挂钩在4.86美元，会进一步增加失业率——这时失业人口已过百万。凯恩斯说，由于矿工联合会等工会力量强大，英国不大可能下调10%~12%的工资来配合英镑升值，面对其他经济因素的影响，工资会“持平”，或缓慢下调，减薪不容易。

“以我之见，凯恩斯先生口中‘稀缺中的失业悖论’，财政部从未意识到它的深远意义，”丘吉尔对尼迈耶写道，“英国具备全世界最优秀的信贷，同时又有125万人失业的奇观，（英格兰银行的行长）竟然心满意足。”次月，丘吉尔邀请凯恩斯和金融世界的其他顶尖人物到自己位于唐宁街11号的官邸参加晚宴。凯恩斯和战时自由党财政大臣雷金纳德·麦克纳认为，减少矿工10%的工资，必然会造成更长时间的罢工，重点行业的收缩（活动放缓）也将接踵而至。三天后，在走正统路线的同事们持续施压之下，丘吉尔放弃了对财政部观点的本能反对，同意英镑按战前水平与金价挂钩，即“金本位”。

丘吉尔的决定促使凯恩斯为《国家》写了一系列文章，其后又收录在一本畅销书里，名叫《丘吉尔先生的经济后果》（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Mr.Churchill），正好呼应此前的《和平的经济后果》。凯恩斯认为，将英镑的价值定在比浮动（或市场）利率高10%的水平上，等于是“一项强行让每个人每英镑工资缩水两先令（10%）的政策”。由于没有机制保证此项举措能针对全体工人施行，议价能力弱或者所属行会怯懦的工人将受伤最甚。雇主和政府会“陷入一场轮流和每个群体单独作战的斗争，无法保证结果公平，强势群体无所得，弱势群体却有所失”。

凯恩斯认为，提高汇率是一种强行实施通货紧缩（物价下降）的残忍手段。“通货紧缩不会‘自动’降低工资，”他写道，“它只会通过失业的方式让工资下降。完全抑制高物价，是在扼杀繁荣的苗子。出于信仰而用其加剧萧条，实乃灾难。”凯恩斯坚定地支持矿工，他写道，矿工“被迫要在饥饿和屈服之间做出选择，他们屈服的果实则累积成其他阶级的利益……站在社会正义的立场上，没有任何理由应该削减矿工的工资。他们是经济巨头手下的受害者”。他警告说，丘吉尔的决定会点燃工人之间的革命热情。

凯恩斯预测，为避免英镑保持战前币值这一决策带来的灾难性社会后果，政府只能求助于借贷来脱身。没过多久，他的话成真了。6月，矿主向矿工工会发出最后通牒，要后者接受减薪，不然就叫他们好看。工会威胁要举行全国罢工。首相斯坦利·鲍德温（Stanley Baldwin）仓猝向矿主提供了1000万英镑的贷款，继续按不具竞争力的旧利率给矿工付薪水，也不肯面对整个行业的乱局。

没过多久，事态就明确了：回归金本位制度给英国经济造成了毁灭性打击。当今的经济史学家几乎一致认为这是个灾难性决定。有史以来第一次，一连串的突发事件把资本主义带到毁灭的边缘：1926年，英国出现首次全国性大罢工；1929年6月，保守党大选失利，工党重新掌权，并成为众议院最大党派；1929年10月，美国股灾重创全球金融；金融危机促使英国在1931年8月成立紧急联合政府；随后一个月，英镑恢复金本位制仅仅6年，就无奈脱钩了。

1926年，米塞斯获得并接受了一笔洛克菲勒奖金出访美国。在繁忙日程的间隙中，他探讨了美国对经济所采用的实证研究法。这种方法，哈耶克曾为之深深着迷。回到维也纳时，他认定，只要谨慎地检验、有选择地应用这一方法，就值得对商业周期，即经济繁荣（经济发展迅速的时期）与经济衰退（经济活动收缩的时期）这对此起彼落的现象加以定量研究。米塞斯着手为全新的奥地利商业周期研究学会（Austrian Institute for Business Cycle Research）筹措资金，主任的人选他早就心有所属，此人便是哈耶克。1927年1月1日，新机构开始运作，哈耶克任领导。

哈耶克上任新职，头一件事就是写信给凯恩斯，求一本埃奇沃思的《数理心理学原理》。哈耶克找凯恩斯索书之举，乍看似乎是无心的请求，实际上却应该是吸引凯恩斯注意的蓄意尝试，它是出于敬重而非冒犯的莽撞行为。凯恩斯在明信片上做了一段简短的回复，尽管是亲手所写，也难免叫人略感失望。凯恩斯的回答（“很抱歉，我也没有多余的《数理心理学原理》”）里暗含的讥讽之意，并不是想吓唬哈耶克，只不过，从这个回复来看，凯恩斯显然并不清楚哈耶克是何方神圣。哈耶克靠着《和平的经济后果》很好地认识了凯恩斯，他当然也读过甚至近乎全盘赞同凯恩斯的《货币改革论》。米塞斯和哈耶克是否读过凯恩斯对自由市场的批评倒不太清楚，因为凯恩斯的悉尼球纪念讲座直接违背了前两者的核心信念。凯恩斯反复呼吁英国政府降低利率，投资公共项目，也直接有违奥地利经济学派的主张，但这些文稿发表在英国的出版物上，难得传到维也纳。

哈耶克以米塞斯的研究为基础，开始论述货币、价格和失业之间的关系。他翻阅了美联储的文献，注意到美联储有些人希望消除商业周期中屡屡出现的繁荣和萧条。他得出结论，想把商业周期的疯狂波动限制在较小范围或许做得到，但让美国彻底摆脱商业周期的目标，却太吃力不讨好了。

为保持物价稳定，美联储的长官们提高利率，出售政府债券，这些都是凯恩斯在《货币改革论》里提到过的补救措施。但哈耶克认为，他们采取行动所凭借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是种不顶用的工具，因为它不足以揭示个别商品的价格波动。故此，整体利率调整以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为基础并不恰当。他发现，根据这种泛泛而论且不准确的指数来制定利率和货币政策，很可能恶化了美联储本来想要解决的问题。他总结说：“消费价格总水平指数不能带来任何商业周期的相关信息，更重要的是，它不可能在合适的时候做到这一点。”

凯恩斯主张，在经济周期的底部，需求长期短缺会导致经济活动放缓，从而带来不必要的失业。他认为，没有私营企业能保证足够的需求，政府应当通过公共项目的方式来提供需求。（他还就为什么要这么做，展开了一番理性的解释。）然而，米塞斯扩展了瑞典经济学家克努特·维克塞尔（Knut Wicksell）提出的理论，对商业周期做出了不同的阐释。他争辩说，要是中央银行降低利率，它就干预了个人储蓄与资本货物（用于制造产品的机械）投资之间的自然平衡。用更少的钱可以买到更多的资本货物，真正的储蓄水平无以维持，从而导致失衡。随着时间的推移，央行碰到了两难困境：要么继续降低利率，提供更多的投资，这会让更多的钱进入系统，追逐过少的商品；要么提高利率，导致投资放缓进而停顿，如此的衰退比最初央行降息力图避免的局面更加糟糕。

哈耶克检验了廉价资金用于投资资本货物时会发生什么情况，进一步深化了米塞斯的分析。他认为，蓄意降低利率，为储蓄不足以维持的投资提供资金，人为延长了“生产周期”（生产商品所需的时长）。事实上，生产周期过长，逼得人们不得不放弃大量资本货物，尤其是“高阶货物”（goods of a higher order，用于制造商品的机械，有别于消费者会购买的商品）的发展，因为等到它们完成的时候，根本就没有需求（消费者的购买欲望）了。举例来说，当冰激凌需求暴跌时，一家生产商用冰箱冰盘的工厂恐怕就破产了。

根据哈耶克的看法，问题的症结在于中央银行降低利率，干预了储蓄和投资之

间的关系。他和奥地利学派都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所有的市场，包括货币市场，都会达到一种均衡状态：制造商的商品供给与需求相匹配。哈耶克认为，价格机制走向均衡的趋势，任何人为改变价格的尝试都会带来可怕的后果。在他看来，篡改价格只是在对朝向均衡的转变症状修修补补。人为地降低利率或借贷的价格，无非会带来物价上涨，而人为提高利率，则意味着鼓励商业活动的收缩（衰退）。

这些想法的背后是维克塞尔建立在“自然利率”差异上的假设：个人储蓄等于投资，“市场利率”或信贷的价格，由银行来固定。奥地利学派认为，自然利率和市场利率的差额造成了商业周期。对央行行长而言，问题在于不可能精确判断自然利率是多少，所以，他们必然会把市场利率设定在不恰当的水平上。这就导致了商业周期里的繁荣和萧条。哈耶克相信，只要能维持真正的自然利率，经济体中的货币就能变为“中性”，在这些环境中，商业周期的波动就来自其他因素的变化，如新产品的发展或新的发明发现。

凯恩斯和哈耶克之间的战线就此划下。凯恩斯认为，采取行动改善生活（尤其是失业人士的生活），是政府的职责所在。哈耶克认为，由于自然的力量不可抗衡，政府的强力干预徒劳无功。凯恩斯拒绝坚守自由市场，认为把达尔文主义应用到经济活动中并不适当，更好地理解经济运作，能让负责任的政府做出决策，消除商业周期触底带来的惨烈后果。哈耶克最终得出的结论则是，人很难发现，甚至根本不可能发现有关经济具体如何运作的知识，基于此类证据制定经济政策的尝试，就像是理发员做外科手术，很可能弊大于利。

凯恩斯认为，人要为自己的命运负责；而哈耶克则有些不情不愿地认为，人只能服从自然规律，命中注定只能受经济自然规律的支配。故此，两人逐渐又对生活和政府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凯恩斯持乐观主义态度：如果掌权者做出正确决策，生活不必那么艰难；哈耶克则认同一种悲观主义态度：人类活动受着严格的限制，不管用心多么良苦，试图改变自然规律的做法，都必定会招来最意想不到的后果。

随着世界走向波澜壮阔的1929年，两人正逐渐打磨着彼此对立的观点。那时候，很少有人理解凯恩斯超前的想象力，反对意见则大多阐述不清。不认同他设想的人，对他提不出知性上的挑战，只是一味坚持正统，躲在体制惯性背后。哈耶克基本上在现有概念下搞研究，他提炼奥地利学派资本理论的贡献，除了维也纳的小圈子几乎没人注意。就像伊索寓言兔子和乌龟赛跑的故事一样，充满活力的凯恩斯

一开场就冲了出去，哈耶克则留在了起跑线上。

1929年10月的美国股灾改变了一切。世界卷入了金融风暴，统治者要求有人对眼下的情况做出解释，尽快找到脱困的道路。享乐主义的咆哮20年代（Roaring Twenties）陷入低潮，一个跟头栽进了持续10年之久的大萧条。世界来到了破产的边缘，大规模失业和赤贫的双重苦难似乎永无尽头。在绝望可怕的新氛围下，乐观主义的凯恩斯轻而易举地提供了一条摆脱泥潭的明确新路；悲观者哈耶克，却想要给出一个理由，说明修复系统的一切努力毫无意义。

凯恩斯发现，他的想法大受欢迎，在一片消沉中带来了一线希望的光明。哈耶克很快会发现，他严峻的估计，不管再准确，也找不到多少支持者，因为他带来的是一条惨痛消息，给无所作为找了借口。凯恩斯革命的目的是，在独裁者时代的不确定和恐怖中愤而崛起，再合乎逻辑的悲观主义，也停不下正想方设法爬出经济泥潭的政客们的喧闹之声。很快，随着凯恩斯和哈耶克的近距离角力，两人之间明显的知性差距就越拉越大了。

哈耶克在美国研究经济思想的短暂经历确认了一点，不受约束的资本主义老家不是辩论未来经济的好地方。为此，哈耶克日后将前往英国。为达成这一目的，1927年，他写信给凯恩斯，着手寻找一个好办法来当面自我介绍。1928年，机会来了，1凯恩斯受邀参加伦敦剑桥经济服务（London and Cambridge Economic Service）召开的会议，2这一机构由凯恩斯与伦敦经济学院（LSE）及剑桥大学合资创办。会议快要结束时，两人第一次见了面。

在旁观者眼里，当时的场面颇为滑稽。两人的身高都超过1.83米，凯恩斯略高，再考虑到他的微驼，在恫吓对手时明显占优势。两人都留着胡子，哈耶克戴着一副英国人眼里中欧知识分子招牌特征的丝框眼镜。凯恩斯穿着散漫的三件套白条纹西服，不修边幅却又优雅自在，双手插在上衣口袋里；哈耶克则穿着浆过硬领的白衬衣，粗花呢外套的扣子扣得紧紧的，流露出爱好整洁又谨小慎微的味道。

两人对比鲜明的性格，还体现在其他一些线索里。凯恩斯用一种甜美的腔调掩饰自己言辞的犀利，先是诱惑对手，而后又催眠对手；哈耶克的英语说得挺糟，带着浓重的奥地利口音，连从小被一连串德国家庭女教师带大的凯恩斯都很难听得懂。哈耶克极其看重礼仪的特点立等可现。“我现在仍然记得，我房间的门打开，进来一位高大有力的矜持人物，平静而坚决地介绍自己是‘哈耶克’。”伦敦经济

学院年轻的经济学教授莱昂内尔·罗宾斯（Lionel Robbins）3回忆了对哈耶克的第一印象。

凯恩斯和哈耶克见面时还素不相识，但没过几秒钟，两人就摒弃了礼仪客套，激烈地辩论起来。对哈耶克而言，这次会面实现了他长久以来的庞大野心。而对凯恩斯来说，这是一场惯常的论战，跟另一个受了自由市场理论误导的信徒磨嘴皮子。不过，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这场会面的重要性，不亚于亨利·斯坦利（Henry Stanley，英国著名社会史学家）和戴维·利文斯通（David Livingstone，英国探险家、传教士）的初次遭遇。两巨头的大战将持续到下个世纪，这才是第一回合（只不过有点像是在练太极推手）。

哈耶克生动地回忆了第一次会面，初尝了无情模式下的凯恩斯，也为日后的激战打下了合适的基调。“我们马上就展开了两人之间的第一次理论冲突——主题是利率变化的有效性。”他说，“尽管在这种辩论中，凯恩斯最初会以一种恐吓年轻人的态度，无情地碾压异议，可要是有人站出来公开反对他，哪怕他完全不同意对方的观点，也会表现出最友好的兴趣来。”4打从这段磕磕碰碰的友谊（它一直持续到凯恩斯过世后20年）一开始，哈耶克就感觉凯恩斯对自己要说的话挺有兴趣，尽管凯恩斯并不赞同哈耶克奥地利学派的观点。“我一提出严肃的反对论点，他就认真对待我，而且自此以后都尊重我。”哈耶克回忆道，“我知道，他提起我，一般总会这么说，‘毫无疑问，他是个疯子，但他的想法也相当有意思。’”5

哈耶克在伦敦找到了朋友罗宾斯。那时候，罗宾斯还算不上是英国的经济学家，他能阅读德语，研究过欧洲经济学家的作品，包括米塞斯、瑞典人克努特·维克塞尔、奥地利人欧根·庞巴维克（Eugen von Bohm-Bawerk）。6罗宾斯活力充沛又雄心壮志，得到了伦敦经济学院主任威廉·贝弗里奇（William Beveridge）7的提拔，1929年，31岁的他得到了政治经济学的教职，成为“全英国最年轻的教授”。8在这个职位上，罗宾斯认定，伦敦经济学院应该展现完整的欧洲思想，成为英国经济学的智慧储备所，跟马歇尔和凯恩斯所在的剑桥大学一较高下。与此同时，哈耶克的期待也很高。他打算在伦敦干上几年，施展自己向上爬到顶的宏伟计划。

哈耶克“半开玩笑”地把自己爬到奥地利社会最高峰的野心告诉了妻子。9他要先在伦敦教上一段时间的经济学，再回维也纳执教。随着声望日隆，他希望能当上国家银行（即奥地利央行）的总裁。到他老糊涂以后，他会以奥地利大使的身份回

到伦敦。他回忆说，不晓谦逊，没有自知之明，是他性格的关键，但“它并非缺乏理性的热望，它大概能让我的生活游走在纯学术与政府公职的交界线上，等我步入晚年，这样的生活应该能让我最感满足”。10凭借在伦敦打出名号，哈耶克向这一精心设计的人生计划迈出了第一步。

罗宾斯以前是社会主义劳工组织成员，因为看了哈耶克的《储蓄“悖论”》（The "Paradox" of Saving）11一文而受其吸引。这篇文章旨在反驳美国经济学家瓦蒂尔·卡钦斯（Waddill Catchings）和威廉·特鲁弗·福斯特（William Trufant Foster）提出的储蓄与需求（即个人的储蓄额与消费欲望）存在直接联系的论点。12和凯恩斯一样，两位美国人曾提出，经济衰退期间用公共项目推动需求（哈耶克称之为“就业功能”），就业和总需求（经济体中消费者想购买的商品总量）之间有直接的联系。福斯特和卡钦斯1926年发表论文《节俭的困境》（The Dilemma of Thrift），13认为经济衰退是因为储蓄太多，商品和服务欠缺需求所致。他们断言，倘若个人选择储蓄而非消费，储蓄又投资到资本货物当中，生产的额外产品没人买，衰退就出现了。因此，他们认为，商业周期峰顶的太多储蓄导致了周期谷底的产品过剩。

他们主张成立一个“联邦预算委员会”，投资公共项目，如有必要，哪怕借钱也要唤起需求，从而为消费者提供资金购买不景气时生产的冗余商品。哈耶克抱怨这两人竟然说服了时任总统沃伦·哈定（Warren G.Harding）的保守派工商部长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14鼓励联邦机构花纳税人的钱创造就业岗位。15

哈耶克的《储蓄“悖论”》是想“纠正”福斯特和卡钦斯。他指出，前述两人的主张建立在误解之上：他们误解了资本在生产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在现实经济中，储蓄无法投资到新的生产中，除非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新投资制造出来的新产品不愁找不到销路。说消费者的储蓄用来投资制造不必要的商品，而不是去购买商品，这种情况并不成立。

哈耶克认为，生产并非只有一种最终产品和价格的单一过程。很有可能，新投资激发了生产的规模经济，降低了商品价格，让人买得起了，结果就没有过剩了。哈耶克记得庞巴维克说过，资本生产的阶段繁多且长短不一，后者称之为“迂回”生产（"roundabout" production）。除了有制造商品的工厂，还有其余各类工厂：制造组装生产商品的零件，制造能生产商品或商品零部件的机器。在迂回过

程的每一阶段，投资者都得到了回报，故此，与福斯特及卡钦斯的论点相反，投资者有足够的资金来偿付生产最后阶段所得出的商品。

哈耶克承认，“如果以非凡的谨慎和超人的能力加以管理”，让政府为系统注入资金唤起需求的计划“或许……能用来预防危机”。16但更大的可能是，“长期而言”，如此操纵经济，“将给整个经济系统带来严重的干扰和混乱。”17他的结论是，“此种靠着救济工程等舒缓失业的尝试是权宜之计，从这种分析来看，也极其可疑。”18

哈耶克和凯恩斯最初见面和争辩的时候，《储蓄“悖论”》仅有德语版，刊发在维也纳经济学杂志上，印数很少，凯恩斯很可能从没读过。就算凯恩斯看到过英文翻译版，恐怕也难以从哈耶克的抗辩中得到太多信息。文章推理严密，用语枯燥，又有各种德语长句，从句套着从句，很不容易读懂。它还包含大量的公式和图表来说明商品的各生产阶段累积进入了最终成本。哈耶克认为庞巴维克的课程谁都该懂，还责骂那些不熟悉奥地利学派大师著作的人，虽说连他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庞巴维克只有一本书，即《资本实证论》（Positive Theory of Capital）的第1版，40年前在伦敦出版过英文版。

罗宾斯不仅读过德语版的庞巴维克，还很喜欢哈耶克在《储蓄“悖论”》一文里展现的技巧。他认为哈耶克令人信服地揭穿了“就业功能”（这一概念是凯恩斯思想的立足根基），于是，他邀请哈耶克1931年2月到伦敦经济学院开4堂讲座。哈耶克察觉了自己受邀的原因。“（罗宾斯）盯上了我的主题，这是我们此刻需要用来跟凯恩斯对战的东西。”19他回忆罗宾斯的原话说。1931年5月，《储蓄“悖论”》翻译成了英文，发表在罗宾斯负责编辑的伦敦经济学院期刊《经济学刊》（Economica）上。20罗宾斯把哈耶克引入了不列颠，激起了哈耶克和凯恩斯之间的大辩论。

这里冒出来一个问题：罗宾斯为什么不邀请米塞斯来反驳凯恩斯呢？米塞斯比哈耶克更出名，并已经出版了大量与凯恩斯主张针锋相对的著作。起作用的似乎是两个因素。为了有效地打击凯恩斯，罗宾斯需要一个易于为他人理解的人。米塞斯的英语零零碎碎，奥地利口音又重得让人听不懂。“他说法语和英语真是不轻松，”替米塞斯写传记的约尔格·圭多·希克索斯曼（Jorg Guido Hixlsmann）解释道，“每当用外语讲演，他的机智就怎么也看不出来了。”21比较起来，哈耶克在

纽约待过一段时间，基本的英语口语没有太大问题，尽管仍有些支离破碎。

哈耶克相对年轻也是一点促进因素。罗宾斯很年轻，大概觉得跟年龄类似的人共事更舒服吧。米塞斯不仅年龄较大，而且根深蒂固地积习难改。他沉默寡言、脾气暴躁的名声早已流传在外，就连他的妻子马尔吉特也没法遮掩丈夫频发的暗黑情绪。“米塞斯有一件事很可怕——他的脾气怪极了，”她回忆说，“有时，他会勃然大怒……这些恐怖袭击其实是抑郁症的征兆。”22米塞斯的生活动手能力也很差。据马尔吉特说：“他连煮鸡蛋都不会。”23故此，就罗宾斯的判断，哈耶克脾气温和，又够理性，似乎是理想人选。在罗宾斯眼里，哈耶克在《储蓄“悖论”》一文中提出了一系列论点，能够立刻用来反驳自剑桥蔓延开来的凯恩斯主义。

从1928年哈耶克在伦敦和凯恩斯第一次见面，到1931年2月他到伦敦商学院举办4场讲座，在此期间出现了一起灾难性的事件，彻底改变了两人之间论战所押下的赌注。1929年10月，华尔街股市崩盘，引发了一场空前的经济灾难。美国经济随后崩溃的恐怖规模，给经济学家提出了一连串的实践问题。崩盘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应该汲取哪些教训来预防它再度发生？该做些什么来舒缓灾难带来的失业大潮？

当时事态并不明朗，众人并不清楚崩盘的后果会蔓延到世界经济的其他地方，它会带来多么可怕的政治灾难。然而，在其后的几个月甚至几年里，凯恩斯发现，自己的激进观点很好推广了，这不光是因为他重视通过自己的新闻和政治活动来宣传促进就业的政策，更因为他的理论似乎能为通过公共项目创造就业的尝试提供智性上的理由。哈耶克拒绝接受凯恩斯的理论，也拒绝创造就业机会的最常见处方，随着股市崩盘带来大萧条，大西洋两岸的失业开始蔓延，似乎日益远离了大众情绪。

较之哈耶克，凯恩斯大概更清楚崩盘对个人的影响，因为他是商品和货币市场上的单日炒家。大多数时候，他早晨醒来，但中午之前都躺在床上，用电话给经纪人发出指令。他的金融能力保证了他那些布鲁姆斯伯里朋友们微薄的信托基金能赚到足够的钱，供他们追求艺术事业，不用担心谋生的事。凯恩斯手里虽没有美国股票，可市场崩溃的速度很快逮住了他。崩盘让他靠着市场投机积累的财富一扫而空。（但他很快又靠着玩弄市场，赚到了第二笔财富，和第一笔财富同样大。）但要是凯恩斯没能预见到即将发生的灾难，他的理论似乎会更适合新的形势。

1924年他出版《货币改革论》之后没多久，就着手写起了《货币论》。这是一

次持续时间甚长的大胆冒险。他写《和平的经济后果》只用了几个星期，《货币论》却用了6年又两个月，一部分原因在于英国的政治争议叫他分了心，比如说，他以自由党代表的身份参加了1929年的大选；另一部分原因是他卷入了国王学院的日常事务；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其他无数的活动都要他花心思。从1925年起，他的生活变得更加复杂：他过了半辈子的“同志”生活，这时却娶了谢尔盖·狄亚基列夫俄罗斯芭蕾舞团里男孩气的舞蹈女演员莉迪亚·洛普科娃，莉迪亚比他年轻9岁。

凯恩斯和莉迪亚的结合让布鲁姆斯伯里圈子很不愉快，尤其是伍尔夫，伍尔夫认为莉迪亚举止轻佻、水性杨花，不适合他们智力出众的“同志”朋友。虽说莉迪亚没胡子，凯恩斯却彻底坠入爱河。他继续奔波在剑桥、伦敦和他在苏塞克斯蒂尔顿的农舍24三地，因为莉迪亚大部分时间住在这里。大多数时候，他给她写长长的情信，为两人之间热情、冒险、不羁的爱情生活留下了无数不折不扣的露骨亲密文字。25夫妇俩很想要孩子，可过了一阵之后，他们发现莉迪亚不能生育。为了不让妻子尴尬，凯恩斯把责任担负了起来，用黑色幽默掩饰自己的失望。即便贵为“蒂尔顿的凯恩斯勋爵”，他却更爱叫自己“不育的凯恩斯”。

虽然琐事众多，凯恩斯还是决定把自己的最新思想落在纸上。但花了近7年时间来写《货币论》，这却影响了最终作品的前后连贯和统一性。因为想法不断改变，他反复修改手稿，甚至不止一次为了新灵感而放弃整个章节。这本书原定于1930年出版，可迟至1929年8月，凯恩斯写信给出版商丹尼尔·麦克米伦：“说来惭愧，逐页修改了440多页之后，我才逐渐意识到，某些章节必须大幅重写，整本书也必须重做安排。”26

所以，这本书里的各种不同想法交织成无法令人完全理解的复杂整体。“这本书不能展现他细想的全貌，而只是一个断面。”27凯恩斯的朋友兼传记作家罗伊·哈罗德（Roy Harrod）说。书出版前夕，凯恩斯写信给父母，“从艺术上说，它是个失败品，在写作过程中，我的想法改变了太多，破坏了它的整体性。”28凯恩斯在序言里承认，与其说这本书是成品，倒不如只是资料的累积。尽管他持保留态度，1930年12月，《货币论》29还是以煌煌两大册的形式出版了。

本书的一个中心主题，也是凯恩斯认为能为经济增添新颖维度的一点是：要清楚地区分储蓄和投资（或资本支出）。那时候，经济学家都假设，随着时间的推移，储蓄和投资是等值的。但凯恩斯提出，储蓄的是一群人，投资的则完全是另一

群人，所以往往出现不平衡。一旦投资额大于储蓄额，就会因价格通胀产生繁荣。反过来说，如果储蓄多于投资，就会出现萧条状态，并伴随有失业和通货紧缩。他的理由是，经济体中的总收入来自消费品和资本货物的规模之和。如果没有储蓄，总收入全部花在了消费品上，这些商品的价格就会急剧上涨，带来繁荣。相反，如果所有的收入都储蓄起来，消费品的价格就会下降，行业会破产。

凯恩斯论点的必然推论对管理商业周期的尝试有着重要暗示，因为他认为，如果自己的主张正确，价格上涨就可以通过增加储蓄来控制，萧条也能靠增加投资来治愈了。凯恩斯认为，商业周期里繁荣和萧条交替出现的原因是银行的举动，而银行的手里同样握着药方。“这种（失衡）之所以成为可能，在于银行的机制。”30凯恩斯写道，因为银行创造信贷时，并不考虑社会的储蓄愿望或能力。银行并不根据自己保险柜里的储蓄水平来制定借贷决策；“它们决定借贷多少的主要标准，完全是它们的现金储备与资产负债的比例。”31如果中央银行能谨慎控制自己的授信额度，储蓄和投资水平是可以保持一致的，结果会实现物价稳定。和维克塞尔一样，凯恩斯区分了“自然利率”（即储蓄和投资相同，价格保持稳定）和“市场利率”（由银行自行设定）。32贯穿《货币论》全书，凯恩斯都假设，不管央行设定什么样的利率，都会达到均衡状态，此时储蓄和投资相等，物价稳定，就业充分。他的看法是，“归根结底，货币理论无非是在长篇大论地精心阐述真相罢了。”33

凯恩斯还回到了固定汇率，以及它们在商业周期繁荣和萧条期间扮演什么样角色的棘手问题上。他认为，只要坚守金本位，央行就不能管理信贷，无法让储蓄和投资达成平衡，因为它们会利用利率政策来将货币维持在固定汇率上。他曾激烈地反对英国政府把英镑汇率挂在战前水平上（1英镑兑4.86美元）。不过，等这一轮战斗打败了，他又调整了自己的想法，适应新的条件，并得出结论，既然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世界经济造成的动荡业已过去，所有货币使用一套相同的衡量尺度（如黄金）也是有好处的。

在《货币论》中，他更进了一个阶段，提出要构建新的机制，一种“超国家的中央银行”把货币联系起来，1944年，这个概念以布雷顿森林固定汇率协议的形式结出了果实。凯恩斯认为，把货币和金价挂钩，事实上并不比把货币跟美元挂钩好。他在书中主张，如果把货币跟60种关键国际贸易商品的一揽子价格协调起来，允许双方挂钩值每年在2%的范围内浮动，这样会更公平。就算这样，他仍预测，倘若某些国家的人口出现“严重失业”，坚守新的挂钩价也会很难。34在这种“特殊

情况”下，他说：“光是中央机关随时准备放贷还不够……政府本身必须推进一套国内（公共工程）投资方案。” 35

《货币论》里提出的这些想法，到1929年6月，凯恩斯在大选中将之引为自由党的政策。可以清晰地看出，未来成为“凯恩斯革命”的那些概念，在他的政治话语里初具雏形了。自由党人把信心压在了老谋深算的威尔士人劳埃德·乔治身上，此公在巴黎和会上的愤世嫉俗曾震惊过凯恩斯。但凯恩斯不情愿地认定，劳埃德·乔治是自由党人把握最大的候选人，他赞同制定能用来吸引选民的经济政策，承诺把国家带回正常的轨道。可大选举行的1929年，英国的失业人口已达134万人。除了1924年的短暂复苏，至少有1/10的英国人连续8年找不到工作了。

1928年3月，凯恩斯在全国自由联盟（National Liberal Federation）上推出了自己的新思路。“让我们站起来动手吧，利用闲置的资源增加我们的财富。我们有失业的职工，有停工的工厂，说我们负担不起新的发展可真是荒谬。负担新的发展，靠的就是这些职工和工厂。” 36他说。7月，他向劳埃德·乔治写了一篇言辞恳切的请愿书，恳请制定他所提出的创造就业机会政策。“我们有那么多失业的职工，那么多空置的厂房，我们的国内储蓄多于支出，非说我们买不起这些东西太愚蠢了。不需要别的，就靠这些失业职工和空置厂房，这些事就办成了。” 37

次年3月，凯恩斯嘲笑财政部怎么也治愈不了失业的说法。“他们相信，只要诱导人们尽量多地储蓄，接着采取措施预防支出，利率就会下降，” 他写道，“事实上，如果把一切形式的资本活动都打扮成非法的样子，利率会沉到零，而失业率则会飙升上天。” 38诚如他在《货币论》中所说，自从1925年不恰当地固定了美元/英镑汇率，英国就成了一个难以实现充分就业均衡状态的“特例”。凯恩斯认为，只有公共工程，可以让疲软的经济起死回生。在小册子《劳埃德·乔治做得到吗》（Can Lloyd George Do It？）中，凯恩斯直截了当地提出了他的主张：“有需要做的工作，也有空闲的工人，为什么不把他们带到一起去呢？” 39

面对凯恩斯的就业计划，保守党嘲笑说，这是白白浪费钱。他反驳说，恰恰相反，不采取行动才是浪费国家的资源。失业救济金已经让纳税人每年花掉5000英镑了，还不包括贫困救济。过去8年，政府总共付给失业人口5亿英镑，要他们闲着什么也不做，这是惊人的资源浪费。这笔庞大的资金可以用来修造100万处新居，翻新全英国1/3的道路，或是免费为全国1/3的家庭提供一辆新车，成立一笔足够大的信

托基金，让每一个英国人免费入场看电影，直到世界末日。40“但这些其实还不算真正的浪费。”他写道，“失业人士本身承受着远为惨重的损失，它体现为失业救济金和完整上岗工资之间的差额，体现为力量和士气的损失。雇主损失了利润，财政大臣损失了税收。10年来，整个国家的经济进步缓慢，更是无法估计的损失。”41

他提出的计划每年将耗资1亿英镑。保守党声称，这每年只能带来2000个新工作岗位。但凯恩斯辩称，他们不光忽视了失业金支出的减少，还忽视了他所谓的“乘数效应”：政府创造的每一个工作岗位，都能增加一个为工人供给商品的新岗位。“更多的贸易活动能产生更多的贸易活动，因为繁荣的力量和贸易萧条的力量是一样的，运作起来都带有累积效应。”42

随着选举日的临近，凯恩斯认定自由党会获胜。可惜事实不如他所想。尽管保守党赢得了最多的选票，占总数的38%，拿下了议会里的260个席位；但由于选举制度变幻莫测，工党赢下了新下议院里最多的席位（287个），选票比例所占略低（37%）。自由党赢得了23%的选票，议席更只拿下了59个。尽管没能赢下绝对多数议席，工党的拉姆齐·麦克唐纳还是靠着自由党给出的一张支持票，组成了少数党政府。新政府迫切需要凯恩斯，华尔街崩盘的当月，就任命他进入麦克米伦金融和工业委员会（Macmillan Committee on Finance and Industry），研究银行和整体经济之间的关系。

凯恩斯在麦克米伦委员会的工作成绩极其出色，他以非凡的口才，用外行也能理解的语言介绍自己的复杂理论，再三再四地提出劝诫。委员会的主席麦克米伦勋爵是位无甚激情的法官，对凯恩斯整天喋喋不休的说道很是迷恋，以至于说出这样的话来：“听你说话，我们几乎觉察不到时间的流逝呢。”43有些人觉得《货币论》中的概念难以把握，凯恩斯就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来阐释，比如他曾用假想的香蕉共和国，来解释储蓄和投资之差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44除了《货币论》里确立的原则，凯恩斯又基于一系列的经济因素描述了自己的观点，日后，这些因素将对推进凯恩斯革命发挥莫大的作用，并在与哈耶克的决斗中，界定了他与奥地利学派理念的差异。

他对听证会的主要贡献，是解释了银行利率以及管理经济的英格兰固定利率的作用。第一天，他介绍为什么实行高利率会导致投资收缩、价格下跌，而降低利率

则为繁荣提供了环境。长期而言，倘若存在良好的贸易平衡，价格和成本会随时间推移而上涨，这样的安排行得通，但要是出现在必须下调成本的时候，再这么做就是灾难了。正如哈罗德所解释的，凯恩斯强调“（委员会）极有必要理解，我们所恪守的这一机制只会带来向下调整，用严重的失业来削减工资”。45

凯恩斯宣称储蓄和投资业已失衡，他承认，货币压力以高利率的形式体现，会提高企业借贷成本，为利润和成本（如工资）施加向下的压力。结果就导致失业。然而，20世纪20年代英国的一个问题在于，由于工会的集体议价能力很强，工资“很有粘性”，无法轻易削减。事实上，由于每周工作时间缩减，工会又要求保持原定工资水平，单位工资实际上还增加了。凯恩斯警告委员会：“不管是现代还是古代，从没有哪个社群不经巨大打击，就接受货币收入水平整体下降的。”46尽管他向委员会否认了失业救济金会助长工资的“粘性”，这就像有人说修医院助长疾病泛滥一样，但他在一次电台广播中承认，失业福利确实增加了工人拒绝减薪的阻力。“救济金的存在，无意中减少了个体接受不想要、不喜欢的工作或工资的压力。”47他提议，为将工资降到国家负担得起的水平，不妨制定一套政府监管的收入政策来补救，即他所谓的“约定降低货币收入水平”。他强调，减薪会一视同仁地应用于社会各阶层，而不仅限于工业领域的工资收入者，减薪的“社会契约”能降低物价。尽管“从某些方面来说是理性的补救措施”，48他也承认，这样的政策恐怕无法实现。为增加就业，他呼吁加强公路和电话系统的公共开支。他认为，财政部反对增加政府开支实在太短视了。“我们陷入恶性循环。我们什么也不做，因为我们没有钱。但恰恰是因为我们什么都不做，我们才没有钱。”49

向委员会作证的财政部发言人理查德·霍普金斯爵士（Sir Richard Hopkins）——罗宾斯形容此人“身材矮小，整体形象很像一只聪明绝顶的猴子”，50同样拒绝凯恩斯用公共工程创造就业机会的观点。他认为，投资无利可图，会削弱英国公司对外国投资的吸引力，让英国资本流失海外；引导资金进入某些行业，会使劳工市场错位，把工人从生产效率高、赢利能力强的企业转移到相对而言没有价值的公共项目上；资本的数量有限，如果政府为公共项目筹资，就会减少私人行业所需的资金。凯恩斯的回答是，回归充分就业能让失业救济支出及企业亏损减少，足以弥补霍普金斯提到的这些因素了。

凯恩斯冒犯财政部、英格兰银行和奥地利学派观点支持者的地方，不光是他不断要求政府干预。在一场痛苦的内部辩论中，他还抛出了同样冒犯的看法：他攻击

自由贸易，宣传实行进口关税。在向麦克米伦委员会作证时，他否认了“进口关税就像毒品，一旦用上就再也戒不掉”的观点，相反，他写了报告给首相的经济顾问委员会，提出只有进口关税和出口信贷才是唯一一种对所有人都有好处的政策。不过，凯恩斯态度坚决地说，只有当英国和全世界都处在水深火热的状态时，才能采取实行贸易关税这样可怕的措施。“自由贸易者一贯坚持信仰，认为收入关税是我们残酷的口粮，只能在紧急情况下使用。”1931年3月，他写道：“但紧急情况已经到来。”51

凯恩斯在“收入关税”上改变心意，是他和自由贸易支持者罗宾斯产生深刻分歧的主要原因，凯恩斯曾亲自任命罗宾斯出任经济咨询理事会经济前景委员会的委员。凯恩斯让罗宾斯出任此职的原因很难捉摸，因为两人不和是必然的结果。凯恩斯的传记作者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认为，罗宾斯“知性的信念，让他拒绝凯恩斯投来的橄榄枝。或许，凯恩斯推荐罗宾斯时，并未意识到罗宾斯对自由市场理念的信心有多么强，又或者是凯恩斯高估了自己的说服能力”。52

不管到底是怎么回事，两人都在麦克米伦委员会发生了最为激烈的冲突。两人都脾气急躁，最让委员会其他成员错愕的是，两人都打算辞职了。在和罗宾斯相遇之前，凯恩斯需要忍受的无非是财政部与英格兰银行官员们的墨守成规和缺乏想象力罢了。罗宾斯一来，他就遇上了报应：罗宾斯是个年轻的斗士，才华横溢，不喜欢剑桥冒出来的激进想法，支持奥地利学派的概念。面对凯恩斯提出的所有补救措施，罗宾斯的回答都一样：不管它对英国工业、雇主、企业和工人的伤害有多大，都得让市场自己去调整。如果真像凯恩斯说的那样，英国经济失衡了，那就应当让它随着时间自我纠正。凯恩斯的所有处方只会拖延时间，恶化事态，延续苦难。一如哈罗德所说，罗宾斯“认为（凯恩斯的关税）提议偏离了英国赖以发展壮大的古老传统，会对国际合作这棵尚未成熟的嫩苗造成毁灭性的打击……他觉得自己必须尽一切努力来阻止它”。53

与此同时，凯恩斯则以调侃的方式迎击了罗宾斯的自由市场式解决途径：“如果我们长时间坚守自由放任（的自由市场）……我们恐怕会自食其果。只要英国出口商（也就是美国人的同行，他们从前的师傅）还剩下些美国人乐意蚕食的残渣，我们又能够削减必需的进口货物，再把我们的储蓄盈余和这部分残渣加入等式，均衡状态终将恢复。”他接着说，“要是你没法咬牙忍受，打算通过关税、进口禁令、补贴、政府投资、抑制外国贷款等方式放弃自由放任主义，你能快些走上正道……此

外，你还可能避免一场社会灾难。”54从罗宾斯的角度来看，同样让人吃惊的地方还有，凯恩斯竟然认为降低工资的最好办法是允许物价上涨，削弱货币实际价值。

罗宾斯想让自己的朋友哈耶克到委员会做专家证人，因为他相信，哈耶克不会屈服于凯恩斯的重拳轰击。但是，凯恩斯拒绝了这个想法。凯恩斯否决了罗宾斯的明星证人，罗宾斯以惊人的优雅态度接受下来，但他的烦躁和凯恩斯的傲慢很快交锋了。因为无法沟通凯恩斯和其他人携手拟定的最终报告，罗宾斯要求获准撰写一份少数派异议报告。罗宾斯回忆说：“凯恩斯能喷出各种叫人难堪的火气，而一如既往地，这一回他暴跳如雷……火冒三丈，他对我十分粗暴。”55凯恩斯援引内阁秘书的观点，拒绝了罗宾斯表达自己与委员会大多数人不同意见的权利。凯恩斯用先例作为挡箭牌：一个人公布少数派报告是不合章程的。其他成员则轮流说，如此大费周章太糟糕了，不该这么做，太出格了，有失绅士风度，等等。罗宾斯造就了一个毫无必要的先例只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为了不破坏采纳有效经济政策的机会，他们愿意把分歧控制在最低限度。”56

但罗宾斯立场坚定，凯恩斯无奈放下了架子。他勉强同意罗宾斯撰写名为“L.罗宾斯教授的报告”（Report by Professor L.Robbins）的意见书，作为主要报告的附录。但凯恩斯和罗宾斯两人之间的一切怒火和积怨，邀请哈耶克到伦敦来参战的最初目的，都白白浪费了。1930年10月，首相麦克唐纳收到报告就把它束之高阁，忧虑让他动弹不得，墨守成规就算是他最大的勇气了。

凯恩斯很快就忘了和罗宾斯之间的严重分歧。“没过几个星期，凯恩斯和我就又见面了……他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我俩之间无非是理念分歧罢了。”罗宾斯回忆说，“我从不怀疑他是个了不起的人，与他整体的品质和性格比起来，他那些让我大吃苦头的个人行为，真的微不足道。”57

然而，罗宾斯还是决定把辩论继续下去。现在，他打算把哈耶克当成西部枪手般从维也纳请出来，瞄准棘手的凯恩斯。可惜，罗宾斯不曾料到，哈耶克的到来，会直接变成威廉·贝弗里奇的一手牌，贝弗里奇对凯恩斯的评价很低。与丈夫西德尼共同创办伦敦经济学院的比阿特丽斯·韦伯（Beatrice Webb）曾和贝弗里奇共进午餐，发现后者“真心讨厌凯恩斯，认为凯恩斯是经济学庸医”。58和罗宾斯一样，贝弗里奇认为哈耶克的讲座能让凯恩斯原形毕露。

这下，哈耶克以伦敦经济学院教员身份向凯恩斯发起挑战的舞台已经搭好了，

只要他在四场讲座中把奥地利学派有关商业周期的理论恰如其分地阐述出来就行。

在经济学历史上最生动的一场决斗中，莱昂内尔·罗宾斯和威廉·贝弗里奇甘居二线。1931年1月，弗里德里希·哈耶克接受罗宾斯的邀请抵达伦敦，进行四场讲座。讲座的基础是他对经济周期的研究，以及他在《储蓄“悖论”》1中想要证明的论点：经济衰退并非消费者缺乏购物欲望所致。

不过，哈耶克抵英停泊的第一处港口，并非位于伦敦斯特兰德霍顿街的伦敦经济学院，而是向北50英里的剑桥，他受邀去为马歇尔学会办讲座，该学会是个热情的经济学家团体，成员大多是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同事。它以盎格鲁撒克逊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的思想为本，是剑桥经济学的精神家园。它活生生地提醒了哈耶克，他身在奥地利学派著作覆盖不到的外国领土。剑桥经济学家们常常说：“马歇尔的思想中能找到一切。”2哈耶克想证明他们错了。他怀着大无畏的勇气，迈着大步走进了狮山。凯恩斯迷人的性格还有他特立独行思想的诱惑，为他吸引来了一群无比忠实的弟子。凯恩斯一直喜欢亲密的小集体，早年在剑桥做过“使徒”（这是一个秘密会社，一群志同道合的年轻人，信奉英国哲学家C.E.摩尔的理念），后来又成了布鲁姆斯伯里小圈子的核心成员。身为国王学院魅力逼人的经济学导师，他为一小群年轻男士（那时候，剑桥大学的学生绝大多数都是男性）提供各种慷慨慈爱的意见。他青睐头脑清晰的年轻人，因为后者能为长时间的交谈带来趣味。马歇尔学会里就有一群对凯恩斯更亲密的追随者，他们戏称自己为“剑桥马戏团”。

理查德F.卡恩（Richard F.Kahn）3是其中的一员，他记得自己第一次见到凯恩斯的情形：在国王学院装饰着凡妮莎·贝尔和邓肯·格兰特壁画的豪华教室，伟人伸着一双长腿，颓然倒在扶手椅里。“因为我是第一次为了督导（非正式教学）去（国王）学院凯恩斯的教室，我其实有点颤抖，”卡恩回忆道，“但一等我和其他三名学生围着火炉坐下来，我们就发现，一位友好、亲切、基于培养我们信心的先生和我们聊了其他，他还鼓励我们聊。”凯恩斯擅长把敬畏和亲密合二为一，很能赢得最亲密仰慕者的精神崇拜。他不光是崇高的老师，也是大师和圣人。卡恩回忆，“1930年10月31日，《货币论》出版那天，受凯恩斯很快会写在一本新书（即《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以下简称《通论》）里的知识所刺激，剑桥的一群年轻经济学家立刻聚在一起讨论起基本的问题来。”4

小圈子的另一名重要成员奥斯汀·罗宾逊（Austin Robinson），大概是第一个将每周的非正式研讨会打趣为“剑桥马戏团”的人。“我们正忙着阅读《货币论》，消化它。”他写道，“不可避免的，我们当中有些人，理查德·卡恩，琼·罗宾逊5（奥斯汀的妻子）、皮耶罗·斯拉法（Piero Sraffa）、6詹姆斯·米德（James Meade），7还有我自己，为此争论起来。后来所说的‘马戏团’，第一次是意外出现的，并非有人蓄意设计。”8除了这五人之外，“马戏团”里还有吉福德（C.H.P.Gifford）、普朗普特利（A.E.W.Plumptre）、塔西斯，还有几个大学生。卡恩、奥斯汀·罗宾逊和斯拉法会对每一名新成员做摸底面试。1931年1月到5月，小组定期开会，激烈辩论，只是风格是纯剑桥式的——意见再怎么尖锐分歧，措辞再怎么一针见血，也不可以有人身冒犯。奥斯汀·罗宾逊回忆说：“不管你喜不喜欢，只有通过争论和激斗，经济学才能进步。”9

“马戏团”最初在国王学院吉布斯大楼卡恩的房间碰头，后来改在三一学院的老休息室。它为凯恩斯提供了一个愉悦的环境，一群值得信任、可以倚之核对《通论》书稿校样的年轻经济学家，以及更重要的，一队在他跟哈耶克决斗的每个回合中都愿意为导师拼命的忠实弟子。凯恩斯并未参加“马戏团”的碰头会。常客詹姆斯·米德是牛津哈福特学院的研究员，打算在剑桥待一年，他回忆说：“从我这样的凡人角度来看，凯恩斯似乎是在一幕道德剧里扮演着神的角色；他支配着演出，但却很少亲自登上舞台。卡恩是传信的天使，把信息和问题从凯恩斯那儿带回‘马戏团’，又把我们讨论的结果传回天堂。”10

卡恩本来学的是物理，但他对此没什么兴趣，转到经济学之后，却灵感非凡。因为数学学得好，他得到了一级荣誉学位，1930年，又当上了国王学院的研究员。卡恩改换专业，不怎么敏感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11对他说：“许多跑不快的赛马都能当上不错的二流文人。”12凯恩斯认为卡恩“在经济学上的天赋，足以和我战后教的所有学生匹敌”。13卡恩很聪明，逻辑也严谨，但他缺乏自信，不敢向别人公布自己的想法。他说话轻声细语，举止无可挑剔，同事们都用他的中间名“费迪南德”叫他。在一群凯恩斯亲昵称为“心爱学生”的年轻人中，他或许要算是最重要的一位。他是个正统的犹太人，凯恩斯戏称他“小拉比”。

虽然卡恩终身研究经济学，1951~1972年还在剑桥任经济学教授，但发表的作品很少，最为人知的身份仍然是凯恩斯工作室的首席“工匠”。为补偿先前的鲁莽

冒失，熊彼特说《通论》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卡恩写的，他写道，“卡恩的历史成就距合著者不远矣”。14熊彼特以卡恩对凯恩斯的奉献为例，称之代表了剑桥学者典型的慷慨无私。“他们把自己的思想投入共同的水池里。他们提出批评和积极的建议，帮忙将别人的思想塑造成形。他们在幕后发挥着有如领导者那样的影响，只不过，光看出版物，却找不到任何痕迹可以确定他们的功劳。”15

奥斯汀·罗宾逊是剑桥大学西德尼·苏塞克斯学院的研究员，1919年4月来自印度，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当过飞艇驾驶员，和许多战争中幸存的剑桥本科生一样，心里怀着让世界变得更美好的愿望。“我们认定，世界上的问题永远不应该再用战争来解决，”他写道，“我们或许天真，但无疑真诚。”16他听过刚从巴黎和会上回来的凯恩斯发表的一系列讲座（内容后来收录在了《和平的经济后果》中）。罗宾逊一下被折服了。在利物浦做了一阵慈善工作后，他回到剑桥学经济学。“我的经济学着眼于改善世界的状态——让它变成一个对穷人富人都更好的地方。”他回忆道。17在他的记忆中，“马戏团”是他、卡恩和其他人碰头，“凯恩斯知道我们的见面，问卡恩我们在讨论什么，卡恩则把我们的问题和疑难转述给他。”18

奥斯汀·罗宾逊的妻子琼，娘家名是琼·瓦奥莱特·莫里斯（Joan Violet Maurice），她是格顿女子学院经济学的毕业生，按凯恩斯的传记作者斯基德尔斯基的说法，“她是（到目前为止）伟大的经济学家里唯一的女性。”19她的父亲是大胆无畏的少将弗雷德里克·巴顿·莫里斯爵士（Sir Frederick Barton Maurice），曾指责首相戴维·劳埃德·乔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就派往西线的英军士兵人数问题误导议会。和父亲一样，罗宾逊夫人也喜欢论战，会激烈地鼓吹自己支持的事业。她的招牌手法是赤裸裸的人身攻击。一位与她同时代的人回忆说：“哈耶克责怪她说，要是有人不同意她，那她认为他们必定是智商极低，他们的道德恐怕也不好，所以和她之间的唇枪舌剑往往是极困难的——至少可以这么说。”20她对经济学的最突出贡献是，她不仅和卡恩密切合作，联手为凯恩斯的《通论》做工作，还研究了“不完全竞争”，并率先抢救了卡尔·马克思在经济学上的声誉。表面上，她和奥斯汀·罗宾逊有着幸福的婚姻和一对女儿，但因为和卡恩在工作上的紧密合作，两人暗中成了情人。卡恩和罗宾逊夫人的奸情明目张胆，连凯恩斯都吃了一惊。凯恩斯告诉莉迪亚，他俩“在卡恩书房的地板上缠绵，尽管我希望谈话仅限于‘垄断的纯理论’。”21

哈耶克在马歇尔学会办讲座，为伦敦经济学院的首演预热时，第一次遭遇

了“马戏团”。有几个因素极不利于他在凯恩斯的后院施展拳脚。因为发烧，他脑袋糊涂，讲座准备得很仓猝，竟想把为伦敦经济学院做四场理论讲座所撰写的资料压缩到一场讲演里。一群对奥地利学派一切言论都持怀疑态度的青年人给他冷场，他完全没料到。

哈耶克还碰到了另一种重大障碍。虽说在纽约住过14个月，但他的英语口语还是不怎么够用。他的奥地利口音浓得就像伦敦的大雾，余生也丝毫未有改善。他到马歇尔学会发表演说时，常常转过身，背向听众，在黑板上画出一连串错综复杂、难以辨认、听众完全无法理解的图表，这实在于事无补。凯恩斯本人并未到场，因为他正在伦敦，这或许使得他那群年轻的追随者们给了嘉宾更加粗暴的待遇。置身此种境地，哈耶克还是很好地完成了整个讲座。

说凯恩斯主义者正沉浸在开山祖师刚刚出版的《货币论》所传授的理论当中，对哈耶克立场相反的经济理论避之不及，这种看法太草率了。问题在于他们确实不理解哈耶克试图解释的概念。诚然，讲座已经发下了预先准备好的提纲，但他们可能还是看不懂，因为哈耶克的书面英语比他的口语更难理解，必须靠出色的翻译和编辑润色才行。正如哈耶克后来承认，他提到的概念，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视之为理所当然，但英国经济学家本来就深刻地怀疑欧洲大陆上的经济学，完全不熟悉那一套。事实上，哈耶克的许多论点都建立在英国听众能够理解其前提的基础之上（可惜并非如此）。22

花了一个多小时宣读论文，涂抹如同蜘蛛网一般复杂的草图，详细解释为什么商业周期会从繁荣走向崩溃之后，哈耶克邀请台下听众提问。年轻的凯恩斯主义者认为哈耶克讲演的要点是，和凯恩斯的主张相反，他相信总需求（经济体中消费者想要购买的商品总和）和就业之间并无直接联系。虽说这伙年轻人时刻敢于来上一场乱七八糟、东拉西扯的论战，但当一位受了误导的陌生人闯入他们温馨的世界时，他们却立刻集体失语了。听到哈耶克请他们提问，众人噤若寒蝉。

彬彬有礼的卡恩就这起攻击马歇尔正统、攻击《货币论》新思想的事件，留下了一份多多少少颇为客观的记录。他的文章写得很苛刻，但毕竟是事件发生50多年以后补记的，所以，时间的流逝软化了他的言辞。卡恩尽力遮掩，但无论如何抹杀不了事实：哪怕对哈耶克这样坚定、对智力极为自负的人物，招待会也十分可怕——哈耶克一贯有着镇定自若的态度，他自信，又带有一些近乎贵族气质的傲慢，

完美地吻合他单挑大师的知名做派。

“听众完全陷入了困惑，”卡恩写道，“通常，在马歇尔学会的讲座完毕之后，会来上一轮活泼、绵长的讨论和提问。可这一回，现场却彻底无声无息。我觉得，只好由我来打破坚冰了。所以我站起身来问，‘您的意思，要是我明天出门去卖上一件新大衣，反倒会增加失业吗？’ ‘是的，’哈耶克说，‘只不过，’他指着黑板上的三角形，‘要用非常复杂的数学来论证解释原因。’”23

一贯无情糟蹋对手名声的琼·罗宾逊就没这么宽容了。“我很清楚地记得哈耶克在去伦敦学院的路上来剑桥访问那一回，”差不多40年后，她回忆说，“他阐述了自己的理论，并在黑板上画满了三角形。如我们后来所知，他的整个论证就是用资本货物总量扰乱当前投资速度，但我们那时没弄清。总趋势似乎表明，经济衰退是通货膨胀造成的。”她残酷地总结了哈耶克在英国舞台上的不幸亮相——“可怜的困惑状态”。24

哈耶克回到伦敦，剑桥的经历给他吃了些苦头，但他相信，伦敦经济学院会温暖地迎接他。罗宾斯承认，哈耶克要做的讲演“艰难而令人兴奋”，25但他也对其寄予厚望，认为它能改变英国知识界的景观。为保证哈耶克不再遭到剑桥的冷遇，罗宾斯预约了最大的讲演厅，听众也精挑细选过，希望他们不管碰到什么状况都表现出欢迎态度。罗宾斯还敦促不熟悉奥地利学派概念的听众提前更新知识，好给出积极反应。和在剑桥的时候不同，哈耶克能站上一个高高的小讲台，台下是十多排木椅子，坐着两百多名热心的教职员工，走廊上还挤着另外一百来号人。

在场者毫不怀疑这件事对经济学理论未来和伦敦经济学院声誉有着重要意义。哈耶克将要详尽展开的论点（即货币供应在经济体系运作中扮演的关键角色），将会打响反对剑桥和凯恩斯之战里的第一炮，也会为最终挑战凯恩斯主义的“货币主义反革命”间接地奠定基础。哈耶克的第一讲，“货币对价格的影响理论”，概述了金钱、价格和生产之间的关系。

一开场，他就承认，英国财政部让英镑以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水平对金价挂钩的决策，为货币“循环收缩”26导致工业减产提供了充分的证据。他感叹，英国和欧洲新近发生的经济动荡，丝毫无助于进一步理解货币力量在经济中所发挥的关键作用。他指责导致这种局面的是“大多数经济学家在经济学方法论上的某些态度转变，然而，许多人却欢呼这种转变是巨大的进步，我的意思是，他们试图在研究中

用定量的方法取代定性的方法。”27他主张，衡量经济中的元素，并不能取代对经济运作的理解。对认为经济学和物理、化学没什么不同，试图用数学方程式“在货币总量、价格的整体水平，或许再加上生产总量之间确定直接因果关系”的做法，28他嗤之以鼻。他认为，理解经济活动的真正关键是个体所做的选择，而这些选择的数量极大，又非常不同，难以衡量。出于同样道理，他也驳斥了基于价格整体水平所做的假设。他辩称，构成经济的是无数单独的交易，这些交易的成交价格千差万别。

哈耶克对货币理论做了一番历史回顾，他钦佩地引用了18世纪初爱尔兰-法国经济学家理查德·坎蒂隆（Richard Cantillon），29后者最先着手研究货币的力量。坎蒂隆从17世纪探险家在南美洲发现了黄金和白银的事迹入手，他发现，新注入的资金提高了带着贵金属回到欧洲的探险家的购买力。这些新财富使得探险家有了更多的钱可花，从而造成货物价格上涨，商家赚得盆满钵满，反过来也有了更多的钱可花，如此周而复始。坎蒂隆以及后来的苏格兰哲学家大卫·休谟观察到，随着时间的推移，新增货币供给基本上只让发现新财富、生产新财富的人享受了好处，至于社会的其余人等，则最终因为新供给的金银让物价上涨而遭殃。哈耶克认为坎蒂隆的理论有用，但仍持保留态度：“倘若新增货币最先落入贸易商和制造商之手，结果可能大不相同。”

接下来，哈耶克点出了坎蒂隆和休谟忽视的一个因素，“货币数量对利率的影响，对消费者商品相对需求的影响，对生产者或资本货物的影响。”30货币过剩往往会降低借贷的价格，导致消费品价格上涨，降低储蓄的吸引力。他追述了如亨利·桑顿（Henry Thornton）、31大卫·李嘉图（David Richard）、32托马斯·图克（Thomas Tooke）33等诸多思想家对货币和利率关系的探索，以及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34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35里昂·瓦尔拉斯（Leon Walras）、36克努特·维克塞尔和欧根·冯·庞巴维克所点明的货币和资本之间的联系（以“强迫储蓄”为表现形式）。为了让人们注意到维克塞尔逻辑中存在缺陷的地方，哈耶克尖锐地批评了凯恩斯《货币论》的中心假设，37即倘若“自然利率”和“市场利率”一致的话，价格会保持稳定。38至于他为什么不同意维克塞尔和凯恩斯的看法，哈耶克答应下次讲座扩展论述。

但哈耶克在第一场讲座中就确立了一个切中他与凯恩斯分歧之核心的概

念。“只要一想似乎就很明显了，货币量的任何变化总会影响到相对价格——不管它是否影响了价格水平。而且毫无疑问，正如相对价格决定了生产的数量和方向，货币数量的变化也必然会影响生产。”39他相信，自己来到了突破货币理论的边缘上，“货币理论将不再是货币价值的一般性理论，而是货币对各种商品不同交换率的影响理论。”40

接着，哈耶克提出了一个惊人的论断：货币没有内在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是不需要货币的。货币存在的绝对数量不是人类幸福带来的结果，故商品有客观价值，而货币却没有客观价值。我们感兴趣的只是货币对商品的相对价值（与收入来源相比较，或作为欲望满足手段）有什么样的影响。41”

对读过凯恩斯三个月前出版的《货币论》并投以怀疑目光的听众，哈耶克的讲座为重新评估经济学理论提供了一个新的方向。和剑桥的遭遇形成截然对比的是，哈耶克在伦敦的讲座赢得了热烈的掌声。愈发好斗的罗宾斯听了讲座也很高兴，他相信自己找到了合适的人挑战凯恩斯即将宣传的新理论。

翌日，哈耶克做了第二场讲座，名为“消费品生产和生产品生产达成均衡的条件”，他从全球经济低迷的角度点明了一个备受关注的重要课题：在什么条件下，资源会遭到闲置？他断言，解释各种经济现象的时候，假设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体会达成所有资源得到充分使用的均衡状态，这很方便好用。但在过渡时期，总有些资源没有利用起来。

哈耶克认为，就提高生产的各种方式而言，利用资本满足其后的需求最为有效，这里他借用了奥地利经济学家欧根·冯·庞巴维克的名词，称之为“迂回”生产法。哈耶克在黑板上画了一个三角形，跟之前在剑桥画的一样（那一回，听众们困惑不解）。他指出，为满足未来的需求，随着时间的推移，企业家会投资一系列中间资本货物，如工具和机器，并主要卖给资本货物的其他生产商。在此过程中，采用这些迂回生产方法会为将来提供更多的消费品。企业家们愿意投资中间生产方法，延缓赚取利润，因为他们能够在将来生产更多的消费品，从而满足消费者的欲望，让现在储蓄的消费者将来花更多的钱。

这就引出了哈耶克第二场讲座的核心问题：怎样让需要资金少的生产方法取代需要资金多的生产方法呢？答案很简单：人们在消费品上花销少而储蓄多时，他们的储蓄就投资到了资本货物当中。但还有另一条途径：如果生产商可以通过银行贷

款获得资金，就能生产出更多的资本货物。他说，第二种办法不是真正的储蓄，而是“强迫储蓄”，因为新投资出现，不是因为储蓄增多，而只是由于银行放贷。一旦借给生产商的资金缩水到先前水平，对设备的资本投资就会出现损失。他预告了下一场讲座的内容：“我们会看到，这种向低资本生产法的过渡，必然会以经济危机的形式出现。”42

观众再次起身离席。次日，哈耶克在第三场讲座中引用了自己导师米塞斯的著作。这场讲座名为“价格机制在信贷周期过程中的运作”，哈耶克引用了米塞斯的一段话作为开场白：“银行政策让借款利息低于自然利率，导致生产活动增加，最先产生的作用是……提高了资本品的价格，而消费品的价格只适度上涨……但很快，反向运动就出现了：消费品价格上涨，资本品价格下跌，即贷款利率提高，再次接近自然利率。”43哈耶克以自己惯常的一丝不苟甚至有些枯燥的方法，描述了无根据的借贷增加怎样随着时间导致资本物品生产过程的混乱，反过来又使得商业周期底部崩溃。为帮助那些没有刨根问底分析倾向的听众，哈耶克举了一个例子。“这就类似荒岛上有一群人，他们造了一台巨大的机器为自己制造所有的必需品，造完之后他们发现，新机器还没有生产出产品来，自己却耗光了所有的积蓄和自由资本。”他说，“他们别无选择，只能暂时放弃制造新机器，资本全无地将全部的劳动都投入生产日常食物的过程中。”44

哈耶克认为，体现在现实世界，结果就是失业率高居不下。他向凯恩斯一类鼓吹以增加消费品需求来提高就业的人道出了一个简单而不愉快的真相：“只有当我们的消费不超过总财富下由现行生产组织方式所决定的当前消费量时，资本生产这台机器才能有效运转。消费的每一轮增加，就算不扰乱生产，至少也必须动用从前的储蓄。”

哈耶克还质疑了另一种凯恩斯主义的补救措施，即将闲置的厂房投入使用，能刺激低迷的经济，使之恢复活力，提高就业。“（凯恩斯等经济学家）忽视了……为使现有的工厂发挥全部产能，必须在漫长的过程中投入大量其他生产资料，并经过相对较长的时间才能收到实效。”45“这应该相当清晰地说明，最近强烈鼓吹的以向消费者提供信贷来治愈经济萧条之做法，其实起到了反作用。”他认为，这种“人为的需求”，不过是拖延了清算的日子罢了。“故此，‘动员’所有资源的唯一持久方式，不是在危机当中或事后使用人工兴奋剂，而是让时间来治本。”46简而言之，没有简单容易的道路能走出低迷。从长远而言，自由市场最终会让经济

恢复到人人实现就业的均衡状态。

哈耶克的讲演，再次正中了听众们的靶心。对凯恩斯主义的政府干预概念，终于有人给出了一套令人信服的反驳。哈耶克表明，来自剑桥的补救措施看似有理，实则逻辑漏洞百出。光有良好的意图远远不够。用借来的钱投资，解决经济不景气的症状，只会让局面变得更糟。与之相反，哈耶克提出了自己略带苦涩的补救办法：忘了快速修复吧，只有时间才能治愈失衡的经济——事实就是这么让人不舒服。要小心凯恩斯这种侃侃而谈、说自己那一套能快速见效的医生，因为他们是骗子，是卖假药的江湖术士。每一回抄捷径，都只会让人回到起点。没有方便的出路。唯有足够的时间能带来真正的复苏。市场有其自身的逻辑，也有它天然的补救。他哈耶克是不给下药的，因为他跟凯恩斯不一样，他不是政治投机分子。

又过了一天，哈耶克在第四场讲座上，闯入了基本上还是块处女地的货币理论领域，并最终从理论上向凯恩斯主义刺出了最有力的一枪。哈耶克认为，在一个经济体中，资金总量和资金的传递速度，是理解这套系统运作的关键。“在现有条件下，货币始终对经济活动的过程发挥着决定性的影响……故此，要是忽略了货币扮演的角色，所有对实际经济现象的分析都不够完整。”他断言。47但他强调，货币理论尽管是一种更深入地理解经济系统的工具，却有着严重的局限性。在正常时期，它挺好用，可在世界如今所处的状态，它恐怕就不适合了。

哈耶克认为，经济最有效运作的关键是让货币保持中立。“增加或减少任何地理区域内流通的货币数量，都会使之成为特定个体货币收入增加或减少的决定性函数，即促使居民占世界总产品份额大或小的函数。”他说。48增加货币供应量，会给某些社会阶层造成不必要的负担。

“货币数量的增加，仅仅意味着有人放弃自己部分的额外产品，成为新钱的生产者。”49他不厌其烦地强调，创造额外的货币来产生货币，不仅包括银行增发钞票，也包括银行多发贷款（“账面信贷”）以及各种与银行无关的信贷形式。“这些信贷的典型特点是，它们的出现不受任何中央控制，而且它们一旦出现，要避免信贷崩溃，就必须允许其兑换成其他货币形式。”50

他认为，为了避免商业周期的大幅波动，银行应当审慎地核查贷款。“银行家不用担心过分谨慎对生产有什么害处。”他说。从维持货币政策的角度来说，银行唯一能做到的恐怕就是谨言慎行。“在现有条件下，任性妄为就会出问题。不管怎

么说，除非全世界只有一个中央货币管理机构，才能实现货币调控。一个国家单独采取行动，注定要招来灾难。”51

尽管消除货币这一不均衡的来源很重要，但他警告说，严格的货币政策并不能包治百病。“说我们能通过货币政策手段彻底消除行业波动，这可能是一种错觉。”他说。有些人，比如凯恩斯，相信经济在一定的通货膨胀下运作得更好，这就受了误导。“我们最多能指望，越来越多的公开信息或许能让中央银行便于在周期的上扬过程中遵循谨慎政策，以此缓和其后的萧条过程，顶住那些‘用些许通胀’对抗萧条的主张。这样的意见，虽说出于好心，但却十分危险。”52

就这样，哈耶克来到了四重奏讲座的尾声。“讲座引发了轰动，”罗宾斯回忆说，“部分是因为它们揭示了古典货币理论多年来遭人遗忘的一方面。”53按约瑟夫·熊彼特的说法，人们感觉哈耶克讲了一些新鲜而惊人的东西。

哈耶克的讲座解答了许多问题，也提出了同样多的问题，可罗宾斯还是特别高兴，因为它们完美地实现了他的预期目的——向英国经济学家介绍“这一伟大的传统（奥地利学派），并帮助说服英国读者，这一思想学派绝不可忽视，要不然，就有可能跟我们时代最富有成果的一大科学发展失之交臂”。54

对哈耶克而言，这些讲座其实也是伦敦经济学院对他的一轮加长版求职面试。他满心希望当上该校的教员。在讲座的推动下，贝弗里奇愉快地邀请哈耶克做访问学者，次年，又授予他图克经济学和统计学教授的职位。55罗宾斯说，“（这一提议得到了）全票赞成。”56哈耶克毫无保留地接受了此职。

哈耶克抵达伦敦的那个月，凯恩斯正在电台的一出广播节目里敦促家庭主妇花钱、花钱，再花钱。商品便宜，意味着英国消费者的日子从没这么好过过。只可惜，有工作的人过得当真不错，数百万失业者却仍在无所事事地游荡。“失业的工人和闲置的工厂每天能生产价值数百万英镑的商品。”凯恩斯说。1

凯恩斯说，答案看似有悖常理，其实却很简单。“今天有很多人……他们相信，为补救眼下的局面，自己和邻居能做的最有用的事情，就是比平常更积极地储蓄。如果他们能节制开支……他们认为，就有助于就业……在目前的情况下，这是非常错误的。”凯恩斯利用自己擅长的归谬法，对人人极力储蓄的前景发出了警告。“假如我们所有人都不再开销自己的收入，尽力储蓄。所有人都会丢了饭碗。用不了多

久，我们就再没有收入可花了。没人会变得更富裕，而且，最终所有人都会饿死。”

“每当你存下5先令，你就让一个人一整天都没了工作。”他告诉听众们，“另一方面，你购买商品，则是在增加就业……如果你不购买商品，商店的库存就清不空，它们就下不了新订单，于是就有人失了业。所以，爱国的家庭主妇们，明天一大早就冲上大街，去开心地购物吧……你会为增加了就业、增加了国家的财富而额外欣喜。”2至少有一位妇女采纳了凯恩斯的建议，那就是他的妻子莉迪亚，她正在伦敦的一家商店买毛毯，为缓解失业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

凯恩斯敦促地方投资公共工程，创造就业机会。“举例来说，为什么不把整个伦敦南部从威斯敏特拉到格林威治呢……这不会雇佣工人吗？它当然会！难道说，工人无所事事，苦不堪言地领着失业救济金，这反倒更好吗？不，当然不是。”3

广播造成了巨大的轰动，至少40份报纸的社论撰稿人对凯恩斯的观点发表了评论。“我一辈子还没这样招摇过，”4凯恩斯写信给莉迪亚说。但拉姆齐·麦克唐纳积重难返的政府却并未注意。财政大臣菲利普·斯诺登（Philip Snowden）认为凯恩斯的想法是极不负责任的。他绝望地告诉内阁，国家的财政状况“极其严峻……一个月又一个月过去，世界经济危机没有好转的迹象，财政前景不断恶化。”5

斯诺登对利用公共工程缓解失业提法的紧张情绪，财政部的一份备忘录做了呼应，它预测“国家以当前规模持续借贷，又没有偿还的储备……很快就会危及英国财政系统的稳定”。6凯恩斯承认，他的想法可能会把世界市场吓得相信政府会拒绝还贷，引发英镑的挤兑，故此，他建议采用临时进口关税。如此快速变脸，让媒体掀起了新一轮嘲笑凯恩斯习惯性改变意见的风潮。最出名的一句评论据说来自温斯顿·丘吉尔：“要是你把两位经济学家关在一个房间，你会得到两种意见，但要是他们其中一位是凯恩斯勋爵，那你会得到三种意见。”7故事中，凯恩斯的反应是：“事实改变，我的看法自然也改变。要不然，你怎么做呢，先生？”8

不管是政敌还是朋友，都反对凯恩斯的进口关税建议。斯诺登和劳埃德·乔治均坚持自由贸易，而保守党早就主张这样的政策，尽管有可能欢迎凯恩斯为这一主张背书，但没必要邀他加入自己的阵营。他们正等着麦克唐纳的第二届工党政府垮台，因为这预示着他们将重新掌权。

多年来繁重的工作开始向凯恩斯收债来了。1931年年初，日后长期折磨他的健康欠佳问题首次显露迹象。伴随流感而来的扁桃体发炎，让他牙痛得厉害。6年后，他又患上了细菌性心内膜炎，在青霉素正式应用于临床之前，这种心脏瓣膜感染尚是不治之症。但凯恩斯一直支撑着病体。5月底，他恢复得不错，有了足够的体力到美国去做巡回讲演。这是10多年来他头一次出访美国。不过，这可不是一次悠闲的假期。

大西洋两岸都非常需要凯恩斯。1931年5月11日，维也纳信贷银行（Credit-Ansalt Bank）倒闭，用来支撑奥地利企业的5/6的资本都因不良贷款而亏损。这为欧洲经济吃紧吹响了不祥的号角。在英国，麦克唐纳的工党政府到了临界点，美国亦处在经济动荡当中。凯恩斯迫切地想亲眼见识一下1929年股灾给美国带来的灾难性影响。他受芝加哥大学的邀请，到美国就失业问题做讲座，当时，美国的失业率已达16.3%。很快，其他美国人也纷纷拿着如何治愈全球经济灾难的题目征求他的意见来了。

尽管凯恩斯在英国政府里并没有正式职位，也并不是以官方大使的身份出访美国，但他的名声为他打开了方便之门，让他接触到了最具影响力的美国人。搭乘亚得里亚号邮轮抵达纽约不久，他和莉迪亚就受美联储主席尤金·迈耶之邀到了长岛乡村度假屋，并立刻赢得了后者的信赖。“（迈耶）一直在给总统（胡佛）、摩根等人打电话。只有我陪着他，他与我的谈话分外直率。”凯恩斯写信给自己从前的学生、《国家》杂志的前任编辑休伯特·亨德森（Hubert Henderson）时这么说。9

迈耶正在思考沉重的“一战”赔款与德国经济崩溃有什么关系，这个主题正中凯恩斯下怀。凯恩斯向迈耶具体提了什么建议并无记载，但就不理性地苛刻要求德国负担无力承受的赔款一事，凯恩斯的意见众所周知，所以可能也用不着他再说什么了。不管他怎么说，这场戏都能演下去。迈耶马上建议胡佛将美国应得的赔款削减一半；三天后，胡佛更进一步，宣布一年内所有外国欠款都暂停偿还。凯恩斯断言，这一决定“迈出了意义深远的第一步”。10

凯恩斯向他在伦敦的朋友福克（O.T.Falk）11报告了美国的一种危险状态，它神秘地预示了一个世纪之后，即2008年9月，信贷危机席卷全美时出现的症状。“（银行）购买了大量贬值的次级债券，它们对农民的预付款、对房地产的折旧并无充分保障。”12福克记录道。

在纽约新学院（New School in New York）的一场讲座上，凯恩斯否定了“依附于纽约一流银行的所谓‘经济学家’”给出的自由市场药方，13主张用涨价和放松信贷的方式把经济重新带回轨道。他向芝加哥的经济学家和外交政策研究者喊话，他告诉听众们，他们正处在“现代世界一场几乎完全由经济原因导致的特大灾难当中”，14他认为大萧条是美联储“惊人低能的”高利率政策挑起的。他进而说，经济陷入停滞时需要动员政府投资，迄今为止最浅白的知性理由在于，“显而易见，不首先恢复企业的利润，没有什么能振兴就业。可依照我的判断，不首先恢复投资量，也没有什么能恢复企业的利润。”15他主张通过“政府或其他公共机构直接主办的项目”，同时“降低长期利率”，以此提高投资。凯恩斯惊讶地发现，在芝加哥这座美国企业家的故乡之城，同时也是美国商业的病灶点，以昆西·赖特（Quincy Wright）16为首的经济学家，似乎和他一样同样热心提高公共支出。17

凯恩斯回国时，英国正遭受着深刻的信任危机，人们怀疑政府偿还债务的能力，尚跟金价挂钩的英镑出现挤兑现象。1930年，德国举行大选，希特勒的纳粹党获胜上台，人们担心德国出现内战，资本疯狂外流，黄金和外汇大规模兑现。1931年年初，德国国家银行因无法兑现承诺，掀起银行危机，反过来又导致了对英镑的新一轮激烈炒作，英国财政部无奈向美国贷款。为了满足贷款条件，财政大臣斯诺登提出了一揽子大幅削减公共支出的计划，计划起草人是前保诚保险公司（Prudential Assurance）的官员乔治·梅（George May）爵士。计划内容包括将失业金减少20%。凯恩斯断定梅的计划会弄巧成拙，估计失业大军还会再添25万~40万人次，国库的耗费会比削减救济金节省的部分多得多。

麦克唐纳向凯恩斯征询对乔治·梅爵士计划的意见，凯恩斯回答说，他非常愤慨，但他想骂的脏字最好还是别公之于众了。凯恩斯力劝首相放弃梅的建议。他预计，英镑不可能继续维持在目前的价值水平（他预料得丝毫不错）。凯恩斯在《每日先驱报》上痛斥梅的报告，“是我这辈子不幸读过的最愚蠢的文件”，斯诺登执行梅削减计划的预算提议“愚蠢透顶，不公之至”。18

凯恩斯说，低迷到了这个阶段，英国宁肯忍受巨额赤字，也好过靠削减开支来迅速还债。他解释说：“目前，各国政府都有巨额赤字。因为政府这样那样形式的借贷是一种天然的补救措施，这么说吧，它能避免企业亏损严重到生产完全停顿的地步，就像现在这样。”19麦克唐纳内阁压倒性地赞成凯恩斯以进口税来帮忙纠正

国际收支平衡的意见，但斯诺登否决了这个想法。麦克唐纳发现，自己不可能获得下议院的必要多数票执行乔治·梅的削减开支计划，只好辞职。英王乔治五世劝他和保守党联合组阁，这一回，麦克唐纳成功了。在1931年10月匆忙举行的大选中，国民政府在新的下议院中包揽了552个席位，击败了麦克唐纳所在的工党，而工党又拒绝了跟随党魁进入联合内阁的邀请，只留下了46个席位。自由党彻底成了小党，内部还分成3个互相争斗的派系。工党和自由党的双双惨败，标志着凯恩斯对英国经济政策的影响走入低谷。

麦克唐纳执掌保守党占压倒性多数的新政府时，采取了大幅削减公共支出的政策。1931年9月15日，麦克唐纳放弃了金本位制。凯恩斯的传记作者哈罗德评论道：“这些年的辛苦全都白费了。早知如此，何不在1925年就采纳凯恩斯的意见！”20这一决定让凯恩斯感到犹如平反，但此刻全无时间庆祝了。实行6年的金本位制度带来的经济损害，已经摧毁了英国的工业。由于坚持正统思想的人非要英镑维持原有价值水平，成千上万的英国工人毫无必要地丢了工作。随着时间继续流逝，大范围的经济苦难看不到尽头，凯恩斯惊讶地发现，他身边年轻的剑桥大学生们纷纷投入了共产主义的怀抱。

1931年5月，凯恩斯正横渡大西洋的时候，哈耶克完成了对凯恩斯《货币论》的猛烈批评文章，发表在伦敦经济学院学报《经济学刊》8月号上。哈耶克刚当上经济学院的教员，罗宾斯就以《经济学刊》的编辑身份，要他详细审读凯恩斯的著作。罗宾斯打算赶紧把书评刊登出来，他相信哈耶克不会食言。哈耶克也爽快地接下了任务。这是一个大好的机会，它不光能从有关当前经济衰退的辩论核心上反击魅力日增的凯恩斯主义观点，还可以评价并应对当代影响力最大的经济学家的最新理论著作。

哈耶克有心让自己的批评文章掀起轰动。尽管他给“马戏团”的凯恩斯主义者留下了些印象，但迄今为止，他尚未吸引到伟人本身的关注。伦敦经济学院的四场讲座让他得到了教职，但在霍顿街之外并未激起太大波澜。没有证据表明凯恩斯注意到了哈耶克私人的胜利，但在《经济学刊》上近距离评价凯恩斯的作品，凯恩斯总不能视若无睹吧？哈耶克迫切地想在新土地上寻求名利，他和罗宾斯的想法一样：彬彬有礼、完全讲道理地评价凯恩斯，是不会让大师动容的。哈耶克的文章必须写得足够尖锐，才能发挥最大功效。哈耶克经常告诉同事，他喜欢像熊彼特和凯恩斯那样的思想家，他们总是跟了不起的好东西唱反调，喜欢给正统观点来点惊

吓。现在，是对凯恩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时候了。

在书评的开场白里，哈耶克以跟奥地利绅士相符的无可挑剔的礼貌态度，评价了凯恩斯及其诸多成就，他说自己是凯恩斯的晚辈，又是英语学术舞台上的新人。“凯恩斯先生任何著作的面世，都必然是一件重要的大事，所有经济学家都怀着浓厚的兴趣，期待《货币论》的出版。”他写道。紧接着，他就开始朝凯恩斯的肋骨之间插刀子。“然而，这一回，《货币论》显然只是表达了知识迅速发展的一个短暂过渡阶段。这个时代期待它的出现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可惜，不能不说它辜负了这种期待。”21

哈耶克在其后的评论中，同样采取这种居高临下的态度，暗示凯恩斯是个无知、狭隘的人物，困在导师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粗俗的盎格鲁-撒克逊式思想里；而凯恩斯对奥地利学派的迟来追赶，又未免有点不自量力。哈耶克写道：“《货币论》带有新近发现的、迄今为止凯恩斯先生并不熟悉的某一思想学派的强烈痕迹，不把它视为实验——第一次尝试将这些新观点与剑桥所授传统货币知识相结合——是断然不公平的。”22

哈耶克继续明褒暗贬。“就算对大陆经济学家来说，这种方法似乎并不对像作者而言那么新颖，那也必须承认，他进行了一轮甚有野心的尝试，把分析带入细节，带入迄今为止没人研究过的复杂问题当中。”23哈耶克对凯恩斯理解大陆经济学的努力做了一番鼓励之后，又给出了恼人的一刺。“他成功与否，是否因为没有投入足够精力，像他招摇伪装地那样深刻理解‘真正’经济学家的基本理论（这是确立任何货币解释的基础）而遭受严重挫折，仍然是未来有待检验的问题。”24

哈耶克最愤怒的地方并不在于手边这本书的本质，而在于凯恩斯改变并误用了奥地利学派的部分观点，并借此去推动政府干涉经济的主张：敦促政府用公共工程项目去创造就业。“这样一本书带来的理论刺激毋庸置疑，”哈耶克写道，“与此同时，有人担心它以目前形式出版会对货币理论的发展造成直接的影响，也是自然而然的。毫无疑问，他所提出的切实建议的紧要性，也是他认为自己理论推理合乎情理的地方，使得凯恩斯先生匆忙出版了这部尚未完成的作品。”25

正如马克·安东尼（Marc Antony）身上带着血污，盛赞刚刚遇刺身亡的凯撒的美德，[1]哈耶克也采用了相同的雄辩策略。“提议的确具有革命意义，不能不吸引到最广泛的关注：它们来自一位素以勇气和非凡洞见著称的作家，而该作家又展示

了他全部的学识和现实知识对其加以详尽的解释。”26紧接着，批评来了。对外行人而言，凯恩斯的理论貌似有理，甚至令人信服，但只要稍微了解经济学的人就知道，它们不比胡言乱语好多少。这本著作“高度技术化和复杂化，不是专家的人永远无法理解”。27对凯恩斯确立其理论所使用的关键术语和方程，哈耶克毫不掩饰自己的鄙视。凯恩斯的论述，“艰深，无章可循，晦涩”，“太难了”，“晦涩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谁也无法肯定自己是否正确理解了凯恩斯先生”。28

在开场白中严厉斥责凯恩斯智力不足、对奥地利经济学基本理论缺乏认识之后，哈耶克拉开了一番漫长、复杂、基本上无法理解的解释：为什么凯恩斯对奥地利资本理论（包括哈耶克自己的作品，它尚未以英文出版，故此凯恩斯不可能读过）的无知，使得《货币论》无助于阐明商业周期的波动。

自始至终，哈耶克用的都是一种火药味十足的语调，仿佛凯恩斯有意得罪了他本人一样。“基本上，我并不反对这种恼人的区分（企业家的利润和货币收入），”29他写道，接下来，他列举了他眼里一连串的个人疏忽。“我不能同意他对利润为什么产生的解释。”30他写道，“我必须承认，我绝对无法认同他的概念存在任何有用的意义。”31“我应该反复指出，”32凯恩斯的另一点认识错误。虽然凯恩斯本人也是一个很自负的人，但同时，他有足够的自信，经常改变主意，承认自己的错误；而哈耶克的立场则完全基于他确信自己每一点都是正确的。凯恩斯沉迷于争执和辩论，欢迎别人跟他看法不一致，而按罗宾斯的说法，哈耶克“没人劝得了，他对自己有着坚定的信念。但在讨论当中，他的重点始终不在于说服他人，而是追求含义”。33

在暴躁的评论中，哈耶克并不局限于解释自己对凯恩斯推理和结论的不同看法，更穿插了各式各样的人身攻击，比如“他似乎认为……”，“尽管凯恩斯先生的陈述存在某些明显的矛盾之处，”还指责凯恩斯“个性非常有害”。他不光指出对手的错误，还声讨凯恩斯语言晦涩，如“这里出现的大多数难题，都是凯恩斯先生所用方法带来的结果，他从一开始，就在分析复杂的动态过程，忘记了先对基本过程做足够的静态分析，铺好必要的基础”。34

究其实质，哈耶克在定义上与凯恩斯纠缠不休，对诸如“储蓄”和“投资”等基本概念，偏爱奥地利学派早已确立的说法，而不是剑桥使用的词汇或是凯恩斯自创的新说法（他以为那些东西是自己新观察的现象）。不过，哈耶克对凯恩斯《货

币论》最主要的不同意见，还在于凯恩斯忽略了奥地利人的资本理论概念，尤其是资本货物“迂回”生产手段对价格与需求的影响，这一点，哈耶克在马歇尔学会的讲座上没能做出足够清晰的解释。哈耶克和凯恩斯对经济如何运作有着彼此矛盾的看法，而哈耶克希望人们注意到，冲突的核心在于两点：凯恩斯认为储蓄和投资不需要达到均衡状态，哈耶克不同意；凯恩斯认为投资和储蓄的差额非常重要，它对价格的稳定有着不利影响，哈耶克也不同意。

至于说其他的分歧，哈耶克认为，凯恩斯只采用了克努特·维克塞尔的一部分概念，而且并不是政客欧根·冯·庞巴维克对有关资本理论的进一步研究，这一点不可原谅。“只利用某一理论得出的结论，”他写道，“却不接受理论本身，从因果关系上来说这是不可能的。但对像凯恩斯先生这样智力水准的作者，这种尝试却得出了真正了不起的结果。凯恩斯先生完全忽略了维克塞尔的整体理论基础。可他似乎又觉得有所欠缺，于是就坐下来自己钻研出一套。”35他一边责备凯恩斯没有考虑弗兰克·陶西格（Frank Taussig）36的研究（陶西格是经济理论学家，被称为“美国的马歇尔”），又一边鬼鬼祟祟地问道：“倘若凯恩斯先生不光接受庞巴维克理论的一条支脉，而是彻底了解该理论本身的实质，不是会让自己的任务变得更容易些吗？”37

谩骂结束的时候，哈耶克切换掉了他的敌对模式，再次假模假式地说起奉承话来，实则是责备凯恩斯的疏忽和判断上的失误。大概是罗宾斯提醒过哈耶克吧，要把凯恩斯钉死在十字架上，留一个不那么刺耳的音符很重要。“到了这时候，我觉得我应该再多加上一句话，”哈耶克写道，“很有可能，在前面的篇幅，在本该单纯要求给予进一步解释的地方，我的意见采用了太多批评的形式，我对轻微的表达失准太过吹毛求疵。对这样一本书，虽然我说的几乎全是批评，但不可否认，它在很多方面都有着精彩绝伦的表现。但愿读者们不曾误会我对它欠缺足够的敬意。”

他有点不够真诚地继续说：“我的目标始终是帮助读者理解这本非凡艰深而重要的作品，我希望，我在这方面的努力最完美地证明了我认为它有多么重要。”38接下来的一句话里，哈耶克以狂妄的嚣张态度说道，除非凯恩斯能在《货币论》中做出更好的解释，否则，他就应该赞同哈耶克的看法。“最终，甚至会有这样的可能，凯恩斯先生和我的观点，其实并不如我如今以为的那么大。唯一的难处大概只是凯恩斯先生把书写得太难了，让人没法跟上他的推理。希望读者原谅我这位评论人，因为我竭力想要认真负责地理解此书，可面对作者设下的重重障碍，有时难免

会耐心尽失。”

事实证明，哈耶克的总结发言远远不是尾声。他的书评只是一轮连续组合重拳里的第一波。他在后记的脚注里向剑桥的凯恩斯轰去了警告的炮弹：在下一个月的《经济学刊》中，他将发表书评的第二部分，并仍然以猛烈批评为主，因为，他坦言，“弄清凯恩斯概念的确切意思实在是太难了，我无法肯定自己是否正确地理解了凯恩斯先生。”

哈耶克直截了当地要求凯恩斯尽快反驳自己的批评意见，好澄清一些他现在仍然不太清楚的观点。“凯恩斯先生积累了这么多有待清理的此类问题，我们最好是暂停一阵儿，但愿他进一步的解释能够提供较为坚实的基础，以便讨论能继续下去。”39哈耶克的枪此刻陷入了沉默。凯恩斯会不会上钩，他说不准。但根据他对凯恩斯的认识，他，还有罗宾斯，都毫不怀疑：过不了多久，他们就会收到凯恩斯从国王学院办公室发来的强硬还击。

实验第一次尝试，尚未完成，论点薄弱，艰深，无章可循，晦涩，太难了，前后不一，费解，难以置信，极度谨慎，最大的保留。哈耶克用这些刺耳的词语和轻蔑的说法朝强大的凯恩斯开了火。他的意图很明确：每一个回合都发起挑战，不留情面，用大叫“国王没有穿衣服”的方式吸引关注。有趣的是，罗宾斯自己并未用这样的态度评论《货币论》，因为他受既定的学术传统和人际礼仪所限，再加上他和凯恩斯在麦克米兰委员会有过争执，真这么做的话，别人会说他是为了私怨而报复。

但罗宾斯和这轮攻击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他是《经济学刊》的编辑，他不光向哈耶克约了稿，还认可了这篇文章并做了润色。事实上，几乎可以肯定，罗宾斯暗中给哈耶克帮了忙，因为贯穿《对凯恩斯先生货币纯理论的思考》全文，都找不出语法上的错误来。要知道，那时候哈耶克的书面英语还相当蹩脚。后来，哈耶克把他在伦敦经济学院所做的四场讲座的讲稿整理成了《价格与生产》（Prices and Production）一书，该书出版时，他感谢罗宾斯为他的英文润了色，他说：“（罗宾斯）为将手稿整理成适合出版的形式，付出了可观的劳动。”40至少，哈耶克在书评中所用的冒犯腔调和语言，罗宾斯丝毫未做改动。

1931年夏秋之交，哈耶克最关心的只有一件事：凯恩斯是否愿意回应他。凯恩斯完全有权利无视哈克耶暴躁的批评，因为他还有重要得多的事情要做。对凯恩斯

来说，回应哈耶克的攻击，只是他国际国内、公共私人领域里无数件有待完成的任务之一。要是凯恩斯的气量稍微大一些，他完全可以说，跟籍籍无名的哈耶克缠斗毫无意义，哈耶克保守的经济学研究方法是板上钉钉的，而凯恩斯正忙着从经济废墟上拯救世界呢。

英国最终宣布放弃金本位制，或许带给了凯恩斯幸灾乐祸的一瞬间，但他大概没什么心情庆祝。10多年来，他不停地向历届政府解释、劝诱、动员、敦促，希望通过增加公共开支来治愈失业，但这些努力毫无成效。他打趣说，自己未能赢得掌权者的支持，就像是“预言大巫师的呱呱叫，从来影响不了历史的进程”。41在弟子们的帮助下，他正酝酿着超越《货币论》的思想，他致力于总结后人所谓的“通论”（general theory）。故此，假如他瞟到哈耶克在《经济学刊》上的尖刻评论，大可以耸耸肩膀，把它扔进废纸篓里。可他偏偏不。他转过身来，朝着对手迎了上去。

不管凯恩斯认为对手的分析有多荒谬，他总是本能地迎上去。从辩论中获益，是头等的剑桥精神。每当凯恩斯本人一参战，辩论必然会以丰富多彩的语言进行起来。凯恩斯是天生的辩论天才，他情不自禁要戏剧化地表现自己和对手的差异。连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1那强大的精神也被凯恩斯夺目的智力吓倒过。“凯恩斯的智力是我所见过的人里最锋利、最清晰的。”罗素写道，“跟他争辩的时候，我总感觉是在拿自己的性命冒险，就像个傻瓜一样。有时候，我会感觉人这么聪明必然没深度，但我也知道，这种感觉毫无道理。”2艺术史学家肯尼斯·克拉克（Kenneth Clark）3深有同感地说：“他的照明灯是从不熄灭黯淡的。”4罗伊·哈罗德也赞同地说：“我们这个时代，没人比凯恩斯更聪明，也没人像他这么不加掩饰。”5

哈耶克极度的自信，或许再加上伴随傲慢而来的勇敢无畏，使得他愿意冲进凯恩斯的主场迎战巨人。凯恩斯的回应是以毒攻毒、以火克火。凯恩斯认为对手深深地陷在狭隘的奥地利学派认识里，无法理解需要想象力大胆飞越的观点，于是他发动了一轮本能的攻击。哈耶克对凯恩斯《货币论》的苛刻评论，让凯恩斯怒不可遏，他用了将近7年的时间来梳理自己的观点，出版了这本书。这当然是一本不断修正改进的作品，可对手居然没考虑到这一点，凯恩斯觉得受了侮辱。事实上，考虑到哈耶克的主要目标是反对凯恩斯，他必然早就意识到，凯恩斯已经远远超越了自己在《货币论》中表达的观点。

在《货币论》的序言中，凯恩斯承认，自己对书中的努力并不满意。“本书中有大量内容代表了我摆脱过往想法、努力寻找表述现有想法的过程。”他写道，“篇幅中仍散落着我蜕下的外皮……我感觉就像是一个被迫自己找路、穿越混乱丛林的人。”6

对这样一个超凡的公共人物而言，如此坦白殊为不易。它为探讨凯恩斯与自己的追随者及普通公众之间吊诡的关系提供了洞见。凯恩斯总是谦虚地承认自己尚存不足，但同时他也超有信心：哪怕他的智性旅程并不完整，也值得出版。此外，他还不愿意放弃自己为《货币论》付出的心血。亚瑟·奎勒-库奇爵士（Sir Arthur Quiller-Couch，英国作家）7曾建议作家们残酷无情，“干掉自己的心肝宝贝。”8凯恩斯若能遵照这一建议，结局一定会更好。可恰恰相反，凯恩斯竟然主动向一丝不苟、固执己见、不肯宽于待人的对手献上了大好的攻击素材，而这个对手正准备拿他开刀搏出名呢。

凯恩斯自承不足，哈耶克的书评却寸步不让，两派人马（凯恩斯和他在剑桥的追随者，对战哈耶克和他在伦敦经济学院的奥地利学派信徒）自然论战起来。论战很快演变成粗鲁、残酷的人身攻击，到两人过世之后都不消停。1931年秋天，凯恩斯发现自己处在了有些尴尬的位置上：他被迫要捍卫自己不再认同的想法，尽管他在11月号的《经济学刊》上发表的回应表明，哈耶克论点的主旨激起了他的兴趣。或许，这就是为什么他愿意花费那么多精力在哈耶克的进攻中捍卫自己。

凯恩斯读了哈耶克长达26页的书评（上下两部的前半部分），手里握着铅笔，越看越生气，在书页的空白处留下了34处反驳。终于，哈耶克不光针对《货币论》，更针对他整体观点的学术辩论方法把凯恩斯气炸了。“作者希望读者怀着‘善意’阅读自己的书，可哈耶克不。”他写道，“他若不怀着善意读我的书，便不能明白我的意思，无法懂得我是否正确。他显然有一种挑战我的激情，但我倒好奇他的激情是怎么一回事。”9凯恩斯在《对哈耶克博士的回复》一文中承认，哈耶克对当代经济学辩论的贡献勾起了他的好奇心。他残忍地评估了哈耶克在《价格与生产》中提出的论点。“以我之见解，在我读过的书里，这本书要算最糊涂的一本了。开篇前45页几乎没能提出一点合理的主张。”他写道，“不过，它还是有些意思，能在读者的脑海里留下点痕迹。”接下来，他承认本书也有优点。“这是一个精彩的例子，说明无情的逻辑学家可以怎样从错误开始，一路冲进疯人院……不过，哈耶克博士的确看出了异象，哪怕他醒来的时候疯言疯语地讲述故事，把故事

里的东西胡乱冠上名称，可他的脑袋并非全无灵感，必定能使读者窥见他观点中的源头。”10

事实上，凯恩斯在《货币论》中提出的理念和哈耶克在《价格与生产》中表达的内容相去并不太远。最重要的一点相似之处在于（但持续时间并不长），两人都假设在封闭经济体中总产出是固定的，当人人都实现就业，均衡状态就会出现。两人的主要区别是储蓄与投资不平衡的原因与结果。哈耶克借助奥地利学派的资本理论，认为在这种时候，经济体的信贷水平和真正的需求失衡。

比哈耶克和凯恩斯头脑冷静的人大概已经看出了他们论据的诸多相似之处，并把焦点集中在有趣的差异之上。可在《经济学刊》及随后私人信件往来的激烈交锋中，凯恩斯和哈耶克却深深地纠结于判断对方所用术语的含义，以求破译对方到底在说什么。即便是对训练有素又得益于数十年后见之明的经济学家来说，这两人之间的差异往往博学到了费解的程度。11凯恩斯甚至一度恳请罗宾斯来调停。哈耶克和凯恩斯两人都未曾料到他们竟然会看不懂彼此的观点，这让他们措手不及，就像黑夜里两艘船迎面驶过一样。

从凯恩斯发表在《经济学刊》的文章明显可以看出，凯恩斯一开始就为哈耶克连在术语的使用上都找不到共同点感到懊恼。“哈耶克博士请我阐明《货币论》中一些他认为含糊的专用术语。他坦率地说，他发现自己和我的差异难以解释。他肯定我的结论是错误的（尽管他没有说明是哪些结论），但他又认为‘极难论证确切的分歧点，并陈述他的不同意见’。他认为我的分析脱离了本质，但他又宣称，‘判断论据的缺陷不容易’。故此，他所做的无非是为了找出语言上的矛盾或暗藏的歧义，挑剔我所使用的具体词汇。”12凯恩斯很乐于澄清自己所用术语的含义，但他把这些澄清放在了文章末尾的附录里，贬低了用词差异的重要性。尽管哈耶克努力想要把辩论焦点重新拉到技术层面上，探讨盎格鲁-撒克逊式马歇尔派经济学和奥地利资本经济学之间的差异，但凯恩斯却指责哈耶克忽视了更宏观的图景（这些宏观图景，凯恩斯并不打算放弃）。

凯恩斯认为，哈耶克不愿面对他新颖的想法，可不光是迟钝的问题。“哈耶克博士严重地误解了我的结论的特点，”他写道，“他认为我的中心论点是另外的什么东西，其实并不是那么一回事。”他指责哈耶克不光歪曲了他的观点，还曲解了他的话，强加不实之词。“难怪他认为我的结论有许多不一致的地方了。”他写

道。他批评哈耶克把论点隐藏在术语之中，实际上无非是想“找麻烦”，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故意“小题大做”。

凯恩斯承认《货币论》论点的部分误会是他自己的错，是他弄混了确切的含义。他坦言，在撰写《货币论》的这些年里，对好些关键因素，他多次改变心意，但没有在最终成品中将先前的推理清除干净。“原来思路的痕迹不容易删掉，我早先写的某些段落，不自觉地跟早前的观点更为吻合，却跟我现在的认识不那么一致。”13但凯恩斯就打算退让到这个地步。他暗示，哈耶克对奥地利学派的思维方式太过投入，对《货币论》中所表达的原创和复杂思想，哈耶克这样墨守成规的学者跨不过这道坎。“深深沉浸在老式观点中的人，就是不愿相信我是在邀请他们试穿新裤子，坚持认为新裤子无非是他们穿了好多年的老裤子新绣上了花而已。”14

凯恩斯怀疑，“一个称职的经济学家”怎么会误解和谎报他的观点，但他又暗示哈耶克没有能力跳出自己在维也纳学到的那一套概念。“否认自己的教条对他来说似乎不可想象，哪怕我写了数万字加以驳斥，对他来说都像是耳边风。他只能注意到我的结论跟他的所学不一致，却看不见我从一开始就对它提出了异议。”15

哈耶克把自认为有别于凯恩斯的观点一一道出。哈耶克宣称，储蓄和投资不相等，是银行提供不当或“非自然”信贷水平的结果，随着时间流逝，这种做法会导致商品价格变化。然而，凯恩斯更看重“自然”利率和“市场”利率不相符合的时候。故此，哈耶克和他占据的是“不同的山头”。凯恩斯向哈耶克伸出了橄榄枝。他建议解决的办法是基于庞巴维克和维克塞尔的著作，资本和利息理论还有更多的研究可做，他同意英国经济学家长久以来太忽视上述两人了。他说，自己在一定程度上就打算试试看，并正在着手进行的新书里公布其成果。他对不同的术语做出定义之后，又评论说，一道“厚而浓重的雾，仍然横亘在我和他的思想当中”。就这样，凯恩斯果断地结束了自己的还击。

凯恩斯的尖锐回应让整个学术界都扬起了眉毛。众所周知，凯恩斯受不了傻瓜，总会气势磅礴地回应批评之声。据认识他的人说：“跟他有接触的人会自卑感弥漫，他要负的责任比同时代的其他任何人都更多。”16但即便对刻薄的凯恩斯来说，他也承认自己和哈耶克两人的往来缠斗充满人身攻击，刻薄得非比寻常。正是因为年长的凯恩斯放弃了通常的礼节，结果门户大开，遭受了一位刚到英国没多久、远不如他有成就的学者不公正的奚落。

对凯恩斯行为的抱怨，起初仅限于资深研究员的公共休息室，不过，当马歇尔的后继者、剑桥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亚瑟·庇古（Arthur Pigou）17哀叹凯恩斯的还击有失体统之后，许多学者对论战精神的不满就浮出水面了。“在我们的私心里，真的对我们同时代的某些人进行争议时采用的态度感到完全满意吗？”1935年，庇古在伦敦经济学院的一场讲座上问道：“一两年前，一本重要作品出版之后，有人对若干具体段落做了谨慎而认真的批评。作者的回应不是反驳批评，而是暴力攻击批评者本人几年前写的一本书！直接把球朝对方身上扔！18用决斗的方式！那种事必定是个错误。”19他认为凯恩斯和哈耶克之间的争吵是“两败俱伤”。20

尽管凯恩斯和哈耶克的高调决斗得罪了不少人，但罗宾斯却对论战感到高兴，也渴望让矛盾愈发激化——这可不光是为了让《经济学刊》及伦敦经济学院得到关注。他请哈耶克立刻回应凯恩斯的还击。凯恩斯上了钩，罗宾斯和哈耶克都很欣慰，也乐于见到伟人准备参与详尽讨论，让新凯恩斯主义的观点跟奥地利学派角力。到了论战的这个阶段，要把他们拉开就很难了。两人都从“古典派”（它以产品成本为推理基础，如产品的稀缺性、土地和工资的成本）和“新古典派”（考虑到商品的价值依赖于其有用性，还有“边际效用”的概念——某种商品越多，在买家眼里所蕴含的价值就越低）中汲取思想。不过，凯恩斯已经在探索怎样操纵需求、供给和价格，而奥地利学派的思想则让哈耶克相信，干涉自由市场将导致无法预见的结果。

哈耶克放下《货币论》批判文章第二部分的写作工作，匆匆拟就了一份对凯恩斯反驳的回复。“很遗憾，”哈耶克对凯恩斯写道，“凯恩斯先生的回答似乎并未帮我理清我先前指出的诸多疑惑，或是对进一步讨论奠定更好的基础。”21如果说，哈耶克最初的攻击触怒了凯恩斯，那么，凯恩斯回复里隐含的怒气，也给哈耶克造成了同样的效果。凯恩斯对他的《价格与生产》一书的贬斥，尤其伤了哈耶克。哈耶克写道：“我肯定地说，我非常乐意也迫切地愿意听取凯恩斯先生对我的任何确凿批评，但我看不出胡乱抨击我的整体观点有什么目的可言。我简直不能相信凯恩斯先生给人留下的印象，对手反对他的分析，他却侮辱对手，分散读者的注意力。我希望，等我的批评文章全部发表后，他不光能更具体地反驳我的异议，还能证实其驳斥意见。”22

哈耶克再度将自己认为是分歧核心所在的术语差异罗列了出来。“他并没有澄

清他的投资概念。我也基本上没能看出它确切的意思是什么……他的利润概念也是如此。事实上，除非他能阐明投资的概念，我不认为他能清楚地使用利润这个术语。”23哈耶克表达了热切学生所受的那种委屈：他只要求对方澄清，对方却声讨谴责他。“作者所提到的几乎所有基本概念都很含糊，有些甚至采用了若干断然矛盾的方式来定义，我本期待他急于澄清其具体含义，以求得到理解。到了这个阶段，我们至少能要求他全力以赴给出概念的确切定义吧？”24

哈耶克说，因为没有明确的定义，他只好猜测凯恩斯的意思。他再次陷入贯穿书评第一部分那种饱受伤害的愤慨语调。“我无奈（假设这就是凯恩斯的意思）因为我无法，事实上现在也无法从他的《货币论》及随后的反驳中发现这一现象有其他任何站得住脚的解释，也因为我拒绝相信（可我现在怕是不得不相信了），凯恩斯先生竟然认为他对利润和投资的分析，能独立而充分地解释他的矛盾之处是怎么来的。”25

在解释了凯恩斯论点中的缺陷之后，哈耶克指责凯恩斯忽视了欧洲资本理论，暴露了他对经济学的无知。他建议凯恩斯重新看看资本理论，“就算我们还没有特别满意的理论，至少也有一套比凯恩斯所依赖的东西要好，那就是庞巴维克和维克塞尔的理论。凯恩斯忽视这套理论，不是因为他认为它是错误的，而仅仅是因为他从未费心去了解过它。这足以证明，他根本不理解我尝试根据这一理论建立若干推论的努力。”26

虽说凯恩斯希望尽快结束这场小论战，但看到《经济学刊》上哈耶克语带叱责的回复，他向这位批评者写去了一封简短的便签，引发了一连串几乎让人看不懂的交流，后来，凯恩斯将相关信件拿给了“马戏团”的少数几名成员传阅，尤其是皮耶罗·斯拉法。他采用了真正的剑桥辩论风格，表面上看，凯恩斯的质询是单纯的学术磋商，旨在更好地理解对手的异议，其实却是想让哈耶克在草率中做出鲁莽或有漏洞的回复，给他下绊子。凯恩斯用英国公立学校的方式对哈耶克直呼其名，他写道：“如果你能帮我更深入地澄清一下储蓄的定义……给我一个公式说明如何衡量储蓄，我会更明白些。此外，按照你的术语，‘自愿储蓄’和‘强迫储蓄’有什么区别呢？”27信笺末尾，他留下了正式的落款：“J.M.凯恩斯。”

一个星期内，哈耶克回了信。信的开头称“亲爱的凯恩斯”，随后附上了对“储蓄”的复杂代数定义，他相信，这个定义考虑到凯恩斯一部分“储蓄”跟更

新破旧厂房有关系的主张。哈耶克认为，此刻凯恩斯就脱钩了，所以哈耶克很着急地想把凯恩斯给抓回来。哈耶克对两人间的明显术语差异做了限定。“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即对我所称的‘强迫储蓄’，最好不使用‘储蓄’这个词，仅将之称为对过剩储蓄的投资。”他说，“在我看来，储蓄和投资达成均衡状态，必然意味着两者一致，至于为什么你觉得储蓄和投资可以不一致，我实在不明白这理由。”28

哈耶克的信到达当天，凯恩斯就写了回复。“非常感谢你的来信，让我总算把事情弄得更清楚一些了。”他写道，“然而，有两处表达我还想得到进一步的解释。”29他对哈耶克所用的“速率”（velocity）感到困惑，“据我所知，当今经济学家用这个词至少有九种含义，而这九种含义彼此之间都有些微妙的差异。”他还向哈耶克请教“现有资产”一词的意思。30

三天后，哈耶克回了信，解释他所说的“速率”的意思是“总有效流通”，尽管“我通常并不使用这个概念”。他让凯恩斯查阅庇古的《福利经济学》（Economics of Welfare），“基本上完全与我的观点吻合。”31四天后，凯恩斯又把球击过了网。“要是我惹人生烦的话，真抱歉，”凯恩斯写道，“但我真的想知道你所说的‘有效流通’的确切意思。”32

就连圣诞节的降临也没放缓两人的通信往来。圣诞节一早，哈耶克就写信给凯恩斯，“抱歉我误解了你的问题。‘总有效流通’是任意时间段内有效的货币支付总金额（现金、银行存款或任何形式）。”33那天下午——当时，皇家邮政局每天会投递两次信件，连圣诞节也不例外，凯恩斯回复道，“我认为你就是这个意思，”但他很快又补充说，“可这也正是我的纠结所在。”哈耶克或许已经感觉到，尽管凯恩斯对术语上有所保留，但他离对手靠得更近了些，更方便反驳他的观点了：凯恩斯在最初的三封信里署名“J.M.凯恩斯”，而这一回的圣诞节通信，他却署下了不那么正式的落款"J.M.K"。

哈耶克圣诞期间到伦敦外面过了些日子，通信短暂中断，可没多久就恢复如常。哈耶克再次恢复了掩盖不住的恼怒语调。“如果我想到你（对用资本代替储蓄）感到困难，我老早就会说得更清楚些了。”34他抗议说。但是，哈耶克发现，这事很难弄得清楚。面对凯恩斯简单的询问，他的回答是一个单句，并带二级从句的省略语，足有200个让人难以消化的单词。到了这个阶段，就连哈耶克也意识到，要简单地表达自己的想法绝不轻松，所以他在括号里写道：“对这个可怕的‘德国

式’句子，我很抱歉。”为了解决更新破旧厂房的问题，他再次建议凯恩斯重温奥地利学派“迂回”生产阶段的概念（就是它，曾让马歇尔学会困惑不解）。

凯恩斯一周内就写了回信。如果说哈耶克以为自己距离解答凯恩斯疑惑靠得更近了些，那他可想错了。“你的切入点并不是真正让我困扰的地方，”凯恩斯写道，“（更新破旧厂房）需要一定的收入比例，对商品折旧。这一点我能理解。”但他继续要求哈耶克给出储蓄的定义，并请求后者把世界当成它本来的样子加以认识，而不是当成一种概念结构。“在一个进步的社会，或者在一个新发明淘汰现有工厂（和折旧截然相对）、现金周转（过手的货币量）和国民收入（产生的总财富）之间不存在稳定关系的社会（举例来说，在英国或者在美国1931年两者的关系和1929年就有着很大的区别），情况会是怎样。”35

1932年1月23日，中断了近两个星期后（在此期间哈耶克患了轻微的流感），哈耶克详细做了回答。他一边试着回答凯恩斯的不同意见，一边坚守生产的阶段性。他继续停留在奥地利经济学派的概念领域，拒绝猜测现实生活的条件，他承认，“判断需要多少货币变化才足以抵消商业组织的变化，诚然是货币理论最困难的一个任务。”他尝试解决凯恩斯有关筹集资本取代过时厂房的要旨，并答应回到问题本身。“我会在我‘思考’的第二部分处理问题的这个方面，我才刚刚读了相关的证据。”36

凯恩斯对通信感到了厌倦。他把哈耶克最近的来信拿给斯拉法看，并写道：“下一步会是什么呢？我很想打呵欠——也真的打了。不过，我还是忍不住想，或许会出现什么有趣的东西。”37

三个星期之后，凯恩斯对哈耶克1月23日的信件做了回复。他举起了白旗，甚至可以说，他投降要求停战了。诚如他对斯拉法所说，他厌烦了在一个并非他当前关注点的领域深挖下去，他现在关心的是自己不断发展的理论如何进行实际应用，而且他的耐心耗光了。“你的信对我理解你在想什么帮助很大，”他写道，“我想，依靠通信的方式，你已经把我想要问的东西都告诉了我。这件事无法再深入讨论了，除非把你的论点扩展到更为实际的案例上，而不是对我们所讨论的内容一味加以简单化。显然，它的内容足够写一本书了，通信远远无法涵盖。”他对哈耶克解释说，他希望从两人的交流中理出一条清晰的思路，帮助自己探索如何更好地解决周期性经济条件，但他所取得的进展有限，不能再多花时间和精力了。

“回到我们通信的起始点，我从这儿开始，也从这儿结束。”凯恩斯写道，“也就是说：你所谓的自愿储蓄和强迫储蓄，我不知道它应用在我们所生活的现实世界是什么意思。不过，我认为我现在理解了你在某些具体案例中使用它们的意思，当然，它也让我对你在想什么有了一定的整体认识。多谢你这么详尽地回答我。”38

由于有太多别的事情要做，比如撰写日后名为《通论》的著作，凯恩斯急于迅速了结与哈耶克的争论。他的结论是，他不大可能说服哈耶克修正想法上的谬误。如他所说：“在经济学上，你不可能判定对手有错，你只会让他愈发相信自己。而且就算你是对的，如果你自己的说服和阐释力上有瑕疵，如果他的脑袋里已经充斥了相反的概念，跟不上你想向他展示的思路，你也不可能说服他。”39不过，凯恩斯也很乐于通过其他途径继续决斗。凯恩斯和哈耶克各自长剑入鞘了一阵儿，但两人的弟子继续展开着与两人分歧相关的辩论。

本·希金斯（Ben Higgins），1933~1935年就读于伦敦经济学院的一名学生，还记得双方当时激烈的对立情绪。“身在伦敦的我们认为剑桥发生的奇怪事情很滑稽，而且是非常危险的滑稽，”他回忆说，“而且，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有着如此风度、机智和魅力的人（指凯恩斯），再加上他的辉煌成就，恐怕会成功地说服一些人相信他是对的。这可真是一个可怕的前景。若非如此，伦敦和剑桥之间怎会发生激烈的辩论呢——我们几乎完全没有任何接触。我们都受到哈耶克很深的影响。他是我们的神祇。”40

加拿大出生的剑桥经济学家罗伯特·布赖斯（Robert Bryce），以类似宗教献身的情绪信奉凯恩斯的观点，他参加了哈耶克在伦敦经济学院的讲座，感受跟希金斯很类似，只不过是站在堡垒的另一边罢了。“1935年春天，我每个星期总有一两天怀着传教士的心情到伦敦经济学院去，”他回忆说，“我参加了哈耶克的研讨会……这是距离剑桥最近的异教徒集中地，我受人鼓励去那儿宣讲（凯恩斯的概念）……哈耶克很有礼貌地给我上了几堂课，把这件事告诉他的学生们。我必须说，这是一场刺激的体验，我发现很多人都挺严肃地对待那份论文。”41

哈耶克在伦敦经济学院的研究生阿巴·勒纳到剑桥待了一个学期，他找到理查德·卡恩和“马戏团”的其他成员，“建议双方阵营的年轻一代应该聚到一起，自己解决争议。”42剑桥人欣然应允，双方决定辩论的经过应当刊登到一份新杂志《经济

学研究评论》（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上。双方还在埃塞克斯郡纽波特一家酒馆面对面碰了头。这个位置事关重大。纽波特位于剑桥和伦敦的半路上，是知识分子从不涉足之地。1933年8月的第一次会议上，代表剑桥一方的是卡恩、琼及奥斯汀·罗宾逊，还有詹姆斯·米德；伦敦经济学院一方来的则是勒纳、索尔·阿德勒、拉尔夫·阿拉基和艾伦·艾曼纽。43讨论的基调如卡恩所评论：“如果哈耶克相信，把新印出来的钱花在就业和消费上会恶化当前可怕的大萧条，那么哈耶克就是个疯子。”44

此外，他们每个月还会抽一个星期天举办联合研讨会，不是在牛津剑桥，就是在伦敦，连伦敦大学学院的年轻经济学家休·盖茨克尔（Hugh Gaitskell）45也赶来参加。剑桥帮靠着昂扬积极的姿态占了上风。正在伦敦经济学院哈耶克门下就读的路德维希·拉赫曼（Ludwig Lachmann）坦言，他感觉自己就像是一场战争里即将溃败一方的初级军官。让年轻成员们大感兴奋和震惊的是，有时候哈耶克、凯恩斯、罗宾斯和丹尼斯·罗伯逊也会露脸。保罗·罗森斯坦-罗丹（Paul Rosenstein-Rodan）1931年是伦敦大学学院的经济学讲师，他回忆道，罗伯逊在一次会上做了关于货币作用的讲演，他指责当时同时在场的哈耶克和凯恩斯，说两人都没有考虑时间的流逝。面对共同的敌人，哈耶克回应以“冗长的谩骂”，凯恩斯则跟着“站起身说他完全同意（哈耶克）”。46

除了“马戏团”的杂耍，凯恩斯还有另一招更凶狠的手段：通过中间人攻击哈耶克。为了替自己的《货币论》辩护，他猛烈抨击了哈耶克的《价格与生产》，结果招来对手和同事的非议。为给予回应，凯恩斯决定做些补救。他并不打算重返“案发现场”，倒找了个人在下一期的《经济杂志》上替他详细评论《价格与生产》。他选中了斯拉法，他是除琼·罗宾逊之外最好斗、最伶牙俐齿的弟子。此举让哈耶克遭到了恐怕要算自他到英国以来最残酷的攻击。

1932年2月，哈耶克在《经济学刊》上发表《对凯恩斯先生货币纯理论的思考》第二部分。他和罗宾斯一道热切地期待着凯恩斯做出响应。又一次，哈耶克以一种因为无法理解（凯恩斯的文章）而感到愤愤不平的腔调表达了自己的论点。“待议的观点涉及一个超级离奇的陈述，若非它白纸黑字地写在书上，实在叫人很难相信它竟然出自凯恩斯先生之口。”哈耶克装出一副不可思议的姿态，频频使用这样的句子。批评文章第二部分的论调和用语严苛与激得凯恩斯做出更加过激回复的第一部分没有太大不同。

哈耶克再次责怪凯恩斯使用经济术语不够精确，但他论点的主旨切中了自己与凯恩斯分歧的核心。哈耶克迎头痛击了凯恩斯多次在公开声明中提出的中心主题，具体而言就是：在商业周期的底部，政府为应对高失业率而采取的干预市场的理智手段。

“许多人持有一种纯粹的商业周期货币理论，和他们一样，”哈耶克写道，“（凯恩斯）似乎相信，倘若不是现有的金融机构碍手碍脚，靠着无限的通货膨胀，繁荣能够延续……为此，当他发现靠廉价资金实现投资复苏已无可能时，便转而在他著名的广播演说里主张直接刺激消费支出……因为，基于这一理论，廉价资金和提升消费者购买量带来的效果是相同的。”

哈耶克所说的无线电广播，指的是凯恩斯呼吁“爱国的家庭主妇”“明天一大早就冲上大街，去开心地购物吧”的那一次。1在广播里，凯恩斯老调重弹，“在全世界的各大工业国家，如英国、德国和美国，我估计，大约有近1200万产业工人正无所事事……而每一天，这些无事可做的工人和闲置的厂房，本可以生产出价值数百万英镑的商品。”2在“思考”一文的第二部分，哈耶克用凯恩斯的话将了后者一军：凯恩斯提出要“不惜代价”地治愈失业，而哈耶克便试图量化这一点，给“不惜代价”标上一个确切的价格。哈耶克得出的结论是：这个代价就是通胀猛增。他从前亲眼见证了恶性通货膨胀摧毁了维也纳的文明秩序，破坏了他家庭的积蓄，所以哈耶克相信，这个代价未免太高。

哈耶克总结了凯恩斯对商业周期的解释。“根据（凯恩斯的）理论，繁荣就是消费品的需求价格超出供给量的成本带来的，故此，只要满足供给的需求不断向前，繁荣就将持续，一旦需求不再增加，或是供给在超常利润的刺激下赶上了需求，繁荣就结束了。那么，等消费品的价格跌落回成本，繁荣就会结束，尽管不一定会变成萧条；然而在实践中，通货紧缩的倾向（价格下跌）通常会出现，逆转这一过程。”3哈耶克认为，对繁荣的此种解释没什么新鲜内容。“究其本质，凯恩斯的解释不仅相对简单，而且也跟目前通行的解释没有太大的不同。”4

哈耶克相信，凯恩斯通过降低利率、提高投资、促进繁荣的想法是短视的，过上一段时间，就没有效果了。他论述了自己这么想的原因，“他认为，我称之为生产结构变化的东西（即平均生产周期的延长或缩短）是长期现象，在对诸如商业周期等短期现象做分析时可以忽略。”哈耶克写道，“我担心，凯恩斯先生这么想，

只不过证明他并未充分认识到，就业人口人均资本量的任何变化都等同于迂回生产过程平均长度的变化，故此，他论证的商业周期资本量的所有变化，恰好可以证明我的观点。”

此外，“如果投资的增加不是出于这一目的而主动决定减少消费水平的结果，那么，一旦银行系统不再为投资提供额外的廉价手段，它就没有理由能永久持续下去，凯恩斯先生所描述的消费品需求增长也会告终。”5他总结道：“鉴于上述考量，不难理解，1929年崩盘后立刻采取的宽松货币政策为什么会没有效果。”6

凯恩斯反复强调，在缺乏私人投资、储蓄和投资跟不上的时候，政府出资进行公共项目建设能够维持高水平需求，保住就业岗位。哈耶克专门阐述了此点的含义。哈耶克非常肯定自己反驳的正是凯恩斯的中心论点之一，便用斜体字突出表示了这一段落的重要性。“增加投资以对应这一本来就需要维持旧有资本的‘储蓄’——任何此类举措，其效果都等同于将投资抬高到净储蓄通胀水平以上的做法，它强迫储蓄，误导生产，最终导致危机。”7

这是对凯恩斯观点的有力反驳。但是哈耶克来得太迟了，凯恩斯的大车已经开动了。对哈耶克第一部分批评做了慌乱的回应后，凯恩斯决定无视哈耶克的后继批评了。他现在已经完全转移了焦点：在经济衰退时期缺乏私人投资的条件下，为什么提高公共投资能创造就业，不会带来哈耶克认为不可避免的危机一题，他正忙着为之建立一套智性上无懈可击的解释——长久以来，他就着迷于此了。而这些思索的结果，就是他的不朽之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

凯恩斯决定不再回应，这让哈耶克备感挫败。罗宾斯和哈耶克把书评分为了两部分，未能吸引凯恩斯的所有注意力。凯恩斯为书评的第一部分感到火冒三丈，指责哈耶克故意误导他的观点，但这一次，他无意再重返辩论的战场了。故此，一举将凯恩斯主义扼杀在萌芽状态中的最好时机，就这么一去不返了。要是哈耶克先发表的是“思考”的第二部分（击中了凯恩斯干预主义的要害），或是将上下两篇一次性发表，他本有可能长时间拖住凯恩斯的注意力，阻止后者继续上路。可惜，大概是因为哈耶克以及罗宾斯都没料到凯恩斯那么快就对第一部分做了回应，反倒对哈耶克观点更充实、更具说服力的部分置之不理了。

凯恩斯找了一只“猎犬”去跟哈耶克缠斗，那就是“马戏团”里年轻的皮耶罗·斯拉法。派斯拉法出门迎敌的决定，彻头彻尾没怀好心。在凯恩斯的门徒里，斯拉

法是跟哈耶克角力最完美的人选。这是个令人生畏的角色，他高额头，留着黑色的短发和一抹小胡子，写过一篇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意大利通货膨胀分析的文章。

斯拉法是个很会吵架的人，拆分论点时好辩嘴，阐明批评时够刻薄。就算是可怕的琼·罗宾逊——剑桥对伦敦经济学院冲突中跃跃欲试的斗士，也认为斯拉法表面上害羞、讲礼貌，骨子里却是唯一让她害怕的人。

斯拉法的密友、哲学家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对意大利人（指斯拉法）的辩才深感敬畏，跟斯拉法相遇之后，说他就像是去掉了枝丫的光秃秃的树干。8“树，剥离了旧有的枝丫，新芽会强有力地生长出来。”9维特根斯坦写道。拜倒在斯拉法一贯手法下的另一名学生则说，他“精心挑选理论结构上的战略要害，再给予正面攻击。（斯拉法）从不浪费时间去批评无关紧要、旁枝末节的东西”。10哈耶克过度注重细节，头脑有点死板，要对抗他，斯拉法的技法很理想。按一位奥地利学派信徒的说法，两人来了“一轮异常凶猛的交火”。11

斯拉法欠了导师凯恩斯一笔特殊的人情债。斯拉法出生在意大利都灵，是一位法学教授的孩子，1921~1922年他在伦敦经济学院求学，在此期间，经玛丽·贝伦森（Mary Berenson）12——常驻佛罗伦萨的美国艺术评论家兼经销商伯纳德·贝伦森（Bernard Berenson）13之妻的介绍，他认识了凯恩斯。回到意大利后，斯拉法在佩鲁贾当上了政治经济学教授，成了个引人注目的人。他是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安东尼奥·葛兰西、社会党人菲利波·图拉蒂的朋友，到1922年，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政党上台掌权，斯拉法也顺理成章地成了国家的敌人。法西斯党人取代了左派在政府岗位上的工作，法西斯团伙的暴力行为也日复一日地猖獗。

斯拉法是一个有原创思想的经济学家，凯恩斯看中了他这一点，委托他为“欧洲重建”系列写一篇文章。斯拉法在文章里尖锐地批评了意大利的三大银行。因为文章把意大利银行业骂得狗血淋头，它甚至引起了墨索里尼的关注。偏巧，墨索里尼当时正动用国家资金，挽救奄奄一息的罗马银行，以应对银行危机。斯拉法的文章出现得恰逢其时，杀伤力极大，凯恩斯很高兴，可墨索里尼不高兴了。他说斯拉法的文章“恶意中伤意大利”，14斯拉法是拿了外国人钱的激进间谍，背叛了祖国。墨索里尼向斯拉法的父亲安杰洛发去威胁的电报，要求斯拉法收回文章，公开道歉。斯拉法告诉父亲，自己的文章以确凿的事实为基础，他坚决捍卫自己所说的每一个字。

银行准备向斯拉法提起诽谤诉讼，斯拉法却还待在意大利。凯恩斯及时出手相助，他向斯拉法提供了剑桥经济学讲师的职位，保证了后者的安全。由于银行的震怒，斯拉法辞去了米兰的公职，动身前往英格兰。英国移民事务所收到意大利当局的举报，说斯拉法是危险的革命分子，在多佛的海关把他给扣下了。斯拉法被遣送回法国北部的加莱，15等危机消停过后，他接受了凯恩斯替他创设的职位。

虽然斯拉法加入了“马戏团”，但他的年龄（他30岁出头，比其他人略长）和他擅长洞悉古典理论家著作疏漏的名声，都让他显得与众不同。凯恩斯布置给他的一个首要任务，就是将自己的《货币论》翻译成意大利文。1932年3月，凯恩斯又要斯拉法在《经济杂志》上评论哈耶克的《价格与生产》。凯恩斯为自己选的这个捍卫者，实在好得不能再好了。

和伦敦经济学院的讲座一样，《价格与生产》不是一本容易琢磨透彻的书。伦敦经济学院的讲师约翰·希克斯同情奥地利学派，后来却又因将凯恩斯的概念翻译为简化的数学模型而名声大起。16他说，“《价格与生产》有英语版，可它不是英国经济学。在进行恰当评估之前，它还需要进一步的翻译。”17斯拉法用来反对哈耶克的论点也不怎么容易理解。就连专门研究奥地利学派思想的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弗兰克·奈特，18也认为整件事情太让人摸不着头脑了。他写信给奥斯卡·摩根斯坦，“我希望哈耶克或者其他人用语法简单的句子给我讲讲斯拉法和哈耶克之间的争议到底是什么。我一直没找到在这方面有哪怕一丝一毫线索的人。”19

不过，有一件事没人会错过，那就是斯拉法攻击所用的讽刺、无情、针对人身的语调。斯拉法在批评文章里开篇就形容哈耶克在伦敦经济学院的讲座“对听众和主讲者的耐心都提出了极大的考验……这些讲座有一个方面……完全坚持了现代作家在论述金钱时迅速确立的传统”，斯拉法说，“那就是不可理解”。斯拉法赞扬哈耶克专注于系统中货币量对商品价格的影响，而不是只看整体价格，但“在其他每一个方面，必然的结论都是，（哈耶克的想法）只为这一主题原本就混乱的思想又增添了更多的困惑。”20

在《价格与生产》中，哈耶克试图证明，如果以某个高于储蓄总量的速度借钱，它所投资的生产就无法维持下去。倘若更多的资金趋于干涸，工厂老板就会发现吸引不到客户，一些生产线也只能停工。换句话说，借钱的价格失去平衡，它破坏了商品生产的有序阶段，要经过一段危机时期，才能找到新的平衡。哈耶克认

为，借贷资金的理想速度应该是没有浪费，让各生产阶段都可以维持下去，并以消费者能够负担的价格提供商品。这就是“自然利率”，能有效地赋予货币“中立”的角色，因为它不对生产系统的“自然”运作产生负担。

斯拉法执行任务的方法很明确。他受托评估《价格与生产》，并将重点放在哈耶克的错误上。捍卫凯恩斯的理论并非他的关注点。斯拉法首先斥责哈耶克的货币永恒中立一说，“那也就是说，有一种钱能让生产和商品的相对价格（包括利率在内）‘不受干扰’，就好像它们完全不是钱一样。”斯拉法认为哈耶克犯了一个基本错误，他提醒说，“每一本货币教科书的开篇”都否定过哈耶克的货币中立概念。“也就是说，货币不光是交换的媒介，也是价值的载体。”斯拉法形容哈耶克的理论“是一座充满矛盾的迷宫，读者看到货币的讨论时就彻底晕头转向了，绝望得什么也不肯相信了”。至于说哈耶克喜欢用三角形图示解释的有关生产阶段的复杂理论，斯拉法说它“就像一台为了敲碎坚果而设计的可怕气锤，可惜它没把坚果敲碎。考虑到在本篇评论中，我们的主要关注点是坚果并没有被敲碎，故此也就不需要花时间去批评气锤了”。

至于哈耶克的核心主张，即“有一点毫无疑问”，如果生产者使用了超过储蓄量的信贷，通货膨胀和崩溃就将接踵而至，斯拉法则针锋相对，以其之矛攻其之盾。“略作思考便知，‘有一点毫无疑问’，这种事情绝不会发生。一个阶级暂时性地剥夺了另一个阶级的部分收入；又把抢来的战利品储蓄了起来。掠夺结束之后，很明显受害者不可能再消耗超出自己能力范围的资本。”哈耶克认为，宽松的信贷断绝之后，制造商的机器就成了冗余的东西，斯拉法则指出，工厂主会保留工厂，等市场重新抬头时付诸使用。所有这一切都是由他们的客户买单的。哈耶克预言，如果银行以低利率放贷，对工厂主是一场灾难。斯拉法反驳说，在额外资本没有储蓄做支撑的时期，制造商会趁着额外资本的供给告罄之前，赚到足够的现金偿付其利息。与此同时，生产商找到手段，以更低的价格生产大量商品。因此，长期来看，降低利率来促动生产，非但不会带来通货膨胀，反而会降低价格。

斯拉法声色俱厉地断定，“哈耶克博士的讨论与货币和通胀完全无关”，并指责哈耶克“远离了货币中立的问题”，不经意地降落到了“凯恩斯先生理论的正中央”。按斯拉法的说法，哈耶克并非凯恩斯的对手，而是尚不自知的仰慕者和支持者。“行文至此，本篇书评必须打住了，”斯拉法又加了一句揶揄的话，“碍于篇幅，无法再对哈耶克博士毫不出奇的新立场进行批评了。”21

哈耶克马不停蹄地在下一期《经济杂志》上对斯拉法做了答复。他以自己一贯的讽刺风格，假装同情斯拉法的困境，“花了这么多时间工作却明显没有得到利润，‘为这一主题原本就混乱的思想又增添了更多的困惑。’”斯拉法批评哈耶克对经济学的新颖贡献，即“靠‘强迫储蓄’累积的资本，至少会随着‘强迫储蓄’理由的消失很快消散”。哈耶克正面接了招，他同意斯拉法的意见，认为“这一点成立与否，决定了我理论的成败”。

哈耶克再一次解释了没有储蓄为支撑的新资本注入经济后会带来什么结果，他强调，由于额外资金注入系统会推动工资上涨，受雇者最终会付出更多代价。他认为，增加工资支出而非资本支出，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放缓生产资料的增长，达到新的均衡点，此时利率“降回了强迫储蓄发生之前的水平，（生产商的）资本也跌落到了接近此前的状态”。事实上，生产者的设备闲置并不意味着他们工厂的价值缩水了。不用的机器不如开工的工厂价值高，与此同时，生产商还必须支付借贷的利息。

哈耶克要斯拉法证明他“对这一分析惊人肤浅的异议”，接着又话锋一转，问道：“他是否属于相信（用闲置厂房）刺激消费的教派呢”——就跟凯恩斯一样？斯拉法嘲弄哈耶克，说他和凯恩斯在许多问题上都意见一致，哈耶克不承认这一点。“我冒昧地认为，我否定斯拉法先生的说法，凯恩斯先生会完全同意。”他写道，“其实，在我看来，斯拉法先生提出这样的看法，似乎只道破了一个毫不出奇的新事实，他对凯恩斯先生理论的认识，比对我的理论的认识更为欠缺。”对这句话，凯恩斯加了一条调皮的脚注：“若承蒙哈耶克先生许可，我希望能这么说，就我的认识而言，斯拉法先生准确地理解了我的理论。”22

斯拉法立刻写了一篇“二次答辩”，和哈耶克的回复刊登在同一期的《经济杂志》上。首先，他惯例地向目标下饵。“哈耶克博士这篇典型的回复文章，本身就雄辩地证实了我的评论，我真是不愿意妄置一词，败坏风景。”他写道。哈耶克所谓的将导致灾难的“强迫储蓄”，斯拉法更乐意称之为“掠夺”，“在通货膨胀中有所得的人选择把战利品存下来……承受了强迫储蓄的人在这个问题上毫无发言权。”斯拉法争辩道，“强迫储蓄”——称它“不恰当借贷”或许更加合适，不会像哈耶克认为的那样带来灾难，而是会甜蜜收尾。“新生产过程一开始产出消费品……企业家就完全用当前的生产弥补支出，完全用销售所得偿付增加的资本，无须任何额外的通胀资金了。”这时候，通胀也随即结束。斯拉法赞同哈耶克，认为这

一切只有当工资不因新成本而上涨时才有可能出现。“不过，我认为事情不会这样，”斯拉法断定，理由是哈耶克在上一篇文章中给出的脚注：“除非这笔钱正好在额外的生产阶段中被纳为现金持有。”“正是如此，”斯拉法感叹地说，“要是哈耶克博士写这本书时耗费的心血和评论者读他书时耗费的心血一样多，他应当记得，依照他的假设，这些现金持有不光会吸纳一定的额外支出，而且会吸纳整个通货膨胀期间发生的额外货币总量；故此，收入完全无法上涨，也完全不存在资本散失的条件。”

哈耶克在自己的文章里要求斯拉法说清他真正相信什么，因为斯拉法没有指出自己思考的知识基础。现在，斯拉法以深刻的调侃做了回应。“（斯拉法揭穿哈耶克的逻辑缺陷）之后，哈耶克博士应当准许我不把他的问题——我‘真正’相信什么——当真了吧？没有人会相信这种逻辑来自虚幻假设的东西在现实里能当真。不过我承认，从抽象上来说，的确存在这样的可能性：通过错误的推理所推导出的结论，在意外之下居然成立了。”斯拉法有意用这个句子来上致命一击。

斯拉法还做了最后一轮强攻。哈耶克把自然利率，即均衡状态货币有效中立称为“货币利率”，受斯拉法的催促，他承认，没有单一的整体自然利率，对不同的商品一连串不同的自然利率更合适。斯拉法进一步思考了这个问题，准备来个突袭。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克努特·维克塞尔确立了自然利率和货币利率的概念，他认识到没有单一的自然利率，而是每一种商品都有不同的自然利率。例如，苹果有一个自然利率，羊毛则有另一个自然利率。斯拉法的解决办法是从概念上为每一种自然利率加权，算出一个复合自然律，和均衡时期整体经济的货币总量相等。“这种规避类的方法不适合哈耶克博士，”斯拉法自夸地说，“因为他断然否定了平均值的使用。”23斯拉法和哈耶克之间一来一往的刺耳音符就此戛然而止。

伟大的凯恩斯和哈耶克的决斗，是一场技术化、模糊、难以理解且脾气暴躁的冲突。它基本上是两位重量级思想家之间的后勤角力。哈耶克坚信，整体而言，经济学是一个深奥的主题，只能从市场个体互动的角度去部分理解。然而，凯恩斯却正在构思《通论》，提出思想突破口。他认为，从整体上由上至下地观察供给、需求和利率等诸多元素的交汇点，这样理解经济学最为适宜。哈耶克卡在了后世称为“微观经济学”的思考上，着眼于构成经济的成本和价值等不同元素；凯恩斯却正在朝着思考经济运作的新路上飞跃，即把经济视为整体的“宏观经济学”。无怪乎凯恩斯和哈耶克的争论在《通论》出版前丝毫没有打住的迹象，因为他们试图用

微观经济学的手段，去探求哈耶克微观经济学方法和凯恩斯宏观经济学概念之间萌生的深刻差异。

两人的思想没有交点。弗兰克·奈特长叹道：“我希望，能够确立起经济学家能够彼此探讨的术语和概念，就算他们要争论，也能争论问题，而不是争执彼此的主张有没有意义。可惜，这方面的进展我始终看不到。”至于斯拉法和哈耶克的附带演出，奈特说：“我还没看见有谁能说明白斯拉法和哈耶克在争论些什么。”24

当时人们并不明白哈耶克和凯恩斯之争对经济学历史有什么重要意义可言。有人说它除了发泄别无亮点，“就是两个顽童之间的无知对打”。25不过，哈耶克的研究生路德维希·拉赫曼，在哈耶克与斯拉法交流期间任前者的助手，却回忆说：“更敏锐的人会察觉到，他们正在见证经济学世界两种不可调和观点的冲突。不怎么敏锐的人只会迷惑不已，不知论辩双方在吵什么。但没人会喜欢他看到的场面……对20世纪30年代普普通通的盎格鲁-撒克逊经济学家来说，没人想得到，这只是经济学思想两大学派之战中打响的第一炮。”26

接下来的几年，凯恩斯在战略上有所改变。他是一个天才的大众辩论家，但不管他多么努力地设计、煽动政府利用公共工程去治愈失业，他自始至终都觉得没取得多大的进展。写完《货币论》之后，凯恩斯对居高位者失去了影响力。拉姆齐·麦克唐纳的“国家”管理，不过是换了个名字的保守党政府。保守党认为凯恩斯反商业，宣布他是“不受欢迎人士”。失败了的工党转向左翼，党员们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注定要失败，所以没什么耐心接受凯恩斯对这套制度的补救措施。至于凯恩斯视为自己精神家园的自由党，则饱受打击，落魄潦倒。

权力高层现在几乎无法容忍凯恩斯。诚然，他仍然时不时地跟麦克唐纳在波迈的雅典娜俱乐部共进午餐，但这无非是过去他跟掌权者们共度好时光所残留的幽灵罢了。他在首相经济顾问委员会下属的经济信息部保留了一个职位，但1932年2月，政府又成立了一个新的顶级经济学家委员会为政策提供建议，凯恩斯未能入选，他的老对手莱昂内尔·罗宾斯（Lionel Robbins）却得到了席位。

凯恩斯认定，自己新书的目标受众不是普通公众，不是政治家，不是财政部的公务员，不是银行里的金融大师，而是自己的同行经济学家。因为没法通过较为直接的路线带动变革，他现在迈上了新的征程，他要巧妙施展自己的理论，让经济学家代表他去奋斗。为此，他打定主意，《通论》一书中的论点要毫不含糊地恰如其

名，1理性呈现，覆盖全面，逻辑紧密。他开始筛选自己的想法，接受“马戏团”成员们的批评，咨询亲密的同事，他相信，这些热心的知识分子能让《通论》完完全全地说服那些早已准备好接受说服的人。完成这部作品，将花去他5年多的时间。

凯恩斯与哈耶克的好斗遭遇太刺激又太徒劳无功，这逼得他认为，与古典经济学家进一步辩论没有意义。他试图超越正统的市场经济学的制约，并相信哈耶克深陷于旧思维，无法理解自己正在酝酿的新概念。他对哈耶克1932年以英文出版的文章《资本消耗》（Capital Consumption）潦草地写了一句评语，“仍然是荒唐的废话。”2他们交叉穿越了彼此的道路，也对两人的分歧展开过粗略的对话，但凯恩斯并不想说服哈耶克。“上个周末，哈耶克到这儿来了，”1933年，凯恩斯从国王学院写信给莉迪亚。“昨晚，我和他一起坐在大厅里，今天还跟他在皮耶罗·斯拉法家里吃了午饭。我们在私交上相处甚得。但他的理论是垃圾，我今天觉得，就连他自己也开始怀疑自己了。”3凯恩斯是个热心的进步主义者，渴望帮助推动世界走向更具仁慈的未来；哈耶克虽然一辈子都说自己不是保守派，但却对新东西持有深深的怀疑。哈耶克明白，他和凯恩斯的辩论，无非是重复了奥地利学派思想悲观的内在逻辑。他后来承认：“在我看来，我所做的事，往往是指出别人选择的前进道路上有什么障碍，而不是为打开发展之路提供新思想。”4

在这个头脑风暴的重要时期，有一个人与凯恩斯保持着频繁的接触——牛津大学经济学家罗伊·哈罗德。1922年秋，哈罗德在凯恩斯手下研究过经济学；凯恩斯过世6年后，他出版了凯恩斯的官方传记，“为20世纪50年代凯恩斯思想的迅速传播起了重要作用。”5凯恩斯定期把《通论》的校样发给哈罗德，征求后者的意见和批评。哈罗德回忆说，自己对每批草稿的评语“由激情、强烈的钦佩，以及对凯恩斯巨大成就的仰慕感所构成，但也孜孜不倦地想要在某些方面转换他的观点”。6

随着《通论》慢慢成形，凯恩斯以他惯常的争议风格生出一种感觉，如果想让财政部的官员们放弃对古典经济学不假思索的执著，他必须彻底反驳哈耶克及其同类人的思想。虽说“马戏团”的成员们正在战壕里和正统信徒们激战，还激动地加以怂恿，但哈罗德仍然保持着难得的温和声音。“我尽力减轻他对‘古典学派’的攻击，”哈罗德回忆说，“我和他的意见一样，认为传统失业理论存在着可悲的缺陷，问题的根源来自不正确的利息理论，但他控诉传统利息理论没有意义，这我不同意。在我看来，这会把他的批评意见推得太远，扬起太多的灰尘，引发不相关的争议。”7凯恩斯并不担心惹是生非，拒绝删除《通论》最后一稿中对哈耶克近乎赤

裸裸的尖刻攻击。凯恩斯认为，如果旧的思维放肆阻碍了更广泛的人群理解他认识经济学的激进新方法，让世界增加不必要的苦难，那么，哈耶克的思想就必须要加以解决、解剖，令人信服地处决掉。

不过，20世纪30年代初，对凯恩斯思想产生最大影响的仍然是“马戏团”。再没有谁，能比理查德·卡恩对凯恩斯的帮助更大了，卡恩让凯恩斯完成了不可能完成的壮举，指出增加投资能提高需求，却又不引起灾难性的价格上涨。“马戏团”于1930~1931学年频频相聚，1931年5月剑桥考试之前放弃正式会议，这时，离凯恩斯着手为撰写《通论》整理思路还有好几个月。不过，理查德·卡恩、琼及奥斯汀·罗宾逊夫妇、皮耶罗·斯拉法、詹姆斯·米德等人，继续揶揄、剖析凯恩斯思想的每一次转折，对他的内心争论做出了重大贡献。凯恩斯在《通论》的序言里写道，“撰写这样一本书，笔者沿着陌生的道路摸索，如果想要避免过度的失误，他必然极度依赖于批评和对话。人要是单独思考太久，什么愚蠢的事情都可能信以为真了。”8

有人怀疑“马戏团”到底为《通论》做了多少贡献，9但“马戏团”成员们深信，他们时常尖酸刻薄的批评通过卡恩传给凯恩斯，为凯恩斯的思想和最终成品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不认识凯恩斯的人或许会吃惊，他竟愿意整个星期地和充当小群体发言人的我讨论出现的问题及其暗示。”10卡恩回忆说。奥斯汀·罗宾逊也认同这种感觉，就为什么凯恩斯感觉有必要战胜哈耶克等正统经济学家的观点一事，他提供了一条重要的线索。“我以为，凯恩斯人格的伟大之处，在这一时刻表现得最为强烈，”他回忆说，“凯恩斯从不表现出迟疑。他比我们其他任何人都更热切地追求真理，就像他打算要去驳倒最凶狠敌人的作品一样。”11对哈耶克和罗宾斯的作品，凯恩斯当真就是这般态度。

“马戏团”确然留下了痕迹。大家都出力说服凯恩斯，他在《货币论》里引用“寡妇之坛”（widow's cruse，意为取之不尽的资源）的例子是错的。这是一个典型的凯恩斯式比喻，他认为，企业家把部分利润花在购买商品上，而商品的价格亦将提高到同等程度，从而将企业家的利润恢复到从前的水平，使其保持原先的富裕程度，就像是圣经“寡妇之坛”（《旧约·列王纪》）里的油罐一样，不管寡妇用多少，它始终是满的。出于同样的道理，他们还让凯恩斯放弃了他喜爱的“寡妇之坛”的反面概念，即他口中的“达纳埃之罐”（the Danaid jar）。达纳埃是希腊神话里的人物，阿尔戈斯国王达那俄斯的女儿们。她们下了地狱后，受到的处罚是永远去装一口漏水的罐子。凯恩斯的“达纳埃之罐”理论认为，企业家通过削减

消费、增加储蓄来谋求损失时，收益递减规律意味着他们永远不可能恢复从前的富裕水平。12卡恩和琼·罗宾逊双双提醒凯恩斯注意，这样的结论只有在封闭经济体中才能成立，即消费品的产出是固定的、有限的。卡恩这样指出谬论：“如果企业家通过增加消费品产出来应对反常的利润，消费品的价格水平将逐步下降，反常利润也将下降，直至企业家的收入恢复正常，或是碰到了某种屏障——产能彻底用完，或是劳动力充分就业。”13

凯恩斯为了辩解，给琼·罗宾逊写了一封痛苦的信，指出在《货币论》的部分章节中，“我对产出变化的影响做了大量讨论；我只是在初步理论论证的一个特定点上假设恒定产出。”14但“马戏团”成员对这两点谬误的异议，使凯恩斯领悟了《通论》的一个关键元素：总体产出不是固定的，而是能够随着投资的增加，提高到经济体内人人都能就业的程度。15这是凯恩斯日后全盘反驳哈耶克等古典经济学家主张的头一条细微思路。后者认为，若任由经济自己发展，长期而言，它必然会达成均衡状态，之后实现充分就业。凯恩斯则在《通论》中主张，在短期和中期而言，经济可以在有着相当多失业的情况下达到均衡状态，古典经济学家预测的充分就业均衡往往难以实现。凯恩斯相信，20世纪二三十年代，英国和美国遭受的慢性失业正是充分就业均衡实乃谬论的证据。

事实证明，在《通论》的写作过程中，卡恩不光深得凯恩斯的喜爱，是其最忠实的学生，甚至还赢得了类似“儿子”的地位。凯恩斯需要定义、完善自己想法的时候，只邀请卡恩一人进行长时间的对话。卡恩很早就进入了凯恩斯孤独的象牙塔，充当有耐心、头脑清醒的创作伙伴。卡恩曾解释凯恩斯怎样在沉思中把他当成监控用的回声板。“1930年开始，我的大部分假期都到（凯恩斯的苏塞克斯）农舍陪伴凯恩斯和莉迪亚了，”16卡恩回忆说，“我缓解了孤独，还因为身在现场，充当了一种比邮件通信更快捷的讨论方法。”17卡恩也修改了凯恩斯的文字。“我的书面贡献——不是口头说说而已——写在校样的白边上。这种笔记有时是略作修改的意思，有时则是提醒凯恩斯和我应当对所示段落加以讨论，或是订正印刷错误。”18

卡恩为凯恩斯思考提供了有可能是最重要的一点新元素，他令人信服地解释了为什么公共投资甚至借来的资金，可以很快收回成本，同时大幅降低失业率：卡恩先称之为“比率”（the ratio），凯恩斯后将之改为著名的“乘数”（the multiplier）。凯恩斯直观地得出结论，公共投资很快就能自我清偿，1929年，他

在呼吁政府帮助无业者就业的自由党竞选小册子《劳埃德·乔治做得到吗》（与休伯特·亨德森合著）上就说过。自由党承诺投资连续3年每年投资1亿英镑创造就业岗位，但财政部却斥之为白白浪费钱。

凯恩斯指出，恰恰相反，新岗位花费甚少，而且能提升企业信心，因为企业家会投资利用这些新聘雇员产生的新需求，政府直接创造的岗位还将得到私营企业所创造的岗位之补足，后者将为向前一部分新聘员工提供商品和服务。“许多现在失业的工人能得到工资，而不是失业救济，这意味着有效购买力的提升，从而在整体上刺激贸易，”凯恩斯和亨德森辩称，“而且，贸易活动越多就越能进一步刺激贸易活动；创造繁荣的力量和带来贸易萧条的力量一样，都具有累积效应。”19这是常识，尽管凯恩斯也承认，“精确衡量这种特点带来的效应恐怕不可能。”20而理查德·卡恩在1931年6月号的《经济杂志》上发表文章《国内投资和失业的关系》，他亲自做了统计工作，证明凯恩斯的乘数推测真实有效。

卡恩回忆了自己是怎么想到要解决乘数之谜的。“1930年8月，我在奥地利蒂罗尔州着手撰写这篇所谓的‘乘数’文章。”他写道，“《劳埃德·乔治做得到吗》给了我灵感，部分原因在于它标志着思考发展的一块里程碑，也因为它提出了一些算术和逻辑问题。”21卡恩越是深入研究会有多少人因政府聘用工人而间接受雇，就越是惊讶于凯恩斯与亨德森的猜测是何等的准确。公共资金注入市场，唤起企业信心，带来新增投资，创造新的岗位——卡恩把对这部分岗位的量化暂时搁到一边，因为“对近期未来的信心状态，很难评估，更难于量化”。22提高企业信心能带来更多的就业，这一点他很有信心，至于它到底能创造多少新的岗位，卡恩把这棘手的计算留到以后再做。

卡恩把注意力集中放在凯恩斯和亨德森主张的中心论点上：每花100万英镑用于修建新公路，就能创造5000个新的岗位，其中一半是直接岗位，另一半是间接岗位。凯恩斯和亨德森估计，“将近一半的资金成本当时就能收回，”其中1/4是不必提供失业救济而省下来的。卡恩同样得出结论，不用支付失业保险，再加上贫困救济开支减少，政府省下来的钱占公共建设投资成本的一半。凯恩斯和亨德森预计新就业人士能带来相当于投资成本1/8的就业税，卡恩也同意。凯恩斯和亨德森的估计，与卡恩用严格数学分析计算出的结果极其类似，把后者吓了一跳。他写道：“凯恩斯和亨德森的天才猜测准确得惊人，只不过，迄今所知，他们并未对‘乘数’，即新增总就业（直接岗位加间接岗位）与直接就业的比率进行估

计。”23卡恩认为，不同国家的乘数或有不同，它取决于公共投资带来的收益有多少会外流他国，尤其是在英国这样一个重要的贸易国家。他估计，在英国，这个数字在0.56~0.94，“我认为取其中值3/4，‘恐怕会存在偏低估的误差。’”24

卡恩回忆说，“从一开始，我主要关心的就是许多因素——税收的增长，国库在多方面的节省……进口相对于出口的增长”，因为新就业者可能会在进口货上花钱，却不一定对出口有贡献，“私人储蓄的增长（主要来自利润）以及物价上涨带来的储蓄率的变化，都能抵消投资的成本。”25卡恩料到古典学派很快会对政府投资公共项目提出两点异议，即这些举措会提高通胀，这由丹尼斯·罗伯逊（Dennis Robertson）指出，26它们只会增加货币流通量。卡恩认为，说生活成本会上涨“是十足的昏庸之语”，因为“如果真的出现价格上涨，它也是伴随生产增加自然产生的，在一定程度上，供给曲线的斜率早以指明”。27这就是说，不管出于何种方式，只要需求增加，价格就倾向于上涨。人为提高需求带来通货膨胀，这没什么特别的。他的结论是，因为创造就业使用了公共资金或贷款，而不是由私人出资，就反对增加生产或供给，完全是转移人视线的障眼法。至于反对政府靠印钞票而不是通过借款来筹资，卡恩认为，“为什么政府公共工程支出一定要靠创造额外的钞票来支撑，却不能靠向公众借款来支撑，这是全无理由的（当然，大型项目突然启动，出于点火目的，银行系统提供一些临时帮助会很有用）。”28

虽说小圈子之外的人并不知道凯恩斯的思想迈向了《通论》，但那些反对他观点的人，比如伦敦经济学院的哈耶克和罗宾斯，恐怕还是很难不听说凯恩斯的煌煌巨著取得了很大进展。到1932年夏天，一切变得清晰起来。凯恩斯开始在一系列的周一上午讲座里向剑桥的学生们阐述他后货币论时代的想法，以“纯粹的货币理论”为名。到讲座上听课的人挺多，不光有剑桥的教员、其他科系的本科生，还有许多感兴趣的受邀访问者。秋季学期，在蒂尔顿经过长长一个夏天的反刍，凯恩斯重开了系列讲座，以醒目的通知告知学生，随后的讲座将名为“生产的货币理论”。多伦多大学的访问研究生罗瑞·塔尔希斯参加了四个系列所有的讲座，他回忆说：“1932年10月的这些话，凯恩斯……实际上宣告了凯恩斯革命拉开了序幕。”29

凯恩斯一堂接一堂地做着讲座，读着自己手里成套的修订校样，展现了最新的个人思考。来听讲座的人都看出，他们见证着一桩非凡的事情。诚如塔尔希斯所忆：“随着时间的流逝，只有顽石才不会因为这些讲座感到兴奋。”30美国本科生

迈克尔·斯崔特则回忆说：“就像我们在听的是查尔斯·达尔文或者艾萨克·牛顿一样。凯恩斯说话时，听众都大气不敢出。”31讲座快结束时，凯恩斯也将自己的想法打磨得足够满意，准备把最后一版的校样交给出版商麦克米伦。这本书，许多人视为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经济理论著作。

虽说凯恩斯酝酿《通论》期间基本上沉浸在学术生活当中，但他也在公共领域出了一次大风头。听说世界经济会议将于1933年6月在伦敦举行，凯恩斯克制不住地想有所作为。他希望制定政策的人能用得上自己最近的想法。他向《泰晤士报》的编辑杰弗里·道森主动提议写一组系列文章，建议通过国际合作穿越全球经济低谷。文章让读者抢先窥视到了一套即将改变世界的革命性理论。

在《泰晤士报》上刊出后，这组文章又收录成了一本名为《通往繁荣之路》（The Means to Prosperity）的小册子，事实证明，这本小册子成为通往《通论》珠峰的大本营。这一次，时年50岁的凯恩斯，放弃了自己擅长的新造短语和华丽讽刺，清晰而毫不犹豫地抛出了一个论点，他很有信心，光是这个论点，就足以吸引聚集在伦敦的经济学家和财政部长们的关注了。他向他们发起了挑战：要么，同意他的观点——用对纳税人最微不足道的成本创造百万就业岗位；要么，说明白他到底哪里错了。这本小册子对他充满想象力的观点做了最完整、最严谨、最具说服力的表述，包含了日后称之为“凯恩斯主义”的一切要素。《通论》只想影响搞学术的经济学家，《通往繁荣之路》却是特意为那些对经济学了解不多的各国财长们所写。对哈耶克主义者来说，《通往繁荣之路》清晰地表明，尚在成形的凯恩斯主义即将挑战他们的哲学。它公平地预先警告哈耶克主义者，《通论》里会出现哪些内容，也暗示他们，该是时候为反驳做准备了。

在《通往繁荣之路》中，凯恩斯直言不讳地批评了认为只要坚守传统补救措施，世界经济就能复原的人。“仍有人坚信，唯一的出路就是苦干、忍耐、节俭、改善业务方法，信贷更加谨慎，以及避免政府干预。”32他写道，凭借卡恩论文的武装，凯恩斯首次公开把“乘数”整合到自己的提议里：政府应当花钱提高经济总需求。他迎头痛击了哈耶克主义者“政府支出只会刺激通胀”的论断。

“如果新的支出是额外的，而不光是其他开支的替代品，那么新增的就业就不会止步于此，”他写道，“（政府支出的）额外工资和其他收入，会用来购买其他东西，这反过来引出了更多的就业。如果国家的资源已经充分使用，这些额外的购

买会主要体现为物价上涨、进口增加。但在当前情况下，额外消费只有一小部分会作用在这方面，因为它的大部分可由目前未得利用的国内资源来提供，不会让价格发生太大变化。”33

对那些第一次接触到“乘数”这个词、不了解它如何运作的人，凯恩斯做了详细的解释。新增资本创造了新的就业岗位，这些新就业的人产生了新的购买需求，为供给这些新增需求创造了新的就业岗位；反过来，这些新增的就业员工，又为其他人创造了就业岗位，如此反复。他认为英国的“乘数”是2，但他并不想说得太夸张，免得自己的论点显得像是痴人妄语，所以他说政府为创造新就业机会所花的每一英镑，对总体经济价值一个半英镑，“在材料、交通、直接就业上投入的额外200英镑贷款支出，表面上只够让一个人工作一年，考虑到它的连续反响，实际上足够负担一个半人。”34他强调，就业不是“乘数”带来的唯一好处。“（财政大臣）有半数的拨款，其实会通过失业救济金减少，以税收增加的形式回到他手里。”35这日后成为《通论》中的一个关键元素，即经济学家和财政部长不应当只顾着看国家收入和支出是否持平，更要看国家总收入的水平，即凯恩斯所说的国家“总需求”（aggregate demand）。

2008年信贷危机后，政府出台举债刺激经济的方案，立刻有人出于对预算赤字的焦虑而加以反对。当年的凯恩斯也碰到过这样的批评，但他说，“认为增加就业的方案和平衡预算的方案不可兼得——我们必须慢慢来，小心对待前者，以免伤害后者，这是完全错误的。恰恰相反，除了增加国家收入没有别的办法能够平衡预算，而增加国家收入和提高就业基本上是一个意思。”36《通论》里的另一点关键元素展现出来：国家收入等于所有就业者的收入总和。

凯恩斯估计，每年花1亿英镑可以把100万人安置就业，而其中5000万英镑资金或许都来自减税。这是凯恩斯第一次提出减税可以用来刺激经济，此举日后先是成为凯恩斯主义者及走凯恩斯主义路线的财长们的标志性政策，接着又变成保守派对手们的护身符。他提醒说，这样的减税对就业市场会产生预期效果，“但用削减政府等量开支（如减少学校教师的薪资）来平衡减税，是达不到效果的，因为这代表了对国民消费力的再分配，而非净增长。”37哈罗德评论说：“我们从这里第一次看到了一个激进想法的迹象，这个想法的激进程度超过了迄今为止所有的建议，财政部长们不光靠贷款来资助公共工程，还要在不削减当前支出的条件下减税，从而刺激额外的购买力。这几乎已经是完全意义上的‘赤字财政’了。”38

最重要的是，凯恩斯提出了一个覆盖面更大的诉求：面对普遍存在的妨碍商业活动的通货紧缩（价格下跌），各国采取一致行动，提高全球需求，蓄意提高价格，刺激企业家和私人行业。“除了在全世界提高贷款支出外，没有其他有效手段能抬高世界价格。”他宣称，“事实上，美国靠贷款维系、用于国内外的支出崩盘，是拉开市场暴跌的主要力量。” 39

接下来，凯恩斯进入另一个思考领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浩劫之后，为恢复全球经济，获胜的同盟国就受了他思考的指引。凯恩斯经常对以黄金作为财富衡量手段的做法表示轻蔑。而他现在提出，世界各地的财长要一致印钞票，假装货币背后有黄金的支撑。对凯恩斯来说，“名义黄金”和真正的金元宝一样有用。个别国家早就放弃了纸币供给和国库等量黄金挂钩的做法；为什么不把同样的金融逻辑应用到全球信贷系统呢？每一个国家都将得到“黄金票据”带来的好处，却又无须实际囤积黄金。凯恩斯呼吁，世界市场因为经济失败而动弹不得，这是恢复信心的一种手段。但倘若它真是恢复信心的手段，那它也无非是一种单纯的信心骗术罢了。罗伊·哈罗德解释说：“如果所有国家都在本国金矿发现了等量的黄金，并因这些黄金储备受到激励，奋勇向前，没人会觉得这是骗局。为什么黄金券不能扮演同样的角色呢？” 40

凯恩斯而后又提出一个想法，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为确保战后的世界不再重走《凡尔赛和约》的错误老路，同盟国也进行了同样的思考，即建立一个世界性的金融机构，日后的世界银行就是这么来的。凯恩斯建议，根据“该国在最近某个日期——比如，1928年年底前持有等量的黄金储备”，将50亿美元的“黄金票据”分配给每个国家。41为确保货币稳定，长久以来反对货币和黄金挂钩的凯恩斯不情愿地提出，名义金本位应当继续统治全新的世界金融体制。“纸币就是黄金票据，”他写道，“参与国需将它们视为黄金的等价物。这意味着，每一个参与国的货币都将和黄金维持某种明确的联系。” 42

凯恩斯的临终意见里有一条极为不祥的注解。在《和平的经济后果》中，他曾预言，强加给战败国的赔款是促成左右两翼极端政治运动的理想环境。尽管他并未在《通往繁荣之路》里提到文章面世前两个月德国出现的局面，即纳粹党党魁阿道夫·希特勒于1933年1月就任总理，但他确然暗示了另一种情况，展现了他对世界政治走向的先见之明。

“有些愤世嫉俗的人，读了我的前述观点，不免得出结论：要把世界从大萧条里拯救出来，除了战争之外别无他途。”他写道，“迄今为止，战争是政府认为大规模贷款支出可取的唯一理由。对和平时期存在的种种问题，它们胆小，过分谨慎，缺乏热情，没有毅力和决心，只把贷款视为债务，却不去想怎样把社会本可能浪费的过剩资源转化成有用的资本资产。我希望我们的政府能做出展示，哪怕承担的是和平的使命，这个国家也能精力充沛。”43

20世纪30年代初，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同样怀着不祥的预感，看着德国发生的事件。纳粹的崛起，是1938年第三帝国吞并奥地利的长长引线。在纳粹国家全面恐怖的笼罩下，希特勒力推的筑路公共工程和战争物资的生产，是对凯恩斯主张的残酷恶搞。但是，希特勒统治下德国经济的走向促使哈耶克跳出经济学，思考自由市场对保障自由社会的重要意义。正如他少时经历的疯狂通货膨胀奠定了他对奥地利学派资本理论的信仰，他对纳粹暴政下的人民，也包括他至亲的家人苦难的同情，让他从更广泛的哲学上认识到，拒绝自由市场会带来集权主义。但20世纪30年代尚在缓慢展开，哈耶克的思路仍然放在说服孤立的英国人相信欧洲大陆经济学思想有什么优点上。

他与凯恩斯的交流陷入了僵局，凯恩斯礼貌地暗示，自己厌倦了。“我对是否应当回到《经济学刊》的争论表示怀疑。”1932年3月，凯恩斯写信给哈耶克，“我尝试重塑、改善我的中心立场，我想，打发时间的话，这恐怕是一种比争论更好的方式。”1凯恩斯转移的新方向，从他在剑桥的公开讲座到在《泰晤士报》上发表的文章，人人都看得很清楚。然而，哈耶克关心的主要问题却是把自己的作品及时地带给英国经济学家，他曾对凯恩斯透露，除了罗宾斯之外，英国经济学家很少阅读用非英语发表的理论。

凯恩斯在《货币论》中承认说，“用德语的话，我只能清晰地理解我已经知道的事情，因为这种语言的难度，我很难看到新的想法。”2于是，哈耶克委托尼古拉斯·卡尔多（Nicholas Kaldor）和H.M.克鲁姆（H.M.Croome）将自己1929年撰写的文章《货币理论和商业周期》（Monetary Theory and the Trade Cycle）翻译成英语，1933年由哈考特-布雷斯（Harcourt, Brace）出版社出版。让他获得教授职位的伦敦经济学院讲座内容，经罗德里奇（Routledge）出版社修订并于1931年出版，名为《价格与生产》，1935年该书再版，他煞费苦心地修订了自己的观点。他着手收集了一系列的文章，1939年出版，名为《利润、利息和投资》

（Profts, Interest and Investment）。凯恩斯有意解决现有资本理论的不足，为表回应，哈耶克开始为罗德里奇出版社撰写自己就这一主题的思考，名为《资本的纯理论》（The Pure Theory of Capital），他希望这本书能抗衡凯恩斯的《通论》。

与此同时，哈耶克把自己和妻子海伦，以及两人结婚3年后生于1929年的女儿克里斯蒂娜·玛丽亚·费利西塔斯、生于1934年的儿子劳伦斯·约瑟夫·海因里希安顿在了汉普斯特德花园郊区一处舒适的红砖房子里。这里的住房和公共交通设施来自爱德华时期，是当时规划的理想“花园城”，后来成了伦敦北部左翼知识分子的堡垒。他的亲密朋友罗宾斯成了他的邻居。哈耶克仿效卡尔·马克思的榜样，经常出没于大英图书馆的圆形阅览室。他参加了波迈的改革俱乐部。该俱乐部是为纪念1832年的《改革法案》（把投票权扩展到工业革命期间新发展起来的城市人口上）而成立，是伦敦少见的保守党不多的大型绅士俱乐部，有着仿罗马法尔内塞宫的闪亮会所（出自设计威斯敏斯特宫的建筑师查尔斯·巴里之手），墙上高挂着英国历史上著名的激进人物肖像画。画像中不光有不顾保守派反对、执意通过《改革法案》的格雷勋爵，也有弒君的奥利弗·克伦威尔，看到他们，哈耶克就像找到了组织。3

教导研究生是哈耶克在伦敦经济学院的部分职责。汤姆斯于1934~1935年参加了哈耶克的研讨班，他鲜明地记录下了哈耶克向英国学生们展现的不协调形象。他“在我看来至少有50岁，我很久之后才发现他不过30过半。一部分原因可能是因为他老派的穿衣方式，厚厚的斜纹软呢外套，外加一件马夹和高领夹克。我给他起了个外号，叫他‘趴动先生’，[2]因为他经常说这个词，也真的这么发音”。3牛津大学经济学家、后为伦敦经济学院讲师的约翰·希克斯也参加了讲座。“一开始，我们似乎有着共同的观点，甚至可以说是共同的信念。我们坚信自由市场，或曰‘价格机制’，是一种竞争的制度，若不受政府、资本或劳动力垄断组合的任何‘干扰’，能轻松找到‘均衡’。哈耶克加入我们的时候，为这一学说引入了一项重要条件，货币（在某种程度上）必须保持‘中性’，该机制才能顺利展开运作。”4

教学让哈耶克感觉愉悦，可是他的蹩脚英语却妨碍了他传递信息的能力。“听说哈耶克来了，我们全都很兴奋，”伦敦经济学院1932年的本科生西奥多·德拉明说，“第一堂讲座，我们到了以后，他开始用英语授课。过了几分钟，事情变得很明显，我们没一个人能听得懂他说的哪怕一个字。有人建议他说德语。他照做了，而我们当中不懂德语的人，只好离开了课堂。”5这是许多学生都碰到过的经

历。“昨天读了一本新书，”学生拉尔夫·阿拉基写信给朋友，“这是这儿的老哈耶克，也叫冯·哈耶克写的。这一年，他用糟糕的英语（上帝啊，救救我们吧）做了20堂讲座，还建议我们读一本荷兰语的书！除此之外，还有30大本其他的书。但他确实是个非常聪明的家伙。”6伦敦经济学院本科生奥布里·琼斯7回忆说，哈耶克“永远挂着一抹仁慈的微笑，毫不掩饰他的本性。但他的英语口音很重，让他的想法显得很纠结。为了跟上他的思路，你只能坐在前排”。8这禁不住让人想到，要是哈耶克能像对手凯恩斯一样操一口流利的英语，真不知双方的辩论会鹿死谁手。

但要是哈耶克觉得说英语太困难了，他会更多地守在家里，不慌不忙地用书面英语整理自己的想法，尤其是在有罗宾斯、卡尔多和克鲁姆等人帮助的时候。1932年，他用英文再版了自己在维也纳大学所写的货币理论和商业周期论文，有机会对1929年的股市崩盘和大萧条加以阐述。9他认为这本书“不光阐明了货币方法的理由，也驳斥了一些广为接受却过度简化的货币解释。”凯恩斯写书是出于直面现实困境的渴望，哈耶克的作品却多为纯理论性质。不过，在《货币理论和商业周期》英文版序中，哈耶克谈到了最近的灾难性事件。

哈耶克第一次以清晰的英语阐述了自己对经济低迷的解释，同时批评了凯恩斯的看法。后者相信，联邦储备银行提升利率，压低了价格，加剧了金融的混乱局面。哈耶克承认，凯恩斯的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他认为，凯恩斯提出的重振美国经济的补救措施，判断有误。“诚然，现在看来，通缩过程（价格下跌）无疑会持续下去，造成的伤害也不可估量。”哈耶克写道，“但这并不必然意味着通缩就是当前困境的最初源头，更不意味着只要逆转通缩趋势……强迫更多的钱进入流通……就能克服这些困难。”不过，他偏爱的解决方案则以错误的前提为基础。“没有理由认为，危机是货币监管机构蓄意的通缩行动导致的，10或者，通缩本身是次要现象，是繁荣过后行业不适应所诱发的过程。不过，如果通缩不是成因，而是行业无利可图的后果，那么毫无疑问，指望靠着逆转通缩过程重获持久繁荣，就是一场徒劳。”11

他的结论是：因为过度修补，商业周期业已失衡，要让经济回到原状，就得恢复“生产阶段”。他认为，美国正是因为采纳了凯恩斯的补救措施，才让事态更加恶化。“多家央行，尤其是美国，非但不曾采取通缩政策，反而过早采取了影响深远的努力，即信贷扩张——这是从前对抗萧条所不曾有过的举动。结果，大萧条的时间持续更长，也比此前任何一次都更为严峻。”哈耶克写道。

哈耶克继续对自己的观点加以强调：政府干预只会让问题变得更严重。“以强制信贷扩张的方式对抗萧条，无异于以招来邪恶的手段治愈邪恶。”最后，他认为没有简单的方法能让经济恢复健康，但他确定政府干预只会延长危机。“过去的6~8年，全世界的货币政策一直采纳的是稳健者的建议。他们的影响已造成足够的损害，此刻正是将之颠覆的大好时机。稳健项目的反对者（比如他自己）仍然处在……不利地位，因为他们提不出同等简单而明确的主张；或许，对那些渴望通过权威行动治愈一切邪恶的人来说，没有什么主张能让他们满足……但有一件事我们必须痛苦地意识到……对于我们尝试通过蓄意管理加以影响的力量，我们所知甚少。正是因为了解太少，如果我们知道更多还会不会这么做，就注定成了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12

1932年年底，凯恩斯和包括亚瑟·庇古在内的一些人，在《泰晤士报》上展开了一轮通信，主张需要花钱，而非储蓄。他们写给编辑的信（读起来很像是凯恩斯执笔的）认为，在商业信心匮乏、支出急剧减少的时候，个人储蓄不会自动转化为生产性投资。凯恩斯和同事们认为，“（储蓄）不会让劳动力转到更为重要的其他用途，反而会让他们陷入无所事事的状态。”他们得出结论，“当前状态下的公共利益并不指向私营经济，少花本来该花的钱不爱国。”经济学家们建议（这些话明白无误地出自凯恩斯笔下）：“如果城里的居民本来想修建游泳池或者图书馆、博物馆，但却克制自己不这么做，是无法促进更广泛的国家利益的。他们会成为‘错误造成的牺牲品’，他们的殉难不光害了他们自己，也害了其他人。他们放错了地方的好心肠，会把失业的浪潮掀得更高。”13

两天后，《泰晤士报》发表了哈耶克、罗宾斯及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其他教员的一份回复。尽管他们一致赞同，“不管表现为现金还是闲置结余的形式，囤积资金就是通货紧缩，而且，没人认为通货紧缩本身可取。”但说钱是花掉还是用于投资都无关紧要，他们不能苟同。“我们认为，如果公众从报上的说法得出推论，购买现有证券，放在建筑协会上的存款，等等，在当前是有违公共利益的，或者卖掉证券、收回存款反而有助于复苏的到来，那无异于一场灾难。”他们写道。“我们的观点是，当前世界的许多麻烦，来自公共当局的轻率借贷和不当支出。（这种做法）抵押了未来的预算，它们往往会抬高利率……萧条异常清楚地表明，公共债务的大规模存在所带来的摩擦和障碍，远远大于私人债务带来的摩擦和障碍。”他们向政府提供的意见是，“不要回到从前放任支出的老习惯上，而是要废除限制贸易和资本自由流动的限制（包括对新事物的限制），眼下，这些限制阻碍了复苏的苗

头。”14

1933年，哈耶克暂别了经济理论，因为他发现，“人真诚地相信国家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的一种反应……我碰到的持这种意见的典型人物是贝弗里奇勋爵。他真心相信这些国家社会主义分子和资本家一起反对社会主义。所以我就这个主题写了一份备忘录15给贝弗里奇。”16

为了推广他的思路，哈耶克采取行动，希望把解释价格对保障自由社会所具重要意义的德语及其他语言的作品，全都引入英语世界。他相信，价格反映了个体所做的无数经济判断。他解释说：“我确信，如果价格机制是人为设计的结果，受价格变化指引的人理解自身决定有着远超当前目标的重要意义，这一机制必将被赞誉为人类思想取得的最伟大胜利之一。”171935年，他把关键文本整理到一起，集成一册：《集体主义的经济计划》（Collectivist Economic Planning：Critical Studies on the Possibilities of Socialism）。这本书的核心内容来自米塞斯1920年于奥地利首次出版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计算》（Economic Calculation in the Socialist Commonwealth）。哈耶克的总结文章则批评了所谓的“市场社会主义者”，因为后者相信自己能够把个体自由达成的价格，跟按照集体规划需求而固定的价格结合起来。

随着20世纪30年代的步步展开，哈耶克发现，奥地利和德国传来的消息愈发严重了。他到维也纳的出行经历以及德国残存自由媒体对纳粹暴行的报道，都坚定了他的信念：必须击败纳粹主义。希特勒和反共商界领袖们（这些人不希望柏林1919年发生的斯巴达克斯起义再度上演）达成了私下约定，所有商业决策听从纳粹号令的社团主义国家就此确立。

来自奥地利和德国的消息越来越恐怖，哈耶克开始回避他的奥地利祖籍。他刚到伦敦时，当众说英语，在家讲德语。10年过去，第二次世界大战迫在眉睫，他决定任何时候都说英语，还悄悄放弃了回奥地利居住的一切念头。他回忆说：“我成了意识上的英国人，因为对我来说，这是一种极其自然的态度。就像踏进了一只跟体温相同的温水澡盆一样。”18

与此同时，凯恩斯对《通论》将深刻改变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传统政治分歧越来越有信心。诸如马克思等社会主义理论家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不可避免。像萧伯纳等费边社会主义者认为，自己倡导的混合经济社会主义可以把陷入困

境的资本主义制度拯救出来。凯恩斯相信，从知识上解释清楚干预经济何以能治愈大规模失业的顽症，他可以有效改善条件，无限期地推迟预言中的资本主义灭亡。因此，1935年元旦，凯恩斯怀着典型的恶作剧心态写信给萧伯纳，宣称多亏了自己即将出版的新书，费边主义的未来不再铁板钉钉了。

“我相信自己正在写的这本经济理论书，在很大程度上，对世界如何思考经济问题具有革命意义——我猜，不会是马上，但在未来10年里必定会体现出来。”他给萧伯纳写道，“我并不指望你，或者其他任何人，在现阶段相信这一点。但对我而言，我不仅仅希望自己所说的成真，而且我暗地里十分有把握。”191935年剩下的日子，凯恩斯修订完善了《通论》，又对出版商寄回的一批批校样做了修改。

1936年2月4日，《通论》正式出版。凯恩斯的事前宣传工作做得极为出色，读者们尤其是渴望炫耀自己熟知这400页新观点的年轻经济学家，将这本书一抢而空。为了最大限度地提高这本书的销售量，扩大其影响力，凯恩斯定了个超级低价：区区5先令。《通论》读起来并不轻松。为了反驳哈耶克对《货币论》的批评，凯恩斯尝试将他惯常使用的独创经济学术语和传统经济学家所使用的术语统一起来。他调和了朋友和合作者提出的不同意见，还试着预料古典经济学家会提出什么样的异议。他努力想要简单地提出自己的观点，然而，他的大部分推理仍然超出了普通读者的能力范围。他解释说：“要想劝说经济学家重新审视他们的若干关键基本假设，除非我拿出一个高度抽象化的说法，不然，我实现不了目的。”20

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21这位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科技经济学家日后成为凯恩斯最杰出的福音使者，他总结《通论》成就时说：“这本书写得不好，组织糟糕……它傲慢、脾气暴躁、好辩，在致谢部分又表现得不够慷慨大度。它充满了子虚乌有和混乱的东西……闪耀的洞察力和直觉散布在单调乏味的代数里。尴尬的定义会突然之间过渡成令人难忘的华彩乐章。等终于掌握了它，我们发现它的分析显而易见又完全新鲜。总之，这是一本天才之作。”22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23自封为凯恩斯的大祭司，也同意前者的看法。他写道：“和凯恩斯其他所有作品不同，这本书十分模糊。如果它不是这样，经济学家不必围绕他的意思和目的展开争论，它也不会具有这么大的影响力。经济学家最擅长回应模糊和相关谜题了。”24

凯恩斯在开篇就切入了战斗模式，宣称《通论》的目标是传统经济学。他的准

星对准了所有前辈，不光有他剑桥的亲密同事亚瑟·庇古，甚至还有他宽厚的导师、剑桥大学经济系创始人阿尔弗雷德·马歇尔。但最重要的是，凯恩斯喜滋滋地对他奥地利学派的竞争对手们——米塞斯、罗宾斯和哈耶克展开了一轮无情的攻击。事实上，在最初读完成稿之后，罗伊·哈罗德为凯恩斯对哈耶克及其同道的严厉攻击大感震惊，多次劝说凯恩斯不要太针对个人。

哈罗德回忆说：“他强调自己和传统经济理论的差异，强调自己找到了传统经济理论的弱点。着重指出自己的贡献，把经典学说里有多少不足之处留待他人判断，岂不更加明智吗？在有些人看来，他是带着调皮的态度在批评那些崇高的名字，也许吧。事实上，这是他蓄意为之。他的新颖贡献始终遭到人们的忽视，为此，他感到挫折和懊恼——过去如此，现在依然如此。于是他故意做出了这样的反应。他觉得，不招惹些是非出来，他将一事无成。”25

凯恩斯饶有兴趣地给奥地利学派挑错找毛病，他不仅指出哈耶克、罗宾斯等人因坚持古典学派立场而不能理解的短视和缺乏远见，还在正文及脚注里痛斥其执拗——那样子，不像是斗恶龙的勇者，而像是打苍蝇的主妇。他认为，哈耶克等正统经济学家与现实脱节了。他写道：“很可能，经典理论代表了我们希望经济所呈现的样子。但是，假设它实际会那样做，就是在回避我们的困难。”26

“经典理论所假设的特殊情况，不会出现在我们实际生活的经济社会中，”他写道，“教授它们带来的结果就是误导，最终，如果我们将之应用于经验事实，则会导致灾难。”27凯恩斯认为，古典经济学家总是说，失业者的困境是他们自己的错。“古典经济学家可能会对拒绝接受减薪的工人表示同情，他承认，用减薪来应对暂时性的条件，恐怕不够明智。但为了维持科学的完整统一，他不得不宣布，工人拒绝减薪就是麻烦的源头。”28凯恩斯阐释了他为什么相信，尽管增加薪资的需求有可能是导致失业的一个因素，但它绝不是失业的根本症结，而后者正是古典经济学家一贯坚持的主张。

凯恩斯否定了经济学界普遍接受的萨伊定律（Say's Law），该定律认为供给创造了需求。29这个概念“仍然是整个古典理论的基础，没有它，古典理论就崩溃了……当代思想仍然深深受这一概念的影响，认为人不这样花钱，就会那样花钱。”30这使凯恩斯进而指出古典学派的另一点错误想法，“个人的储蓄行为必然会带来类似的投资行为。”31

否定萨伊定律是《通论》新思维的核心，它带来了“流动性偏好”的概念，凯恩斯对储蓄为什么不会自动转化为投资做了解释。凯恩斯认为，古典学派经济学家对资金成本或利率的构成评估不足。虽然他过去曾持有类似的观点，但如他所说，这是一套“荒唐理论”。32在古典经济学家看来，利率取决于储蓄和投资之间的关系：如果储蓄的人太多，利率会下跌，鼓励人们投资企业，最大化产出；如果储蓄的人太少，利率会提高，吸引更多的储蓄者。

凯恩斯探讨了储蓄者的动机，得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结论。他相信，储蓄者往往不把钱存入银行或投资于股票，而是更喜欢把钱以“流动的”形式（即现金）存起来，以便能够充分利用环境的快速变化。流动性偏好的概念，颠覆了传统储蓄和投资关系的认识，因为如果储蓄者相信自己持币观望会得到更划算的交易，他会以现金、珠宝或黄金的形式来保留储蓄。在凯恩斯看来，这里的含义很明确。由于流动性偏好，利率需要维持较高水平，因为银行必须向储户提供溢价来换取其资金。

凯恩斯认为，流动性偏好否定了储蓄比支出更具美德的“常识性”观念，而这一观念，恰好是古典经济学的基础。“对有效需求而言，个人储蓄行为和个人消费行为一样好，这想法何其荒唐，却甚为普遍，”他写道，“它是那种最难从人们头脑中打消的谬误。它的源头来自：以为财富的主人渴望拥有资本资产是因为喜欢它，却不料他想要的是资本资产的预期收益。”33

凯恩斯还引入了其他新颖概念，乘数就属此列。花掉的每英镑远远超过了单独的一英镑，因为在穿越系统的过程中，这笔钱会一遍一遍地反复花出去。非经济学家中也有许多人认为通过借贷资助公共工程是挥霍、不负责任和浪费，为说服这部分人，他放弃了常规方法，而是编造了一套颇为荒谬的项目，说明哪怕明显的“浪费”计划也可以治愈慢性失业，并且为自己买单。

他写道：“如果财政部用钞票塞满旧瓶子，把它们埋在废弃的煤矿，表面覆盖以城里的垃圾，接着，让私营企业家基于自由竞争原则去把钞票挖出来，这样就不会再有更多的事业，而且，凭借反弹的帮助，社会的实际收入和资本财富恐怕同样会大于它本身的价值。诚然，修建房屋等会更明智；但如果政治和实际操作上有困难，上述做法也聊胜于无。”34为强调掌握经济常识有别于经济的现实运作，他重复了自己不祥的结论，“正如政治家认为战争是大规模贷款支出合理的唯一形式，在银行家眼里，要把在地上挖洞表现为稳健的金融形式，唯一的借口就是开采金矿

了。”35

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哈耶克在后来的著作中提出国家干预经济威胁自由的观点，出于同样的精神，凯恩斯提出，当政府发挥更大作用实现充分就业时，个人自由确实会面临重大问题。他写道：“中央控制为确保充分就业所必需，这当然涉及传统政府管理职能的极大扩张。此外，对有必要抑制或引导经济力量自由发挥的诸多条件，当代古典理论本身也呼吁加以重视。”36他稍后承认，“较之自由竞争和大规模放任措施条件下给定产出的生产和分配理论，从整体而言，《通论》所主张的生产理论更容易适应集权国家的条件。”37但凯恩斯对人的本性持乐观态度，不相信集权理论是自己理论的必然结果，也不相信他的改革会带来严酷的暴政，即哈耶克口中的“农奴制”。

凯恩斯认为，人人都得到就业的繁荣社会，是维持独立思考和行为最可靠的途径，而独立的思考和行为保证了真正的民主。“个人主动性和责任感仍保留相当广泛的行使空间。在这一空间内，个人主义的传统优势仍然会保持良好。”38此外，他认为，“如果可以清除个人主义的缺点，避免滥用，是个人自由的最好保障，因为较之其他任何体系，它极大地拓宽了个人选择的余地。”39凯恩斯无意拥抱国家严刑苛法损害个人自由的可怕灰色未来。他开出的药方就如同掌握船舵的巧手，为的是船员们繁荣又满足。正如他的传记作者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所说：“他给了人们希望，失业问题不靠集中营也可以治愈。”40

凯恩斯暗示古典理论仍将发挥重要作用，向古典学派递出了橄榄枝，同时，他进一步预料到了哈耶克对放弃自由市场所带来影响的悲观评价。他写道：“我们对经济学公认经典理论的批评，不在于找出它分析中的逻辑缺陷，而在于指出它的隐性假设很难或从未令人满意，它不能解决现实中的经济问题。如果政府投资兴建公共工程能成功的话，确立与充分就业相对应的总产出量近乎可行，那么古典理论会再次从这一点上崛起。为调整消费倾向和投资诱因，中央控制是必需的。”41凯恩斯认为，实现充分就业后，古典学派的许多确定信念自然会再度盛行开来。

《通论》隐含着对哈耶克及其同道的邀请，希望他们就此做出回应。事实上，凯恩斯还多次特意嘲弄了哈耶克。“哈耶克教授推断，储蓄和投资的概念也存在相应的模糊性。如果他说的是净储蓄和净投资，那么他是对的！”42他驳斥了哈耶克“强迫储蓄”的解释，他说，这太“有趣了”43如果一个英国人用了“有趣”这

个词，那它可绝不是恭维。但大多数时候，为避免再度出现哈耶克批评《货币论》时那种挑剔的定义之争，凯恩斯在《通论》中用了一整章的文字来对经济概念下定义，如“储蓄”、“强迫储蓄”和“投资”，这样一来，如果有人想对他的中心论点——提高总需求是充分就业的关键提出异议，就不会因为语义产生困扰。

出于同样的道理，凯恩斯直接道明了哈耶克提出的闲置厂房替换问题。哈耶克批评《货币论》之后和凯恩斯进行了多轮通信，这个问题是这批信件的核心讨论点。对哈耶克在伦敦经济学院进行的“生产阶段”和“迂回”生产方法讲座，凯恩斯还特意质疑了这些元素的有效性。凯恩斯在撰写如下段落时，视线明显是对准哈耶克的：“诚然，一些冗长或迂回的生产过程是完全有效的。但一些短暂的过程同样有效。冗长生产过程由于太过冗长，并不完全有效。部分甚至大多数冗长过程其实效率极其低下，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出现破坏和浪费。对给定劳动力，蕴含在迂回过程中并可有利使用的劳动量是有限的。”44

凯恩斯撰写《通论》的主要目的是改变经济学家对经济运作的认识，并通过他们说服决策者采取措施增加总需求。其次，他的一个重要目的则是希望哈耶克及其他人能对这本巨著中的观点提出反驳。唯有证明古典经济学错了，凯恩斯的思想才能站稳脚跟，所以凯恩斯很有自信能回应一切预料中的异议，他渴望听到古典经济学家的反驳。既然哈耶克给自己揽下了艰巨的任务，迎战凯恩斯笔下源源不断的论点，那么到了这一刻，为了捍卫自己的荣誉，他理应有所表示。

为什么用提高总需求来增加就业是不恰当的呢？乘数会在什么时候不按凯恩斯和卡恩所料的那样发挥作用呢？为什么流动性偏好的概念并不违背设定利率的经典解释呢？如果《通论》从头到尾都充满了错误的阐释、误导的假设、虚假的逻辑、跳跃的不适当想象，那么，哈耶克显然应该在它们扎根之前就拆解凯恩斯的招数。

但答案始终没有出现，哈耶克保持了沉默。在拿出全副力气与凯恩斯决一死战的关头，哈耶克失语了。几个星期过去了，始终不见他的大力还击。哈耶克的人生目的、罗宾斯从维也纳召唤他到伦敦经济学院的最大原因、贝弗里奇任命他为学院教员的关键理由似乎全都落了空。凯恩斯的巨著非但没碰上炸弹，连呜咽都没听到。全英国甚至全欧洲大陆都热切期待哈耶克有所回应，可他却始终不置一词。

1936年2月《通论》的出版，标志着凯恩斯打响了日后称为“凯恩斯革命”的第一枪。开篇第一句话，他宣布，“本书主要献给我的同行经济学家们，”接着，他

坦言，自己用了10年时间尝试说服政治学家和公务员响应他通过政府资助项目减少失业的号召，但没取得太大进展。然而，在美国，赫伯特·胡佛和富兰克林·罗斯福两届政府都悄悄上马了小规模的公共工程计划，以求舒缓大萧条带来的庞大失业局面。

两任总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必须要做点什么，选民希望政府能做点什么，选民看到政府在试着做点什么总比看到它无所作为的要好。“罗斯福力争大规模提供就业岗位，因为失业人太多，他还尽力通过税收来负担大部分的成本。”哈罗德解释说，“如果出现赤字，很糟糕，但之后总可以补救。”凯恩斯在《通论》中为这种行为提供了一个智性上的理由。故此，他的目标受众是英美大学里整整一代受理想主义所驱动的年轻经济学家，他们迫切想要帮助大萧条的受害者。

从20世纪20年代起，在美国人眼里，凯恩斯就不是一个埋首深奥理论的经济学家，而是一个把精力用在实用补救措施上的人。和在英国的情况一样，他凭借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版的《和平的经济后果》首次登陆美国。当时，正逢总统伍德罗·威尔逊拼命劝说参议院通过《凡尔赛和约》。该和约很有争议，因为有史以来第一次，它把美国和一个世界性政府“国联”（League of Nations）——国联是威尔逊的心血所在，捆绑了起来。尽管凯恩斯对威尔逊在巴黎的和平目的感同身受，却忍不住要谴责美国总统的霸权行为以及后者认可对战败国强加的巨额赔偿。凯恩斯在《和平的经济后果》中对好心威尔逊做了活灵活现的描述，引得美国媒体竞相引用，因为这给了它们一个绝妙的机会，可以凭借一位谩骂高手的犀利语言，诋毁美国人敬爱的总统。

凯恩斯先把他放在崇高的基座上，接下来又一举掀翻了他。“威尔逊总统离开华盛顿之时，他在全世界都有着好名声和道德影响力。”他报道说，“欧洲首都的群众朝着总统座驾欢呼的声音是何等热烈！怀着好奇、焦虑和希望，我们努力想要瞥一眼这来自遥远西方的命运之子的容貌，他将要为孕育自己文明的年迈至亲治愈伤口。”2然而，和平的使者威尔逊却僵硬、官僚，只顾着保持道德操守，屈服于同盟国复仇的叫嚣。“人们是如此幻灭，”凯恩斯写道，“有些曾对他深信不疑的人，几乎都不敢开口了……总统是怎么了？是什么样的弱点、什么样的变故，让他来了这样一次谁都料想不到的大背叛？”3凯恩斯解释了许多美国人业已洞穿的认识，总统“孤独又超然”，“意志坚强而顽固”。最重要的是，他“不是英雄也不是先知，甚至也不是哲学家。他只是一个善意慷慨的人，像其他人一样，有许多的弱

点”。4

凯恩斯描述了他在近距离观察下对总统形成的印象，放大了对威尔逊的破坏作用。“他的脑袋和容貌都精雕细琢，跟照片上完全一样，他脖子上的肌肉和他头上的仪态却截然有别。”凯恩斯写道。但很快事情就变得很明显，“他不光是表面上对周围不敏感，他根本就是对环境完全不敏感。”见证威尔逊置身老谋深算的政客（如英国首相劳埃德·乔治和法国总理克列蒙梭）当中，就如同看着总统“盲人摸象”一般。“走进客厅的人，再也没有谁比他更像是命中注定的完美受害者了，”凯恩斯意识到，巴黎发生的一切，正吻合美国人对“老欧洲”背信弃义本性的认识，也让美国人确信，美国长时间不参战的做法完全正确，而且最好也跟新生的国联保持安全距离。威尔逊，“这个又瞎又聋的堂吉诃德，”凯恩斯写道，“走进了一个洞穴，洞穴里，狡诈灵敏的对手们手里正握着闪闪发光的利剑。”5

凯恩斯判断，威尔逊远远不是一位“白衣侠客”，由于他未能制止对战败国强加沉重赔偿，为“终止一切战争的战争”带去公正结局的高尚努力化为泡影，不久以后，还可能带来另一场灾难性的战争。这个预言很快就应验了。到《通论》出版之时，希特勒已经当上了德国的总理，另一个法西斯独裁者墨索里尼也昂首阔步地拿下了罗马。惩罚性的《凡尔赛和约》给战败国带来了悲惨的经济条件，反倒让这两个极端分子占了便宜。对许多美国人来说，凯恩斯是个清醒的预言家，他的锐笔勾勒出了世界即将走入的噩梦般的未来。

凯恩斯对威尔逊的看法第一次让美国人注意到了他，但美国人很快发现，凯恩斯非正统的经济思想同样带劲。1931年凯恩斯短暂出访美国期间受到政治领袖和学者的热烈欢迎，说明他激进的经济补救措施论调已经到达远离英国的地方。他把写给伦敦报纸的文章同步发表在美国的《名利场》（Vanity Fair）6等与经济学完全不沾边的刊物，用有趣的论点引发激烈的辩论，成了经济学名人。

1929年的股市崩溃和随后的大萧条，为凯恩斯主义的观点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从罗斯福入主白宫的那一刻起，他就鼓励属下以“新政”的名义，尝试不同的方式缓解大萧条带来的苦痛。7股市崩盘后，投资锐减90%，1300万美国人失业，占成年人口的1/4。由于测量方法太有限，极大地低估了灾难的严重程度，现实情况其实比数字看起来更可怕。如果除去农场工人，失业率甚至高达37%以上。在俄亥俄州的托莱多，4/5的人没了工作。8摆在眼前的任务之艰巨，让新政府不堪负荷。正如阿瑟·

施莱辛格（Arthur M.Schlesinger Jr）9所说：“因为负担日益沉重，为失业者提供住处和食物的链条处处崩坏……避免暴力甚或革命（至少有人是这么想的），成了一件大事。”10

正是在这样的混乱局面下，1933年年初，凯恩斯向新总统呈上了自己的建议。他先寄给罗斯福一本《通往繁荣之路》，勾勒了他随后会在《通论》中详尽论述的设想，接着又写给总统一封公开信，发表在1933年12月31日的《纽约时报》上。凯恩斯这么做，是听从了费利克斯·弗兰克福特（Felix Frankfurter）11的建议。后者是哈佛大学行政法教授、总统“智囊团”的负责人，也是罗斯福最亲密的一位政治友人。凯恩斯初遇弗兰克福特是在巴黎和会上，当时这位美国人正在倡导犹太复国运动。1933~1934年的秋冬两季，弗兰克福特在牛津大学全圣学院做访问学者，他建议凯恩斯，要是此刻敦促罗斯福花更多公共资金来缓解失业局面，会正中总统下怀。“你可能想知道……我听到美国的消息说，参议院有相当多的意见支持大力增加公共工程。”弗兰克福特写道：“我相信，总统会接受。我这么写，因为我认为，您写一封表达您独立立场和意见的信，能极大地加快此刻的这股势头。”12为确保凯恩斯的报纸投稿不致显得师出无名、过分莽撞，弗兰克福特预先找了一份抄本寄给罗斯福。13

凯恩斯首先恭维罗斯福，“对每个国家中力争用理性实验修补我们眼下罪恶的人，您承担下了他们的嘱托。”他写道，“若您败北，理性变革将在全球大受挫折，唯留正统和革命一较高下。但若然您成功，大胆的新方法就将开遍各地。”致敬之后，凯恩斯说，总统的《全国工业复兴法》（National Industrial Recovery Act，NIRA）（1933年6月通过，允许私人垄断，允许固定价格，成立公共工程署来推行公共工程项目）令人喜忧参半。《全国工业复兴法》“在本质上是改革，但有可能阻碍复兴”，凯恩斯写道，“它伪装成复兴技术的一部分，通过得太过草率”。

他赞扬总统蓄意提价、填满农民和其他生产商口袋的政策，但他警告说，“如果涨价以牺牲产量为代价，那么，很难说它有什么可取之处。提高总购买力刺激产出，是涨价的正确之道，顺序反过来就不对了。”他重申，他相信用借款来偿付公共工程是个好政策。“我坚定不移地强调，政府可以通过贷款，而不是对现有收入收税的方式来提高支出、增加全国购买力。繁荣时期，因为有无限的信贷维持产业投机者的狂热，这会导致通胀。但低迷时期，要想以提价的方式快速提高产出，政

府贷款支出是唯一可靠的途径。”接着，他写下了一句话——日后将会证明，此言甚为不祥：“这就是为什么战争总会带来激烈的工业活动。过去，正统经济学将战争视为政府花钱创造就业的唯一合理借口。”

在呼吁提高国家公共工程开支的同时，凯恩斯也很明白总统的困境。英国人早就发现，找到公共资金可以有效投入的合适项目不那么容易。罗斯福主张把钱用于兴修水电大坝、新的高速公路和国家公园，但这些都是缓慢的产业，投入的资金要许多个月甚至几年之后才能显出效果。“迄今为止只花了这么少的钱，我并不吃惊。”凯恩斯写道，“我们自己的经验表明，短期内创造出有效的贷款支出是何其困难。如要避免浪费、低效和腐败，需耐心克服许多障碍。”但他劝说总统，大规模公共支出必将提高需求，让国家重返繁荣。有些人主张增加货币供应量，不靠增加支出提高需求，凯恩斯对此做了驳斥，“那就像是因为买了一条太长的皮带就想让自己长胖一样。在今天的美国，皮带可比腰围长得太多了。”

罗斯福并没有直接回应凯恩斯，但他写信给弗兰克福特说：“你可以告诉教授15（凯恩斯），在公共工程方面，我们在财政年应花的钱当为这个财年的近两倍，但政府借贷有实际限制，尤其是因为大多数金融中心的银行消极抵抗。”16次年，在弗兰克福特的建议下，总统答应会见凯恩斯。“他真的投入到了你的事业当中，他甚至可能是新政在英格兰的最大支持者。”弗兰克福特写信给总统，“他不仅挥舞着一支锐利的经济之笔，他还是一家重要保险公司的总裁17，他在城里（伦敦金融区）能施加相当大的影响力……因此，我相信，让他第一手听到本届政府的努力和目标有着加倍的重要性，因为他在纽约逗留期间，许多人都想方设法地对他下毒药呢。”18罗斯福很高兴见到凯恩斯，写信给私人秘书说：“我想见见他，跟他单独喝个茶。”但罗斯福脑袋里不光想到了经济，他补充道：“你跟凯恩斯说定了以后，叫他把妻子带上。”19

1934年5月，凯恩斯只身前往纽约接受哥伦比亚大学授予他的名誉学位，他拿着弗兰克福特的介绍信，会见了大量新政支持者、商界领袖和总统智囊团的成员。凯恩斯急切地想从内部了解美国经济的状况，但他始终是个好辩的人，克制不住地要反驳所见银行家和商人单纯而倨傲的态度。不过，这对他来说太费力气了。他告诉莉迪亚，他发现，“整天跟一群讨厌的人竭力争辩，真是一件可怕的辛苦工作。”20

5月28日，星期一，凯恩斯离开华盛顿五月花酒店前往白宫，下午5点15分，他大步走进椭圆办公室，和坐在那儿的总统握了手。他们谈了大约一个小时。和他评估伍德罗·威尔逊性格的时候一样，凯恩斯认为，只要观察总统的手，就可以看出许多事情。“很自然地，我的注意力集中在他的手上，”他回忆说，“坚定，相当有力，不聪明，不圆滑，指甲圆而短，和商人的手指一样。我把它们画不好，在我眼里，它们和一双普通的手没有区别。尽管（他的手跟其他人的手）别无二致，可又有一种奇怪的熟悉感。我在哪儿见过这样的手吗？我花了10分钟在记忆库里搜索，完全不知道自己就白银、平衡预算和公共工程主题说了些什么话。最后，我终于想起来了，是（英国前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爵士。”21

凯恩斯认为，较之罗斯福总统在哈佛大学历史系里学到的凄凉艺术知识，他的经济学知识反倒更成熟。罗斯福在当选时曾宣布，他支持“稳健的货币”，但当有人要他深入解释这是什么意思，他回答说：“我不打算为它写一本书。”22会面中，凯恩从技术上解释了卡恩的乘数是怎么一回事，有了它，就能把兴建公共工程的贷款视为投资而非支出，公共工程很快会收回成本，因为重新就业的工人会缴纳收入税。但凯恩斯对罗斯福说的大部分内容，总统都左耳进右耳出了。

离开白宫时，罗斯福顺便拜访了罗斯福政府的劳工部长弗朗西丝·珀金斯（Frances Perkins）。“凯恩斯再次表达了他对罗斯福采取行动的钦佩，”珀金斯回忆说，“但随即谨慎地说，他本以为‘总统在经济上会更有文化。’”23根据珀金斯的说法，凯恩斯对罗斯福“谈起了崇高的经济理论”，尔后凯恩斯对她解释乘数时，则放弃了夸张的理论，换用了更日常的例子，他解释说，“政府在救济上花的一元钱，就等于给了杂货商一元钱，杂货商把它给了批发商，批发商给了农场主，用以购买供给。在救济、公共工程或者其他任何东西上花了一元钱，都相当于为国民收入创造了四元钱。”24珀金斯一直劝说总统要更大胆，在她看来，两人的会面似乎浪费了机会。“我希望他跟罗斯福谈的时候同样实实在在，而不是认为总统有着更高端的经济知识。”25她写道。不久之后，罗斯福肯定了珀金斯的猜想，他说，凯恩斯对他说的大多数事情，他始终摸不着头脑。“我见了你的朋友凯恩斯，”他说，“他说了一大堆莫名其妙的数字。他肯定是个数学家，不是什么政治经济学家。”26尽管如此，凯恩斯还是认为，他跟总统的会面“迷人而具启发意义”，27罗斯福则给弗兰克福特回话说：“我跟凯恩斯狠狠聊了一阵子，我非常喜欢他。”28

罗斯福或许未能充分理解凯恩斯的言论，但他对全世界最强烈反对自由市场放任观点的吹鼓手表示欢迎。这点事实，让蜂拥齐聚华盛顿、拯救世界回正轨的年轻经济学家心领神会。罗斯福的保守党对手们也并未误解总统接见凯恩斯的重要意义，他们认为，总统落入了一个危险外国人的圈套，这个人对自由市场的主张，从定义上看就是“不”美国的。

它绝非凯恩斯和罗斯福之间短暂会面直接孕育的果实。然而，人们很快就把政府对经济给予更多干预的源头，归结到了凯恩斯对罗斯福的建议上。“我不知道你是否意识到《纽约时报》那封信的效果有多棒，”专栏作家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写信给凯恩斯说，“但我听说，财政部现在奉行低调而有效的政策——购买政府长期债券，创造稳定的债券市场，减少长期利率，主要的功劳都来自它。”29李普曼是新近皈依凯恩斯主义的，1934年，他对哈佛的学者说：“自由放任已死，现代国家必须从整体上为现代经济承担责任。”30

尽管凯恩斯主义并非罗斯福第一任期内的官方政策，但大量税款都用到了让失业者重获工作的计划上。罗斯福用他典型含混的管理风格，指派了两名最亲密的助手从事同一任务。内政部长哈罗德·伊克斯主持各种公共工程项目，其中包括公共工程署和公共资源保护队，征召了25万人从事“社会性生产工作”。同时，罗斯福的密友哈里·霍普金斯，对伊克斯项目的推进步调至关重要，他负责土木工程署，这是一个紧急救援项目，监督创建400万个新就业机会。罗斯福对霍普金斯说：“400万人意味着大约4亿美元。”31因为采取了这些举措（当然，它们只是一部分的原因），公共部门预算赤字大幅上升，罗斯福上任第一年就达到了60亿美元。这个数字让预算总监刘易斯·道格拉斯大惊失色，他不愿经手这样一个显然灾难性的账户，宁肯辞职了事。赤字大得甚至把罗斯福也吓了一跳，1934年4月，他指示霍普金斯叫停了土木工程署最雄心勃勃的项目——修造桥梁和公共建筑。

凯恩斯对新政的成绩持怀疑态度，热衷于把热情的仰慕者们带回自己的思想。他对那些愿意倾听的人重申，只有在周期的底部或是经济衰退期间，政府出资舒缓失业才能算作恰当。一旦经济恢复，继续往系统内注入资金就不妥当了。“只有过渡到了社会主义，人们才会指望政府支出年复一年地发挥重要作用。”32他告诉国家劳工复兴总署的顶尖统计师、新政主义急先锋维克多·冯·塞利斯基说。返回纽约后，凯恩斯煞费苦心地指出了若经济已达充分就业状态国家继续注资提升需求会有什么后果。“当社会的所有劳动力和资本设备都已投入使用，进一步提高有效需求

除了无限制地提高价格，别无任何作用。”33

从这次短暂的美国之行中，凯恩斯清楚地看出，一群雄心勃勃、致力于激进变革的年轻经济学家，正在取代华盛顿原来的那批年迈的经济卫道士。凯恩斯对弗兰克福特说，“世界的经济实验室是在这儿，不在莫斯科。主持实验的年轻人了不起。他们的才干、知识和智慧，都令我惊讶。经常见古典经济学家的人应该被扔出窗外——但他们基本上都被扔出去了。”34说到凯恩斯对美国年轻经济学家带去的启发，著名的年轻凯恩斯主义者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或许总结得最好。“尽管年轻又无足轻重，但跟着大师，我们感觉自己比摩根大通、国民城市银行、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那些伟人还了不起。”35他断言。加尔布雷斯对凯恩斯迷恋至极，1937年他度蜜月时，带着来自马萨诸塞州剑桥的新娘凯蒂到英格兰剑桥去觐见伟人。36加尔布雷斯的朝圣之旅反映了年轻人心目中对凯恩斯的神化。“我去圣庙的决心已定。”37加尔布雷斯回忆说。

罗斯福新政的建筑师并非全都是年轻人。许多人通过自己在商界的亲身经历得出了类似凯恩斯的结论。谁也不敢说犹他州摩门教银行家、千万富翁马里纳·埃克尔斯（Marriner Eccles）38是个容易上当的人或者天真的理想主义者，他是个铁腕人物，以前是共和党人，是第一证券公司（First Security Corporation）的老板，经营着26家银行以及美国最大的一家甜菜糖生产商（乳业连锁巨头）、若干木材公司，还有其他业务。他根据自己对商业的理解得出结论：这个国家需要提高需求。“全国整整1/3的人口失业，经受贫困和痛苦，是完全没有理由的。”1933年，他在参议院委员会召开的听证会上说。重新实现充分就业是做得到的，只要“提供充足的购买力，让人民获得国家有能力生产的消费品。”39

他接着说：“19世纪的经济学不再适合我们的目标，这套150岁的经济学走到尽头了。正统的资本主义制度不受约束的个人至上主义以及自由竞争，不再适合我们的目标了。”40埃克尔斯主张联邦政府通过借贷资助公共工程。“借贷有时，还债有时。”他宣称，“你必须照顾失业者，不然，这个国家就要爆发革命。”41就算有些参议员对埃克尔斯的激进姿态不以为然，但白宫仍很重视他的评论。1935年，罗斯福任命埃克尔斯担任美联储董事会的第一任主席，未来14年中，这个位置一直在他手里。

埃克尔斯选中担任他在美联储助理的人，是经济学家劳克林·柯里（Lauchlin

Currie）。柯里在伦敦经济学院和哈佛求过学，同样相信大萧条的唯一出路是刺激需求，如有必要，可以通过借贷为公共工程提供资金。埃克尔斯和柯里联手为美联储和其他政府机构聘用了大批志同道合的年轻经济学家，尤其是在1935年以加强监管为目的的《银行法》差点没能通过之后。（此时凯恩斯声名极盛，反对该法案的人直接称之为“柯里克隆的凯恩斯”。）根据加尔布雷斯的传记作者理查德·帕克说：“柯里意识到，现任政府中，较之反托拉斯和国家规划阵营，凯恩斯阵营的人手明显不足。当务之急就是要在华盛顿的重要部门里大力招聘、谨慎安插同道中人。”42受共同信念的鼓舞，年轻的凯恩斯主义者努力想在权力走廊中认出彼此，并开始在成立于1934年的美国规划学会（National Planning Association）里碰头。

靠着计量经济学家兼统计学家西蒙·库兹涅兹（Simon Kuznets，宾夕法尼亚州经济学及统计学教授）及其在国家统计局经济研究所和美国商务部工作的追随者（他们以记录经济的运作为业，连《通论》也充满敬意地提到了库兹涅兹）的努力，凯恩斯的观点在美国扎下根来。库兹涅兹本人从来不是凯恩斯主义者，但他在汇编国民收入及国民生产总值等统计数据领域做出的贡献，成了助推凯恩斯“提高总需求可加速经济发展”论点的证据。

库兹涅兹及其追随者提供了衡量经济活动的手段，证明凯恩斯主义式的补救措施在很大程度上确实能够像凯恩斯预测的那样发挥作用。加尔布雷斯解释说，有了凯恩斯理论和库兹涅兹测量手段的武装，联邦政府里的年轻经济学家小队伍“不仅知道要做什么，而且知道该做多少。有了库兹涅兹和他具有创造力的同事们提供的具体数字，许多本来对凯恩斯抽象概念完全不相信的人也折服了”。43

但除了哈佛的年轻经济学家，渴望投身凯恩斯主义事业的人并不多。大洋那边另一个剑桥飘来的煽动观念浪潮，无论如何也说服不了马萨诸塞州剑桥的老卫道士。后来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当时年轻热血的凯恩斯主义者詹姆斯·托宾（James Tobin）回忆道：“资深教员大多心怀敌意。不久之前，他们有一群人出版了一本书，对罗斯福的复兴计划颇有微词。”44可年轻人的态度完全不同。和托宾一样，年轻人纷纷投身于罗斯福新政所表达的理想主义。“凯恩斯对包裹着钢铁盔甲的谬误揭竿而起，在青年人眼里，这无疑是一场极具吸引力的圣战。”托宾说，“真理能带给我们自由，也能带来充分就业。”451935年冬，《通论》在英国即将出版时，哈佛本科生们就是这么兴奋：他们专门安排了特别的货运邮包，只等书一上市

就立刻运到大西洋对岸来。邮包一到，他们径直扑了过去，第一批读到文中宣扬的革命思想。托宾回忆说：“哈佛成了凯恩斯入侵新世界的滩头堡。”46

加尔布雷斯说保罗·萨缪尔森“几乎从一开始就……成为年轻凯恩斯主义者公认的领袖”47，他记录下了1936年2月凯恩斯巨著抵达哈佛校园时掀起的狂热精神。“《通论》立刻吸引了所有35岁以下的经济学家，就像是一种病毒触抵南海某个孤立的岛民部落，它的毒力出人意料，让所有人都得了病。”他回忆说，“但50岁以上的经济学家，则对这种疾病表现出了相当强的免疫力。”48加尔布雷斯同样回忆了凯恩斯作品所揭示的代沟。“白天教授的仍然是老派经济学，但到了晚上，从1936年开始的几乎每一天晚上，几乎每一个人都在讨论凯恩斯。”49按萨缪尔森的说法，《通论》获得了一种近乎神秘的意义，那就像是浪漫派诗人约翰·济慈（John Keats）在十四行诗《初读贾浦曼译荷马有感》（On First Looking into Chapman's Homer）所表达的初窥新星所带来的冲击。加尔布雷斯开玩笑地指出：“有些人会想，经济学家真的能体会这种精致的情感吗？”50

年轻的哈佛大学经济系毕业生，加拿大人罗伯特·布赖斯，51初抵英国剑桥后享受到了额外的愉悦：凯恩斯本人给他上过课，他还以基督教牧师见证食人族仪式的态度，参加了哈耶克在伦敦经济学院的讲座。布赖斯充分利用了自己和大师的联系，以至于约瑟夫·熊彼特曾这样评论道：“凯恩斯是真主，布赖斯是他的先知。”52

正如华盛顿拜倒在凯恩斯蛊惑下的并非全都是年轻人，哈佛一些年长的经济学教授同样经历了一场本来不太可能发生的顿悟。不久后被众人称为“美国的凯恩斯”的阿尔文·汉森（Alvin H.Hansen），1937年从明尼苏达大学得到哈佛的招聘时，已经50岁，而且是古典经济学家。凯恩斯发表《货币论》时，汉森严厉地提出过批评。对《通论》表达的观点，他起初也持怀疑态度。但不久，他改变了心意。他立刻成了凯恩斯一派声音响亮、表述清晰、极具说服力的推动者。他率众反对相信赤字会让国家毁灭的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回忆说：“汉森在无意当中（至少他自己并不十分清楚）成了十字军东征的领袖。”53萨缪尔森和托宾是汉森年轻队伍里的第一批战士，汉森在哈佛新公共管理研究生院开了讲座，他们去参加时发现，讲座里人满为患，有不少都是从华盛顿跑来的政策制定者。加尔布雷斯回忆：“学生人数经常多得挤到了大厅里。你会觉得，这是当时全国最重要的事情了……官员们把汉森的想法甚至他的信念感，都带回了华盛顿。”54

在约翰·希克斯（他本来是1930年伦敦经济学院第一批受到哈耶克影响的人）的帮助下，汉森用图表形式描述了凯恩斯所说的利率、流动性-货币供给、投资-储蓄、国民收入之间的复杂关系，以IS-LM（投资-储蓄/流动性偏好-货币供给）模型的名字在经济学家们之间流行开来。他们把凯恩斯的核心理念融入简化的代数公式，将新的信条传播开来。1941年，汉森出版《财政政策和商业周期》（Fiscal Policy and Business Cycles）一书（他所谓的财政政策就是政府的税收总额），属于美国第一批支持凯恩斯对大萧条成因分析的作品。1953年，汉森又出版了大部头《凯恩斯理论指南》（A Guide to Keynes），成为第一本凯恩斯主义革命教科书，激励了其后几代的年轻经济学子。

汉森的亲密同事西摩·哈里斯（Seymour E.Harris），是另一个后期皈依凯恩斯门下的信徒，他以作者和编辑的身份创造了数量惊人的书籍，传播凯恩斯主义的新信条，功勋累累足可媲美汉森。他办讲座时开场白如下：“我是西摩·哈里斯，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写过33本书，每一本书的主题都是凯恩斯。”尽管汉森和哈里斯为凯恩斯主义事业做了无数工作，但还是比不上保罗·萨缪尔森的畅销书《经济学》（Economics：An Introductory Analysis）。这同样是一本凯恩斯主义的作品，出版于1948年，刚一上市就成为自《经济学原理》（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对古典经济学的明确阐述之作）之后影响力最大的经济学教材。

因此，短短几年，凯恩斯就吸引了许多美国年轻经济学家的心灵和头脑。他对美国理论经济学家思想的影响力提升之巨，可从学术期刊提及他的次数中明显看出。1934年，受他理论启发的只有20篇文章；1936~1940年，这个数字飙升到269篇。55

凯恩斯革命以令人眼花缭乱的速度席卷了美国诸多经济部门，而后又冲上了华盛顿特区联邦政府的制高点。他的概念似乎找对了时机，很快就传遍了整个美国。有些人把凯恩斯的想法当成铁板钉钉的论断，意见不同的人往往要怀疑他们的动机。后者很高兴地发现，原来数千凯恩斯主义者里居然有不少人是苏联间谍，包括柯里。但与其说凯恩斯革命是一场可怕的阴谋，倒不如说它是许多个体的自发运动，他们凭借自己的经历不约而同地找到了凯恩斯。“持阴谋论的人会悲哀地发现，这是一场未经组织的革命，”加尔布雷斯回忆说：他在数千份报刊上发表文章，成为凯恩斯主义观点的主要普及者。“所有参与者都对这种思想感受到深深的个人责任，产生了强烈的冲动要去说服别人。但没有人是出于计划、命令和指示而

做出响应，他的行为单纯地来自他自身的信念。这或许是凯恩斯革命最有趣的一个特点了。”56

罗斯福可能不理解凯恩斯主义，不懂如何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但他的政府里的年轻人大多数都知道。尽管提供给这些年轻人的资金远低于所需，他们仍然相信，哪怕凯恩斯式措施发挥作用的速度很慢，也会显现出成效来。失业率并没有很快降低，但逐年都在走下坡路。1933年，失业率达到25%的顶峰，次年，它跌到17%，1935年则降到14.3%。这个数字尽管仍然高得无法忍受，但令人鼓舞。1936年，全国生产已经恢复到1929年的水平。

不过，看到数据走向正确的方向，华盛顿各权力部门残存的不少古典经济学家却更固执己见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证明，不管凯恩斯革命多么成功地让罗斯福政府接受了干预经济的观念，它同样能轻而易举地毁掉美国经济脆弱的复苏。

弗里德里希·哈耶克为什么不立刻质疑他眼里凯恩斯《通论》所存在的逻辑失误呢？如果他在《通论》出版时主动请缨反驳，他兴许已经把凯恩斯革命掐灭在萌芽状态了。哈耶克的余生都为这次错失机会感到懊悔。将近40年后，他承认：“我迄今没有完全摆脱这种感觉，我推托了完全属于自己的职责。”1

凯恩斯径直邀请哈耶克来批评。他给哈耶克送了预印本，好让他的克星可以赶在正式出版之前写出评论。凯恩斯是个公关大师，知道招揽争议的价值。和哈耶克进行激辩，能带动书的销量。

促使凯恩斯这么做的，不光是敏锐的商业意识。他长期以哈耶克及其古典学派的同事为目标，真心想跟他们辩论。他的野心不仅是在论战中胜出，还要取代他们。只有后者愿意跟他辩论，这一点才能实现。他的大炮早已装填好了炸药，随时准备一战。事实上，哈耶克拒绝进擂台，这让他很失望。光是用《通论》初次登场吸引来的热情浪潮吞没古典经济学家还不够。《通论》反复向哈耶克和他的同事们下战书，要他们捍卫自己的立场。可哈耶克始终没有露面。他认为凯恩斯正把经济学带向危险的方向，可他不愿参战。

莱昂内尔·罗宾斯或许要为哈耶克反常的沉默负上部分责任。罗宾斯一直意识到争论的潜力，热切地想利用《通论》的到来提升伦敦经济学院的声望和他自己在全国经济辩论中的位置。罗宾斯第一次读完《通论》，就认为凯恩斯对其剑桥同事亚

瑟·庇古的尖锐攻击是最有新闻价值的线索。庇古在《经济学刊》上做出回应，恐怕会比哈耶克的稿件更受欢迎。他还可以避免和凯恩斯之间出现挑剔暴躁的僵局，像哈耶克评论《货币论》之后那样。

罗宾斯知道凯恩斯和庇古有些私人摩擦。有一次，他和凯恩斯在剑桥散步，按罗宾斯的话说，正看见“不怎么活泼的庇古，从每天散步的课业里迈着大步回来”。嘴巴刻薄的凯恩斯低声对罗宾斯说：“这是一个运动得太剧烈结果毁了自己健康的人哪。”2庇古严厉谴责凯恩斯，说他回复哈耶克对《货币论》的评论时用语有失妥当，“简直是在跟人决斗！”3所以，1936年5月的《经济学刊》邀请的是庇古而非哈耶克首先跟凯恩斯过招。

庇古充分利用这一邀请来捍卫自己，对凯恩斯对他的正统观点的驳斥论调，写了一篇措辞谨慎、充满痛苦的抱怨文章。他削尖了飞镖，来配合凯恩斯伶牙俐齿的攻击。庇古嘲笑凯恩斯狂妄的假定，“爱因斯坦对物理学所做的贡献……凯恩斯先生认为自己对经济学所做的贡献与之相当。”他指出，爱因斯坦“在宣布他的发现时，并未用带着利刺的句子暗示，牛顿及其追随者是一群不称职的笨蛋。”庇古以为人师表的态度继续批评道，“尤其遗憾的是，（凯恩斯甚至把）贬低延伸到自己的老师马歇尔身上。”

把自己的作品和其他古典经济学家混为一谈，伤害了庇古的虚荣心，倒不光是因为凯恩斯的批评泛泛而论不具体，很难对付。“如果有人带着狙击枪冲进了大村庄，没人会耐心地追查他每一颗子弹的路线。”庇古抱怨说。在评价《通论》的实质时，庇古假作绝望。“凯恩斯的论点如此模糊，读者无法确定他确切想要表达什么。他论述的力量……更不必说他生动的措辞，让他成了《每日邮报》重要的投稿人……可这一回，怎么竟连和他同一专业的同事几乎都无法理解这位作者了呢？”和哈耶克一样，庇古指责凯恩斯在“术语使用上前后不一致”。4庇古接着一丝不苟地破解了许多原创概念，如凯恩斯首创的“流动性偏好”等。这篇文章写得很精彩，庇古显然很享受打垮凯恩斯的乐趣。

但庇古的苛刻书评根本不足以叫停《通论》引发的凯恩斯主义思潮。罗宾斯很快明白过来，凯恩斯成功地在年轻的经济学人中引发了热情的巨浪，值得《经济学刊》用大量篇幅展开长期辩论。但庇古交出答卷，却几乎没在经济学家中造成半点动静，罗宾斯莫名其妙地结束了辩论，甚至没让哈耶克执笔再开上一轮火。

但如果哈耶克主动请缨去对抗凯恩斯的最新论述，罗宾斯的《经济学刊》并不是唯一可用的学术论坛。他为什么不到其他地方去发表意见呢？收到凯恩斯一早寄来的《通论》之后，哈耶克曾回信说，他挺有兴趣地浏览了一下这本书，并发现了许多自己不同意的论点。他说，他特别为两个问题感到“困惑”，一是凯恩斯对储蓄及投资之间关系的论述，二是流动性偏好的概念。哈耶克告诉凯恩斯，一等他抽出时间来仔细看完全书，他会在凯恩斯的《经济杂志》上撰文回应的。“如果我现在的怀疑仍然挥之不去，我兴许会恳请你同意我在《经济杂志》上针对特定观点进行评论。”5但这些“评论”始终没有出现。

未来的岁月中，人们反复恳请哈耶克解释他为什么不在《通论》出版以后正面迎击凯恩斯。他从没给出过一个令人信服的答复。他的说法很难让人相信，“我没有回到攻击中的一个原因在于，我担心我还没完成分析，他就又改变念头了”，6就像凯恩斯在《货币论》出版后做过的那样。为什么不列举这本书的诸多缺陷呢，哪怕它被广泛誉为凯恩斯的杰作？30年后，哈耶克用如下评论反驳《通论》说，“对他以为是政策货币需求的东西，当时很明显要再写一本书才行”。7可惜这话也不怎么说得通。

按哈耶克的说法，凯恩斯推论的本质使得他回避了挑战，但此顾虑同样很难解释。他承认有一种感觉，“当时只能朦胧地感到”，8凯恩斯新作品很难迎击，因为它是从宏观经济学（而不是微观经济学）层面解释经济的运作。哈耶克坚信，只有理解无数个体的选择构成了整个经济，才能解释经济体的运作。他说，自己的立场假设理解经济的关键在于从下而上，可凯恩斯的方法却是自上而下的，这让他很难充分表达反对意见。诚然，要是凯恩斯说着苹果，哈耶克却谈论橘子，反驳《通论》的假设确实很难，但这也并非远超哈耶克的能力。总之，用这个借口解释何以到了球门之前却不狠狠射门，还是够蹩脚的。

多年以后，哈耶克尝试回答那些非议他的人。这些人认为，他未能直接跟凯恩斯对质，不仅仅是疏忽，甚至可以算失职之罪。因为，要是有了正确的干预，哈耶克恐怕能放缓甚至完全阻止这种古典经济学家眼里彻底破坏了经济政策的理论。“对于我投入了大量时间仔细分析他作品之后却未能重返战场的原因，我应该解释一下——我为这件事责怪自己很多年了。”91983年，他在纪念凯恩斯诞辰100周年的时候撰文说。“不仅仅在于……年轻人听到著名作家对自己说，他的反驳意见没什么好重要的，因为连凯恩斯自己也不再相信自己的论点了……年轻人不可避免地

会感到失望。也并不在于我意识到，要有效反驳凯恩斯的结论，必须应付整套宏观经济学的方法。倒不如这样说好了，凯恩斯罔顾我认为关键的问题使我意识到，恰当的批评要对付的不是他在讨论的事情，而是他不曾涉及的东西。故此，彻底对付凯恩斯论点的先决条件，是有一套精心阐述的资本理论，哪怕它的构建尚未成熟。”10

故此，经过了将近50年的困惑之后，哈耶克主动给出了一个自己保持沉默的合理解释。在这个迟来的解释中，他不曾提到《通论》刚诞生时，他正要出版一本自己的大部头，旨在让奥地利学派的资本理论翻开新篇章，并能全面地反驳凯恩斯主义。到1936年，他的这篇论文进展颇为顺利。3年前，他曾向伦敦经济学院的洛克菲勒研究基金委员申请一笔资金聘请助理。11“未来18个月（甚或两年），我希望能完成一卷资本理论作品，我担心它篇幅极大。”他写道，“在本书的进一步准备过程中——我大概完成了1/4，我迫切需要一位真正优秀的数学家长期协助，他不仅能精确地绘出我已经设计好的相当复杂的图表，还能在分析论述上帮我的忙，虽然这部分内容我希望只放在附录中，但绝对不可或缺。”12学校找到一个能说英语、德语和法语的合适人选，指派他于1934~1935年帮助哈耶克。

这个项目的工作开始得很艰难。1935年，哈耶克已经把书搁置了一阵儿，但1936年，收到凯恩斯寄来的《通论》仅仅两星期之后，他告诉同为奥地利人及奥地利学派信徒的朋友戈特弗里德·哈伯勒（Gottfried von Haberler），13写书挤掉了他所有的工作，都腾不出手来应付凯恩斯的最新作品。“我努力专心写我的书，必须把其他一切搁置起来，”他写道，“现在说它初具规模还太夸张，不过我还是希望能在复活节假期之前完成第一稿。”至于《通论》，他写道：“我暂时还没法发表意见，因为我自己的书绝望地卡在了第6章。”14

3月，哈耶克告诉哈伯勒，除了根据自己所做讲座整理出来的几章内容，他的书远未完成。这时候，哈伯勒已经读了《通论》，寄给哈耶克一篇想要送去《经济学刊》上发表的文章，指出了理查德·卡恩乘数理论中的缺陷。哈耶克退回了文章，说了些杂志方面莫名其妙的“困难”。在说明短信中，哈耶克写道，“5月号上要刊登庇古对凯恩斯的批评文章，它最先寄过来，而且会非常尖锐（我自己还没看过）。想必你明白，这种情况下，我们不想给人留下印象，认为我们在有计划地进行一场反凯恩斯行动。出于这个原因，我自己决定向《经济杂志》……提交一份笔记……凯恩斯不好拒绝……我相信你也应该投他那儿试试看。如果他拒绝，我们再来谈其他的

可能性。” 15

罗宾斯和哈耶克固然不愿显得要着急发动反《通论》活动的样子，但从哈耶克的信里能明显看出，哈耶克、罗宾斯、约翰·希克斯和其他人确实在暗中密谋，打击声望如日中天的凯恩斯。“把凯恩斯孤立起来，让他和其他剑桥及伦敦经济学家当面论战，现在就是机会。”哈耶克私下对哈伯勒吐露内情，“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不想把《经济学刊》放到攻击第一线而陷入困境。庇古的文章当能引起足够的轰动。” 16

5月，哈耶克给哈伯勒寄去自己对《通论》的判决。他说，他对这本书“当然非常恼火”，不光是因为“靠着他的设计，凯恩斯败坏了许多重要思想，现在它在许多人中流行开来，不干掉所有其他废话就想说服他们变得更困难了。” 17但这句短评，成了哈耶克同期对《通论》的所有批判性评估。他不把自己“恼火”的地方详细说清，直面凯恩斯的“废话”，而是集中精力完成《资本的纯理论》第一部分，这部书分上下两卷，有意直接和《通论》打擂台。

虽然哈耶克有自信，认为很快能完成个人的杰作，并暗示“绝望地卡在第6章”只是暂时性挫折，但没过多久，他发现自己在《资本的纯理论》里泥足深陷，无法实现任何进展了。他对这部作品寄托的雄心是扩展自己的“生产阶段”概念。但在其后4年，他挣扎着解释资本和货币在经济中扮演的关键角色，却始终无法让自己满意。他越是努力，任务的规模越显庞大。他的思维跑得太远了，他捕捉不住，更无法将之在书面上表达出来。

又过了一阵儿，他在《资本的纯理论》上磨起了洋工。1937年，他第二次把工作放到一边。1938年，他完全乱套了，他竟然发现自己丢失了部分手稿，只得向同行的维也纳经济学家朋友弗里茨·马克卢普（Fritz Machlup）19索要遗失部分的抄件（因为马克卢普看过他进行中的工作，还给出了修改建议）。哈耶克为经济更宽泛的层面分了心，他脱离了资本理论的密集领地，进入了洞悉个体经济行为背后冲动的独到见解。尽管英国的经济学家们，尤其是剑桥和伦敦经济学院的同行，都热切地等待哈耶克挑战《通论》，但哈耶克的思想却漂向了他方。

1936年11月10日，哈耶克在伦敦经济俱乐部致就职演说“经济学与知识”，清楚地表明了他思考新方向的第一个结果。本次讲座对经济均衡的概念做了惊人的再评估，而这个概念，本来就是他与凯恩斯争论的焦点。更重要的是，哈耶克第一次

在讨论价格重要性的时候，突然冒出了一种全新的方法，不光进一步拉大了他和凯恩斯的分歧，也奠定了他原创思想家的地位，不再仅仅是奥地利学派的追随者。

经济达到均衡状态的概念在经济理论中司空见惯，凯恩斯与哈耶克论战中最出名的例子就是古典经济学家所持的假设：随着时间的推移，储蓄和投资完全一致，经济就会进入完全就业的静止状态。凯恩斯对是否存在均衡状态提出了怀疑，因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英国和美国的实体经济和这个概念明显不一致。不管是美国还是英国的经济基本上都进入了静止状态，只不过是大规模失业的静止状态，而非充分就业的静止状态。古典经济学家反驳说，经济陷入长期低迷时并未达到均衡状态，但它难以令人信服。

哈耶克重新考察了均衡的概念，逐渐改变了从前的信念，转而认为经济很难甚至根本不会达到静止。为了让自己的论点更容易让人理解，他在“经济学与知识”讲座中举了一群人共同修房子的例子。“造砖厂、水管制造厂和其他供应商都将根据所建房子的具体数量生产产品，因为所需的生产资料就只有这么多。”他对听众说，“类似地，我们可以设想，潜在的买家因为打算在某个日期之前买下一定数量的房子而进行储蓄……我们可以说，在此之间存在均衡状态。”20

但是，哈耶克很快指出事情不一定会这样，“因为，不属于他们行动计划的其他条件，或许会有别于人事前的期待。部分材料可能会因为事故遭到破坏，恶劣的天气状况导致房子无法修建，或是出现一项发明，改变了不同材料所需的比例。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外部）数据变化，它扰乱了本已存在的均衡点。但如果不同的计划一开始就互不相容，那么不管发生什么，都必定会打乱人的计划，非调整不可，故此，一定时期内所有行动的复合整体，并不等同于从个体计划角度理解的个体行动的总和。”21

哈耶克认为，如果现实世界中的均衡注定难以捉摸，那么，理论经济学家对经济体或市场趋于达到均衡点的先验假设，就总是会功亏一篑。只有知道每一个参与者的意图，才可能预测均衡点，但这一点不管在理论还是在实践中均不可能做到。他爽快地承认，这一点看似平淡无奇，但否定存在可预见的均衡状态，否定前述先验性假设（市场中哪怕最简单的决定，都由许多准确和不准确的人类选择构成），哈耶克突破了一片新天地。在这个过程中，他跟米塞斯及其维也纳同事们，以及奥地利学派中的其他大神拉开了距离，对后者而言，均衡状态是核心假设。

尽管哈耶克这个时候还没有在逻辑上做出日后让他成名的最终飞跃，但在“经济学与知识”讲座中，他达到了做出重大突破的临界值。大规模经济行为的先验假设依赖于一整套理想的条件：每一个人都掌握了为在完美市场中做出决策所需的一切有关目前及将来环境的知识。但是，哈耶克提醒听众，完美的市场并不存在。现实生活中的经济决策是个体根据对现状的部分知识，再加上对将来走向的最佳猜测做出来的。这些条件到底会怎么样，每一个人得出的判断都是不同的（通常还是相反的）。有些人的决定做得对，有些人则做错了。但他们的决定结合到一起，构成了一幅市场正处于运作中的活动图景。

根据这条推理思路，他得出了两点重要结论，虽然他并未在讲座中明确指出，但两者都为他思考的新方向铺平了道路：价格反映了对市场认识的集体智慧；诸如政府等外部力量干预价格形成，就像是想用按住测速仪指针的方式来规范汽车行驶速度一样；没有一个人，哪怕是“全知全能的独裁者”，能够了解经济体中所有个体的想法、欲望和期待。如果一个极权统治者，甚至心怀善意的非政治“规划者”，基于自己能够准确了解他人思想的假设来干预经济，必然会挫败、阻碍个人的幸福和自由，哪怕他口口声声说自己是代表个人的利益行事。这是哈耶克灵光乍现的紧要关头。后来，他形容这个关键概念说：“这个极具启发意义的想法让我从全新的角度看到了经济理论的整个特点。”22

哈耶克引入了“知识分工”的新概念，他认为这和劳动分工的经济概念同样重要。劳动分工指的是产业发展的如下阶段：工人专门从事单独一种任务，共同制造整件产品，而不是一个人把整件产品做出来。他认为，经济由无数个体构成，这些个体要做出无数单个的经济决策，完全理解或衡量这些决策是不可能的，但他们的意图将通过不断波动的价格反映出来。一样东西的价格，是至少两个人能够达成一致的点。因为价格基本上是有机的，就像人的意志结合起来构成整体的决定，尝试改变或干预价格最终是徒劳的，因为人类行为永远会让固定价格的设想落空。出于同样的道理，（政府通过有意或无意行为煽动起来的）价格通货膨胀，就成了掌控经济者蔑视愿意照价买单者意愿、剥夺其公民意志的一种手段。

可由于凯恩斯《通论》引发的喧嚣太盛，哈耶克的讲座几乎没人注意到。哈耶克传记作者艾伦·爱本斯坦（Alan Ebenstein）证明，“凯恩斯出版《通论》之后，人们几乎已经遗忘了哈耶克这个技术性的经济学家……到20世纪30年代最后的几年，再也没人对他感兴趣了。”23遭到忽视固然是可怕的命运，但它还不算这段

时间发生在哈耶克身上最糟糕的事情。参加他的伦敦经济学院讲座的人，态度上出现了变化。从前他们敬畏哈耶克的声誉，视他的言论为权威，可等他们熟悉了一段时间之后，就形成了一种轻视，凯恩斯的迅速崛起又加剧了这种轻视。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家认为哈耶克是化石，是老古板，他们排队来参加哈耶克的讲座只为了取笑他。1937年，讲台下嘲笑队伍里的一员，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亲身见证了哈耶克权威地位的火速委靡。“学生们无情地比拼着参与（并纠正哈耶克）。”24“竞争的气氛极其火爆，以至于哈耶克教授这位持有落伍观点的温柔绅士……几乎没法开口说话了。一个难忘的夜晚，他来到他的座位上，鞠了一躬，带着优雅的口音说，‘现在，先生们，如同我在上次见面时所说，今晚我们要讨论利率。’尼古拉斯·卡尔多瞅到了空子说，‘哈耶克教授，请恕我真的不能同意。’”25

卡尔多出生于匈牙利，为哈耶克誊写过《价格与生产》，也曾为哈耶克在与凯恩斯通信期间做过英语顾问，但却是所有助手中对哈耶克最有失尊重的一人。卡尔多回忆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哈耶克“对我好生懊恼。起初，他对我来说很可怕，但后来，我发现他其实很傻，我揶揄他，让他显得很荒唐，我在研讨班上当面顶撞他。记得有一次，我和哈耶克吵了一架。我说，‘哈耶克教授，这是中级经济学。’哈耶克脸色发红，事后，哈耶克走进茶室说，‘你们知道卡尔多说了什么吗？你们知道这孩子说了什么吗？他说，哈耶克教授，这是中级经济学，你应该知道。’我说，我抗议。我从来没有说过‘你应该知道’。每个人都笑了起来”。26

后来，卡尔多和威廉·贝弗里奇合著了1944年出版的凯恩斯主义的行动呼吁《自由社会的全面就业》（Full Employment in a Free Society），为哈耶克弟子转投凯恩斯门下开了先河。事实上，卡尔多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辞了职，到剑桥谋了个职位，鼓吹纯粹的凯恩斯主义。哈耶克另外两名最优秀的弟子约翰·希克斯和阿巴·勒纳，从前在他们火热的联合研讨班上结成了反击“马戏团”的团队，也不甘人后地公开放弃了对哈耶克的忠诚，改入了凯恩斯之门。勒纳在剑桥度过了1934~1935年，从源头吸收了凯恩斯主义，回到伦敦经济学院传播凯恩斯的福音。再过了不久，就连庇古也在重读《通论》之后收回了自己的不同意见，掺和到鼓掌唱赞歌的长长队伍（还全都是著名经济学家）里去了。

这么多亲密同事和好友火速“叛逃”的累积效应，让哈耶克几乎没有了集中精力完成《资本的纯理论》的信心。1940年6月，这本书最终完成，次年得以出版，发出一声闷响后就着了地。它德语式的句子，过分的乏味单调，都让人看不懂它，以

为它无关紧要。萨缪尔森回忆说：“哈耶克的《资本的纯理论》并未胎死腹中。但它却是一块投入经济科学池塘而未能掀起一丝涟漪的鹅卵石。”27比较起来，满是曲曲折折图表的《价格与生产》，倒像是一本适合晒太阳时看的通俗读物了。正如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28所说：“我是哈耶克的超级崇拜者，但我崇拜的不是他的经济学。我认为《价格与生产》是一本到处都是缺陷的书。我认为他的那本资本理论根本没法读。”29

哈耶克在《资本的纯理论》一开头就承认，自己是怀着沉重的心情处理这个主题的。他写道，他“极不情愿”地处理这份任务，并对厌倦了抽象转而致力于解决现实世界经济如何运作的人，比如凯恩斯等，表达了同情。他所选择主题的庞大规模令他感到沮丧和郁闷。“如果我早知道这份任务如此艰巨，我恐怕会更不乐意承担它。”30他写道。这本书有着歉意和绝望的整体基调。“本书和它所有的缺点，都是很长时间工作的结果，我不知这样的结果能否值得我付出进一步的努力。”31后来他承认，“我慢慢醒悟过来，32这该死的东西复杂到几乎不可能理解。”33

尽管文字有欠明晰，残存的哈耶克党人还是把希望寄托在这本书上，盼着自己的英雄反击不断发展的凯恩斯邪教，但他们失望了。不过，这是哈耶克最接近详细列举自己与《通论》分歧的一次，可惜又做得太乏力了。“一般而言，我认为打断主要论点，明确提到他人某一观点的做法不可取。”34他写道。不过，他还是提到凯恩斯分析的一些方面，但他大多继续纠缠于经济学术语的神秘性，忽视了反驳凯恩斯通过公共工程提高就业的主张。他写道，他对凯恩斯建议的主要异议在于，经济衰退期间，把未使用的资源重新高效地利用起来创造岗位，“对一套声称具有普遍适用性的理论来说，这肯定不是一种正常的立场。”35

哈耶克认为《通论》的主要论点是诡辩，它否认了经济学家始终关心稀缺性的问题。“凯恩斯带给我们的，其实是人们长久以来渴望的富足经济。”他写道。凯恩斯否认自由市场的运作，重新把稀缺性定义为一种“人为状态”，“是因为人不愿意低于某个固定价格来贩卖其产品及服务造成的”。凯恩斯忽略了市场价格，认为它们只会在“充分就业实现后，不同的商品相继开始变得稀缺并开始涨价时”才发挥作用。36

哈耶克驳斥了凯恩斯的价格概念，认为它代表了对价格如何真正确定的深刻误解。哈耶克相信，价格是理解生产过程的关键，是理解整个经济运作的基础，价格

的基础来自商品的稀缺性，而非如凯恩斯所说，来自储蓄与投资失衡及生产“实际成本”之间的关系。这使得他不加解释地排斥了凯恩斯的整套复杂论述。

哈耶克在一处生动的脚注里谴责了《通论》，但他批评的不是它过分新颖，而是说它是过时思维的产物。哈耶克嘲讽地描述说，作为“现代经济学上的重大进步之一”，凯恩斯放弃了资源稀缺性的概念，可令人吃惊的是，凯恩斯居然还承认“瓶颈”的存在，并以此解释为什么繁荣快要结束时商品会变得稀缺。哈耶克认为“瓶颈”用词不当；这个术语指的是市场的供给与需求不匹配。故此，“瓶颈在我看来是一个基本上属于经济学思想早期的一个概念，把它引入经济理论，很难算得上进步。”37

哈耶克评论说：“遗憾地偏离本书的中心线索，实在是由于凯恩斯先生的《通论》面世后对这一主题造成了莫大的困扰所致。”38之后，他就又回到了自己干枯乏味犹如撒哈拉沙漠一般的资本及利率研究上了。他约略地提到了“流动性”（凯恩斯《通论》中的核心概念），可惜他说，本书不是随心所欲深入探讨这一主题的地方，“在这个问题的表面抓抓挠挠，没什么好处可言。”39又一次，凯恩斯分明落在了哈耶克的眼里，可惜后者还是狠不下心来扣动扳机。

在《资本的纯理论》的结语部分，哈耶克说，凯恩斯把视线集中在经济问题及补救措施的短期效应上，“不仅是严重而危险的智性失误，也背叛了经济学家的主要职责，深刻威胁了我们的文明。过去……人们认为经济学家的职责和权利，就是研究、强调生手看不见的长期效应，实践者才需注重更直接的效应。我忧心忡忡地看到，从前，我们着手系统化地论述长期而言决定价格和生产的各种力量，现在，它们却要我们放弃这一切，取而代之以商人美其名曰为‘科学’的短视哲学。”40

他故意误用了凯恩斯的一句名言，以一句带有不祥意味的话结束了全书。“不是甚至有人这样说过么——因为‘长期而言，我们都会死’，所以，政策应该完全受短期因素指引吗？”“我担心，‘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一语的信徒们真的会遇到洪水滔天的那一刻。他们会自食其果的。”41

哈耶克一直都清楚地知道，这些对凯恩斯的精彩重击，完全不足以放慢年轻经济学家投入凯恩斯怀抱的步伐，阻止就更别想了。然而，《资本的纯理论》对凯恩斯主义发出警告的字里行间，也为米尔顿·弗里德曼等追随哈耶克投身反凯恩斯阵营的人指示了一条前进的出路（同时也对其做了告诫）。

“没有什么根据会让人相信，使用现代复杂信贷结构的经济系统无须对货币机制进行有意识的控制，也能永远顺畅地运作下去，”哈耶克写道，“基于货币的本质，它构成了价格机制自我均衡机关的松散关节，也正因为这一天，它势必要阻碍这机关的运作。任何成功货币政策的目的，必然是尽可能减少价格机制自我纠错力量的松懈部分，让它变得更敏捷，阻挡下一轮更猛烈的反应出现。”42但哈耶克又警告如弗里德曼那样以为定量货币理论是万能良药的人，这种管理经济的手段有着严格的限制。“我们当然有资格断言……和今天人们普遍认为的不同，通过控制货币来任意决定事件走向，其控制程度是很有限的，货币政策的适用范围则更为有限。有些作家似乎认为，靠着玩弄货币手段，我们想对经济系统做什么就能做什么。可惜，我们做不到。”43

哈耶克本想再写一本《货币的纯理论》，作为对《资本的纯理论》的补充，可惜，这个构思的下半部他始终未能完成。有些讽刺的是，未能完成他宏伟设想的上下两部，其实正好相当于在信贷加剧的低潮期，资本货物生产阶段陷入崩溃。他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在《通论》中，凯恩斯得出结论，商品的需求等于对劳动力的需求，故此必须敦促提高总需求，以实现充分就业。哈耶克不同意凯恩斯的分析，认为没有实证可支持这一说法。解读这一数字或许还有其他方式。正如哈耶克所说，“总需求与总就业之间的相关性……也许只是近似值，但由于它是我们唯一拥有的量化数据，人们把它看成了唯一的因果关系。”44《资本的纯理论》的最后一句话指出，凯恩斯爱上了一个错误的假设。“在我看来，能否充分理解‘商品需求不是对劳动力的需求’这一原则，以及它有什么样的局限性，是对经济学家的最佳考验。”45

哈耶克用着重号道出了自己对经济学理论的最后一言，从纯经济学的角度朝凯恩斯射出了最后一轮炮火。紧接着，哈耶克转身投入了他最初以“经济学与知识”之名提出的政治哲学主题，开辟了更具说服力地反对凯恩斯及凯恩斯主义的第二条战线。

《通论》出版后，美国凯恩斯主义革命的成功似乎已十拿九稳，但罗斯福政府对凯恩斯主义思想的应用还是只鳞片羽，不成规模。富兰克林·罗斯福欢迎凯恩斯到访白宫，但按新学说主张的规模大兴公共项目，还是让他很紧张。等到1937年春，生产、利润和工资都恢复到了美国1929年的水平，暗示经济复苏上了正轨，总统就

发出了转向的信号。失业率从前一年同期的16.9%下降到14.3%，罗斯福的一些顾问，包括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马里纳·埃尔克斯1在内相信，新政的就业安置计划已经在施展魔法了。

1937年6月，罗斯福重新回归正统路线，他削减开支，紧缩信贷，提高税收。2联邦创造就业岗位的机构运作放缓。不久之后，美国又一次陷入衰退。“罗斯福衰退”持续了整个1938年，工业生产萎缩了1/3，价格跌了3.5%，失业率攀升至19%。3罗斯福试图以攻击大企业的方式免遭责难。1938年1月，大选在即，总统改弦易辙，将一份37.5亿美元的开支法案送上国会，4月再呈上12.5亿美元，为新一轮创造就业岗位举措提供资金。

在4月14日的一轮“炉边谈话”中，罗斯福采纳了凯恩斯主义的逻辑。“我们的问题，主要是来自消费需求不振，”他说，“让经济好转的关键在我们。”他宣布将3亿美元用于清理贫民窟，1亿美元用于修建公路，其余数百万美元用于“公共改善”。罗斯福为自己态度的逆转解释说，为失业者提供帮助，能保护美国，不出现像德国和意大利那样猖獗的极端主义。“我们民主体制的健全，取决于我国政府为失业者提供就业机会的决心。”他宣称。4

2月，凯恩斯写信给罗斯福。他认为“罗斯福衰退”是“犯了乐观主义错误”，他敦促总统坚持到底，并建议以兴建房屋为重点，“这是迄今为止最佳的复苏援助。”他呼吁罗斯福克制反对商业人士的言论，他们“困惑、发懵，真的吓坏了”。他写道：“如果您让他们陷入不折不扣的恐惧情绪……国家的负担就无法转移给市场。”5

德国发生的一连串事件迫使罗斯福按照凯恩斯的建议大手笔开支。1933年1月，希特勒上台，他无视《凡尔赛和约》，着手大规模重振军备计划。一年之内，德国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就不曾摆脱的失业困扰一扫而空，实现了充分就业。6欧洲的民主国家忧心忡忡，也开始扩展军备，这给了美国军工行业一针强心剂。在英国，内维尔·张伯伦政府静悄悄地扩军了。英国的失业率开始下降，但直到1939年9月3日正式对德宣战，7其失业率仍保持了创纪录的高点。而就在这一天，华尔街股市回到了1929年崩盘前的水平。8担心轴心国的并不只有欧洲。尽管罗斯福在1940年的总统选举期间信誓旦旦地做了保证——“我之前说过这话，但我还会一次次地、反反复复地这么说：我不会把你们的孩子送到外国去打仗。”9但他还是下令开展一轮庞

大的重整军备计划：1940年，年度国防开支为22亿美元；次年，它激增至137亿美元。

“如果军备支出确实治愈了失业，一场大型实验就开始了。”1939年，凯恩斯宣称，“我们可以从中学上一两招，等和平的日子降临时会派上用场的。”10这么多的公共资金注入美国经济带来的乘数效应，使得国内生产总值（GDP）跃升了约250亿美元，武器及其他国防开支占了增长的46%。11即便如此，直到日本偷袭珍珠港的1941年，就业仍没有恢复到“罗斯福衰退”前的水平。“我们看到战争成为凯恩斯主义理论、凯恩斯主义原则和凯恩斯主义建议的正当理由。”12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回忆说。13

1938年3月，德国占领奥地利。恰逢此时，哈耶克成为英国公民，并在战争爆发之前最后一次拜访了故国。由于他从前的国籍，哈耶克无法加入英军服役，所以，1939年9月，他写信给英国信息部，“考虑到我的特别经历和有些特殊的职位，对联系德国的宣传组织一事，我恐怕能帮上相当大的忙。”14可惜没人理睬哈耶克的提议。

哈耶克本可能会有更可怕的遭遇。皮耶罗·斯拉法仅仅因为是意大利人，就被收押在了马恩岛，考虑到他受墨索里尼的威胁后逃离意大利的经历，命运显得颇为残酷。多亏凯恩斯向内政大臣求情，斯拉法才重获自由。哈耶克很清楚自己的好运气。“我当时还是前外国人，来自敌对国家的外国人。我有一个非常幸运的位置，”他回忆道，“没人让我去做任何与战争相关的事情，但也没人骚扰我。对我来说，这个位置再理想不过了。”15

时年56岁的凯恩斯，因为年纪太大，健康也糟糕，不适合服役，更因为不受张伯伦政府欢迎，也没能进财政部。他的传记作者斯基德尔斯基解释说：“安排他做普通公务员，他太杰出了；可不让他进白厅，又太刺激他了。”16然而袖手旁观不是凯恩斯的风格。尽管没人邀请他，他还是主动思考起如何解决为战争买单的问题来了。他摒弃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使用的通货膨胀方法，也不赞成配给制。“废除消费者选择而支持全面配给制，是那一轮冲击，有时也叫做布尔什维主义的典型产物。”171940年4月他写道。

张伯伦的财政大臣约翰·西蒙爵士（Sir John Simon），18在不经意间表现得像是个时髦的凯恩斯主义者，通过公共借贷而非增税的方式重振军备。他将国防开

支提高到6亿英镑，同期税收仅为1.07亿英镑。财政部得出结论，要是失业率能维持在9%，通胀的风险就不大。19然而，凯恩斯认为，巨大的军备支出，再加上军队征募士兵，会把整个劳动力都用上，带动需求大规模提升。这不光会吃光用有限供给去打仗的政府，通货膨胀也必将紧随其后，因为货币太多，而商品却太少。政府只能在高税收、通货膨胀或定量配给三种方式中做出选择，要不然，就是三者合一。

1940年10月20日，凯恩斯在马歇尔学会的“战争潜力与战争融资”讲座中，公布了自己的计划。他并未采用直接的收入税，而是将收入课以累进税，外加强制储蓄，将“延付薪酬”转入计息账户，待战争胜利后再兑现。凯恩斯认为，一旦战争开支耗尽，战后必将出现低迷时期，此时把积累的钱拿出来用，就能起到抗低迷的作用。哈耶克说凯恩斯的方法“巧妙”。哈耶克也赞同凯恩斯反配给制的立场，他认为消除商品价格，必将导致不公正。因为不喜欢以支出激增方式抵挡战后萧条的概念，哈耶克建议，“延付薪酬”应该投资到股票上。令人惊讶的是，他还提出，对“旧财富课以资本税”，20偿付战争债务，再设置“一家巨型控股公司，由它发行股票，交给资产遭到冻结的业主”。21

哈耶克评论凯恩斯的计划时说，凯恩斯有着“在世经济学家中最丰富的思想”，22“凯恩斯先生的建议……似乎是唯一真正的解决方案”。23尽管“支出的全面增加是否能真正治愈低迷值得怀疑”，哈耶克还是欢迎凯恩斯回到“正统”队伍中。“他与更‘正统’经济学家之间的长久分歧，已经消失了。”24“战争期间，我站在凯恩斯一边，共同抵抗对他的批评，因为凯恩斯非常反对通货膨胀。”哈耶克后来说。他还表示，“为了提高他反对通货膨胀分子们的影响力”，自己未能完成《货币的纯理论》的第二卷——不过，这只是故事的一部分而已。25

1940年，德国实施闪电战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迁出伦敦，搬到了剑桥的彼得学院，对凯恩斯批评得最厉害的哈耶克和庇古在这里共担教职。此举完成了哈耶克对英国生活的彻底同化。“战争岁月在剑桥的生活和我特别投缘。”他回忆说：“不知怎的，这个国家的整个环境和学术氛围对我显得极具吸引力，战争条件下，我的全部同情心都在英国这边，又大大加快了这种彻底归化的过程。”26

哈耶克本来要搬到彼得学院住，而凯恩斯却以他典型的善意姿态，坚持要他的老对手在自己国王学院的房子附近找地方。两人时不时地在国王学院碰头，履行教员职责。这便是本书开头那超现实一幕发生的背景：凯恩斯和哈耶克手持铁锹和扫

帚在国王学院哥特式教堂的屋顶巡逻，他们扫视夜空，提防德国轰炸机飞来。这是两人休战的大好时机。两人并未让步，但大敌当前，他俩都答应做个好相处的熟人。哈耶克回忆说：“我们有好多其他的共同兴趣，历史方面的，除了经济学之外的。基本上，我们见面后不谈经济学……所以，在私交上，我们成了非常要好的朋友，包括莉迪亚·洛普科娃。”27

1940年8月，财政部给了凯恩斯一个不拿薪水的职位，让他得以环顾经济政治的方方面面。人们要他跟美国谈判，商量战争贷款。他设计了战后经济秩序方案，取代挑起战争的国与国之间不受约束的竞争，他发明了一种更有序的外汇交易系统，围绕修正后的金本位展开，后来它们演变为布雷顿森林协议。他还构思了另外两家关键的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

同一时期，哈耶克正着手写他弥漫着悲观主义情调的杰作《通往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28他的传记作家艾伦·爱本斯坦评论说：“《通往奴役之路》彻底改变了哈耶克的生活。这本书出版之前，他是一个籍籍无名的经济学教授。这本书出版一年后，他在世界各地都出了名。”29哈耶克对这本书表现出了难得的谦虚，认为它最多能有几百个读者。30如此看来，这样的结果实在还算不错。

《通往奴役之路》最初名为《计划经济社会的报应》（The Nemesis of the Planned Society），根据哈耶克1938年及1939年在两篇文章中探讨的观点展开。31它认为，主张用计划经济取代自由市场的人，不管多么用心良苦，都等于踏上了一条有可能通往暴政的道路。他宣称：“一旦市场的自由运作受阻超过了某个程度，规划者就被迫要扩大控制范围，直至一切都受其掌控。”321944年3月10日，《通往奴役之路》在英国出版，印数为2000册。可短短几天，罗德里奇出版社就又增印了2500册，此后求书的订单源源不绝，出版社几乎跟不上步子。在美国，由于受到多家主流出版商的拒绝，该书交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44年9月18日出版上市。

哈耶克声称，人们普遍认为极左极右是对立的两极，但这是一个误解，因为两者都以全面的国家规划取代了市场力量，侵犯了个人自由。他重申了自己的信念：经济规划者无法了解他人的意志，最终会采取专制举动。

哈耶克担心，第二次世界大战获胜时，胜利的盟军可能会得出结论，战时经济管理能加速实现一个更繁荣、更公正的战后社会。他警告说，这样的政策是通往极

权主义的先决条件，并可能使得历史重演。“我们已经逐渐放弃了经济事务上的自由，而没有经济自由，从前的个人自由和政治自由根本就不曾存在。”33他写道，“我们有可能重蹈德国人的命运。”34

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的论点并非指向凯恩斯，后者的名字书中只提到过两次，35但他在写下这句话时，脑海里似乎浮现出的是凯恩斯和剑桥的其他新同事：本书“显然会得罪不少我希望与之友好相处的人”。36联系他中心论点的各个段落，依稀可见他对《通论》的反应，虽说这反应来得有点迟，态度也很柔和。他一贯刺耳的论调也没了。在剑桥和凯恩斯亲密相处的时光，似乎软化了他证明老对头错误的激情。

很难说《通往奴役之路》是在反驳《通论》。哈耶克肯定了凯恩斯宏伟计划背后的动机：长期大面积失业带来的危险，“对抗经济活动的一般性波动，以及伴随而来的大规模失业浪潮的反复出现”，提出了一个“超级重要的问题”，“一个我们时代最严重、最紧迫的问题”。37但哈耶克的解决方案，仍然反对政府干预。“尽管周期性失业的解决方案需要大量善意的规划，”他写道，“但它并不要求，至少是并不需要取代市场的那种特别规划，这一点，并不如其倡导者所说。”38

哈耶克虚构了一个凯恩斯主义的世界，其经济活动受国家指导。他写道：“这可能会给竞争领域带来严重的限制。在朝着这个方向尝试期间，要想避免让所有经济活动都逐渐依赖政府支出的指导及规模，我们应当谨慎观察前进的步伐。”和哈耶克早就做出的承诺不同，“我们应当谨慎观察前进的步伐”算不上对凯恩斯《通论》的有力拆解。

哈耶克接下来的两句话说得很含糊。“在我看来，（用大规模兴建公共工程来解决失业的办法）也并不是消除对经济安全最大威胁的可靠途径。不管怎么说，提供安全保障、免受经济波动所害的必要举措，不会带来那种威胁了我们自由的规划。”他的意思是说，他对国家干预经济妨害自由的不祥警告，不包括凯恩斯主张的“大规模”公共工程计划？他不太可能把它们排除在外，只可惜，他也并未做出明确表示。又一次，哈耶克明明瞄准了凯恩斯，最终却没有扣下扳机。

然而，就算哈耶克认为凯恩斯主义式的规划不一定会妨害自由，他也很清楚，凯恩斯的方案代价太高：通货膨胀攀升。他写道：“如果我们决心不惜一切代价解

决失业问题，又不愿意采用胁迫手段强制人们工作，我们就被迫要诉诸各种绝望的实验，它们无一能够带来持久的缓解效果，而且全都会严重妨碍我们最有效地利用资源。”39

若真的把《通往奴役之路》视为对凯恩斯迟来的回应，那么它还存在第二点重大疏漏。在《通论》中，凯恩斯不仅对政府干预提供了智性上的理由，且在不经意中开创了经济学的全新分支：宏观经济学，以从上至下的角度观察经济活动，以便规划者更好地理解进而管理国家经济。在此之前，人们一直是从“微观”的角度认识经济的，即逐一考察经济活动的每一个因素。凯恩斯远远超前于他所处的时代，直到他去世，“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这两个词都不曾出现。“计量经济学”同样是凯恩斯在无意中发明的（他甚至对其多加贬斥），随着规划者着手评估经济的尺寸、设定目标，经济活动的测量方法也就浮出水面了。哈耶克和奥地利学派认为这种方法是不恰当的。可惜，哈耶克忽视了对新学科的参考，也并没有将哲学方法切换为凯恩斯杰作所预示的社会科学方法。

哈耶克后来承认，凯恩斯主义的出发点并不是搞破坏。1976年他写道，“就算这种危险的确存在，但这并不是《通往奴役之路》要表达的意思。它意在提出警告，除非我们修补政策的原则，否则就会出现大多数主张这些政策的人并不希望的极不愉快的后果。”40哈耶克认为，诸如凯恩斯等走“中间道路”、主张改良措施的温和思想家，尽管本身并不是社会主义者，但却朝着采纳社会主义观点迈出了步伐，以为这些观点是迈向文明进步的必经之路。“人们仍然没有意识到，德国最大的悲剧在于，它基本上是怀着良好用心的人……铺垫了，甚至在事实上创造了如今代表他们所痛恨的一切力量。”41

《通往奴役之路》并未批判代议制民主，相反，哈耶克支持它。尽管如此，它无疑谴责了所有渴望通过国家机关，以及各层各级力争（从哈耶克的角度来说，再怎么争取也不可能做得到）理解人民真实意愿的政治家去做善事的人。他认为，民选政府的存在，使得政府规模会不断增长。“这不是个别代表的错，也不是议会机构的错，而是这些人与机构所肩负的任务固有矛盾带来的结果。”42

在哈耶克尖锐的分析下，古典经济学家和保守主义者也并不好多少。他谴责了“僵化”鼓吹自由市场解决之道的人，同时又拒绝了保守主义，拒绝固守现有制度。“保守主义尽管是一切稳定社会的必要因素，但它不是社会项目，”他写

道，“保守主义天然具有家长做派、民族主义、权力崇拜的倾向；保守主义又天然有着传统主义、反智主义和保持神秘的倾向，它绝对吸引不了……年轻人，还有那些相信变革能让世界变得更美好的人。”43

在尾声中，哈耶克又捎带着批评了战争最后一年凯恩斯构想的世界新秩序这个理想化的概念。他一方面承认“需要有一个国际政治权威机构，它没有规定不同的人必须做什么的权力，但却必须有能力制止他们互相伤害”。但另一方面，他又怀疑，建立国际经济管理制度是否将走向独裁主义。“在全国范围内有意识地指导经济事务引出的问题，必然让人设想更宏大的尺度，把同类措施应用到国际上。”

事有凑巧，1944年6月，凯恩斯在乘船横跨大西洋前往新罕布什尔的布雷顿森林酒店途中，读到了《通往奴役之路》。凯恩斯此行的目的是主持国际货币机制的谈判（该机制后以这家酒店为名），正好就是哈耶克焦虑的那种超国家机构。4月的时候，哈耶克把书送给凯恩斯，凯恩斯回复说，这书“看起来挺迷人。它就像是苦口的良药，我不喜欢吃，但却知道它对我有好处……一种人必须放在脑后而不是搁在眼前的东西”。44横跨大洋后，凯恩斯十分放松，便从新泽西州大西洋城的克拉瑞吉酒店写了张便条给老对头。“远航让我有机会拜读大作，”他写道，“在我看来，这是一本伟大的作品。我们有绝对充分的理由感谢你把迫切应该说出来的话说得这么好。想必你知道，我并不完全接受这本书里的经济学论述。但从道义上和哲学上，我几乎完全同意它的观点；我不光同意，而且深为感动。”

如果这样盛情的赞扬让哈耶克的精神为之一振，那接下来，他就要大受冲击了。凯恩斯即刻开始了反驳。“我应该说，我们想要的不是完全不计划，甚至减少计划，事实上，我应该说，我们几乎肯定想要更多的计划。但计划需要在这样一个社会下进行，即有尽量多的人，无论是领导者还是追随者，都完全跟你有着一样的道德立场……只要执行计划的人脑袋里、心灵里都有着正确的道德方向，适度的计划就很安全。其中一部分人确实是这样。但不妙的地方在于，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几乎可以确定地说，他们想要计划不光是为了享受它的果实，更因为他们在道德上持有和你完全相反的立场，希望侍奉的不是上帝，而是魔鬼。”

他接着说，“故此，在我看来，我们需要的不是改变我们的经济项目，在实践中，这不光会导致对你哲学的结果产生幻灭，甚至恰恰相反，扩大了你的哲学所带来的结果。”凯恩斯提醒哈耶克，希特勒的崛起并非仰赖大政府带来的便利，而是

因为资本主义的失败和大规模失业。“你今后面临的最大危险在于，美国对你哲学的应用出现了极端形式的失败。”凯恩斯继续说，如果美国在和平时期，失业率回到20世纪30年代的水平，就有可能带来政治极端主义，再次把世界拉进战争之中。

“不，”凯恩斯继续说，“我们需要的是恢复正确的道德思想，回归我们社会哲学的正确道德价值观。如果你只能将自己的十字军指往那个方向，那么，你不会显得或是觉得像堂吉诃德。我要批评你，因为你兴许有点儿把道德和物质问题混为一谈了。一个有着正确思考和感觉的社会，可以把危险的行为完成得很安全。而如果由那些想法和感觉错误的人来执行，那就是通往地狱之路。”45凯恩斯的观察非常敏锐：哈耶克的分析是以对经济学或社会学的认识为基础的，他忽视了人的因素。哈耶克关心的是政府干预与暴政之间的联系，凯恩斯却相信，极权主义的倾向根植于个人的道德选择。

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承认，就解决长期失业问题而言，计划可能会发挥一定的作用，正确的规划形式可能不会导致压迫。正如他后来表示：“到目前为止，政府对竞争的计划，或在竞争无能为力领域的举措，还没有人提出异议。”46他还相信，国家有道义上的责任介入，只要自由企业不受影响，国家介入是可以接受的。“毫无疑问，一些最低限度的食物、住房、服装足以维持人的健康和工作能力，能让所有人感到宽心。在出现疾病和意外的时候，不管是避免这种灾难的愿望，还是克服其后果的努力，都不是削弱救助的理由。简而言之，我们要应付那些真正可以担保的风险。国家出手组织全面社会保险制度的理由是十分充分的。”47

凯恩斯抓住了这难得的一丝温和表态。从计划走向极权主义可能存在一道滑坡，但哈耶克同样站在滑坡上。“这是我唯一严肃的批评。”凯恩斯写道，“你时不时地承认，这是一个在哪里划下界限的问题。你赞同必须在某个地方划下界限，也赞同逻辑上的极端是不可取的。但你却并未向我们说明在哪里、怎么划下这条界限。诚然，你我划线的地方可能有所不同。我猜，照我的观点，你大大低估了中间路线的可行性。但只要你承认极端不可取，又必须划界限，你就反驳了自己的论点，因为你此前一直试图说服我们，只要朝着计划方向迈出一寸，你就必定走上滑坡的路，它会带我们跌下悬崖。”48

大概是因为对手大度的赞许，哈耶克并未试图回答凯恩斯信中提出的问题。但过了一阵儿，凯恩斯说，在一个珍视自由的国家，比如英国，计划是不会招来暴政

的，哈耶克反击了。“我担心我的不少英国朋友们，比如凯恩斯，仍然相信，英国人现存的道德信念能保护他们免遭这样的命运，滑稽啊！”他断言，“你无法仰赖‘英国人’固有的‘性格’解救英国人民于此种命运。”49

哈耶克未对凯恩斯做出回应，或许是因为他以为自己在《通往奴役之路》中已经详细解答了凯恩斯的反对意见，即在国家干预和自由市场之间划界限的问题。国家扮演角色的关键在于，是否任何情况下都应用法治。法律应当公正，这意味着要确保它不偏向社会中的任何一部分。“国家的控制权重和举措（或在其他任何领域防止欺诈哄骗等）当然在运作，可与此同时，面对比如罢工纠察队使用暴力的时候，它却不作为。”他写道，“然而，前一种情况，国家遵守了自由原则，后者则否之。”50

政府的政策，如补贴某些行业或个人、特许商业垄断，或歧视性政策（哪怕是意在纠正不公的偏向性政策），都混淆了法治原则。但是，福利国家的救济，如扶助老弱病残，只要它一视同仁地对待所有公民，就是合乎法理的国家行动。“在一个如同我们这样已经达到普遍富裕的社会中，在不危及普遍自由的前提下，没有理由不为所有人提供这种安全保障。”他写道，尽管“这些依赖社会的人是否应该无限期地和其他所有人一样享受同等的自由……很可能带来严重甚至危险的政治问题”。51

芝加哥大学出版社曾请弗兰克·奈特评估一下是否值得出版这本书。按理说，奈特应该肯定书中提出的警告。可他认为，哈耶克举的例子太夸张了。“它基本上是否定态度，”奈特写道，“对于未来政府活动将与经济生活息息相关的问题，它几乎不曾考虑除此之外的替代方法，对这么做的必要性以及政治上的必然性认识不足。它只涉及了以政府控制取代自由企业的喧嚣之下一目了然的浅白谬误、不合理要求和虚构成见。我怀疑它在这个国家没有太广阔的市场，也不见得能改变大部分读者的立场。”52

在这一点上，奈特的意见完全错了。随着时间的推移，《通往奴役之路》成了挑战经济规划合法性和有效性的经典之作。它在美国的初版印数仅为2000册，可《纽约时报》的书评对它推崇备至，说它是“我们这代人最重要的一本书”。53第二次印刷为5000册，紧接着第三次印刷是10000册。而后马科斯·伊斯特曼（Max Eastman）54在《读者文摘》上安排了一个删节版，恰逢其时，富兰克林·罗斯福于

1945年4月12日逝世，新政及美国未来的经济政策成为热门话题。没过多久，出版社就下了100万册的订单。《瞭望》（Look）杂志甚至印了卡通版。

在英国，哈耶克的观点基本上得到了公平对待。《一九八四》一书作者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55为它写了一篇代表英国读者典型态度的书评。他坦率地承认独裁主义蔓延是个大问题。“哈耶克教授论文提出的消极看法，基本上说的是事实。”他说，“哈耶克教授——没有看到，或者不愿承认，回归‘自由’竞争对大多数群众意味着一种更糟糕的暴政，因为自由竞争比政府更不负责任。竞争的问题在于，总会有人赢，有人输。哈耶克教授否认自由资本主义必然导致垄断，但在实践中，它确实会带来垄断，由于绝大多数人宁可要国家的管理也不愿萧条和失业，那么，只要主流民意在这件事上有决定权，滑向集体主义就是不可避免的。”56

其他左翼人士，如强硬的公共知识分子芭芭拉·伍顿（Barbara Wootton），57认为哈耶克的分析很正确，但对书里的宣传调门有点迟疑。“我想指出其中的一些问题，”她写信给哈耶克，“但你现在说得这么夸张，我只好掉过头来反对你了。”58不过，她对他的观点十分重视，出版了一本《计划下的自由》（Freedom under Planning），59对哈耶克做了尖锐的回应。

1945年6月，《通往奴役之路》在英国引出了一段出人意料的刺激小插曲。当时，保守党开始了竞选活动，温斯顿·丘吉尔在电台广播开幕式里对这本书主题做了归纳和简化。60丘吉尔认为，在克莱门特·艾德礼（Clement Attlee）61的领导下，工党将危害好不容易赢回来自由。艾德礼是丘吉尔战时联合政府的副手。“工党将堕落成某种形式的盖世太保，”丘吉尔宣称，“它将把所有的权力收归至高无上的党和党的领导人，像高高的方尖碑一样凌驾于庞大的官僚公务员队伍之上，不再是公仆，不再是公民。”62首相的不祥预感，战争时期曾经那么自然顺耳，此刻却突然显得过分极端、杞人忧天，甚至有失民主风骨了。按丘吉尔的传记作者罗伊·詹金斯（Roy Jenkins）所言，63这次节目“成了丘吉尔历次著名无线广播致辞中最缺乏判断力的一回。”64

丘吉尔采用了哈耶克的批评，丝毫无助于提高哈耶克的声望。温和的艾德礼指出，首相受了“一位奥地利教授的二手学术观点”所蛊惑，“我昨晚听了首相的讲话……我立刻意识到他的目的。他希望选民意识到，英国伟大的战时领袖温斯顿·丘

吉尔，与保守党现任党魁丘吉尔先生之间有着多么大的差异。他担心那些接受了他战时领导的人，会因为感激而继续追随他。他是如此彻底地破灭了这些人的幻想，让我心存感激。”65让丘吉尔和艾德礼吃惊的是，工党居然大获全胜，因为选民们担心保守党执政后会回到战前的高失业境况。诚如工党政治家托尼·本恩（Tony Benn）所回忆的，“所有这些战士都说，‘再不要了。我们再不要回到失业状态，回到大萧条时代。’”66

哈耶克回忆，在美国，“连学术界都认为这本书是一个反动分子破坏崇高理性的恶意行为。”67哈佛主要的凯恩斯主义者阿尔文·汉森在《新一轮的反规划圣战》（The New Crusade against Planning）68中提出了和凯恩斯相同的问题，他指出，哈耶克说要区分好的干预和坏的干预，既然如此，哈耶克到底要在哪里划出界限呢。

芝加哥大学教授T.V.史密斯（T.V.Smith）69拉高了调门，指斥哈耶克的观点“歇斯底里”、“危言耸听”、“太过刺耳”。“没有哪个以民主为预设前提的国家有意识或者……无意识地滑入了奴役状态，”70他写道。史密斯说，这一点，“区分了是想要帮助规划，还是谴责所有的规划……作者并不反对规划。和我们所有人一样，他只是反对颠覆了自由的规划”。71“在一定程度上，准备接受电刑处死和接受照心电图是一样的。”72史密斯提出，难在如何区分两者。

史密斯看出了哈耶克推论中的另一点缺陷：如果民主选举的政府按照选民的意愿去规划，规划不可能不民主。“宪法最大的成功之处……是在一个半世纪当中，将人民对政府的一贯不信任，转化为接受政府、视之为友。”史密斯写道，“民主政府是人民自己成立的。”73

芝加哥大学的另一位教授赫尔曼·芬纳（Herman Finer）74写了《通往反动之路》（The Road to Reaction）作为回应。书中他指责哈耶克“谬误丛生”。他说：“哈耶克的知识体系不完善，阅读书目不完整……他对经济过程的认识偏执，他对历史的阐述谬误……他的政治学几近于无，他的术语充满误导，他对英美政治程序和思想的理解存在严重缺陷……他对普通人的态度是凶狠的专制主义。”75他形容《通往奴役之路》是“数十年来民主国家里出现的对民主制度最险恶的攻击”。76

很快，人们就发现，《通往奴役之路》尽管大受欢迎，却是一本不光区分了左翼与右翼更区分了右翼与极右的决定性著作。好斗的自由意志论者安·兰德（Ayn

Rand），77几乎没见过哈耶克本人，曾不屑地称他是个“妥协者”，78看到这本书却彻底动了怒。兰德在书页的空白处潦草地写下了好些骂人的话，说哈耶克是“该死的傻瓜”、“可怕的蠢货”、“混账”、“完全、彻底、恶毒的混蛋”。79

发现自己陷入美国的意识形态混乱斗争，哈耶克吃了一惊。他记得在美国，“人们对新政的热情依然高涨。这里的人分成了两群，一种人对这本书很热情却从没读过它，他们只是听说有一本书支持资本主义；另一种人是美国的知识分子，他们刚刚被集体主义的‘臭虫’咬过，认为这本书背叛了知识分子理应捍卫的崇高理想。所以，我在美国遭遇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声讨大潮，这种事我在英国的时候从没经历过。它太离谱了，竟然从专业上完全诋毁我。”80

1946年1月，哈耶克和凯恩斯在剑桥见了面。两人本来聊着伊丽莎白时代的书籍，哈耶克却掉转话头。在他看来，凯恩斯的追随者（他应该指的是琼·罗宾逊和理查德·卡恩）似乎是为了自己个人的目的而接受凯恩斯的观点。凯恩斯是否为此感到困扰呢？他能怎么做呢？“他对提及的人做了一番不大恭敬的评论，”哈耶克回忆说，“之后宽慰地对我解释说，他提出那些观点的时候，时代正迫切需要之。他暗示我不必惊慌；如果它们变得危险，他会迅速掉转公共舆论的；他还用手迅速地挥动了一下，示意到底会有多快。”81“凯恩斯对自己摆布公共舆论的力量极其自负，”哈耶克回忆道，“他相信自己可以把舆论当成工具般摆弄。出于这个原因，对自己的想法遭人误解，他完全不感到吃惊。‘哦，我随时可以纠正它啊。’这就是他的感觉。”823个月后，凯恩斯过世了。

1946年4月30日，复活节周日的上午，由于长期同时在多个领域操劳，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虚弱的身体支撑不住了。他在东苏塞克斯郡蒂尔顿农舍自家的床上因心脏病去世。83这病痛自他中年以来就一直折磨他。莉迪亚和他妈妈伴在他身边，他才不过62岁。他从前的对手，陪他去美国磋商英国战争债务的莱昂内尔·罗宾斯，写信给莉迪亚，说凯恩斯“把他的一生都献给了祖国，和倒在战场上同等壮烈”。84哈耶克也写信给莉迪亚，形容凯恩斯是“我所认识的真正伟人，令我无限仰慕。没有他，世界会是一个远为贫困的地方”。85

哈耶克对妻子说了一句未来他“痛感懊悔”的话。他说，凯恩斯过世后，自己现在“恐怕是在世经济学家里最有名的人了”。“10天后，恐怕就不是那么回事了。”他回忆说，“就在那一刻，凯恩斯成了伟人，而我，身为一个经济学家，却

逐渐遭到遗忘。” 86正如他40多年后所说：“20世纪40年代中期，我知道这听起来非常自大，我以为在世人的眼中，我是两大经济学巨头之一，一个是凯恩斯，另一个就是我。现在，凯恩斯去世了，成了圣人；而我，却因为写了《通往奴役之路》而名声扫地，它完全改变了形势。” 87

《通往奴役之路》在美国的大获成功，哈耶克本人并没有出太大的力。他并不情愿做公众人物，为书做巡演时，他觉得听众的喝彩有失体统。“人们请我为五所大学做五场系列讲座，”他回忆说，“我以为是非常稳重的学术讲座，精心撰写了讲稿……我人还在公海上，《读者文摘》就刊登了《通往奴役之路》的节选。于是，等我到了，人们告诉我……我要到全国各地去做公开的巡回讲演。我说，‘天哪，我从来没这样做过。我肯定做不了。我没有公开演讲的经验。’他们说，‘哦，来不及取消了。’” 1

哈耶克发现，听众太多叫他恐慌。“我宁肯想象听众是一小群像《纽约客》漫画家霍金森（Hokinson）2笔下的那种老妇人，”他回忆说，“我问，‘听众大概会有多少人呢？’他们说，‘大厅能容纳3000人，但这次讲座人数爆满。’老天呐，我完全不知道要说些什么。” 接下来的五个星期，他横穿了美国，对着专注的人群讲演。他瞬间变成了英雄。随着时间的推移，他逐渐享受起扮演先知和圣人的角色来，但演员生涯来得并不那么自然。“我在美国的经历非常糜烂，”他回忆说，“你成了演员，但我不知道自己身体里还藏着这么一号人。但因为有机会和观众们一起玩，我开始喜欢上了它。” 3

和凯恩斯主义思想的战斗，居然把哈耶克变成了公众人物，此事值得好好思考一番。凯恩斯知道怎样兜售自己的想法。他是写社论的大师，喜欢成为公众的焦点。要是哈耶克拥有凯恩斯那样的自信、商业常识和对表演的热爱，他大概可以说服更多的人相信管理经济不可取。哈耶克的确有自信，但他的口音，还有他内向的天性，不光跟他本人也跟他的思想对着干了起来。一位同事描述这一时期的哈耶克说：“很较真，相当严肃，有些胖，和蔼，迟钝，说话呆板，有时要想一想才知道下一句话该说什么。” 4他完全不具备媒体明星的素质。不管凯恩斯和哈耶克的论点孰优孰劣，占优势的始终是凯恩斯，哪怕是在他过世之后。

哈耶克受人钦佩，可除了十分熟悉他的人之外，没太多人喜欢他。人们认为他是一个逆流勇进、标新立异的人，但喜欢归属感的人并不亲近他。基于人类的乐观

天性，凯恩斯送上了一种对未来充满希望、人人都得到就业的观点。哈耶克却是个怀疑论兼悲观论者：力争让世界变得更美好的人有可能招来意想不到的后果。自由市场按基于自利的理性决策运作得最好，若是受了理想主义诱惑反倒要失败。因此，乐观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往往追随凯恩斯；悲观主义者则从哈耶克身上找到了指引，对现实世界保持清醒的失望态度。

美国巡回售书活动结束后，哈耶克闷声返回了英格兰。“只要凯恩斯还活着，他就极具争议性。可他去世之后，他成了圣人。部分出于凯恩斯乐于改变自己意见的原因，他的弟子们形成了一种正统见解，准你是正统，你就是正统；不准你是，你就不是。与此同时，我因为写了《通往奴役之路》，在大多数同行经济学家里名声扫地，他们很不喜欢它。所以，不光我的理论影响力降低了，伦敦经济学院的大部分科系也变得不怎么喜欢我。”5

哈耶克在1944年年初的一次讲座中透露，因为反对进步论的观点，他承受了旷日持久的伤害。“我有充分的理由希望自己能够相信，计划下的社会能实现倡导者的承诺。”他说，“如果我能说服自己相信它们正确，我眼前遮挡未来前景的所有乌云就会突然消失。”要是他能顺着势头倒下去，“我说不定能变成受人信赖的领导者，而不是讨厌的挡路人。”“不管你对古典经济学家有什么样的看法，你必须承认，他们从不害怕自己不受欢迎。”他说。

对《通往奴役之路》的敌意叫哈耶克吃了一惊。人们对其强烈表达的反感情绪也不曾很快消减。记者拉尔夫·哈里斯（Ralph Harris）6回忆说，“20世纪五六十年代，哈耶克有一段时期遭人讨厌和憎恶。连本身无意冒犯人的左翼知识分子都不想见他。我在牛津大学碰到好几回这样的事——哲学教授说，他不想见到‘那个人’……那是一种深深的恨意。”7

随着时间的推移，对哈耶克思想的憎恶，转移到了所有主张有别于凯恩斯主义的自由市场观的人身上。“这是一种类似宗教战争似的东西，批评、平等、公正等崇高理想，就是亵渎好东西。”哈里斯解释说，“在许多普通人眼里，社会主义必将到来，它是文明社会最终要实现的目标。”8反过来说，自由市场的理念也得到了准宗教的地位，一些追随者似乎只是投身于秘密教派之下，而不是追求真理。

因为在居住国遭人嫌弃，哈耶克打算移居美国，可惜他又不愿意再一次忍受搬到新土地所带来的文化改变。他的导师路德维希·冯·米塞斯曾为躲避纳粹前往纽约，

好不容易才在美国学术界找到工作。这样的经历暗示，哈耶克也不会太受欢迎。此外，哈耶克享受生活在英国人当中。他回忆说，20世纪20年代第一次到美国时，“我始终太像个欧洲人，丝毫找不到归属感。但刚到英格兰的那一刻，我便属于它了。”9不过，他生活里发生了两件大事，改变了他的想法。

但他首先想解决自己在美国各地巡回售书时碰到的一个现象，那就是跟他一样、不管凯恩斯主义多么普遍也仍然信奉正统经济学的人身上表现出的彻底孤绝感。“无论到哪里，总有人跑来告诉我，他完全同意我的看法，但与此同时，他觉得完全孤立在自己的观点中，没人能和他一起谈论这个话题。”他说，“这让我产生了把这些人聚到一起的想法，把这些生活在茫茫孤独中的每一个人，聚到同一个地方。”10

哈耶克希望带头高举反凯恩斯主义的大旗。和他合作的人，全都是“经济自由主义者”，但绝不全是奥地利学派的信徒。“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和市场应该免受干预。不要把这些人和美国的“自由主义者”搞混淆了。后者鼓吹个人自由，认为人在私生活里喜欢怎么做就怎么做，不受社会习俗的限制，但他们在经济观上并不是“自由主义”。“自由”（liberal）这个词的矛盾用法，给人们带来了各种困惑。

1938年4月，哈耶克朝着反凯恩斯革命的道路上迈出了第一步。为推动新书《美好社会》（The Good Society）的销售，美国著名记者兼评论员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在巴黎办了一场研讨会。哈耶克、米塞斯、罗宾斯以及反马克思主义的法国社会学家雷蒙德·阿伦（Raymond Aron），11曼彻斯特大学经济学家迈克尔·波拉尼（Michael Polanyi），12弗赖堡自由市场思想家卢朴克（Freiburg Wilhelm Ropke）13等20余人受邀参与讨论“自由主义的危机”。他们的论点勉强为进一步讨论奠定了基础，但“二战”开始后，哈耶克的脑海里形成了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刚一打完仗，哈耶克就着手联系“沃尔特·李普曼研讨会”的参与者，以及其他志同道合的思想家。

哈耶克提议在1947年4月于风光秀美的杜帕克酒店（Hôtel du Parc）14开一场为期10天的“峰会”。酒店坐落在瑞士沃韦附近的佩尔兰山顶，俯瞰日内瓦湖。瑞士信贷银行（Schweirzerische Kreditanstalt）的一位高层管理者承担了18000瑞士法郎主办费用的93%。领导瑞士手表制造商的一位苏黎世商人阿尔伯特·胡

诺尔德（Albert Hunold），15本来有一笔经费要创办文科学报，后也挪作此用。此外，纽约支持自由市场的艾维顿·哈得逊出版社经济教育基金会（Foundation for Economic Education），还有来自密苏里堪萨斯城的自由意志论者威廉·沃尔克慈善基金会（William Volcker Charities Fund）负担了美国人来瑞士的路费。16

哈耶克邀请了约60人，承诺报销所有费用，来自10个国家的37人接受了邀请，其中一半来自美国。随后历代的自由意志论者们，对参加第一届佩尔兰山会议的参与者推崇备至，那态度不亚于新英格兰的富家子弟们对搭乘“五月花号”前往美洲的前辈们。在法语里，“佩尔兰”（pelerin）是“朝圣”的意思（故此佩尔兰山学会也称朝圣山学会）。搭着缆车前往杜帕克酒店（平时住在这里的人大多是登山客，不是知识分子）的“朝圣者”们，是一群南辕北辙、从本质上就不相同的人，只因为他们都有一种宗教般的疏离感，如同圣人受了迫害那般，才走到一起来。正如历史学家乔治H.纳什（George H.Nash）17所说：“高高站在瑞士阿尔卑斯山的参与者们太清楚不过了，他们寡不敌众，对西方世界的政策制定者们并无明显影响力。”18

到场的人分别是：米塞斯、罗宾斯、弗兰克·奈特（Frank Knight）；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乔治·施蒂格勒（George Stigler）；191933年逃往美国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弗里茨·马克卢普（Fritz Machlup）；英国反计划经济学家约翰·朱克斯（John Jewkes）；20伦敦经济学院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21在《纽约时报》上为《通往奴役之路》写了赞美书评，确保该书在美国大获成功的亨利·黑兹利特（Henry Hazlitt）；日内瓦高等学院（Ecole Des Hautes Etudes）的校长威廉·拉帕德（William Rappard）；以及日内瓦的卢朴克，主持了德国货币改革；牛津大学毕业的英国内战史学家，为英国文学杂志《时与潮》（Time and Tide）撰过稿的韦罗尼卡·韦奇伍德（Veronica Wedgwood）。22施蒂格勒开玩笑（当然是半开玩笑）说，这份名单简直就相当于“哈耶克的朋友们”。

在所有这些出席了第一次会议的人当中，对实际推广哈耶克思想最得力的人或许要算是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他当年35岁，是芝加哥的一位经济学家，这是他第一次到美国之外的地方旅行。弗里德曼曾短暂地在《通往奴役之路》巡回宣传活动中见过哈耶克。他听从妻子的哥哥阿伦·迪雷克托（Aaron

Director，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教员）23的建议，接受了邀请。迪雷克托在伦敦经济学院见过哈耶克，并为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通往奴役之路》一事出过力。芝加哥三人组——迪雷克托、施蒂格勒和弗里德曼戏称此行是“为了拯救自由主义……到瑞士公费旅游”，24除了打打扑克之外，并未心存太大指望。施蒂格勒让弗里德曼“训练阿伦打桥牌，之后我们再找到第四个自由主义者，教他打”。25正如弗里德曼的回忆，“在这儿，我是个年轻天真的外省美国人，遇见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和我们一样，他们愿为相同的自由主义原则献身；所有人都在自己的国家陷入了困境，其中不乏已在国际上享有盛名的人，还有些人注定将来会享誉全球；和他们结下友谊，参与创办一个维护和强化自由主义思想的协会，大大丰富了我们的人生。”26

哈耶克的开幕致辞反映了他所走过的漫长道路，以及他眼前将要走下去的更为漫长的道路。之后，他邀请人们讨论“‘自由企业’和真正的竞争秩序之间的联系”“逼迫绝大多数国家采用集体主义式发展的主要工具[是]……通胀高压经济”问题、历史教学、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和基督教之间的关系、德国的未来、欧洲联邦的前景以及法治。

“这个地方美妙得不可思议，”弗里德曼在寄给妻子露丝的明信片上写道，“我们每天开三场会……很累，但也十分刺激。”27讨论十分激烈，活泼得过分。“我们的会议总以激烈的争论为标志。”28弗里德曼回忆说。不可避免地，会上也有激烈的争吵和分歧。米塞斯、罗宾斯、弗里德曼、施蒂格勒和奈特因为收入再分配问题吵了起来。29弗里德曼解释说：“米塞斯是个有着强烈见解的人，所有的意见分歧他都受不了。”30为了让场面冷却下来，主办者安排了到周围山坡上散步的环节。第一次会议的激战氛围为随后的会议定下了基调，人们会为了外人眼里难以分辨的差别反复争吵，甚至退出。萨缪尔森带着冷幽默说：“佩尔兰山上请辞的人数，远不及新加入成员的人数。”31

经过一个多星期的辩论，罗宾斯执笔写下了朝圣山学会的使命宣言。宣言称，“文明的核心价值观危在旦夕”“一种否定一切绝对道德标准的历史观在发展，各种怀疑法治可取性的理论层出不穷”造成了对自由的威胁。“未来，对私人财产和竞争市场信仰的衰落，还将进一步助长（对自由的威胁）。”他总结说，“本团体无意大肆宣传。它不希望给既定体制造成妨害，阻碍正统观念。它不偏向于任何政党。它的目的单纯……是为保护、改善自由社会贡献一份力量。”32

哈耶克相信，这次会议将成为“欧洲自由运动重生”的标志。33弗里德曼认为，它是“抵消通往奴役之路的一次尝试，转而拉开一场通往自由之路的运动”。34安排第二次会议花了一年多时间（在瑞士的塞利斯贝格），但那以后，该会社年年碰头。

凯恩斯主义者们逐渐注意到了佩尔兰山会议，并将参与者们嘲笑为“化石般”的老古董。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的贬斥最为典型：“自由市场经济学家的少数余党聚在阿尔卑斯山巅，结成了会社，可很快就因为一个小问题而分崩离析了，英国海军应该是政府所有呢，还是从私营部门租用呢？”35

在新使命的鼓舞下，哈耶克回到英国揽下一件更痛苦的差事。1926年，他在维也纳和海伦·伯塔·玛利亚·冯·弗兰奇（Helen Berta Maria von Fritsch，人称“海拉”）结婚。接下来的20年，在罗宾斯等朋友看来，两人的婚姻似乎很幸福，还生了两个孩子。但是哈耶克娶海拉是为了疗伤。他年轻时原本最初爱的是表妹海伦，但1923年他旅居纽约，两人分隔两地，“因为一些误解”，36海伦厌倦了等待，嫁与他人。

不久后，哈耶克跟海拉结了婚，他解释说，这是因为海拉跟海伦长得有点像。海拉成了“很好的妻子”。37他回忆说。战争结束后的1946年，哈耶克独自回到维也纳，探访亲戚们在纳粹治下过得如何。此时，他遇到了海伦，海伦说自己已是自由之身，可以嫁给他了。虽然妻子海拉为他奉献了青春，家里还有17岁的女儿克里斯汀和12岁的儿子劳伦斯，离婚还违背天主教信仰，可哈耶克还是决定跟海拉分手，迎娶海伦。海拉既伤且怒，拒绝跟哈耶克离异，两人的离婚谈判甚是火爆。

1949年，哈耶克和海拉及孩子们在汉普斯敦温暖舒适的家里共度了圣诞节。两天后，他离开他们，到纽约出席美国经济协会大会（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Convention）。哈耶克的财务状况主要靠的是他的脑子，而不是经济学。为了避免争议离婚要花的开销，他在酒店房间的门上给阿肯色大学经济和商业系主管哈罗德·杜兰留了个便签，希望能得到一个教职。哈耶克打算在阿肯色州定居，该州有着宽松的离婚法，跟海拉打离婚官司会比较便宜。杜兰伸出了援手，阿肯色州高级法院的大法官也挺仗义。1950年7月，哈耶克离婚成了定局。“最终，我强制执行了法院的判决，”哈耶克回忆说。“我敢肯定这是错的，但我还是做了。”他说，“我只是出自内心地必须要这么做。”38

离婚让哈耶克伦敦经济学院的同事们大感愤慨，气得最厉害的莫过于罗宾斯，1950年，哈耶克辞去英国的教职时，罗宾斯完全傻了眼。罗宾斯写道，他认为哈耶克“此番行事……跟我在过去20年的友谊中对他性格和为人标准的认识，实在不可能调和。就我个人而言，我认识的这个人已经死了”。之后10年，罗宾斯对哈耶克厌恶之极，为海拉的遭遇表示抗议，他干脆辞去了朝圣山学社的职位，再也没跟哈耶克接触过。直到海拉去世两人才和解，1961年，罗宾斯出席了自己的教子（哈耶克的儿子）劳伦斯的婚礼。

哈耶克需要遁走他乡。从他个人情感大戏的角度来看，他迁往纽约，主要考虑的是财务状况，并非想要利用自己刚建立起来的自由斗士的名声。他需要赚到比伦敦经济学院更高的薪水，赡养海拉和孩子，同时维持自己和海伦的生活。最终，他在芝加哥大学找到了一个职位，尽管整个过程相当艰辛。

能跻身芝加哥大学经济学院，哈耶克肯定再高兴不过了。但他在底特律经济俱乐部发表讲演后，支持自由主义的威廉·沃尔克慈善基金会总裁哈罗德W.鲁瑙（Harold W.Luhnow）找到哈耶克，邀请他专门根据美国的情况改写《通往奴役之路》。鲁瑙愿意答应哈耶克的要价：连续3年，每年付1万美元。“我对他并不怎么上心。”39哈耶克回忆说，较之成为保守派智囊团的御用文人，他宁可在一家声誉卓著的大学做个独立学者。

哈耶克试着在普林斯顿大学高级研究所谋个教职，后者不乐意哈耶克出于私人理由索要高工资。接着，哈耶克接触了芝加哥大学，想在经济学院找个职位，满心以为弗兰克·奈特和雅各布·瓦伊纳（Jacob Viner）40等学者会欢迎他。大学校长罗伯特·梅纳德·哈钦斯（Robert Maynard Hutchin）热情地接受了哈耶克的要求。哈钦斯是个教育改革家，努力想让芝加哥大学成为一个更严肃的教育机构，废除了联谊会和橄榄球项目。这些改革举措让他挺不受教员的待见，至少，经济学院思想保守的教授们不喜欢他。故此，从一开始，哈钦斯让哈耶克到学校来的建议就遭到教员们的抵抗，尽管对哈钦斯的反感并非哈耶克受拒的唯一理由。

“他不是他们想要的那种人，”弗里德曼解释说，“他们不同意他的经济学主张……如果他们放眼全世界寻找一个经济学家加入他们的教师队伍，他们肯定不会选择《价格与生产》的作者。”41当时的学术界认为哈耶克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深奥又过时。哈耶克的思想和芝加哥学派的概念存在明显的差异。弗里德曼支持哈耶克

对经济和政治的自由主义主张，而忽视了奥地利人“生产阶段”的概念，并且赞成政府控制货币供应。而政府控制货币供应的过程，在奥地利人眼里令人厌恶。此外，哈耶克相信，自由市场有着无与伦比的美德，弗兰克·奈特等芝加哥学者则认为，市场也可以和政府干预一样效率低下。不过，奥地利人和芝加哥学派都相信价格是理解经济的关键，自由市场比政府干预更可取，这就意味着，两者虽有针锋相对的主张，但基本上是同路人。

弗里德曼在经济学上的突破（认为对货币供应给予不必要的限制和随后的经济紧缩有联系），表明芝加哥经济学家之间的分歧有多么大。哈耶克和米塞斯认为经济活动太复杂，无法量化，用平均值来界定个人如何确定价格是误导，弗里德曼的研究则理所当然地接受了凯恩斯将经济视为整体的概念，并用平均值来判断经济变化的因和果。对哈耶克的奥地利学派概念，弗里德曼素来谨慎待之，不做过分严厉的批评，但他对其优点是始终有所保留的。

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所做的末日预言，同样表现出他缺乏芝加哥学派所期待的学术严谨性。据芝加哥社会思想委员会（Chicago's Committee on Social Thought）主席约翰·奈夫（John Nef）所说，一些芝加哥经济学家认为，《通往奴役之路》“太畅销了，受人尊敬的学者不应该犯这种罪。芝加哥愿意要他没问题，但别把他跟经济学家扯上联系”。421950年秋，在奈夫的建议下，哈耶克成了社会思想委员会旗下社会与道德学的教授。这个职位也接受了沃尔克基金会的部分赞助。尽管心有不甘，哈耶克还是接受了这份工作。

哈耶克想写一本像《通往奴役之路》那样受人欢迎的作品，启动他反凯恩斯革命的事业。一如他的传记作者艾伦·爱本斯坦（Alan Ebenstein）所解释：“他希望《自由秩序原理》（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能成为20世纪的《国富论》。”43接下来的9年里，他断断续续地着手写一本解释“为什么法治是捍卫个人自由免受政府侵犯最佳途径”的著作。他简介了自由概念的由来，详细阐述了200年前“自由主义之父”、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John Locke）第一次表达的法治概念。洛克的作品曾给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的开国元勋们带去了无限的鼓舞。洛克主张人人平等，否认君权神授的逻辑。他定义了社会中人们和平相处的“社会契约”，并认为，这种契约是顺从法律和政府的先决条件。洛克最触动哈耶克的想法在于他断言，只有当法律之下人人平等，才能说这是一个真正自由的社会。

哈耶克接受了洛克的法治思想并做了进一步的演化。他声称，唯有法治的存在，才能确保自由市场对所有人公平运作，如果法治缺席，暴政就会上台。为了改进《通往奴役之路》故作惊人之语的缺点，在《自由秩序原理》中，哈耶克故意放低了调门。“我本着尽量清醒的精神来引导讨论。”44他写道。

《自由秩序原理》的第一条总体结论是，个人要免于他人的胁迫，国家必须强迫一些人不去胁迫他人。第二条是，民主和资本主义，以及其私有产权的观念、自由市场下执行契约的观念，都需要法治。“西方社会走向繁荣，贡献最大的因素恐怕就是法治的相对确定性了。”45哈耶克断言。有了法治，公民能对未来做出确定的决定，提供了社会实现富裕的有序条件。哈耶克认为要限制法律对私人生活的干涉，允许个人享有他所谓的“某种确获保障的私域”。46这无异于洛克的现代翻版。

接着，哈耶克闯进了与“美国梦”关键元素相关的危险领域，即人生而平等，为保证公平地对待所有国民，政府需要奉行能让国民在尊严上平等的政策。哈耶克剖析“平等”这个词，顺便驳斥了洛克的论点，即通过经验而非天赋来获得智慧。“贬低先天差异的重要性，在当代一直很流行。”他写道，“可我们绝不能忽视一点事实，人确实是生来就非常不同的。从陈述事实的角度来说，‘人人生而平等’并不是真的。”47无怪乎哈耶克在书的前言就警告说：“我不敢说我是以美国人的身份来写它的。”48

尽管哈耶克承认，所有人都应当视为具有同等的价值，在法律下享受平等的待遇，但他认为，政府想叫人人平等，或是为所有人提供相同资源叫他们平等，这太荒谬了。人和人之间有着巨大的差异，而在他看来，这种差异，是维护进步与繁荣的基本要素。“我们所期待的经济快速进步，在很大程度上似乎正是不平等的结果，没有不平等，经济快速进步是不可能实现的。”49

他认为，一些国家的文明进步领先别国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今天有一些国家能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达到西方世界用了数百年才实现的水平或物质享受，岂不能明显看出——正是因为西方并未强迫世界其余地区分享其物质成就，它们的道路才变得更加容易了吗？”50

争议性观点接连不断地冒出来。读过《通往奴役之路》的保守派或许可以得出结论，哈耶克是自己这边的人，这本书为自由市场做了担保，保守派普遍视之为宣

言。然而，在《自由秩序原理》中，哈耶克却用一篇后记叫他们醍醐灌顶。后记题为：“为什么我不是保守派。”51哈耶克宣称，他是“自由主义者”。“保守态度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害怕变化，对新生事物有着怯懦的不信任。”他写道，“而自由主义立场则以勇气和信心为基础，愿意让改变自然发生，哪怕我们无法预测它通往何方。”52他接着说，“保守派立场建立在如下信念上，在任何社会中，总有公认的卓越人物，其天生的标准、价值观和立场应当受到保护，他对公共事务有着比其他人更大的影响力。诚然，自由主义者并不否认确然存在这样的人物——他并不是平等主义者，但他不认为什么人有权威来判断卓越者。”53

哈耶克断言，保守派和社会主义者一样，都持有不民主的可恨观点。“只要他认为用在了正确目的上，保守派并不反对高压政治或专制权力。他认为，如果政府在一个正派人的手里，它不应该通过严格的规定施加太多限制……他认为自己有权将自己的价值观强加给别人，”54他写道，“我反对的不是民主，而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我不明白，为什么这些人就是不懂要限制多数统治（majority rule），以及其他任何政府形式的控制范围。”55

他认为，民族主义是保守派的死穴。“民族主义的偏见往往会在保守主义到集体主义之间架起一座桥来，一旦从‘我们’的产业或资源的角度思考，下一步就是要求以国家利益指导这些国家资产了。”56他断言，“这种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是完全不同的……它是对爱国主义的背离，但又与对国家传统的深深依恋完全兼容。”57哈耶克写这本书时，美国正笼罩在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及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Joseph McCarthy）发起的反共阴影下。面对这种凶险的发展趋势，哈耶克毫不客气：“说一个理念非美国，或者非德国，这并非真正的论点，由我们的同胞所构思的错误或邪恶理想，也并不比其他错误或邪恶的理想更好。”58

1959年5月8日，哈耶克在自己60岁生日时完成了《自由秩序原理》，1960年2月该书付梓。他把签了名的抄本寄给了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沃尔特·李普曼、约翰·达文波特（John Davenport）、亨利·黑兹利特以及《时代》杂志的发行商亨利·卢斯（Henry Luce），还有《读者文摘》的一位高级编辑，希望该杂志像对《通往奴役之路》那样，出一个删减版。这不仅是为了他振兴自由主义的计划，也是因为哈耶克需要收入。要养活两任妻子和两个孩子，没有薪俸的退休迫在眉睫，他衷心希望这本书能畅销一时。

可惜天公不作美。虽然它收到了往日怀疑者的鼓励之语，却未能在公众当中掀起波澜。较之《通往奴役之路》，它冗长而沉重。诚如罗宾斯所说：“真不能说它容易读；论点尽管清晰也条例分明，却需要读者时不时停下来反思。”59虽说是一本旨在鼓励知识分子重新思考自由基本概念的作品，可连知名的学术期刊对它也不怎么关注，很少有人为它写书评，写了书评的人却发现它缺陷甚多——哪怕这些人有可能赞同书里的结论。

普林斯顿大学的雅各布·瓦伊纳的态度最为典型，他和弗兰克·奈特从20世纪30年代起就引导芝加哥学派朝着支持市场的方向前进。瓦伊纳抱怨哈耶克过分简单化、自相矛盾、学术方法糟糕，“哈耶克的论据明显缺少‘如果’和‘但是’，也少见权衡利弊的痛苦角力。”60他重复了乔治·奥威尔对《通往奴役之路》的批评，即哈耶克主要反对的是公共领域的高压政治，但同样的论点用在私人企业上也成立。瓦伊纳嘲笑哈耶克抗议工会垄断劳动力供给，却放过了私人企业卡特尔。61他奚落哈耶克叫所有人支付相同税金的“单一税”：“即便按最极端的表现，累进税制（对富人的征税比例高于穷人）也从来不曾让纳完税的富人过得比穷人还艰难。”62

瓦伊纳拒绝接受哈耶克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最适应社会需求的人会过上好日子），他说，这跟哈耶克对“历史主义”（说历史是由不变的法律所决定，而不是由人的努力所决定）的驳斥相互矛盾。63瓦伊纳说，哈耶克倡导有限度的福利国家，实现全民医保，国家提供基本的住房，这跟他反对国家“高压政治”的核心主张完全是对立的。这些前后不一之处会“破坏哈耶克对自由放任的任何陈述”，足以“叫不少和他有关系的‘自由意志论者’心烦意乱”。64最后，瓦伊纳斥责哈耶克将经济发展和收入最大化置于所有其他价值观（如宗教或民主）之上。65

罗宾斯在《经济学》（Economica）上的书评凸显了两人之间的隔阂。罗宾斯认为，哈耶克对自由的定义以是否存在“高压政治”为基础，这是错的。罗宾斯说，诚然，诸如民主和投票权，“尤其是考虑到了女性和有色人种”等重要的正面行为，是真正民主的标志。“但不容否认，（民主）天然地要以自己的自由摧毁其他的自由；出于这一理由……我们或许会同意……哈耶克教授的这一观点，民粹主义的政府有很大的危险性。不过，这无非是生活的诸多悖论之一罢了。”66

说到哈耶克对国家干预的反对，罗宾斯发现他从前的这位朋友采用的方法极不

合理。“在我看来，对所有混合经济的稳定性都持绝对怀疑态度，这在逻辑或者历史上都没有任何基础。”67他断言。和凯恩斯一样，罗宾斯认为，国家对公众福祉出手干预，无非是因为社会此时正迫切需要它。在一个温和的种群中，国家援助恐怕是有益的。“当我观察如今英国的社会条件，公民和孩子们都吃得饱，身体健康，基本上体面而富有人情味，再跟我年轻的时候，也就是40年前的情况对比，我真的觉得，社会有了最可靠的实质性改善，”68罗宾斯写道，“哈耶克有点太偏执……地假设，偏离他的规范，就会渐渐导致灭顶之灾……为什么他会认为，这些（进步）都有可能令社会解体、走向集中营呢？”

《自由秩序原理》这些令人失望的书评，还有它可怜的销量，引发了朝圣山学会的一场危机。多年来，协会的成员和出席率不断萎缩，它因为派系之争、个人恩怨而四分五裂，内讧的细节小得令人尴尬，实在无法公之于众。在很大程度上，哈耶克把协会当成自己的孩子，内讧给他造成了极大的困扰，1960年的聚会上他辞去了主席之职，并拒绝参加1961年的聚会。

还有另一件恼人的事情。1960年，哈耶克跟临床抑郁症缠斗了第一个回合。次年，他经历了一次轻微的心脏病发作，却没有得到正确的诊断，他进一步堕入了阴郁。1962年，他仍为老年财务安排不足而感到焦虑，担心可能会让海伦过拮据日子，于是，他接受了德国弗赖堡大学一个有退休金的职位，弗赖堡距奥地利边境约100英里。从某些方面而言，此举代表了回归故土；从另一些方面而言，它标志着后撤，退隐家园。过了20多年姓氏里不带贵族前缀“冯”的生活，回到弗赖堡之后，他又开始叫自己“冯·哈耶克”了。虽然1964年，哈耶克成了朝圣山学社的名誉主席，该组织的动荡仍让他深感失败。他感到孤立，受人忽视（后者更糟糕）。1978年，他回忆说：“（大学的）大部分院系不喜欢我，那种厌恶我到了今天都能感觉到。经济学家们则基本上拿我当外行。”69

还有一件事似乎对哈耶克的信心造成了最后一击：他昔日最紧密的朋友、最热情的支持者——莱昂内尔·罗宾斯，也修正了对自由市场理念的信仰，改投凯恩斯主义门下了。对罗宾斯来说，转折点在于哈耶克和米塞斯责怪美国的大萧条是因为商人以太低的利率借了太多的钱，又把钱投入到亏损的业务上。罗宾斯以英国式的低调手法形容该解释是“误导”，他说哈耶克对大萧条的补救方法（暂停错误的投资，提高利率鼓励更多储蓄，阻止消费者支出，让市场自己找到平衡点）是不合适的，这就像是“拒不给掉进冰窟的醉汉盖上毯子、注射兴奋剂，因为他最初的麻烦

是热得过了头”。70

罗宾斯最初曾完全接受哈耶克的诊断，还写了名为《大萧条》（The Great Depression）的书，支持哈耶克的主张，认为只有对破产的经济及其受害者坚持铁腕政策，才是清除资本失衡、回复经济健康的唯一办法。但后来，他却说，“我宁肯忘了”这本书，“它是我职业生涯里最大的失误”。他不仅为自己坚持哈耶克的信仰感到懊悔，也为自己这么迟才投入凯恩斯主义感到遗憾。一如他所说：“我会一直感到深深的遗憾，尽管我的所作所为是出于真诚的信仰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但我当时确实激烈地反对那些有可能减缓经济灾难的政策。”71

1969年，哈耶克出于经济原因搬回了奥地利。一家经济系很小的小规模学院，萨尔茨堡大学（University of Salzburg）以体面的数目买下了他的藏书阁，搬到那儿去，哈耶克能够继续参考他的书，继续写作。同年，他经历了第二次心脏病发作，但又一次没得到正确的诊断。其后5年，他长时间处于健康状况不佳的状态，他不但疼痛，还犯了急性抑郁症，完全无法工作。衰弱状态持续到了70年代末，他只得仰仗抗抑郁药物。

据拉尔夫·哈里斯说：“哈耶克回到故乡奥地利时，非常沮丧。混合经济的成功让他的自由市场理论，还有他本人，都显得脱离时代了。”72他的儿子劳伦斯说：“他的想法不时髦了。似乎没有人再听他的话，没有人再赞同他的观点。他孤立了。”73哈耶克落入人生的最低潮。哈耶克回忆道。“我的印象是，‘我完了。’”74

1946年凯恩斯过世后，立刻被当成英雄般供奉起来。他的骨灰撒在靠近家乡的萨塞克斯道文。1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为他举行追悼会，首相克莱门特·艾德礼主持了仪式，参加追悼会的人包括莉迪亚、凯恩斯年迈的双亲、内阁大部分成员、美国大使约翰·怀南特（John Winant），还有布鲁姆斯伯里小圈子的许多人——邓肯·格兰特、瓦妮莎·贝尔、克莱夫·贝尔和伦纳德·伍尔夫。美国在华盛顿特区的国家大教堂为他举行了盛大的送别仪式。

凯恩斯过世，并没有减缓以他名字为号的这场经济革命向前推进的步伐。他最初研究商业周期的动机是减少大萧条时期的大规模失业，《通论》为政府提供了避免失业的一种途径。然而，没有了凯恩斯之后，革命的领导大旗就落到了凯恩斯主义者们手中。他的智慧再也无法调和他们。凯恩斯的主张和凯恩斯主义者打着他名

号的所作所为渐行渐远。哈耶克等人认为，凯恩斯发动了整整一代鲁莽的经济学家。正如伦敦经济学院一位年轻的经济学家艾伦·皮科克（Alan Peacock）所说，2凯恩斯相当于“凯恩斯革命里的克伦斯基（Kerensky）”3——一位温和的领导人，被更加激进的革命者推到了一边。

在英国，艾德礼推动了凯恩斯主义的改革。“二战”期间，温斯顿·丘吉尔主持战争，副首相艾德礼则基本上可以不受妨碍地管理国内政策。按丘吉尔的传记作家马丁·吉尔伯特（Martin Gilbert）的说法，战时联合政府1942年的“预算讲演是彻底凯恩斯主义的……利用国家收入和支出估计来制定预算，在国家政策应用经济学的历史中，是一件大事”。4关键举措是让纳税人出资建设福利国家，以充分就业为国家目标。这两项举措都出自威廉·贝弗里奇（William Beveridge）的手笔，贝弗里奇是哈耶克在伦敦经济学院的前东家，认为“国家要履行的最终责任……是建立需求，让所有劳动力都就业。”5

自己从前的恩人又倡导起了凯恩斯主义，哈耶克把这一切都看在了眼里。他对贝弗里奇的评价从来不高。“我还从不认识哪位公认经济学家却对经济学了解如此之少呢。”哈耶克回忆说。6贝弗里奇的问题出在他缺乏持之以恒的原则。“他是那种大律师型的人，简单地说，他随时都拿得出冠冕堂皇的说辞，但5分钟以后就忘得一干二净了。”7哈耶克说。

哈耶克感到更为痛心的是，贝弗里奇的抄写员，执笔了《贝弗里奇报告》（Beveridge Report，预示了国有化社会保障和《国民卫生服务》）和以充分就业为国家政策两份文书的人，是他当年的得意门生尼古拉斯·卡尔多。哈耶克带着点恼怒地承认：“卡尔多，通过《贝弗里奇报告》，在宣传凯恩斯主义思想方面做了比其他任何人都要大的贡献。”8

以充分就业为政府首要责任的概念，并不仅限于英国。出席了凯恩斯伦敦悼念仪式的澳大利亚工党总理约翰·科廷（John Curtin），于1945年推出了《澳大利亚充分就业》（Full Employment in Australia）政府工作报告，授权政府为每一个具备劳动能力的人找到工作。同年，《联合国宪章》的起草者们撰写了一份请愿书，认为各国政府应当力争实现“更高标准的生活，充分就业，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91948年，联合国采取了进一步行动，宣布“人人都有权获得工作，自由选择职业，享受公正与适宜的劳动条件，获得失业保障”。10

饱受战争蹂躏的欧洲成了凯恩斯主义的实验室。因为有苏联的先例（远远落在西欧的后面），美国认为，必须牢牢记住凯恩斯在《和平的经济后果》中所提出的教训：应当首先限制极权主义发展的先决条件。美国纳税人非但不曾以贫困来惩罚战败国，反而通过“马歇尔计划”来帮它们实现繁荣。美国人不假思索地把德国、日本、意大利带回了自由市场。1946年，凯恩斯主义最积极的传道士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担任了国务院顾问，为被占国的经济政策提供建议。

在美国，凯恩斯主义也迈上了征途。1943年，新政时代的国家资源规划委员推出一项《权利新法案》（New Bill of Rights），“依靠一切适当措施促进和保持国家生产和消费的高水平”。111944年，罗斯福在国情咨文中公布了“第二权利法案”（Second Bill of Rights），“保护国民免于年迈、疾病、意外和失业的经济忧患”。121945年1月，蒙大拿州民主党参议员詹姆斯·默里（James Murray）13推出了《充分就业法》（Full Employment Bill），由“美国的凯恩斯”阿尔文·汉森帮忙起草，并以新政经济学家利昂H.凯泽林（Leon H.Keyserling）在1944年所写“美国的经济目标”（The American Economic Goal）一文中提出的观点为基础。15

该法案简直就是凯恩斯经济学入门课。它宣布，“自行其是的私有企业，不可能提供充分就业，也不可能消除周期性的大规模失业和经济不景气”16“所有具备劳动能力、拥有劳动愿望的美国人都有权获得一份有益、有报酬的正规全职工作。”它认为，联邦政府应当“提供所需的联邦投资和支出……以确保持续的充分就业。”17来自密苏里州的参议员哈里S.杜鲁门（Harry S.Truman），18矮个子，低调、自信，还会演奏钢琴，1945年4月12日接任了罗斯福的总统职位。国会不信任他会一板一眼地服从指示，于是吩咐行政分支提交年度预算，预测实现充分就业需要多少产出，并估计不靠联邦刺激，全国经济的产出是多少。接下来，杜鲁门总统无奈提交了“补偿性融资”的立法，通过赤字刺激经济，并在劳动力短缺时，减少支出切断多余需求。监管美国经济的任务，落在了新创办的“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上，以配合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Joint Economic Committee of Congress）。和联合国一样，这项法案把充分就业视为基本人权。19

凯恩斯主义者们欢欣鼓舞。“1000万人失业的10年岁月给人留下的痛苦记忆，尚未完全消除，”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家西摩E.哈里斯（Seymour E.Harris）写

道：“每年750亿美元的联邦政府战争开支业已减少，其影响会涉及我们所有人。”他预测，接下来的10年，会有多达620万就业岗位流失。“哪怕有沉重的税收负担，无指导的经济有可能让消费再多50%，投资达到30年代的5倍吗？”20他问。

不是没人批评凯恩斯主义者。哈耶克在哈佛的朋友，戈特弗里德·哈伯勒（Gottfried Haberler），就指出了条例草案中的一点重大缺陷。“危险在于……主动支出方面的政策会被夸大，”他写道，“如果失业的人集中在某些‘萧条’地区和行业，而其他地方则是充分就业，总支出的增加则会带动充分就业地区的价格上涨，而对不景气的产业却不会有太大影响。如此就会出现通货膨胀与不景气及失业并存的矛盾现象。”21整整30年之后，哈伯勒的正确预见才得到证实。

要狙击一项受民众欢迎的立法，反对者们面临着极大的挑战。他们采用了跟哈耶克反对凯恩斯补救措施时极为相似的论点。商业周期和衰退都是自然现象，反映了正当的商业活动，不应该立法反对。充分就业是一种幻想，因为随着工人在雇主之间的流动，失业（即未就业状态）是有必要的。干预就业市场会导致堕落的混乱。反对者进一步指出，没有准确的经济尺度可以正确地预测未来的就业水平，适当地刺激经济。他们还反对将工作视为人的权利：这会叫美国人产生错觉，想要从政府那里获得它无法提供的东西。

到1946年2月，杜鲁门总统签署该法案时，国会的保守党已对之做了极大的软化。《充分就业法》的名字改成了《就业法》。就业的“权利”（right）和“权益”（entitlement）成了“联邦政府有责任……推动实现就业最大化”“总统需向国会提交一份总的计划……确保持续充分就业”则改为“维持充分就业”这一较模糊的说法。年度创造就业机会预算缩水成了强制性小得多的“总统经济报告”。22

尽管不乏妥协和失败，凯恩斯主义者仍然坚信，新的法律将实现他们的目标。它叫行政分支挑起了经济的责任。有史以来第一次，政府承担了管理经济的权利，将行政权力扩大到现有宪法职责之外的领域，对货币和贸易加以控制。此后的30年，政府的立法和行政部门竞相把新的权力推向极致，通过税收和类似措施操纵经济，以期实现最大化的繁荣，获得连任选举。宏观经济，这门凯恩斯在无意中创立的沉闷科学，成了美国政府的官方工具。正是在这一时期，“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两个词第一次得到了使用：微观经济学研究经济的个别元素；宏观经济学将研究经济整体。

杜鲁门对经济学没有太大兴趣，也拿不出多少时间来打发经济学家。他曾开玩笑地说，要是能跟只有一只手的经济学家见面就好了，这样，对方就没法跟他说，“一只手要这样，另一只手要那样。”[3]他忘掉了发展之路上的岔路口，以凯恩斯和哈耶克为代表的理论曾经为之争斗不休。他不理解《就业法》的重要性，也不理解新设立机构的重要性。到了该由他任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第一任主席的时候，他对凯恩斯主义者阿尔文·汉森这一合适人选视而不见，却支持了布鲁金斯研究所的保守派经济学家埃德温·诺斯（Edwin Nourse）。23“杜鲁门是默里《充分就业法》和顾问委员会的正式支持者，法案通过后，他还写了一封言真意切的信，可他并不知道这法案到底是什么意思。”诺斯回忆说，“它超出了他的知识范围。”24尽管如此，总统还是高兴地接受了让所有美国人都有了工作的荣誉。1947年的国情咨文中，他吹嘘美国“在实质上等同于充分就业”。25

诺斯的任期并不长。1949年，他的继任者是利昂·凯泽林——《就业法》和新政关键措施的构建者，热切地相信规划能维持高增长和充分就业。凯恩斯主义的潮流席卷了杜鲁门，尽管他主张预算平衡，还深度削减了一系列国防预算，偿付国内的项目。“利昂，你是我认识的最了不起的说客，”他对凯泽林说，“但谁也不能叫我相信，政府能把还没弄到手的钱给花出去。我就是个乡巴佬而已。”26朝鲜战争改变了这场辩论。再度激增的军费开支令通货膨胀飙升，凯泽林反对美联储削减国防开支、提高利率以堵死物价飞涨的补救措施，反而主张操纵经济以带动经济发展。朝鲜战争为凯恩斯主义者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借口，他们通过国防部恢复了高公共开支——并将此趋势维持了近10年。

1948年，汉森的哈佛弟子、麻省理工教授保罗·萨缪尔森的《经济学》（Economics：An Introductory Analysis）出版，推动了凯恩斯主义思想，并成为凯恩斯主义者的圣经。在最初的版本中，萨缪尔森忽略了正统经济学，他只选择了两种情况进行描述：“社会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米塞斯、哈耶克或者奥地利学派，统统不值一提。未来60年里，《经济学》被翻译成了40多种语言，售出了4000多万本，让凯恩斯主义在西方世界里成了新的正统学派。凯恩斯读的是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凯恩斯主义者们则既读也教萨缪尔森。“只要我能撰写该国的经济学教科书，”萨缪尔森说，“我才不在乎谁撰写它的法律呢。”27

杜鲁门之后继任总统的是共和党人，率领盟军击败希特勒的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28他是一个保守派，对凯恩斯主义的许多处方都持怀疑态度。和哈耶克一样，

他对通货膨胀的担心远甚于失业。但此时再也没有办法回到从前经济自己管理自己的老路上了。按休斯敦政治学教授约翰W.斯隆（John W.Sloan）的说法，前五星上将艾森豪威尔“在决定政府宏观经济政策事务上，是最重要的参与者”“对这一政策领域甚为关注，通常也十分自信”。29艾森豪威尔仰赖的是奥地利出生的商业周期专家阿瑟·伯恩斯（Arthur Burns），30他任命伯恩斯担任自己经济顾问委员会的主席，后者将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管理往保守立场做了大幅度的修正。“仅仅一代人以前，经济学家和其他公民的普遍看法是，商业萧条的风暴要让它纵情地吹，政府不能干涉，”伯恩斯说，“如今，美国人却基本上赞同，联邦政府不能对私人经济领域发生的一切保持超然立场，政府必须不断努力，促进经济不断发展，政府有明确的责任，全力以赴阻止萧条。”31他说到做到：在1954年朝鲜战争结束之后，第一轮艾森豪威尔经济衰退期间，伯恩斯不顾保守派大范围的反对，动手减了70亿美元的税，主动让联邦预算出现赤字。加尔布雷斯的传记作家理查德·帕克认为，“艾森豪威尔恐怕是第一任凯恩斯主义的共和党总统吧”。32

艾森豪威尔任期快要结束的时候，《生活》杂志形容他的经济政策“实际上是教科书里如何善待、刺激自由市场系统的模范”。33凯恩斯主义打着“商业凯恩斯主义”的标签内置到政府当中，通过利用“自动财政稳定器”，即失业和福利支出等手段在经济不稳时提高政府开支（由于经济萎缩时收入减少，企业纳税收入降低，政府的开支提高和缩小收入维持了经济的规模），将艾森豪威尔任期内的三次短暂经济衰退的危害限制在了最低限度。虽然艾森豪威尔对鬼祟的凯恩斯主义并不怎么满意，但他愿意在经济衰退时期透支政府开支。

在艾森豪威尔之前，从来没有哪一任和平时期的总统像他那样大手大脚地花过纳税人的钱，尽管如此，他还是克服了保守派的重重反对，以政府开支对国家安全必不可少为由通过了预算。1956年，庞大的跨州公路网络破土动工（这是凯恩斯主义基础建设项目的完美案例），经费来自“国防高速公路”项目（National Defense Highway），艾森豪威尔劝说保守派接受它的理由是：一旦出现军事紧急事件，它就是运输物资的手段。“冷战”的升级也刺激了国防开支的突飞猛进，34更何况，1957年10月，苏联人还向太空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斯普特尼克”号。未来50年进行的太空竞赛，让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的预算提高到每年187亿美元的天文数字，另外还有200多亿美元35花在五角大楼的卫星和火箭上。“我们生活在一种奇怪的军事凯恩斯主义之下，火星突然跑出来填补了市场经济留下的空白，”36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tadter）在1950

年写道。到艾森豪威尔的总统任期结束时，他在国防上花的钱比罗斯福用来打赢“二战”的钱还多。

对于这一切，艾森豪威尔在告别演说中流露出一丝哈耶克式的想法，提醒要当心社团主义，也即私人企业与政府相勾结。艾森豪威尔悔恨的地方是，他这一届政府的庞大军备开支武器导致了所谓的“军工复合体”（the 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37他警告说：“我们决不能让这种权贵组合危及我们的自由和民主进程。” 38

不过，对于20世纪50年代，给人印象最深的还是美国上下遍布的无尽繁荣。对打赢了反法西斯战争的“最伟大一化”，这不啻是最完美的奖励。消费主义大旗飘扬，新建设的理想家园里充斥着电冰箱、洗衣机等家用电器，每一家的车道上都停着汽车。即便如今回首审视，人们仍然满心喜爱，觉得那是一个和平与丰裕的时代。在英国，凯恩斯主义者哈罗德·麦克米伦（Harold Macmillan）打着“你从不曾过得这么好”的口号，赢得了1959年的选举。

用凯恩斯主义的举措操纵经济，能给现任执政者带来巨大的选举优势——艾森豪威尔是第一位充分意识到这一点的总统。只不过，到1960年总统选举时，事情出现了一点波折。为了抗击1958~1959财政年度的130亿美元赤字（造成它的原因是，一次小型衰退令得政府大手笔地提高福利支出，并削减税收），艾森豪威尔在1958年的中期选举中敦促选民，不要把“我认为是败家子的人”39送去华盛顿——这句话，不管是凯恩斯主义者还是保守派，都听在了耳朵里，也看出了其中的讽刺味道。

选民对艾森豪威尔的警告置之不理，上下两院都出现了民主党占多数派的局面。在任最后一年，艾森豪威尔不愿把一笔庞大的预算赤字留作自己的政治遗产，试图削减公共开支。“我想把（开支）使劲往下扣，直至最后一分钱。”他说。民主党大概是想着削减开支兴许能在总统竞选助选活动期间（共和党一边是艾森豪威尔那下巴宽大的沉郁副总统理查德·尼克松，40民主党一方则是年轻的约翰F.肯尼迪41）搞砸经济，竟然进一步削减开支，令政府预算出现了2.69亿美元的意外盈余。与此同时，美联储大幅加息，提高贷款成本。

1960年4月，新一轮经济衰退开始了，选民们责怪起了共和党。他们明明有足够的资金把人民送回工作岗位，降低利息，减少税收，保持经济兴旺，可他们却选择

了不作为。很少有人记得，1952~1960年的通货膨胀率一直保持在1.4%。肯尼迪打出了竞选口号，“让我们的国家继续前进”，他赢了——只不过，这是一次险胜。两党总统候选人的支持者人数，仅仅相差千分之一。如果艾森豪威尔稍微松松口，尼克松说不定就赢了。在未来的岁月，尼克松屡次长篇大论地抱怨艾森豪威尔阻碍了他第一轮赢下白宫的机会。这对所有未来的总统都是一次沉痛的教训：要成功赢下投票箱，就是要把经济管理好，让商业周期跟为期四年的选举周期保持一致。要是有人敢在财政预算案赤字上“做正确的事”，一定没好下场。

到了约翰F.肯尼迪当总统时，这位波士顿肯尼迪家族的青年才俊首次公开承认，他不光会在商业周期触底时采用凯恩斯主义的对策，还要把它作为推动全国生产力的一般性政策工具。虽说在哈佛时受过加尔布雷斯的指导，可肯尼迪对经济学知之甚少。肯尼迪曾坦言，他记不住财政和货币政策之间的区别（财政政策，即行政分支确定的税收和支出；货币政策，是美联储确定的货币供给和利息调控），他能记住美联储负责货币政策，仅仅是因为美联储主席的姓氏开头有个"M"，和"Money"（金钱）一样。42肯尼迪身边是一群凯恩斯主义者，为首的就是加尔布雷斯，后者为肯尼迪执笔了竞选演说中与经济有关的内容。肯尼迪上任后把加尔布雷斯安置在了行政办公楼，并简短地对他说：“别告诉我做什么，要告诉我该叫别人怎么做。”43

肯尼迪任命华尔街银行家、共和党人C.道格拉斯·狄龙（C.Douglas Dillon）为财政部部长，任命谨慎的威廉·麦克切斯尼·马丁（William McChesney Martin Jr.）44为美联储主席，并将该职位的职责定义为“舞会一开起来，就把酒杯拿走”——也就是说，要通过提高利息，抑制与高公共开支相伴而来的通货膨胀。45虽说身边都是凯恩斯主义者，但肯尼迪起初想找萨缪尔森来执掌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之后又探过加尔布雷斯的口风（可加尔布雷斯选择去印度当大使），最后才选定了沃尔特·赫勒（Walter Heller），46赫勒将本届行政分支的凯恩斯主义做法称为“新经济”。赫勒以及顾问委员会里的克米特·戈登（Kermit Gordon）47和詹姆斯·托宾，相信自己可以实现充分就业（按他们的定义，就是失业率低于4%），而且不招来通货膨胀。

肯尼迪的经济目标是弥合“增长差距”，即把美国经济完全放手交给私人企业所实现的产能，跟行政分支对经济进行干预所实现的充分生产之间的差距。这无非是给《充分就业法》中“消失的增长”理论换了件新衣服。在对国会发表第一次讲

演时，肯尼迪感叹道：“150多万失业人口（占总失业人口的1/3）本来都可以找到工作的。200多亿美元的个人收入，本来1960年就可以挣到的。企业利润本来还可以再高50亿美元。这一切，都可以用现成的人力、材料和机器实现——不会造成产能紧张，不会引发通货膨胀。”这话听起来很像是凯恩斯在大萧条时期的说法。

肯尼迪继续说：“不平衡的经济不会带来平衡的预算。家庭和企业的收入低，联邦的税收收入也会低。商业萧条时，协助失业工人和其他纾缓经济困境的成本会有一定上升。”当经济全速航行，增加的税收能偿还国家债务。“高就业率下的债务偿还，有利于经济发展，因为私人企业的储蓄释放出来，进入生产性投资领域。”48他宣称。任命赫勒的那个晚上，肯尼迪吐露了心声：“我把赫勒和凯恩斯直接给了他们，他们会喜欢的。”49难怪替肯尼迪作传的阿瑟M.施莱辛格（Arthur M.Schlesinger Jr.）形容他是“当之无愧的第一任凯恩斯主义总统”。50

尽管肯尼迪在言论上走凯恩斯主义路线，但因为自己在总统之战中只以微弱优势险胜了尼克松，他做起事来十分谨慎。他担心弗吉尼亚州参议员、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主席哈里F.伯德（Harry F.Byrd）领导下的民主党保守势力。哈里·伯德对赤字是持强烈反对态度的。整整两年里，除了在国防和空间上投入巨资（像艾森豪威尔一样，他称这两者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1962年10月发生古巴导弹危机之后，这个论点变得更有分量了），他没有对经济做更多的刺激。军事和航天经费占了肯尼迪任期内所有增加支出的3/4，空间方面的资金上升得尤为明显，从1960年的10亿美元，增长到4年后的68亿美元。51尽管投入了这么多公共资金，失业率仍然持续上升。1961~1962年，失业率保持在5%以上。国会宣召凯泽林作证时，他说了一句激怒总统的证词：“他们派遣了一个侏儒程序，去完成巨人的工作。”52

等肯尼迪终于将创造充分就业付诸行动之时，他采取了最出人意料的方式。1962年12月，他向华尔街人士致辞，宣布了自己违背常理的计划。它完全符合凯恩斯主义，只是来了个“颠倒”。“我们如今的发展速度令得好人失业，优秀的产能闲置，这种局面无法令人满意……以增加需求和振兴经济，联邦政府最有益的角色不是匆忙开展一套令公共开支激增的项目，而是激励私人支出，增加私人支出的机会。”他说，“我们的现状很矛盾，税率过高，税收收入却过低，故此，长远来看，提高收入的最合理方式，就是现在降低税率。”53

尽管预算有赤字，他还是敦促国会削减了100亿美元的所得税。赫勒和萨缪尔森

第一次提出削减税收时，肯尼迪大吃一惊。“我才刚刚搭起财政责任和平衡预算的平台，你们就告诉我，我上任该做的头一件事就是减税？”54他问。诚如赫勒和萨缪尔森所知，这一举措正遵循了凯恩斯1933年在《通往繁荣之路》里的建议：减税能够让资金注入经济，如公共开支那样有效拉动经济。

一部分凯恩斯主义者，和近乎全部的保守派，怀疑这一方案是否明智。凯恩斯主义者认为，增加联邦支出是振兴经济最可靠的方法，保守派的理由则是，预算存在赤字时减税，简直是不计后果的赌博。加尔布雷斯抱怨，减税是凯恩斯主义的一种“反动”形式，它不能像有针对性地公共开支那样解决公共弊病。55此外，减税还会带来通货膨胀。然而，赫勒并非赌棍。他是根据最新的“新凯恩斯主义”概念（意在为管理经济提供一种预见性更强的手段）来操作的。凯恩斯的门徒罗伊·哈罗德（Roy Harrod）和哈佛大学的埃弗塞·多马（Evsey Domar），56在其根据卡恩乘数理论建立起来的“哈罗德-多马模型”中，预测了减税推动经济发展的形式。赫勒本人和同事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57思考了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新西兰人威廉·菲利普斯（William Phillips）581958年的研究工作，后者在名为“菲利普斯曲线”的图表中，假定失业率降低和通货膨胀上升之间存在一种权衡关系。赫勒根据菲利普斯曲线制定政策，认为自己找到了一种既能创造充分就业又不会引起物价上涨的方法。

肯尼迪的减税提案在参议院遭到冷落，但1963年11月他遇刺身亡后，接任的副总统林登·约翰逊发誓要在每一个方面接下前任的政治遗产。约翰逊并不是经济学家，但他对赫勒和其他人的建议很感兴趣。“例如，他尤其着迷于经济状况，他很擅长记忆关键指标，他会向经济顾问们询问各种经济指标。”59林登·约翰逊的特别助理道格拉斯·卡特（Douglass Cater）说。60约翰逊过去在国会待了几十年，熟知各种讨价还价手法，又生就一副狡猾的性子，1964年他终于说服两党的保守派，通过了肯尼迪的减税“赌博”，降低了一般所得税率，将最高税率从91%降到65%。4年之内，左右两翼对减税的批评都落了空。联邦税收收入增长了400亿美元，61经济增长从1964年的5.8%增加至1965年的6.4%，再到1966年的6.6%。失业率从1964年的5.2%，下降为1965年的4.5%、1966年的2.9%。62通货膨胀率1964~1965年低于2%，1966年略微增长至3.01%。肯尼迪的赌博赚回了满堂彩。和青霉素一样，凯恩斯主义成了新的神药。

1965年12月，《时代》杂志把“年度人物”的荣誉颁给了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凯恩斯正式成为经典，地位堪比比萨斜塔、蒙娜丽莎脸上的微笑。“在他去世近20年后的今天，他的理论给自由世界的经济带来了莫大的影响。”《时代》夸耀道，“华盛顿制定国家经济政策的人们，利用凯恩斯主义的原则，不光避免了战前岁月的暴力循环，还实现了惊人的经济增长和极其稳定的物价。”

华盛顿的经济学家们是怎样做到的呢？“他们坚持凯恩斯的核心主张，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不会自动以最高效率运转，但政府的干预和影响可以将它提升到该水平。”实施控制的，是哈耶克痛恨的“规划者”。“经济学家……信心满满坐在政府和企业几乎每一位重要领导的身后，这个时代愈发需要他们的预测、规划和决定。”《时代》反反复复地说。甚至，连铁石心肠的商人，也拜倒在凯恩斯主义旗下。“他们已经开始……理所当然地认为，政府必定会出手干预，抗击萧条、切断通货膨胀，也不再认为赤字开支不道德……最大的变化或许还在于，他们不再认为政府会完全偿清债务，正如对通用汽车和IBM而言，偿清自己的长期债务恐怕并不足取。”63对那些高傲自大者，这些有关凯恩斯理论的溢美之词，暗示着凯恩斯主义的优势已经达到顶峰。

凭借蓬勃发展的经济和迅速增长的税收收入，约翰逊着手建立自己的政治遗产了。1964年5月，他在安阿伯市密歇根大学宣称：“我们不仅有机会实现强大而富裕的社会，更有机会实现伟大的社会。”64他发誓要消除贫困和种族不平等，保护农村，让每一个孩子接受教育，“重建整个城市美国。”1964年，他在选举中对超级保守派巴里·戈德华特（Barry Goldwater）65取得压倒性胜利，以此作为后盾，20世纪30年代新政的狂热“粉丝”约翰逊送出了公共开支大礼包。阿肯色议员威尔伯·米尔斯（Wilbur Mills）66回忆说：“在某种意义上，约翰逊花起钱来跟肯尼迪不一样。他认为，靠公共支出刺激经济，总是比靠私人支出更好。”67约翰逊的项目在激进尺度上，与富兰克林·罗斯福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他把公民权利扩大到了非裔美国人范围，他通过联邦授权“向贫困开战”，他建立了医保制度，为所有年龄在65岁以上的长者提供医疗服务，为买不起医疗保险的人提供医疗补助。

20世纪60年代是财富无与伦比的10年。20世纪50年代是普遍富裕的年代，而60年代则让普通工人实现了小康。彩电、飞机旅行和第二辆私家车等奢侈品变得司空见惯。努力工作让位给了更充足的休闲时间。凯恩斯主义式的规划，非但不曾像哈耶克预言的那样令独裁蔓延，反而创造了全新的财富，提供了全新的自由。妇女、非裔美国人、青少年都开始拓展自己的自由领域。凯恩斯革命拉开了一场文化革

命，向从前社会贫困朴素时所确立的传统习俗提出了质疑。

凯恩斯主义的奇迹继续为约翰逊发挥着作用。工作效率提高，真正拿回家的工资较之艾森豪威尔时代翻了一倍，失业率一路下降：1965年是4.5%，随后4年则平均只有3.9%。约翰逊把联邦用于反贫困计划上的预算比例从1961年的4.7%提高到1969年的7.9%。不过，约翰逊将平息越南南部叛乱的战争升级，并把它提高到比国内改革更紧要的地位上。最终，50万美国青年驻扎越南，国防开支从1965年的495亿美元激增至1969年的812亿美元。预算仍然保持盈余，但盈余的部分正飞速萎缩，与此同时，通货膨胀开始上升，到1968年达到4.2%。为抗击物价上涨，1968年额外增收了一部分的所得税，但它未能将经济保持在平衡状态。不过，拖垮约翰逊的不是经济，而是战争。他的离任宣告“伟大社会”走向了尾声。

1969年1月，理查德·尼克松来到了白宫，并暗示自己打算逆转凯恩斯主义的浪潮。“60年代这10年当中，联邦政府的支出，比税收所得多570亿美元。”他在1970年的国情咨文中说，“今天，数百万美国人被迫陷入债务的泥潭，因为昨天，联邦政府决定要陷入债务的泥潭。我们必须平衡联邦预算。”68他的结论是，靠赤字推动的充分就业，导致劳动力稀缺，抬高了工资和物价。为对抗通胀，尼克松向他持保守倾向的经济团队——其中包括经济顾问委员会负责人保罗·麦克拉肯（Paul McCracken），69理事会成员、后接任麦克拉肯职位的赫伯特·斯坦（Herbert Stein），70管理及预算办公室主任乔治·舒尔茨（George Shultz）71——做出指示，大幅削减开支，平衡预算。

然而，此次削减开支恰逢一轮轻度的经济衰退，失业率从1970年1月的3.9%涨到当年年底的6.1%。72因为尼克松相信，1960年他输掉总统选举，就是因为失业问题，73他立刻掉转路线，说自己想要“充分就业的预算，旨在促进经济充分发挥巅峰潜力的预算。我们要像实现了充分就业那样开支，借此帮助我们真正实现充分就业”。他提出了扩张性预算，以便“刺激经济，为数百万人创造新的就业机会。”741971年1月，尼克松本着纯粹的凯恩斯主义精神宣布：“现在我在经济方面是凯恩斯主义者了。”75斯坦回忆说：“他自称凯恩斯主义者，这并没有让他得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们的赞许，反而激起了共和党人愤怒的抱怨。”76

尼克松1970年的国情咨文中有一句坦言，暴露了他改变心意背后的算计。“我认识到了支出项目所蕴含的民声走向，尤其是在大选之年。”尼克松是战后机会主

义色彩最鲜明的总统，他让自己的野心左右经济，考虑个人利益甚于国家利益，以自己能够再度当选为最高目标。用斯坦的话来说，他的凯恩斯主义策略，“遭到了自由派和保守派的同时鄙视”。77米尔顿·弗里德曼曾在尼克松1968年竞选时出任他的经济顾问，形容说“尼克松是美国20世纪总统里最直接、现实的一位。”78

尼克松奔向凯恩斯主义的代理人是得克萨斯州前任民主党州长约翰·康纳利（John Connally），79一度是约翰逊总统的密友，1970年12月，尼克松任命康纳利担任财政部长。由于选民和行政分支的议员都大声鼓噪要为不景气的经济“做点什么”，1971年6月，由美联储主席阿瑟·伯恩斯牵头，尼克松在戴维营召开高层顾问会议，讨论未来路线。他发现他们乱了阵脚。斯坦要求“刺激性更强的财政政策——减税或者增加支出，甚至两手同时上”。80而舒尔茨则要求削减开支，财政紧缩。尼克松答应什么也不做，也就是一项称为“四不”的政策：“不增加支出，不减税，不控制物价和工资，不让美元贬值。”81

但短短几个月里，尼克松就来了一轮完美的向后翻腾。他在自己的“新经济政策”中，先取消美元对黄金的挂钩，之后批准美元贬值；施加减税、增加开支的财政刺激，让联邦赤字激增到400亿美元；向飞机制造公司洛克希德提供低价联邦贷款，预防其倒闭；1971年8月，又通过法律禁止物价和工资上调。稍后，他又放弃了自由贸易，征收10%的进口税。这是连凯恩斯主义者都望而却步的大变脸。凯恩斯政治遗产的一个关键环节，布雷顿森林体系（其他国家的货币盯紧美元，美元跟黄金挂钩）一瞬间就烟消云散了。但其余的措施则是不折不扣的凯恩斯主义。保守派专栏作家，1960年和1968年担任尼克松讲演撰稿人的威廉·萨菲尔（William Safire）发出召唤：“全世界持自由放任市场观点的人们团结起来！你们失去的无非是凯恩斯。”82尼克松气得拿电话砸他。

尼克松采用大量干预措施，召唤出了他认为是连任关键的繁荣景象。一位愤怒的共和党国会议员抱怨说：“我只好把从前谴责赤字支出的讲演全都给烧掉。”总统回答说：“我们在同一条船上。”83“不知为什么，人们总有这样的概念，你只需要稍微控制物价和收入一会儿，等事情恢复常态，之后你就可以收手（让物价和收入自行依照市场定价），”舒尔茨回忆说，“但事实证明，插手容易罢手难。”84但尼克松掌控经济命运的愿望遭到了致命打击：1973~1974年，阿拉伯石油卡特尔组织欧佩克（石油输出国组织）为惩罚美国在赎罪日战争中向以色列提供军火，将油价提高了4倍。物价高涨，经济增长来了个急刹车，如菲利普斯曲线等传

统工具似乎不再适用了。一种名为“滞胀”的全新经济现象出现——经济低增长甚至不增长，又伴随着通货膨胀。此前，人们一直以为这是压根不可能出现的局面。85凯恩斯时代落入了垂死的阵痛。“滞胀”时代到来了。

1972年，由于碰上的对手乔治·麦戈文（George McGovern），尼克松在选举中大获全胜。可最终，叫尼克松1974年黯然离开椭圆办公室的，不是他在经济上的大变脸，而是华盛顿水门酒店民主党总部的一桩入室盗窃案。但滞胀显然落进了他那不幸的继任者、前密歇根大学橄榄球明星杰拉尔德·福特（Gerald Ford）86的手里。在福特任总统期间，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都达到大萧条时代以来的最高点。尼克松下台前，任命了极端保守的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87担任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的主席。88格林斯潘多年来反对尼克松的花言巧语，并对自己跟引入价格和收入管控的政策大掉头毫无瓜葛而感到庆幸。但他并没有太多法子能救得了福特。一群吵吵闹闹的经济顾问挤压着和蔼可亲的总统，一会儿要他用这种灵丹妙药，一会儿又要他用那种——格林斯潘只能在场边无能为力地看着。

福特达成了短暂的妥协，民主党控制下的国会同意限制开支，削减了900亿美元的税收；经济数据开始转入正确的方向。通货膨胀率从1975年的9.2%，降到1976年举行总统选举那个月（11月）的4.88%。89失业率也下降了，从1975年5月最高峰的9%降到了1976年11月的7.8%。但好转来得太迟，救不了福特了。滞胀把第一名受害者拉下了马。

凯恩斯主义者相信，失业率和通货膨胀不可能同时上升。这种现象的出现，证明他们想错了，也破坏了人们对该理论其余部分的信心。凯恩斯为管理经济带来的确定性灰飞烟灭了。“滞胀宣告天真的凯恩斯主义结束了。”90米尔顿·弗里德曼评论说。曾经无所不知的经济学家们只好摸索着寻找解释了。“华盛顿出现了关于经济政策的一个明显共识，自由派的左翼和保守派的右翼在态度上一致向内收敛。”格林斯潘回忆说，“突然之间，人人都在想办法抑制通货膨胀，削减财政赤字，减少监管，鼓励投资。”91

但原有的思维很难一笔勾销。永远带着微笑的佐治亚花生农场主、前潜水艇舰员吉米·卡特许下了让美国重返充分就业的承诺，入主白宫。1978年，他批准了《汉弗莱-霍金斯充分就业法》（Humphrey-Hawkins Full Employment Act），92重演了1945年的《充分就业法》，规定总统和美联储将总需求维持在足够的高度，保

证充分就业。但法案又提出一个明显矛盾的诉求，指示总统和国会要平衡预算和贸易。如同克努特大帝（Canute）93自不量力地想指挥潮汐，事实证明，立法的议员们对经济无能为力。一厢情愿的想法和国会的大多数票是不足以打败滞胀的。要带领美国走上一条痛苦的新路，卡特也并非合适人选，他发表了一篇“恼人”的演说，鼓足了勇气说出了这难以启齿的真相：美国遭遇了“一场危机，痛击着我们国家意志的核心、灵魂和精神”。94

滞胀同样折磨着世界其他领导人，比如倒霉的英国首相詹姆斯·卡拉汉（James Callaghan），但卡特并不为此感到欣慰，因为他的时间马上就要耗光了。1978年10月，他宣布了反通胀措施，包括厉行节俭、大力加强企业管控、行业减税、冻结联邦人事聘用、许诺将联邦赤字减半。95但每一项措施都需要时间才能发挥作用，而大选周期却比衰退间隔要短得多。

1979年1月，卡特受到致命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在中东地区引发动荡。足可媲美1973年欧佩克涨价的第二轮石油危机把总统给困住了，石油供给大幅缩水。他对燃料实行了价格管制，加油站前排起了长队。他又给美联储任命了一位铁杆民主党人主席——保罗·沃尔克（Paul Volcker），96沃尔克的使命是提高利率，遏制需求（当时人们以为需求是通胀的根源）。由于卡特未能及时控制住价格，1980年11月的总统大选中，共和党候选人，英俊和蔼、眼睛亮光闪闪的罗纳德·里根趁机问选民：“你们过得比4年前更好吗？”人们的回答是一个响亮的“不”！

受到审判的不光是卡特，还有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这位伟人过世34年、《通论》出版40多年之后，凯恩斯主义似乎走完了自己的历程。就像是神药用得太多也会失效一样，药剂师把他的补救措施当成万用良药，用得太频繁了。是时候对经济理论进行彻底的重新评估了——为了这一天，哈耶克和他的盟友们筹划已久。

对哈耶克来说，黎明之前是最黑暗的时候。他警告朝圣山学会，凯恩斯的理论暴露出明显的缺陷，恐怕要等数十年。但他没有料到的是，逆转的前途竟然掌握在阿伦·迪雷克托的妹夫——米尔顿·弗里德曼这个看似不可能的人手里。哈耶克和迪雷克托相处甚好，或许是因为他们长得很像，都戴着金属边框的眼镜，头发稀疏，留着格劳乔·马克斯[4]式的小胡子。

1943年，哈耶克在维也纳的经济学家朋友弗里茨·马克卢普（Fritz Machlup）给迪雷克托看了一份《通往奴役之路》的打印稿，后者将它传给了芝加哥的弗兰克·

奈特。尽管奈特的审阅报告持怀疑态度，但芝加哥大学出版社还是同意出版此书。事后证明，出版社的这个决定很明智，因为时隔70年，这本书的销售势头仍很强劲。迪雷克托是个虔诚、阐述清晰、有说服力的哈耶克分子，他反对政府津贴，抨击进口关税，反对工会。他为《通往奴役之路》写了书评，形容哈耶克是“经济思想发展历程中成就最大的史学家”。1但哈耶克重塑经济自由主义漫长征途的成功，靠的是迪雷克托贡献的家庭纽带。迪雷克托的妹妹罗斯搬到芝加哥和他住在一起，在经济学班上，她爱上了邻座的米尔顿·弗里德曼，后者当时还是个凯恩斯主义者。1938年，罗斯和弗里德曼结婚不久，迪雷克托和罗斯开玩笑：“告诉他，我是不会拿他强烈的新政倾向（专制地使用一个侮辱人的词汇）反对他的。”迪雷克托带着弗里德曼参加了第一届佩尔兰山会议。

弗里德曼生于布鲁克林，20世纪30年代时是个社会主义者，在罗格斯大学、芝加哥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拿到学位后，加入了渴望参与罗斯福新政的年轻经济学家的行列，在华盛顿特区的国家资源委员会找到一份工作。他回忆说：“就个人而言，新政救了我们的命。”2“二战”结束后，他回到芝加哥，开始接受弗兰克·奈特和乔治·施蒂格勒的市场观点。朝圣山学会的一位会员，剑桥经济学家斯坦利·丹尼森（Stanley Dennison）3鼓励弗里德曼申请富布赖特奖学金（Fulbright scholarship）到剑桥深造，弗里德曼申请成功，在剑桥遭遇了凯恩斯主义者们。他和乘数理论的提出者理查德·卡恩、凯恩斯的护法琼·罗宾逊、哈耶克最有前途的弟子尼古拉斯·卡尔多交上了朋友。

和凯恩斯、哈耶克一样，弗里德曼对商业周期产生了兴趣，开始思考“大萧条”的成因。他研究了美国自19世纪中期以来的每一轮波峰和波谷，发现每次下行开始前，总会出现货币供给的大爆炸。4再对照大萧条的数据，他推断，要是1929~1933年美联储通过降低货币利息来增加货币供给的话（实际政策则为货币大幅紧缩），低迷最多持续一两年。故此，按弗里德曼的推算，大萧条其实是“大紧缩”，它是一场本可避免的人为灾难。为了改进商业周期，弗里德曼提出，要严格控制货币增长，只允许它缓慢增加，后世称此种政策叫“货币主义”（Monetarism）。5

弗里德曼的结论是：凯恩斯误读了局势。“凯恩斯……认为，大紧缩……在货币当局实施积极的扩张性政策后仍然出现，”弗里德曼写道，“事实恰恰相反……大紧缩悲惨地见证了货币政策力量……并不如凯恩斯所相信的那样，证明了货币政策的无

能。”6凯恩斯应对失业的处方是公共工程。哈耶克曾试图说明，一旦刺激撤回，这种指导劳动力进入产业的政策就会失败。弗里德曼从另一个角度接近凯恩斯：深陷衰退的经济需要的不是过于慷慨的货币供给，适当就行了。货币水平合适，会带来“自然的就业水平”，它可能是充分就业，也可能不是，而系统中的资金不管是太多还是太少，都有可能导致失业和通胀。

尽管弗里德曼早已做出揭示，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仍束缚在凯恩斯主义之下。凯恩斯主义“简单得出奇，”弗里德曼写道，“多么美妙的处方，对消费者来说，多花掉收入，收入会上涨；对政府来说，多花钱，靠着额外支出带来的倍增效应，总收入会上涨：削减税收，消费者多花钱也会带来同样的结果。”7尽管弗里德曼为凯恩斯给政客们开了一张空头支票感到遗憾，但他对凯恩斯的态度并不像哈耶克那么强硬。“我认为，凯恩斯理论的优越之处，就在于它简单，把焦点集中在几个关键的量级上，有着极大的潜力。”他写道，“我否定它……是因为我相信它与证据不相吻合。”8

弗里德曼认为，“凯恩斯对技术经济学的馈赠是十分正面的”，但他的政治遗产却是负面的。“他极大地助长了政府规模的扩张，使之日益与公民日常生活的每一阶段息息相关。”9他写道。弗里德曼和他的经济学分析，和哈耶克的关系很小，只不过，他和哈耶克一样，都不喜欢国家干预。弗里德曼倾向于减税，不光是因为他相信个人比政客们更清楚该如何花掉自己的钱，还因为既然要减税，政府支出就必须减少。

对国家干预可能造成的后果，弗里德曼赞同哈耶克的悲观立场。“不管经济学上怎么分析，”他写道，“善意的独裁迟早会导致极权社会。”但他相信凯恩斯写给哈耶克最后一封信里所说的话，即干预是否会导致暴政，取决于一个国家是否有强烈的公平感为立足基石。这解释了为什么英国和斯堪的纳维亚诸国的福利国家政策并未导致极权主义。根据弗里德曼的观点，英国有一种“贵族结构”，并受“……彻底的知识精英，至少某些方面是如此”所牵制，在此种结构下，“权贵之责任[5]并非一句毫无意义的空话”。此外，英国还有“基本上清廉的公务员”和“奉公守法的公民”。但对良性的福利国家能否在美国扎根，他不怎么乐观。“（美国）没有廉洁、胜任的公务员传统，”他写道，“分赃制度构成了公众的态度……因此，凯恩斯的政治遗产在美国的效力已经在衰减了。”10

弗里德曼高度赞扬了哈耶克的诸多成就，内中不乏溢美之辞。“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的影响巨大而深远，”1975年，他在密歇根州希尔斯代尔的朝圣山学会会议上慷慨发言，“他的工作融合到了技术经济学理论的整体当中；他在经济史、政治哲学和政治科学上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他影响了法律系、科学方法系甚至心理系的一代代学子……（最重要的是，巩固了）自由社会的道德和智性根基。”弗里德曼热情地赞扬哈耶克鼓舞了“自由社会下无数的信奉者”，但他又煞费苦心地指出，“我不能说自己也是其中一员，因为我走上这一方向，是受芝加哥大学老师们的影响，那时候我还不认识哈耶克，也没看过他的著作”。11

弗里德曼的经济思想并不来自哈耶克信奉的奥地利学派资本理论；事实上，弗里德曼对哈耶克的大部分经济学作品持批评态度。反过来说，他总是不吝对凯恩斯的赞美，认为凯恩斯的思想有原创性，又一手创造了宏观经济学。不过，不管他对哈耶克的经济学水平怎么看，他对哈耶克提出的缩小政府规模的建议，始终热切响应。弗里德曼的自由主义（尊重个人主义的美德，警惕国家权力），和哈耶克对政府的天生不信任完美契合。两人都认为，通货膨胀比失业带来的苦难更大。

哈耶克担心自己的追随者们违背原则，早就告诫他们要远离政治。弗里德曼更为务实。“我们必须在体制内部采取行动，”他写道，“我们也许会为让政府拥有了这样的权力感到懊悔；我们也许会倾尽公民的本分，劝说同胞们消除若干此种权力；但只要这种权力存在，那么，大多数时候，政府高效率地履行权力比它效率低下要更好，虽说不见得能永远如此。”12

弗里德曼参加了1964年保守派自由主义者、亚利桑那州参议员巴里·戈德华特的总统选举活动，在当时的著名共和党人之间，戈德华特对联邦政府的权力持少见的抨击立场。从戈德华特在凤凰城的根据地，到华盛顿和东海岸的复杂世界，当中似乎隔着一条漫长的道路。他的西部边疆视野，令得他相信中央集权的国家不应当过分密切地干预个人事务。

戈德华特在他的宣言《一个保守派的良心》（Conscience of a Conservative）中宣称：“我对精简政府没有兴趣，也不是要让它变得更加高效，因为我的意思是要减小它的规模。”13他受《通往奴役之路》“影响很大”，14痛恨凯恩斯，尤其痛恨凯恩斯对共和党政府的影响。哈耶克反对累进税制，因为它意味着国家不是平等地对待每一个公民。和哈耶克一样，戈德华特相信：“政府有权

提出一个人人相同的纳税百分比，或是索取相同的税额，仅此而已。”15

1961年或1962年，参议员的顾问、保守机构“美国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的比尔·巴罗迪（Bill Baroody）把弗里德曼介绍给了戈德华特，三人常常讨论如何将哈耶克的概念付诸实践。弗里德曼为戈德华特撰写讲演稿，并发现人们迫切需要他来解释参议员的立场。“中央集权的政府对经济施以控制……既不能实现自由，也不能让普通人过上体面的生活。”在戈德华特的一次竞选活动中，弗里德曼为《纽约时报》撰稿道。尽管他声称戈德华特“完全支持”1946年的《就业法》，“以促进充分就业和物价稳定”，但他又谨慎地说，他“恐怕会首先通过货币政策”来实现这些目标。16

弗里德曼的文章招来了凯恩斯主义的主要推动者保罗·萨缪尔森的尖锐反驳，后者将弗里德曼的观点追溯回《通往奴役之路》，并认为“自由”的哲学里包含着一点致命的缺陷。“你有挥舞胳膊肘的自由，但要给我的肋骨留出生长的空间。”萨缪尔森认为，“西方世界混合经济中大多数选民并不认为自己给前进道路制定的规则，是外部某个怪物施加的强制力量。”他写道：“除非你是那种认为多数规则在美国运作糟糕的极少数人，你才会把政府视为人民之外的东西。”17

不管是谁赢了这场笔战，1964年11月的大选胜出却毫无疑问：约翰逊以压倒性优势赢了戈德华特。这一惨败打破了此前把哈耶克和弗里德曼的思想转化为行动的希望。然而，在弗里德曼看来，它带来了一些好处。戈德华特大声鼓吹他的经济政策，在公众眼中，俨然成了保守派的思想家、哈耶克天生的继承人。戈德华特始自凤凰城的竞选活动，造就了未来一只浴火重生的保守派凤凰：罗纳德·里根。18

里根曾代表通用电气公司向工厂工人宣导了许多年的自救和小政府哲学。大萧条时期，他的父亲杰克接受了伊利诺伊州迪克森一份和新政相关的工作：帮助失业的邻居找到工作。年轻的罗纳德亲眼看到父亲被矛盾的福利偿付制度所折磨：每当杰克给别人找到了工作，那人的失业救济金就停发了，结果，当事人的日子过得比没有工作时还要糟。

这类生活教训里最重要的一条，是里根在好莱坞认识到的：累进税制令人不愿意工作。里根当演员时曾有高达500万美元的年收入，1937年，他的所得税高得叫他心痛——79%，到1943年更是涨到了94%。“我记得我是怎么做的，”他解释说，“人们给我好些电影的剧本，一等我挣够了数目，我就拒绝再接拍新戏。一美

元里我只能挣到六分钱，我才不去工作咧。”19

“二战”结束后，好莱坞的风尚从里根这类轮廓鲜明的好心肠男人，换成了威廉·霍尔登那样坚毅的英雄，里根发现自己没戏可演了，可因为从前挣了好些年大钱，他欠下了巨额的税款。面对经济上的破产，他得出结论：与其说税收是必要的恶，倒不如说它是赤裸裸的恶，它支撑了一套浪费大、依赖强的腐烂系统。

在伊利诺伊州的尤里卡学院，里根学习了凯恩斯之前的正统经济学。虽然算不上知识分子，可里根特别喜欢读书，这个习惯是他在等着拍电影的空白时间段里养成的，还因为他害怕飞行，总是搭火车，行程耗时久。尽管开玩笑时略显轻浮，但里根读书的品位绝非如此。“我读过冯·米塞斯和哈耶克的经济观点。”他解释说。20

里根第一次见到戈德华特，是在妻子南希的父母家，当时老两口退休回到凤凰城。两人关系并不融洽，但里根发现，自己对戈德华特的政治立场很有共鸣。1964年，他答应出任戈德华特竞选活动在加州的副主席。在洛杉矶的“椰树林”俱乐部上对高税收和大政府做了猛烈抨击之后，有人邀他发表全国电视演说，支持戈德华特步履蹒跚的总统竞选。

里根这场名为“选择关头”（Time for Choosing）21的演说来得太迟了，无法逆转戈德华特的惨败，但它有力地振奋了保守派的信念。里根一夜之间成了保守派的宠儿，走上了政治之路，先是夺下加州州长的职位，最终入主白宫。

1967年，弗里德曼在洛杉矶见到了州长里根。里根是从弗里德曼1962年的作品《资本主义与自由》（Capitalism and Freedom）知道他的，州长请他来，是希望能得到帮助，缩小加州政府规模。里根正在掀起一场修订加州宪法的活动，限制州政府每年的支出和税收总额，他找弗里德曼来帮他兜售这个想法。尽管该活动在1973年未能赢得必要多数票，可里根和弗里德曼却拉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活动，缅因州、密歇根州、密苏里州、蒙大拿州、内布拉斯加州、俄克拉何马州和俄勒冈州都竞相仿效。这不禁让两人信心大振。

里根极为出色的沟通能力，积极地推动了哈耶克和弗里德曼的信息。“里根自己就懂哈耶克。他自己也懂米尔顿·弗里德曼，”纽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22说，“我猜你没法把哈耶克弄到《今日秀》（Today）来，但你能叫里根以更准确的

例子、更通俗易懂的语言解释哈耶克的核心。” 23

里根要耐心等待自己竞选总统的日子。1968年，他搞了一轮竞选，但理查德·尼克松的候选人轮次排在他前面。接过了戈德华特“美国保守主义运动领袖”的衣钵，似乎也惹来了戈德华特的妒忌，阻碍了里根。1968年6月，戈德华特写信给里根，敦促他叫追随者和尼克松一派保持团结，以便共和党人共抗外敌。这封信叫南希·里根深感受到背叛，后来，在里根任总统的整整8年里，戈德华特从没接到过白宫的任何一次邀请。

弗里德曼成为尼克松的非正式经济顾问。“（尼克松）有着强烈的野心，似乎随时准备为了一丁点儿的政治优势抛弃他自称的原则。” 24弗里德曼回忆说。1968年在加州米慎湾的总统竞选活动中，尼克松告诉弗里德曼和自己经济顾问小组里的其他人，他打算对美国的进口纺织品征收保护性关税（他可是一贯号称自己信奉自由贸易的）。“他相信，他保护纺织品的立场，能决定他在南方一两个关键州上的竞选成败。” 弗里德曼回忆说，“他知道，从经济上来说，这是件错事。” 25当尼克松当选总统后，弗里德曼仍然是他的顾问。

1971年6月，尽管弗里德曼坚持要求严格控制货币供应量，尼克松仍请他建议美联储主席亚瑟·伯恩斯增加货币供给。“我提出抗议，我说加快货币增长不可取，因为它不久就会带来通货膨胀，” 弗里德曼说，“尼克松赞同，但他表示，在通货膨胀之前，它先会促进经济发展，这样，在1972年选举前，经济保证能扩大。我回答说，如果要以随后的通货膨胀为代价，这样的选举不值得赢。尼克松说了一句，‘等它来了我们再担心吧。’ ” 26

1971年8月，尼克松结束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固定汇率制度。如果说长久以来反对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弗里德曼有了值得庆贺的理由，那它也是个短命的理由：尼克松同时还在法律上固定了价格、冻结了收入。“我最后一次在白宫椭圆办公室看到尼克松，是和乔治·舒尔茨一起，” 弗里德曼回忆说，“尼克松总统对我说，‘别为了这个愚蠢的工资和价格管制责怪乔治。’ .....我对他说，‘哦，不，总统先生，我不怪乔治，我怪你。’ ” 27尼克松的政策纪录让弗里德曼蹙眉：他未能将联邦开支占国家收入的百分比削减下去；他设立了大量新的政府机构，对经济环境施以监管。尼克松的首席经济顾问赫伯特·斯坦说：“尼克松执政时期，政府对经济施加的新规矩，比新政以来的任何总统都要多。” 28

一如我们所见，1974年对凯恩斯主义者而言，是可怕的年头。可哈耶克的名声却逐步上升。那一年，他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极大地促进了他的追求：恢复经济自由主义的影响力。他的获奖，不光对凯恩斯主义者是个大冲击，也出乎了绝大多数人的意料。萨缪尔森回忆说：“1974年，在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的高级教员室，大多数人似乎根本没听说过这位获奖者的名字。”29

诺贝尔委员会做出这一决定的理由是，哈耶克在“货币和经济波动理论上做出了开创性工作”，但它似乎说服力不够强。哈耶克必须和瑞典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社会民主党政治家冈纳·默达尔（Gunnar Myrdal）共享荣誉。30按弗里德曼的说法，31诺贝尔委员会指望叫默达尔和哈耶克一起得奖，可以避免被人指责同情左派。在颁奖典礼上，哈耶克当众宣称诺贝尔经济学奖荒唐可笑，既不值得颁发，也不值得领受；默达尔则谴责委员会竟颁奖给哈耶克。

不管怎么说，保守派和自由意志论者都普遍欢迎哈耶克获奖，认为这是他数十年来反主流工作得到回报的证据。这次获奖极大地提升了哈耶克个人的声望，一得了诺奖，他多年来的临床抑郁症眨眼间就消失了。“1974年得到诺贝尔奖，让他彻底重生了。”32哈耶克的朋友拉尔夫·哈里斯回忆说。按保守派历史学家乔治H.纳什的说法，哈耶克的诺贝尔奖具有三重效果：“它给了老教授一份全新的生活租约，它让美国的保守派们感到振作、‘时机到了’，它重振了公众对那本叫他出了名的小书（《通往奴役之路》）的兴趣。”33

穿着白色燕尾服，打着白色领带，当着国际媒体发表诺贝尔获奖讲演《知识的僭妄》（The Pretence of Knowledge），34是哈耶克人生的制高点。他本着真正的哈耶克风格，无视诺奖避开争议的惯例，为多年来抗拒凯恩斯革命道出了一个发自内心的理由。他赞扬了奥地利学派资本理论的优点，并将人们的注意力拉到《通往奴役之路》里警告过的自由威胁上。

哈耶克以不乏满意的口吻宣称，“就经济学家这个行业而言，我们把事情搞得乱七八糟了”。他简短地介绍了凯恩斯主义的危险性。“过去30年，指导货币和财政政策的理论，”他解释说，“在根本上是虚假的”，是“庸医”。他形容滞胀是自己招惹上身的伤口，“是大多数经济学家推荐甚至敦促政府采取的政策所带来的”。治愈滞胀，需要进行痛苦的调整，比如更高的失业率、大范围的破产，但“经济的平衡到底如何建立起来”，超出了包括他自己在内的所有经济学家的认

识。凯恩斯主义的信念，即所有经济问题都有解决之道，只令得通货膨胀和失业问题进一步恶化。

他请斯德哥尔摩的听众们把市场想象成一场球赛，借此证明没人知道它是多么的纷繁复杂。如果有关球员的关键事实成立，比如“他们精神投入的状态，他们的感觉，他们的心、肺、肌肉等在比赛每一刻的状况，我们大概能预测结果。”他说，“但我们显然无法确定所有这些数据，故此，比赛的结果就超出了科学预测的范畴。”经济学家最多无非能像园丁一样行事，“提供适当的环境，培育发展”。35

哈耶克开始赢来各处的鼓掌。凯恩斯主义全面撤退，世界似乎走向了他的思维方式。他宣称：“我年轻的时候，只有很老的长者才相信自由市场制度。等我人到中年，除了我自己，就没人相信它了。现在，我很高兴自己活得足够久，看到年轻人再次相信它。”36

哈耶克获奖两年后，弗里德曼也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他向诺贝尔委员会发表获奖感言时，为哈耶克戴了一顶高帽子，称自己的奥地利导师“精彩之极”地看到了价格在左右个人选择中所发挥的作用。37

此时的英国，气候对哈耶克也突然变得分外明媚起来。西方世界最成功的选举政党——保守党，开始从根本上重新评估自己存在的理由。保守党本来是一贯逃避任何概念思维的党派，但1974年2月和10月的两次选举惨败，逼得他们做了这一次罕见的自我反省。这两轮打击让首相爱德华·希思（Edward Heath）失掉了唐宁街，还逼得他和公开的哈耶克党人撒切尔夫人激烈地争夺保守党领导者的位置，希思再度败北。人们事前就预料到了这一结果，但与其说那是因为保守党喜欢哈耶克的哲学思想，倒不如说那是因为希思太不受欢迎，大家只想着另外换一个人就好。38

撒切尔的哲学来自幼时在店东父亲膝下学到的信念，但她同样努力为自己的观点寻找智性上的理由。她在牛津求学（学的是化学）时读到了《通往奴役之路》，391974年，她发现这本书有了新的现实意义。担任保守党领导者后没多久，她去见党内的左倾研究部门，把手伸进手袋，掏出一本哈耶克的《自由秩序原理》，砰的一声砸在桌上。“这就是我们信奉的东西！”她叫道。40

撒切尔夫人决定放弃战后的政治共识41，即为了争夺决定选举成败的中间阶层，保守党在福利国家和经济管理两个领域与工党达成了妥协。这样一来，铁路和公交、煤矿、所有的造船厂、所有的钢铁厂、电话网络、电力、煤气和自来水厂、英国航空公司、英国石油、港口和机场全都成了国有的。卫理公会教徒撒切尔夫人，向共识宣战：“旧约上的先知们从不说，‘兄弟们，我想要有共识。’他们说的是，‘这是我的信仰。我全情投入相信的东西。如果你也相信，就跟我来。’”42

撒切尔夫人知道，哈耶克每年都要到伦敦经济事务研究所拜访，研究所的所长是朝圣山学会成员拉尔夫·哈里斯。“撒切尔的办公室人员过来（1976年），问她可否顺道拜访，见见哈耶克，”哈里斯回忆说，“就这样，玛格丽特·撒切尔来了，坐在那儿，陷入了一阵不同寻常地沉默，热情地倾听着大师的话。”43哈耶克和弗里德曼成了她在唐宁街10号办公室的常客。

1979年6月，撒切尔夫人当选英国首相。巧的是，哈耶克的80岁生日也在临近。他给撒切尔夫人发了一封电报：“谢谢你为我80岁生日献上的最好礼物。”撒切尔夫人回信说：“我很骄傲，过去几年我从您那里学到了那么多东西。我下定决心要取得成功。如果我们终于能达成目标，您对我们的胜利所做贡献极大。”44

撒切尔夫人着手缩小公共部门的规模，减少货币供应量，削减税收，把企业从政策法规下解放出来，偿还国家债务，变卖国有资产，这个过程后世称为“私有化”。这是纯粹的哈耶克，再加上了少许弗里德曼。“多年来，太高的税收、太多的监管、太高的公共开支，压榨着企业精神。”她回忆说，“那时的理念是国有、集中、控制、调节。现在，这一切必须要结束。”45撒切尔的货币主义观点面临着强大的反对，连她自己政府里的成员都引用大街上日渐增高的失业率和犯罪率，作为她政策失误的证据。哈耶克在伦敦经济学院的得意弟子尼古拉斯·卡尔多，此时是剑桥经济学院的名誉教授，他嘲笑撒切尔逆潮流而动背后的哈耶克式观点，并初步编了一本呼唤凯恩斯精神的小册子，名为《撒切尔夫人的经济后果》（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Mrs.Thatcher）。46可惜无济于事。

撒切尔夫人下定决心要一意孤行。1980年，她刚就职一年多，就在保守党年会上说：“有些人，总劝说我们松手，不分青红皂白地多花钱，以为这就能帮助失业工人和小商人，他们可不是怀了好心，表示同情或关照。他们不是失业者或小企业

的朋友。他们是要我们重做那些最初导致问题的事情。”她坚持绝不回到凯恩斯主义的老路上，“你想掉头，随你便。夫人我是不掉头的。”47

撒切尔夫人还以传道士的口吻对下议院说：“我极度崇拜哈耶克教授。他的一些书……一些可敬的成员会好好地读一读。”48为动员她的内阁对手和她联手，她邀请弗里德曼与其一起进餐。“这次会面引出了一场有趣而热烈的讨论，”弗里德曼回忆说，“特别是，撒切尔夫人离开时，要我指导她内阁里的某些‘窝囊废’。”49英国是第一个尝试以货币主义政策解决通胀局面的重要经济体，在执行弗里德曼主义实验的过程当中，免不了有一些尝试和失误。50撒切尔夫人通过一个保守派智囊团，51向瑞士货币主义者于尔格·尼汉斯（Jurg Niehans）寻求建议。52尼尔斯告诉她，她对货币供给控制得太紧，利率设定得太高，导致英镑汇率上涨，英国的出口变得太贵。弗里德曼把英国货币主义尝试的最初失败归咎于货币供给的“回旋”。“它跌，它涨，它又跌，它又涨。”他解释说。结果就是，“出现了一轮超乎必要限度的经济衰退。”弗里德曼说。53

撒切尔的选举和她的哈耶克式观点极大地鼓励了里根1980年的白宫竞选。里根竞选采取了一个哈耶克式的口号，“我们可以不受政府的干预”，54并许诺实施减税，缩小联邦政府规模，巩固国防。1980年11月4日，里根把吉米·卡特打得落花流水。弗里德曼受邀参加总统的新经济政策咨询委员会（Economic Policy Advisory Board），委员会负责人是乔治·舒尔茨。“新经济政策咨询委员会为里根所做的，无非就是向他保证，他选择的道路是正确的，”里根的顾问马丁·安德森（Martin Anderson）回忆说，55“他们敦促他不增加任何税收，并越来越强烈地劝说他减少联邦开支，推动他取消管制。”56

弗里德曼特别看重的是，里根应当忠于稳健的货币政策，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叫他大感宽慰，沃尔克读本科时拜访过伦敦经济学院，倾心于奥地利学派的资本理论。沃尔克认为滞胀“是一条吞噬我们内脏的恶龙”，57他相信弗里德曼是正确的：调节货币供应量是关键。“人们逐渐认为这属于凯恩斯主义的一部分，即略有通胀是件好事。”沃尔克回忆说，“之后，你得到了一点通胀，紧接着你又需要一点儿，因为它刺激了经济。人们习惯了它，它的效力渐渐丧失。和抗生素一样，你必须要新品种才行了。”58

沃尔克开始收紧货币政策：在卡特任期内大幅提高利率，令得依赖借贷的企业

减少了数以千计的就业岗位。随之而来的经济衰退导致卡特丧失民心，1981年竞选连任失败。里根入主白宫后，弗里德曼和舒尔茨都赞同沃尔克的看法：要治愈通胀，就要继续深化经济衰退。但是，里根是一个喜欢被人喜欢的人。撒切尔给英国导致类似经济衰退的时候，打从民调一开始，她就成了最不受欢迎的首相。里根准备好抵御政治风暴了吗？“很明显，谁想要经济衰退啊？”舒尔茨回忆说，“但我记得里根总统引用了那句名言，‘若非此刻，更待何时？若非我等，更待何人？’”59

通过紧缩货币来抑制通货膨胀，只是后来统称为“里根经济学”（Reaganomics）一揽子政策中的一个环节，这些政策都部分受哈耶克或弗里德曼思想的启发。里根对高收入税的亲身体验，使他相信减税能激励美国人更努力地工作，这也是新经济政策咨询委员会成员阿瑟·拉弗（Arthur Laffer）所极力倡导的政策。601974年12月，拉弗和福特总统的参谋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Rumsfeld）、他的副手迪克·切尼（Dick Cheney）共进晚餐后，他提出，所得税率有一个能获得最大收益的最佳区间。他在一张餐巾纸上画了一条钟形曲线，指出甜区的可能位置。

里根身边的经济学家立刻将“拉弗曲线”当成劝诱他人相信减税能增加收入的工具。里根认为，大幅削减收入税，将增加个人消费，反过来又能通过“涓滴效应”拉动整个经济的需求。里根经济政策的第三点关键因素（同样由拉弗倡导），是“供给学派经济学”（Supplyside Economics），即这样一个概念：繁荣的经济最好是通过减少行业管制和企业税收，鼓励生产商供给更多更廉价的商品来实现，而不是像凯恩斯主义那样增加公共开支，刺激“需求主导”的发展。

拉弗很优雅地指出，尽管拉弗曲线以他的名字命名，但它并非自己的创作，早有其他人抢在了前面，尤其是凯恩斯。“税收太高，有损其本意，这样的说法也并不奇怪，”1933年，凯恩斯写道，“只要有足够的时间采摘果实，减税比增税平衡预算的可能性更大。”凯恩斯把不断增税的人比作“只懂得做表面算术题”的制造商，他不断提价，哪怕由于价格太高，根本没人买他的东西。61

“涓滴效应”也来自凯恩斯主义的推导，按照理查德·卡恩的乘数逻辑，那些购买商品的人创造了就业机会，有了更多的支出。然而，里根的减税明显让哈耶克感到紧张。“就其尝试的规模而言，我有点担心，”1982年，哈耶克说，“我完全支

持缩减政府开支，但把支出减下来之前先减税，这是一件很冒险的事情。”62

凯恩斯主义者们对里根的经济实验持普遍的怀疑态度。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以他一贯慢吞吞的说话态度，嘲笑供给学派的主张，“穷人不工作是因为他们收入太高，富人不工作是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收入。你靠着少给穷人、多给富人来扩大和振兴经济”。他驳斥“涓滴效应”是“马和麻雀理论——如果你给马足够的燕麦吃，总有些燕麦会洒在路上供麻雀吃。”但他承认，收紧货币供应量“能以其严峻的风格对抗通胀”。63里根1984年总统选举的民主党对手沃尔特·蒙代尔（Walter Mondale）把“涓滴”归纳成了一个社会阶层问题，嘲笑“里根经济政策背后的想法是这样，水涨起来了，所有的游艇也高了。”64

沃尔克的货币紧缩带来了一轮严重的经济衰退，1981~1982年足足持续了16个月，通货膨胀急剧下降，从1981年的11.8%降到了1983年的3.7%。但物价仍然很高。失业率上升到大萧条以来的最高水平。1980年，里根接手时的失业率为7.1%；到1983年和1984年，则涨到了9.7%和9.6%。备受嘲笑的菲利普斯曲线[6]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大通胀时似乎失去了意义，现在好像又正常运作起来了。

按拉弗的计算，里根的减税政策就跟肯尼迪的减税政策同样有效。肯尼迪将最高税率从90%降到70%的4年后，联邦所得税实际增长率从此前4年的2.4%提高到了8.6%。同一时期，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从4.6%上升至5.1%，失业率从1962年1月的5.8%下跌至1966年12月的3.8%。

里根的减税来得更狠。他把所得税一刀砍掉了25%，最高收入者的税率从1981年的70%削减到1988年的28%。企业所得税从28%降到20%。根据拉弗的说法，结果相当惊人。尽管1978~1982年，经济仅有0.9%的实质增长，但1983~1986年却飙升到4.8%。这种增长反过来变成了就业岗位，到1989年1月里根离任时，失业率仅为5.3%。65

不过，这还不是故事的全部。尽管拉弗曲线的最佳收入区间的确存在，削减所得税仍然让联邦收入大幅下降。1982年，里根为快速增长的预算赤字感到大为震惊，取消了对高收入者的各种税收减免，增加的税收创下了“二战”后纪录，高达370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0.8%。66

不管怎么说，货币主义者仍然宣称获胜。通货膨胀已经从系统中清除掉了，资

本主义的自由力量得到释放。“里根的这些行动，降低税率，再加上他强调取消管制，释放出了自由市场的根本建设性力量，从1983年至今，它似乎一直在增长。”67弗里德曼乐不可支。但弗里德曼没有提及一个重要的元素：里根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消耗着纳税人的钱。里根削减了针对贫困人口的福利计划，但这和他在国防上激增的开支比起来实在无足轻重。若以定值美元来看，国防预算从1980年的2670亿美元猛增至1988年的3930亿美元。68公共债务从1980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3，增长到1988年年底的占一半强，从9000亿美元涨到了28000亿美元。69

预算失衡靠公共借贷来维持。里根入主白宫时，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在他退休回到圣巴巴拉的牧马场时，美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欠了外国债主们4000亿美元。70尼克松的经济顾问赫伯特·斯坦评论说：“除了语言生动之外，里根经济政策最鲜明的特点，就是它预算赤字的规模了。”71里根，沐浴在蓬勃发展的经济带来的温暖之下，摆脱了赤字创纪录的麻烦。他打趣地说：“我不担心赤字。它足够大了，能照顾自己啦。”72

在许多凯恩斯主义者看来，里根经济政策就像是变戏法，是政治噱头，表面上打着削减政府规模的哈耶克旗号，实质上是通过激增的国防开支拉动总需求和经济增长。按诺贝尔奖得主、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家罗伯特·索洛所说：“1982~1990年持续的经济繁荣，是靠里根政府以增加支出、降低税收这一明显的凯恩斯主义方式设计出来的，这是财政预算赤字扩张性增长的经典案例。”73

加尔布雷斯表示同意。“（里根）在国家正经历着一场相当不愉快的经济衰退时就任总统，并（执行了）许多强硬的凯恩斯主义政策，”他说，“其结果之一，就是在罗纳德·里根执政的80年代改善了经济。有趣的一点是，这一切是由并不真正理解凯恩斯、对他持批评态度的人完成的。这就是不由自主的匿名凯恩斯主义吧。”74

接下来的20年，哈耶克对政府干预演变为暴政的警告越来越受欢迎。1991年苏联解体。民主新政府的领导者，如捷克共和国的前两任总统瓦茨拉夫·哈维尔（Vaclav Havel）和瓦茨拉夫·克劳斯（Vaclav Klaus），波兰副总理莱谢克·巴塞罗维茨（Leszek Balcerowicz），都赞美哈耶克是他们的指路明灯。1随着凯恩斯主义概念的退却，自由市场理念的回归，哈耶克活到了证明自己正确的那一天。看着事态的发展，他说：“我早就告诉过你们。”21992年3月23日，他以92岁的高龄

在德国弗赖堡过世。

在美国，对政府在国家事务中所扮演角色的公共辩论逐渐变得色彩鲜明对立，而学术领域里一度非黑即白的选择却过渡到灰色的阴影中。这时出现了一段缓和期，英国工党大臣丹尼斯·希利（Denis Healey）3称之为“受虐货币主义”（sado Monetarism），4经济学家则称之为“残酷凯恩斯主义”（crude Keynesianism）。5人们发现严格的货币措施是非常不可靠的指标，转而利用利率工具来控制通胀。重大的经济论战围绕常见的问题展开：公共赤字的规模，如何缩小它；自由贸易的可取性；税收的程度和性质；从不值得的领域撤出国有权益。

关于集中管理经济（这本身是凯恩斯主义的概念）的辩论演变成了一个漫长的“后凯恩斯主义”阶段，即对凯恩斯与哈耶克的观点进行折中。尽管国民经济的总管们普遍认同，应当采用混合调配了凯恩斯和弗里德曼观点的鸡尾酒来最大限度地发展经济，扼杀通货膨胀，可学院派经济学家之间仍然存在深刻的分歧，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它们大致沿袭了凯恩斯-哈耶克从前辩论的老路。一方是所谓的“淡水经济学家”，因为他们所在的大学聚集在美国内陆的大湖区，另一方是“咸水经济学家”，来自沿海的几所院校。淡水经济学家和哈耶克一样，认为通货膨胀是国家最可怕的祸害，咸水经济学家则像凯恩斯一样，认为失业问题更加严重。

淡水派认为，应当把经济视为有感觉力的有机体，受市场参与者的理性决策所控制。虽然政府应确保市场的自由和公平，但政府的支出和税收却偏移了经济的自然秩序。他们认为，基于个人所理解的未来状况，他们会做出理性的决策；商人若是担心国家刺激经济发展的支出会导致更高的税收和通胀，就会暂不进行新投资；全球化和电子通信的兴起让市场变得更有效率，造福了所有人。他们声称，经济衰退是经济周期的常规面貌，只能忍受，无法治愈。他们偏向“供给”式补救措施，即取消政府的管制或税收，鼓励企业提供更便宜的商品，从而刺激需求。

咸水派认为，对经济自由放任并不适合所有人。他们把衰退症状视为经济体健康状况不佳的表现，或是不可预见的冲击带来的结果，在商业周期的底部，应当争取解决失业问题。他们相信市场，特别是设立了工会组织的劳动力市场，应对变革非常迟缓，竞争不完善。他们承认供给学派改革的逻辑，但更强调“需求拉动”的补救措施，即把资金投入系统当中，让商品变得更实惠。

争论兜了整整一个圈子。如今，哈耶克崛起，凯恩斯陷入低谷。许多咸水经济

学家变得不愿意承认自己和凯恩斯的渊源。“到1980年前后，你在美国很难找到年龄在40岁以下的学院派宏观经济学家会自称是凯恩斯主义者了。”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凯恩斯主义者艾伦S.布林德（Alan S.Blinder）说。6芝加哥大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7做了很多削弱传统凯恩斯主义概念的工作，他也发现，“要是被叫做‘凯恩斯主义者’，人们甚至会觉得受了冒犯。在研究讨论会上，人们再也不严肃对待凯恩斯主义式理论了。听众会交头接耳，相视而笑。”8哈耶克发起的反凯恩斯革命似乎圆满完成。凯恩斯主义教皇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之子詹姆斯K.加尔布雷斯（James K.Galbraith）回忆说：“突然之间，保守派成了美国文化钟爱的勇敢骄傲坏小子，而像我自己这样的自由派，却成了国家的扫把星，绝望地受着老观念束缚的遗老遗少。”9在布林德看来，到2004年，凯恩斯主义已经变成了累赘，“同时代的经济学家们在讨论稳定货币政策时……几乎所有人都谈的是货币政策，而非财政（税收和支出）政策。”10

1978年，哈耶克宣称：“就知识分子观点的运动而言（原文如此），在我这一辈子，它此刻首次转入了正确的方向。”111978~2008年，自由市场欣欣向荣。然而，尽管有许多经济学家暗自怀疑市场力量的有效性和公正性，各方各派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家都说它们好得很。一如哈耶克在佩尔兰山上所做的预测，游荡荒野30年之后，哈耶克主义者压下了凯恩斯主义者的风头。凯恩斯时代之后，哈耶克时代到来了。必胜的信念在一些人当中弥漫开来，他们相信，后凯恩斯时代新共识已经解决了凯恩斯和哈耶克在20世纪20年代确立的难题：商业周期（以及繁荣和萧条的无尽交替）是否能够驯服，又是否应该驯服。

卢卡斯毫不怀疑。周期性的恶龙已经被打垮了。“宏观经济学……业已成功，”他宣称。“事实上，预防萧条的核心问题真正解决了。”12“冷战”结束之后，美国政治经济学家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13断言，社会发展的进化阶段，即从封建主义经过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迈入现代资本主义民主，走到了尽头；世界达到了“历史的终结”。14经济学家怀着同等的信心宣布“经济史的终结”：世界经济不会再回到萧条状态，这种病治好了。人们赞誉弗里德曼（竟然不是凯恩斯）解决了20世纪30年代发生大萧条以及怎样避免它再度发生的谜题。在弗里德曼90岁生辰纪念活动上，时任美联储主席的本·伯南克（Ben Bernanke）15为美联储在20年代的缺点发表了迟来的道歉。“关于大萧条，”他宣告，“你是对的。是我们导致的。我们很抱歉。但多亏了你，我们才不会再重蹈覆辙。”16

和整个这一时期（名为“大稳健”）捆绑在一起，并成为两党弗里德曼式货币政策象征的人物，是艾伦·格林斯潘。1987~2006年，美联储在他领导下备受人们赞誉。如果说他也犯过错，那么，在他离任很久以后，这些错误都不曾显现出来。格林斯潘在青年时期师从斯坦·盖茨（Stan Getz）学吹萨克斯管，和流行艺术家拉里·里弗斯（Larry Rivers）同在一支爵士乐队做伴奏，还跟泼辣的安·兰德（Ayn Rand）本人以及她的自由意志论观点眉来眼去。格林斯潘信心百倍地表示，正是凭借他对事件高深莫测的把握和理解，使连续4位总统确信，他是确保经济稳定不可或缺之人。美国记者迈克尔·金斯利（Michael Kinsley）17指出：“格林斯潘对货币政策给予了新的重视，他将自己倒腾数字的天赋和在社会、商界的信誉结合起来，再辅之以一贯夹杂含混的语言（这种语言风格，很快就会在听证会成为一时的传奇），搅和一阵儿，喝了下去，顿时变成了魔法术士。”18

格林斯潘就是扑克世界所谓的“算牌手”。他如此总结自己超谨慎的理念：“我总是问自己这个问题，如果我们错了，会给经济造成什么样的代价？要是没有负面风险，你尽管尝试自己想要的任何政策。如果失败的代价有可能非常大，你就应该避免此种政策，哪怕成功的概率高于50%，因为你无法接受失败的代价。”19

1989年，前美国海军飞行员，高大拘谨的乔治H.W.布什20来到白宫，对罗纳德·里根确定的经济路线未作太大调整。里根经济政策在此前的两届总统任期内学到了大量的教训。布什任上做了调整，更动了优先顺序。里根时代的随心所欲改变了美国的氛围。私人企业取代共同行动，成为改变社会的首选方式。20世纪60年代“X一代”热爱自由的花童们，让路给了80年代和90年代以自我为中心的“Y一代”。鲍勃·迪伦（Bob Dylan）“变革时代”的行动呼吁，被戈登·杰科（Gordon Gekko）“贪婪是善”的口头禅所取代。21对小政府、州权和更多个人权利的需求，替换了全国范围内的少数族裔民权之战。

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泰勒规则（表明了利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权衡，因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家约翰·泰勒（John Taylo）22而得名）逐渐取代了菲利普斯曲线（表现就业与通货膨胀之权衡），成为经济运营者的首选方程。布什本来是美国东北部出身，后来成了得克萨斯州的显贵，在耶鲁大学时主修前凯恩斯主义经济学，231978年在共和党初选时，他指斥货币主义是“巫术经济学”，24不过，由于里根任命他当了副总统，他只好把怀疑藏在心底。到1988年布什与民主党的迈克尔·杜卡

基斯（Michael Dukakis）25角逐总统时，他更是采纳了共和党人愿意听到的里根式减税、小政府言论。他在巡回讲演上说过一句日后备受人嘲笑的话：“请读我唇，不加新税。”26

一场经济风暴迎头扑上布什。1990年7月，持续了92个月的里根繁荣期（自20世纪60年代肯尼迪/约翰逊时代以来最长的繁荣时期，也是自1854年来第二长的持续经济增长期）戛然而止，布什代人受了过。该年年底，通货膨胀率上升到6.1%，失业率攀升至1991年的6.7%，1992年的7.4%。预算赤字从1989年的1520亿美元翻倍到了1992年的2900亿美元。

为了和民主党控制的国会达成协议，布什选择了提高税收而非削减开支，这个决定破坏了他在包括弗里德曼在内的许多共和党人心目中的信誉。弗里德曼迄今仍对遭布什轻蔑解雇耿耿于怀，为布什的两面三刀深深受伤，他严厉批评布什政府的经济政策，说它是“反向的里根主义”，是“术巫经济学”。[7]“布什先生在某些领域，比如外交政策上，或许有着坚定的原则。但在经济政策上显然是没有的。”27弗里德曼批评道。

经济周期的持续时间比选举周期要久，再加上美联储又是格林斯潘总揽大权，布什无力使之同步。布什很清楚过于紧缩的货币政策威胁到他的连任竞选，他也公开表达过这样的意思。“我不希望看到我们如此强烈地反对通货膨胀，阻碍经济增长。”28他对记者说。但格林斯潘不准备放松货币供应量来掀起选举前的繁荣景象。随着1992年总统大选临近，布什的困境，因为第三方候选人罗斯·佩罗（Ross Perot）的出现而有所缓解。佩罗是个矮个子的得克萨斯州堂吉诃德式人物，倾向于开放贸易边界，维持联邦赤字。佩罗调解的最终受益人是英俊的前阿肯色州州长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29他的竞选口号是：“重要的是经济，笨蛋。”克林顿主张平衡预算，逐渐减少国家债务；培养美国民众的技能，以便他们能更好地就业；自由贸易。

入主白宫之后，克林顿迫切地希望不被人看成是凯恩斯式增加税收、大手笔动用政府开支的自由派。考虑到在里根和布什治下，国家债务已飙升3万亿美元的事实，他主张走“第三条道路”，将保守派的经济措施和进步派的社会政策结合起来。他依靠政府耗资少的社会项目，如准予无薪产假和病休等，来调和从紧的货币政策。他呼吁有选择地对“中间阶层”减税，提高富人的所得税。为了扩大美国商

品的市场，他正式批准了布什任上就在进行的与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自由贸易协定。

20世纪90年代初，“政府规模应当维持在最低限度”的哈耶克式观点，通过前大学教授、后成为佐治亚州议员的纽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的雄心展现出来。1993年，克林顿提出一项议案，希望放弃里根对富人的税收减免，30削减2550亿美元的社会福利项目，在4年内每年减少1.25亿美元赤字。可心急的金里奇却发起了更为宏大的削减联邦政府规模的计划，“靠一毛硬币就叫国家这艘大船转向”。31他执笔为共和党1994年的中期选举撰写了哈耶克式的宣言《美利坚契约》（Contract with America），发誓要靠平衡预算、减少企业管制、削减税收来“结束政府过大、插手过多、大手大脚挥霍公众税金的状态”。32在这次选举当中，两院在40年中首次同时落入了共和党之手。金里奇和其他人宣称，这是民意要求终止政府的侵犯。

金里奇马不停蹄地向总统摊牌，要求一刀切地大幅削减医疗保险、医疗补助、教育和环境控制经费。新任的众议院多数党领袖汤姆·迪莱（Tom DeLay）认为，“大政府靠公众养活太久了，我们必须叫它节食，如有必要，还得让它狠狠地节食”。33共和党打算，要是总统不听话，就剥夺政府的资金，叫联邦政府关门。金里奇解释说：“这就像强制戒毒一样。你必须做点类似的事情，来点震慑效果，好叫华盛顿认真对待。”341995年11月中旬，政府的非要害部门统统停工5天。80万联邦雇员遭到解雇。

但金里奇本意里的有原则对抗很快演变成了一场闹剧。11月早些时候，克林顿总统和国会领导人搭乘空军一号前往以色列，出席该国领袖伊扎克·拉宾（Yitzak Rabin）的葬礼，金里奇却大声抱怨自己坐在了飞机后排。即便是金里奇的盟友，比如迪莱，也意识到冠冕堂皇的“共和党革命”的领袖，这一回“犯下了他这辈子最大的错误”。“可惜啊，”迪莱回忆说，“纽特疏忽大意地说了这样的话，现在，叫政府部门停摆的整个道德基调全毁了。原本是为了财政明晰而打的高贵战斗，如今看起来却像是被宠坏了的小孩在不讲道理地呱呱叫。”35

金里奇挑起第二轮政府停摆，让26万名联邦雇员于圣诞节期间在大街上沦落了21天之后，正打算参加总统竞选的鲍勃·多尔（Bob Dole）等温和派共和党参议员放弃了战斗。金里奇的哈耶克起义溃散了。从佩尔兰山到国会山的长征晃动了。一如迪莱所说，金里奇“被典型的学术功能障碍所困扰，他认为光有想法就足够了，有

了想法就该那样”。36

金里奇的失败革命，令淡水派和咸水派经济学家之间的潜在争论浮上水面。克林顿承诺用税收收入来偿付国债，这是凯恩斯主张的繁荣期政策。1930年，凯恩斯认为：“我们必须找到一个大胆的政府项目，把我们推出老路线。如果它有着恢复企业利润的效果，那么，私人企业这台机器兴许能再一次让经济系统靠自身的动力开动起来”。37一旦经济走向繁荣，税收收入就会接连不断地涌进来，此刻就应尽快偿还政府为刺激经济所借贷的资金。

1997年，克林顿提出《平衡预算法》（Balanced Budget Act），希望通过降低医疗费用，到2002年实现预算平衡。2000年夏天，他宣布预算账户连续3年出现盈余，1998财年盈余690亿美元，1999年1240亿美元，2000年预计至少为2300亿美元，这是自1947~1949年之后（当时还是哈里·杜鲁门任总统）第一次连续3年出现盈余。在这3年里，国债减少了3600亿美元，其中2000年一年就还了2230亿美元，这是美国历史上外债减少得最多的一年。39若按照这样的速度，5.7万亿美元的国债2012年就能还清了。40格林斯潘盛赞克林顿是“我们在一段时期以来最棒的共和党总统，41绝不是典型的增税增支出型自由派，却仍然是个民主党人。”[8]42

然而，克林顿明显偏保守派的德行，却引发了对手出人意料的反应。里根时代末期所掩盖经济思想的鸿沟，因为争论如何支配繁荣带来的果实，再次暴露了出来。罗伯特·卢卡斯等新古典经济学家用以微观为基础的宏观经济模型进行了推理，国会的共和党人在其鼓动下，倾向于以减税的方式支出盈余，鼓励美国人更努力地工作。克林顿则倾向于以还清国债、喜欢花的盈余结算的国家债务及承销医保和社会保险费用的方式来支出盈余。较之减税，格林斯潘更支持还清国债。

克林顿在1996年的国情咨文中骄傲地为哈耶克唱颂歌：“我们知道大政府也没有一切的答案。大政府的时代已经结束了。”43克林顿效法哈耶克的思想，解除商业管制。1999年，在财政部长罗伯特·鲁宾（Robert Rubin）的支持、在格林斯潘的有力认可下，他批准了《格雷姆-里奇-比利雷法》（Gramm-Leach-Bliley Act），放弃了富兰克林·罗斯福在大萧条时代制定的银行、保险、金融业法规。60年来第一次，投资银行获准与储蓄银行合并。在鲁宾、格林斯潘和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亚瑟·莱维特（Arthur Levitt），以及鲁宾继任者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的建议下，克林顿还拒绝对日益增长的信贷衍生工具交易（即对债券和

贷款的信贷风险加以投机）加以管制。

2001年1月，前得克萨斯州州长、石油大亨乔治W.布什44在竞选中险胜，当选总统。由于他前任的谨慎，布什继承了2000~2001纳税年度的1280亿美元预算盈余，次年预计可达2800亿美元。国会预算办公室估计未来10年，盈余将达5.6万亿美元，其中3.1万亿美元已经分配出去用于负担社会和医疗保险。预算办公室估计，由于接下来的每一年可出现5000亿美元的盈余，到2006年，就可以彻底还清3.4万亿美元的债务。布什对怎样支配这笔难得的遗产并没有做太多的考虑：他想靠着削减个人所得税实现更多、更多的盈余。因为共和党在两院都占大多数，他宣布了一项1.35万亿美元的减税计划，日期覆盖到2010年年底，当年即刻退税4000亿美元，平均每个家庭退税600美元。

但新总统上任没几个星期，他就发现自己正面临着一场即将逼近的经济衰退，这是互联网泡沫市场破灭迟来的结果，也是全球化导致竞争加剧、物价降低的结果。格林斯潘开始降息，以便将经济增长放缓的影响减到最低。马上还会出现更糟糕的事情。由于1~9月标准普尔指数狂跌20%，来自股票交易的资本利得税跳水，7月，联邦税收收入大幅下挫。华尔街跌跌撞撞地转为熊市，一度庞大的盈余烟消云散。紧接着，9月11日，基地组织对美国进行了恐怖袭击。

基地组织领导人奥萨马·本·拉登声称其目的是通过恐怖主义搞垮美国，就像他为苏联占领阿富汗而搞垮前者一样。布什以大规模的凯恩斯主义刺激应对此次威胁。他召集格林斯潘、前克林顿政府财政部长鲁宾、布什的经济顾问拉里·林赛（Larry Lindsey）、国会各领导人开了会，迅速批准了全新的大规模联邦开支。除了用于巩固美国边境（如强化机场安全性）的资金，他还出台了大量与保障美国安全丝毫无关的“分猪肉”项目，如缅因州的消防局建设。格林斯潘把利率降低至1%，以期迅速将资金泵入经济，相对而言，略有通胀的经济前景，远比好过受恐怖主义威胁而陷入萧条的经济。

然而，这些提升经济的凯恩斯主义措施似乎并未起到作用。截至2002年年底，增长非常缓慢，利润极低，股市处于低迷状态，失业率持续走高，预算赤字达到1580亿美元，自前一年盈余1270亿美元的状态变为亏空了2500亿美元。2002年9月，1990年的《预算加强法》（Budget Enforcement Act，确保所有新的联邦支出都有对应偿还的税收）获准失效。美国好像面临着新一轮的危险：类似日本那样

贯穿整个90年代的长期通缩（利率降低至0，再加上大手笔的公共支出，仍然不能重振一度蓬勃发展的日本经济）。

布什借此理由继续减税、增加国防开支，还为有医疗保险的人增加了额外的处方药福利。45“若按预期大规模盈余的条件，这些目标也并非不切实际。”格林斯潘回忆说，“但乔治W.布什上任6~9个月之后，这些盈余就全部消失了。”462002年中期选举共和党获胜后，布什又将股票的股息税降低了50%，此举遭到财政部长保罗·奥尼尔（Paul O'Neill）反对。2002年12月的一次会议上，副总统迪克·切尼要求股息减税，对经济做进一步的现金刺激，奥尼尔说，赤字已经太大了，国家正“走向财政危机”。“里根证明赤字无关紧要，”切尼打断他道，“我们要赢中期选举。这是我们应得的权利。”47不久，奥尼尔辞职。

事实证明，发动伊拉克战争、在阿富汗开展军事行动、推出反恐措施，都是很费钱的：2006财年总计2万多亿美元的联邦预算中，这部分支出占了1200亿美元。但较此前的战争，它们毕竟只在总值13万亿美元的经济中占很小的一部分。481994年《美利坚契约》中的哈耶克式理想，随着企业丑闻（如安然和世通的大规模欺诈行为），以及国会中共和党人“分猪肉”式支出项目的曝光，化作了泡影。俄亥俄州议员约翰·博纳（John Boehner）是《美利坚契约》的执笔人之一，2003年，他写道：“原来，美国人民并不希望政府大规模缩水。”49保守派智囊机构“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的预算分析师布赖恩·里德尔（Brian Riedl），得出结论说：“共和党现在对小政府根本不感兴趣。”50尼克松时代任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赫伯特·斯坦早在1985年就评论说，“激进的保守主义革命，是在野保守派的梦想，而非执政保守派的实践。”51两年中，联邦政府的可任意支配开支增长了22%，从2002年的7340亿美元提高到2004年的8730亿美元。到2004年，联邦赤字迎头冲上4000亿美元。

2006年11月，共和党在两院失去多数席位。根据1995~2002年任众议院多数党领袖的迪克·阿米（Dick Armey）所说，这次失败，宣告1994年拉开序幕的哈耶克式小政府革命结束。回望《美利坚契约》，他写道：“最初那几年，我们的首要问题是，怎样改革政府，将金钱与权力交还给美国人民？最终，受狭隘眼界驱动的政治官僚，取代了政策创新家和‘94精神’。他们的问题变成了我们要如何把持政治权力？”52哈耶克的理想化愿景败在了老派政治斗争之下。

哈耶克思想的另一脉络，即让自由市场依靠自己的机制运作，它会纠正自己的错误，确保所有人得到繁荣——在2007年夏天，它遭受了近乎致命的一击。由于包含了高风险“次级”房屋抵押贷款的捆绑债务价值大跌，银行在恐惧之下失灵，不能或是不愿意向其他银行借贷。银行家之间弥漫的紧张情绪，吓坏了银行客户，令英国的一家银行出现挤兑——这是自19世纪中期以来的第一次。靠在公开市场上大范围借贷的储蓄及贷款银行——北岩银行，无法获得足够的信贷，满足储户的取款。人群包围了银行的各分行，要求取回自己的积蓄。为了防止恐慌蔓延到其他金融机构，英国政府将北岩银行收归国有。这对世界各地的银行是一个警告，因为大部分的银行都背负着大量债务。储户和投资者当中的恐慌，在大西洋两岸的金融机构扩散开来。

这场灾难，宣告十多年来允许市场基本不受管制、自动创造经济繁荣和增长的实验失败了。“整个理论大厦都倒塌了，”格林斯潘对国会说，“我犯了一个错误，我以为，追求自我利益的组织，尤其是银行和其他机构，有着最佳的能力保护自己的股东和他们在企业里的股权……我深受震惊。”53格林斯潘的言论，和80年前凯恩斯对大萧条的评论遥相呼应。“我们把自己卷入了一场巨大的混乱，我们在控制一台精密机器上犯了错误，我们并不理解它的运作。”凯恩斯写道，“结果是，我们创造财富的可能性暂告破灭了，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指望了。”54

为应对这场格林斯潘称为“百年一遇的凶猛金融危机”，55布什没用太多时间思考是否纵容市场跌入谷底。他立刻向凯恩斯伸出了求助的手，毕竟，凯恩斯曾说过，“我不明白，大范围的破产对我们实现繁荣的目标会有什么好处。”56“30多年来，凯恩斯的声誉日渐凋零，”凯恩斯的传记作者彼得·克拉克说，“可在差不多30天里，这位已故经济学家就被重新发掘出土、恢复名誉了。”572000年的时候曾有人问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凯恩斯时代是否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加尔布雷斯宣称：“只要再来上一场经济衰退——这很有可能发生，我们就会回过头去，利用一部分政府盈余来创造就业，重新发动经济了。”58他从未想过，这段话的预言色彩竟然是那么强。2008年2月，布什要求国会以所得税退税的形式，投入1680亿美元来刺激经济。财政部从银行购买7000亿美元“不良资产”（这是坏账的一种委婉说法）。消费者的终极避难所——国家，全力出手干预经济，希望能悬崖勒马。在英国，政府通过股票交换救助银行；在美国，政府直接给银行钱。

布什的刺激计划，还伴随着本·伯南克（他接任了格林斯潘美联储主席一职）鼓

励银行恢复放贷的一揽子行动。2007年9月到2008年4月，利率减半，巨大的短期贷款涌向银行，美联储则买下不良的抵押贷款债务。2008年3月，次级抵押贷款市场的领导者贝尔斯登，贱卖给了摩根大通。9月，雷曼兄弟投资银行破产。两轮倒闭都不受人欢迎，即便是那些自称相信市场应顺其自然的人也不喜欢。与此相反，最常见的批评是，政府当局居然“允许”雷曼兄弟停止交易。2008年10月，美国财政部长亨利·保尔森获得国税授权的7000亿美元，拯救其他濒临破产的金融公司。2008年12月16日，美联储将利率下调至零。世界各地的政府和央行都采取了类似的行动。

凯恩斯复仇一般地又回来了。《时代》周刊以“凯恩斯复出”为题，欢迎老男孩的回归。59“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记者贾斯汀·福克斯（Justin Fox）写道，“害怕因为信贷崩溃导致需求崩溃，一头栽进经济崩溃。面对这种威胁，各国政府似乎情不自禁地转向了凯恩斯在20世纪30年代初设计的补救方案，通过更多的政府支出，最好是（但不一定）兴建高速公路和学校等有益公共设施，刺激需求。”60在埋葬凯恩斯上出力最多的芝加哥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卢卡斯宣称：“我猜，枪林弹雨之下，人人都是凯恩斯主义者。”61随着复苏的凯恩斯主义浪潮席卷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咸水经济学家恢复了威信和控制，淡水经济学家则明显陷入沉默。“我想大家都同意，凯恩斯主义发挥不了作用，”保守派的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里，克里斯·爱德华兹（Chris Edwards）发出了孤独的抱怨声，“但此刻，眼见着国会要出台新的刺激计划，凯恩斯主义者又从树林里倾巢而出，我很想知道，反对凯恩斯主义体系的那些理论家都到哪里去了。”62

2009年2月，总统贝拉克·奥巴马63敦促国会通过一项7870亿美元的刺激法案，减税、增加失业救济金和基础建设开支。“我们必须采取行动，因为不这样做，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他解释说，“多亏了《复苏法案》（Recovery Act），消除了出现第二次大萧条的可能性。”64但总统的更替，再次带来了意识形态分歧的争执。没有一个共和党人为刺激计划投赞成票。而且，还没来得及喘口气，原有的凯恩斯-哈耶克之争也再度爆发了。一切就如同80年前政府从来没干预过经济似的。

从2009年起，围绕刺激的有效性、刺激的规模是否足够大的问题，出现了新一轮的辩论。对凯恩斯主义者而言，争论的核心在于1936年凯恩斯对萨伊定律的错误本质所提出的理由，该定律断言，收入总归都是要自动花出去的。经济衰退中减免的税收大多是存入银行，而非消费出去，企业也着手囤积现金，大力储蓄，减少开

支，这导致卡恩的乘数发挥不了什么效果。本来应该尽快往经济内泵入现金，但奥巴马的刺激方案大部分都被推后了，资金要数月甚至数年后才能进入经济。行政分支要求的是能尽快为失业者找到就业岗位的建设项目，立法机构里的议员们却往往提议在自己的州里开展长期项目，对经济很难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

“对通用汽车好，就是对美国好”这个概念落实到了字面上。美国人因为担心失业，推迟了购买新车的决定，全美四大汽车巨头里有三家都沦落到了破产边缘，它们供应商的长长链条也几近断裂。财政部拨给它们现金援助，换回了股权。

2008年11月，华盛顿召开G20峰会，世界各国的领导者达成了一项共同政策，以求避开迫在眉睫的经济大衰退。他们承诺削减利率，允许公共开支超过税收。到2009年9月匹兹堡会议召开的时候，长期衰退的前景似乎已经淡化了。2010年夏初，各国领导人的心情彻底转晴。凯恩斯式的支出措施还没来得及发挥作用，买家们却纷纷开始懊悔。由于债权人担心政府违约，国债的规模对货币造成了威胁。希腊债务缠身，经济摇摇欲坠，逼得欧盟在2010年5月匆匆拉来一笔贷款，防止希腊政府欠债不还。2010年11月，爱尔兰也获得援助，接着是2011年4月的葡萄牙。债权人对意大利、西班牙、比利时，甚至法国的经济表达了类似的主权债务疑虑。若是对希腊、爱尔兰和葡萄牙的破产放手不管，欧盟货币，即欧元的延续能力就会遭到威胁，而这又将破坏欧洲政治的一体化运动。2010年6月在加拿大多伦多召开的G20会议上，18个月前还支持凯恩斯主义解决方案的各国领导人，又坚持要大幅削减政府支出、偿还国债了。他们的态度变得飞快，就像是刚给了头疼患者一片阿司匹林，紧接着就动手抽空他的胃。

奥巴马的经济刺激计划获得通过两年后，表明它获得成功的证据几近于无。失业率上升至2010年11月的9.8%，超过1500万人失去工作。丧失赎回权的房屋越来越多。刺激方案的反对者，包括国会中的全体共和党议员，称它行不通，说由于相信额外联邦支出和借贷会带来高税收和苛刻经营条件的人持有“理性期待”，复苏延迟了。他们希望尽快降低联邦赤字。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65在《纽约时报》上提醒那些想立刻重返降低税收和开支的人，认为他们是在向双底衰退（doubledip recession）发出邀请，就像富兰克林·罗斯福引发了1937年的“罗斯福衰退”一样。

不久，克鲁格曼等一直怀疑刺激不够大、不够快的凯恩斯主义者，要求往经济

中第二次注入资金和信贷，而且规模要更大。“我担心，我们现在正处于第三次衰退的初期，”他写道，“世界各地……真正的威胁是通缩，政府却为通胀而着迷；真正的问题是支出不足，它们却鼓吹要勒紧裤带。”66

2010年11月，民主党输掉了中期选举，“茶党”67开始左右选举。茶党要求政府停止借贷，迅速填平赤字。奥巴马行政分支发现，共和党领导者的意见严重地限制了经济管理，这部分人坚持要延续布什针对富人结合中产阶级的减税政策，不遗余力地攻击政府授权的全民医疗保险。接下来的两年里，减税和针锋相对的延长失业救济（新一轮的凯恩斯式刺激），让联邦赤字新增了8580亿美元。与此同时，美联储为保持长期低利率而继续购买政府债券，导致美元贬值。在公司已经现金泛滥的时候继续增加全美的货币供给，富兰克林·罗斯福时代的美联储主席马里纳·埃克尔斯（Marriner Eccles）早就做过劝诫。他说，货币政策是不能视为刺激的；“绳子只能拉，不能推”。也就是说，不管你准备好了多少钱，始终不能强迫企业进行投资。

那么，自哈耶克和凯恩斯第一次交锋以来已经过去了80年，是谁赢了这场经济学史上最著名的决斗呢？几十年来，凯恩斯似乎在混战中略占上风，但很难说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他的传记作者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解释说：“在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学辩论中，哈耶克败给了凯恩斯，我想，这倒不是因为凯恩斯‘证明’了自己的观点，而是因为，一旦世界经济陷入崩溃，没人会特别想知道到底是什么导致了它的崩溃。”1

尽管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人们多次宣称凯恩斯主义已死，但弗里德曼在1966年承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现在全都是凯恩斯主义者；换言之，没人不再是凯恩斯主义者”。2这种说法要准确得多，甚至，它还略带调侃地对21世纪初经济学的状况做了评估。凯恩斯和哈耶克两人之间的关键区别（即从上至下地从宏观角度还是从下至上地从微观角度理解经济更好）使得凯恩斯把持优势。他的宏观方法，如今得到了普遍的应用，诸如国内生产总值（GDP）等概念，已经成为经济学家衡量经济的重要工具。一如弗里德曼所说：“我们使用了《通论》中的许多分析细节；《通论》改变了我们研究和分析的关注点，我们全都至少接受其中的一大部分。”3

弗里德曼凭借货币主义药方改善了凯恩斯主义，但并未取而代之。“（货币主

义）从凯恩斯的研究中获益良多，”1970年，他写道，“如果凯恩斯今天还活着，他毫无疑问地会冲到（货币主义）反凯恩斯革命的最前线。”4凯恩斯一直在寻找大规模失业的治疗办法。他的补救措施是增加总需求。他提出了大量的途径：通过货币手段，降低利率，将新的资金投入经济；税收减免；公共工程。

谁是凯恩斯哈耶克大战的胜出者，弗里德曼的位置提供了最准确的衡量线索。在经济学上，弗里德曼偏向凯恩斯，他经常赞美凯恩斯的经济学，尤其是《货币改革论》。哈耶克承认：“米尔顿的货币主义和凯恩斯主义彼此之间存在更多的共同点，而我和两者的共同点都不多。”5然而，在政治上，弗里德曼更接近哈耶克。凯恩斯认为，国家干预是改善公民生活的合适途径。弗里德曼赞同哈耶克，认为只要国家干预经济，就会阻碍自由市场创造财富的能力。弗里德曼赞同减税，而不赞同凯恩斯推荐的向经济体内注入更多资金，仅仅是因为他相信政府规模会因为减税而收缩。在这方面，哈耶克迈的步子很大。哈耶克的反政府干预理念鼓舞了整整一代人。

一方面，哈耶克庆贺苏联解体，另一方面，他又觉得，普遍采用经济规划，意味着凯恩斯击败了自己。按弗里德曼2000年所说：“谁在知识界论战里胜出是毫无疑问的……较之1947年，当今知识界对中央规划和控制是不怎么支持的。但要判断谁在实践论战里胜出，这就难说多了。今天的世界比1947年时离社会主义更近了。在几乎每一个西方国家，政府如今的开支都比1947年要多……政府对商业的管制也更多了。”6

哈耶克采取绝对主义的立场：由于没有人能知道社会中每一个成员的想法，而市场价格又是揭示他们矛盾需求的最佳指标，那么，对经济施以任何的指导都是多余的。在凯恩斯主义声势极盛的时期，他无法吸引支持者，这似乎逼得他把自己的主张推到了近乎荒唐的限度。他希望国家权力收缩到最小，希望经济的每一个元素，甚至货币发行权，都在私人手里，因为他要挑战国家制造货币的垄断权力。这样一来，他就跟弗里德曼的意见直接相悖了。弗里德曼尽管也希望政府最小化，但相信经济应当受到管理，以实现稳定发展。弗里德曼选择的工具是货币政策，它需要通过国家掌握的中央银行来操作。哈耶克认为货币发行是终结商业周期的关键，而商业周期，又是他和凯恩斯的共同关注点。“我认为，如果货币体系不受政府干预，我们就没有产业波动，也没有萧条时期了。”哈耶克断言，“如果你把货币发行交到企业手里，能否维持货币稳定决定了它们业务的成败，这样一来，情况就完

全改变了。” 7

两位倡导哈耶克概念的领导人，罗纳德·里根和撒切尔夫人，对国家做了一定的收缩，令得自由企业蓬勃发展。在哈耶克90岁生日那年，撒切尔夫人写信给他：“到这个星期，我就荣幸地担任首相10年了……你的工作和思想，带给我们绝对关键的引领和鼓舞；我们欠了你很大一笔人情债。” 8撒切尔夫人授予哈耶克名誉勋位，这是英国的最高荣誉。但哈耶克并不完全认可这些恭维。1985年，米塞斯的继女吉塔·塞伦尼（Gita Sereny）9在接受采访时说，哈耶克曾煞费苦心地指出：“当然，说是我给了撒切尔夫人建议，那可不是真的。” 10同样，1989年，《福布斯》的一位撰稿人请哈耶克评价里根和撒切尔夫人的成就，哈耶克的失望情绪亦可明显看出。他认为他们的政策“很合理，恰如我们此刻的期待。他们的雄心并不高远。” 11无论是撒切尔夫人还是里根，都不曾朝着哈耶克以私人企业取代国家的最终目标迈出过哪怕一小步。在两位领导者当中，尽管撒切尔夫人起步的基础较低，接手的是一个亟待改革的混合经济，但她的成就最大。里根的哈耶克言论，远远超过了他对政府规模的缩减意愿，在他执政期间，联邦预算不断膨胀就是最好的证明。

哈耶克写《通往奴役之路》是在“二战”期间，当时反专制的斗争正进行得如火如荼，他说该书40年后就是一本“战时宣传小册子”。12可60多年以后，人们引用这本书时，却忘了考虑它成书时的特殊时代条件。即便是那些赞同哈耶克的人也会承认，用他的末日式观点来评价战后欧洲社会民主党政府的进步作为并不公平。新保守主义思想家亚当·沃尔夫森（Adam Wolfson）指出：“最现代化的民主国家享有比美国更广泛的福利制度和高度社会化的经济，而又不曾到达误入极权主义的‘临界点’。故此，福利国家并没有通往奴役的那条路。” 13凯恩斯主义的主要推动者保罗·萨缪尔森说得更直白。“在我执笔写下这些文字的2007年，瑞典和其他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按哈耶克的原始定义来看，是最‘社会主义’的。可他们的恐怖集中营在哪儿？”他问道，“在那儿，最坏的元素掌握了绝对的权力吗？要是根据‘可量化不幸福度’来汇编报告，像瑞典、丹麦、芬兰和挪威一类的地方，是奴役的最佳缩影吗？不，当然不是。” 14即便按哈耶克自己的幸福指标，即经济增长来看，斯堪的纳维亚社会民主的表现也远优于邻国的自由市场。15

哈耶克并不承认这一点。他相信，瑞典取得经济上的成功并不是因为它拥有庞大的国有部门，此外，他感觉瑞典人之间存在一种失去自由的厌倦感。“瑞典和瑞

士这两个国家已经逃脱了（原文如此）两场战争赔偿，成为欧洲大笔资金的存放地。”他提出。但这种普遍的共同繁荣和几近于无的失业率，是以沉重代价换回来的。“瑞典或许有着比我到过的其他任何国家都更高的社会不满率（他指的可能是自杀率）。瑞典人普遍有一种生活不值得一过的强烈感觉。”16

不少知识分子都认为，像瑞典这类社会民主国家比自由市场经济更文明，但哈耶克却对之持否定态度，这令他大受嘲笑。左右两翼的领军人物都轻视他。1967年，哈耶克浪潮到达最低谷时，撒切尔夫人最喜欢的哲学家安东尼·昆顿（Anthony Quinton）把他称为“庞大的恐龙”（magnificent dinosaur），17而英国的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则称他“旷野里的先知”。18“他的经济和政治立场大部分已经和同时代的其他知识分子完全脱节，”他文集的编辑布鲁斯·考德威尔（Bruce Caldwell）写道，“当人们把社会主义视为‘中间道路’的时候，当所有有良知的人似乎都同情社会主义的时候，他却攻击社会主义……本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哈耶克是一个饱受嘲笑、蔑视甚至漠视的人物。而对一位思想家来说，遭到漠视再糟糕不过了。”19

在普通人眼里，哈耶克仍然太出格了，尤其是在欧洲。不过，自从他1974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之后，也逐渐获得了应有的重视。2003年，《大英百科全书》换下了250字的哈耶克简介，代之以更详尽、更慷慨的介绍。在凯恩斯主义的美国发源地哈佛，他进入社会学研究课程纲要。但是，尽管有政治评论员格伦·贝克（Glenn Beck）的支持（贝克投入了相当多的时间推广《通往奴役之路》的信息），哈耶克仍然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人物，只不过，有些矛盾的是，自认边缘化的经济学家视他为英雄，自认为最受大企业喜欢的经济学家也拿他当英雄。

因为不受高位者的关注，哈耶克始终无法出头。他似乎觉得，被主流学术界驱逐，恰恰证实了他理论的正确性。这是常年的孤独、隔绝和抑郁给他带来的惊人自信。哈耶克从《通往奴役之路》延伸出了最终的结论：只有将整个社会彻底投入市场的力量之下，个人才能实现真正的自由。在1960年的《自由秩序原理》、1973~1979年的《法律、立法与自由》（Law，Legislation and Liberty），以及他1988年最后的作品《致命的自负》（The Fatal Conceit：The Errors of Socialism）当中，他提出了一个乌托邦，就跟从前的思想家们构思的理想社会一样，充满理想主义，不切实际。

他表现出极其强烈的使命感，叫不少哈耶克信徒生出无意间加入某个精神教派的感觉。这是他有意为之。1949年，哈耶克断言：“我们缺少一个自由主义的乌托邦，它不是单纯的防御项目，也不是稀释了的社会主义，而是真正的激进自由主义。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必须从社会主义者的成功学会重要的一课：他们凭借通往乌托邦的勇气，得到知识分子的支持，在公共舆论上获得了影响力。”20

哈耶克的乌托邦主义经常扩散成宗教主义。他的弟子拉尔夫·哈里斯形容过：“一旦……你懂得，除了通过分散财产所有权之外，没有其他方式可以维护个人自由的实质……你就可以说，它几乎就像是宗教信仰……我说过——它冒犯了我的一些基督教朋友；他们说，认为市场如同神命……真可怕，是亵渎。”21按哈耶克的愿景，政府只需要用来管理无法由其他组织来运作的社会元素就行了，比如国防。哈耶克认为应该私有化的服务“从教育、交通到通信——包括邮政、电报、电话和广播服务，所有所谓的‘公共设施’，各种的‘社会’保险，以及最重要的，货币的发行。”22但对那些认同哈耶克整体目标的人，有一点是很出乎他们意料的：哈耶克倡导国家强制性普及医疗教育和失业保险，还认为劳动力应该能在各国之间自由流动。

哈耶克从来就不是一个保守派，他是自由主义者，但并不提倡无政府状态。他建议由私人公司代替政府履行公共职责。“不需要由中央政府来决定谁有权提供不同的服务，拥有提供公共服务的强制力量更是极不可取。”23他设想“准商业企业进行竞争，争取公民”。24要是有人不喜欢公司提供的服务，可以搬到其他地方去。

他认为，代议制民主往往会造成“多数人的暴政”，削减个人自由，带来不必要的成本。他坚持主张“自由市场是迄今为止实现参与式民主的唯一机制”。25考虑到哈耶克的终极目标——用私有化社会取代代议制政府，放弃它的一切利益集团、说客和政党，他认为里根和撒切尔所做的远远不够也就不足为奇了。26

里根和撒切尔夫人成功对代议制民主进行了管理。若是他们详细阐述哈耶克的整个愿景，竞选对手会恶意地指控他们不民主。其他战后政治家主要关心的是，要让所有人都获得实践允诺自由的机会。哈耶克关注抽象的乌托邦期间，进步人士打赢了一场场人权之战：为非裔美国人、妇女和同性恋人士争取到平等的公民权利。许多政治运动，如环保运动以及20世纪60年代风俗变化带来的震撼文化变革，都不

是从完全没有政府的概念衍生出来的。在很多人眼里，哈耶克英勇的唯物主义除了英勇别无所长。

然而，公开论战逐渐转到有利于哈耶克的方向。在20世纪70年代的智利，人们推崇哈耶克。尽管大多数西欧国家坚守混合经济和福利国家道路，在英国，撒切尔主义却提供了新的方向，托尼·布莱尔的新工党政府也沿袭了这一“精简版哈耶克”的思路。只有在素以自由企业为国家信条的美国，哈耶克理念取得的进展最大，部分原因在于，美国的立国思想就是个人应当远离政府干涉。早在哈耶克做出阐述之前，一代又一代的美国人就在实践他的哲学。18世纪，起草宪法的绅士们坚信自由放任的市场很重要。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代议制民主会侵犯绝对自由。正如保守派政治学家亚当·沃尔夫森引用亚历克西斯·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的话说：“大政府，是写进民主制度的政治DNA里的。”27

哈耶克提请人们注意到美国宪法核心中蕴含的悖论，它既支持个人权利，又支持联邦政府掌握强大的权力。对政府影响力不断扩展带来的棘轮效应感到愤怒，正是戈德华特和里根等领导者要表达的基础信息。原先备受哈耶克鄙视的保守派老巢——共和党，成了哈耶克自由意志论的主要推动者。共和党和东北部望族（如纳尔逊·洛克菲勒（Nelson Rockefeller）等，认为凯恩斯主义便利了国家支出与私人利益的联姻）脱离了关系，在茶党的怂恿下，接受了哈耶克的小政府呼吁，并对捍卫现状的民主党发起了挑战。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的政治变得越来越哈耶克主义了。

1994年，共和党的《美利坚契约》尝试从联邦政府手里消除权力。它失败了。任何拆解民主制度的举动，必然都会碰到问题。政治家始终是政治家。他们辛辛苦苦地从竞选中胜出，哪怕是相信政府规模太大的人，也会觉得将好不容易赢来的权力一笔勾销太不方便。通过立法或国家宪法修正案来缩小政府权力范围的公众运动，也面临着同样的矛盾：通过法律限制政府的收税能力，有可能对偿还预算赤字的法律承诺造成损害。

过去30年，哈耶克的影响力可能有所上升，但凯恩斯却从未远离经济学家们思考的视野。联邦政府就2007~2008年金融危机的紧急应对案（乔治W.布什首先提出，贝拉克·奥巴马继续推动），是彻底的凯恩斯主义方案，两任行政分支都在经济即将崩溃时干预了市场。美国面临着生存威胁，和20世纪30年代一样，不采取行动

的话，会为天下人视为笑柄，所以几乎没人想过这么做。

在这场危机高峰时段，很少有人短期内反对过这一轮凯恩斯主义的重新抬头，更没人支持让市场自己寻找平衡的哈耶克式方案了。没人胆敢检验美国的奥地利裔政治哲学家约瑟夫·熊彼特认为自由市场必须时不时地忍受一段“创造性破坏”期的观点。危机明显证明，自由市场总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自我纠正的普遍观点是错的，没人给它第二次得逞的机会。很少有人尝试预测经济崩溃带来的可怕后果：有多少人会失业，有多少人流离失所，有多少宣告破产，有多少家企业粉身碎骨。

然而，布什和奥巴马为避免经济末日而采取的大胆行动，也并未得到太多的赞誉。事实也证明凯恩斯主义不是什么灵丹妙药。由于刺激未能迅速减少失业人数，有争议的公共项目“浪费”钱的传说又开始流传，许多美国人为政府借贷的庞大规模感到震惊。对一些人，如哈佛大学经济学家罗伯特·巴罗（Robert Barro）而言，凯恩斯成了笑柄，成了引诱未来孩子们进入庞大债务黑洞的吹笛手。其他人指责奥巴马和他的经济顾问是藏在衣柜里的社会主义者。哈耶克认为“公共投资就是浪费”的奥地利学派观点重新浮出水面。

尼克松的经济顾问赫伯特·斯坦1986年时描述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和哈耶克之战说：“传统的保守派认为凯恩斯以黑暗而邪恶的影响力破坏了自由经济制度。然而，他其实是在一个鼓吹更激进变革的时代帮忙拯救了自由制度。” 2825年过去了，斯坦的话仍然不乏真知灼见，但越来越多的美国人似乎愿意把赌注压在哈耶克痛苦的药方上，偿付凯恩斯补救措施所需的代价。

类似的忧患意识也影响到了欧洲人。然而，对他们来说，为确保欧元的存活，维持欧洲政治一体化的进程，以凯恩斯主义迎击新一轮的金融危机恐怕不如选择哈耶克好。60年来，为确保欧盟的成功，德国一直不成比例地为之买单，以他们为首的欧洲人担心，希腊、爱尔兰、葡萄牙和其他地区发生的主权债务危机会使欧元发生挤兑。德国人采取了行动，但其代价是，凯恩斯主义的措施使2008年的金融危机出现了最严重的恶化。要继续欧洲政治一体化进程，就必须收紧货币供给，大幅削减公共开支。

英国也面临着削减政府开支的压力，要不然英镑就会遭到挤兑。2010年的大选中没有任何一个党派赢得了多数席位，戴维·卡梅伦（David Cameron）的保守党和自由民主党联盟宣布了一项史无前例的削减英国公共部门的实验：第一年削减开支

10%；到5年的议会任期结束时，以削减25%为目标。英国的保守党抓住了这个投奔哈耶克式解决方案的借口，外交大臣威廉·黑格（William Hague）和就业及退休保障大臣伊恩·邓肯·史密斯（Iain Duncan Smith）等人长久以来就怀有贯彻撒切尔革命的梦想。凯恩斯的第二次复兴持续时间很短，但乞求哈耶克相助的队伍仍然四分五裂，因为赞成小政府的人实在找不出其他合适的人选视为灵感之源。自然，他们也不会承认对凯恩斯欠下的人情：80年里，凯恩斯两次拯救了资本主义。

哈耶克本人在表达对凯恩斯的钦佩之情时却没有这样的忌讳。他认为凯恩斯是“他那一代人里最有影响力、思想最丰富多彩的人物”“对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9虽然哈耶克认为，在构思合适的科学方法时总会出现错误的观念，暂时阻碍许多重要的洞见，“凯恩斯革命”只是其中的一段小插曲，但他又说：“评价凯恩斯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是如此多面，哪怕你认为他的经济学既错误，又危险……即便他的名字从未载入经济学，所有知道他的人仍会将之视为伟人。”30

和凯恩斯与哈耶克一样，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没有活到见证“大衰退”的那一天，但他曾解释过为什么保守派不肯为凯恩斯第二次拯救资本主义鼓掌。“凯恩斯对自己做过精彩探索的经济体系非常满意，”加尔布雷斯评论说，“因此，和罗斯福一样，他努力的主旨是偏保守的，目的是帮助这个体系存活下去。但在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里，这种保守主义似乎并不能吸引真诚的保守派……他们宁可接受失业、厂房闲置、对大萧条的普遍绝望，以及对资本主义制度声誉造成的一切损害，也不愿意在真正的原则上退却……当资本主义终于屈服，那些庆祝自己最终战胜了凯恩斯的人会爆发出雷鸣般的欢呼。”31

1.哈耶克在说起自己第一次遇见凯恩斯的时候，叙述总是前后矛盾。1963年，他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做名为“20世纪30年代从伦敦看经济学”（The Economics of the1930s as Seen from London, published in Collective Works, vol.9：Contra Keynes and Cambridge, p 59）的讲演中，他说：“1929年……我在一次国际会议上见到了他。”在《东方经济学家》（Oriental Economist）发表的一篇文章（vol.34，no.663，January 1966，pp.78-80，reproduced in ibid.，p.240）上，他写道：“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1928年的伦敦。”凯恩斯文集里并未提及两人第一次见面的事。

2.伦敦和剑桥经济服务（LCES）由一个执行委员会管理，委员会成员包括伦敦经济学院和政治科学院的威廉·贝弗里奇和阿瑟·鲍利、剑桥的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和休伯特·亨德森。它的目的是以可用的形式提供现有的统计数据，制定新的指标，如股票价格、货币工资和工业生产等，从而为企业服务。

3.莱昂内尔C.罗宾斯，后成为罗宾斯勋爵（1898—1984），英国经济学家。

4."Economics of the 1930s as Seen from London，" in Collected Works, vol. 9：Contra Keynes and Cambridge, p.59.

5.Hayek, Hayek on Hayek, p.78.

6.欧根·里特尔·冯·庞巴维克（1851—1914），维也纳的经济学家，卡尔·门格尔的弟子，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的老师，一贯对马克思持批评态度。庞巴维克出生于捷克斯洛伐克的布尔诺，当时它属于奥匈帝国的一部分。

7.威廉·亨利·贝弗里奇（William Henry Beveridge），贝弗里奇勋爵（1879—1963），英国经济学家，其1942年的报告《社会保险及相关服务问题》（Social Insurance and Allied Services）为日后工党构建福利国家和国民卫生服务提供了灵感。

8.Lionel Robbins, Autobiography of an Economist（Macmillan/St.Martin's Press, London，1971），p.150.

9.Hayek, Hayek on Hayek, p.75.

10.同上。

11.F.A.Hayek，"The 'Paradox' of Saving，" first published in 1929 in Zeitschrift fur Nationaldkonomie, vol.1，no.3.See note 15 below.

12.瓦蒂尔·卡钦斯（Waddill Catchings，1879—1967），美国银行家，后转为经济学家，威廉·特鲁弗·福斯特（William Trufant Foster，1879—1950），美国经济学家，俄勒冈州波特兰里德学院的第一任院长。

13.W.T.Foster and W.Catchings，"The Dilemma of Drifts，" published by the Pollak Foundation, Newton, Mass.，1926.

14.赫伯特·克拉克·胡佛（Herbert Clark Hoover，1874—1964），美国商务部长（1921~1928），美国第31任总统（1929~1933）。

15.Hayek，"The 'Paradox' of Saving，" translated by Nicholas Kaldor and George Tugendhat, was published in Economica, vol.11，May 1931，and reproduced in Collected Works, vol.9：Contra Keynes and Cambridge, p.88.

16.同上，pp.118-119.

17.同上，p.119.

18.同上。

19.Hayek, Hayek on Hayek, p.77.

20.Hayek，"'Paradox' of Saving，" in Collected Works, vol.9：Contra Keynes and Cambridge, pp.74-120.

21.Jorg Guido Hiilsmann, Mises：The Last Knight of Liberalism（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 Auburn, Ala.，2007），p.514.

22.Margit von Mises, My Years with Ludwig von Mises（Arlington House, New Rochelle, N.Y.，1976），p.44.

23.同上，p.85.

24.蒂尔顿是盖茨勋爵（Lord Gage）的产业，其祖上是盖茨将军，在美国独立战争的第一场战役邦克山之战（Battle of Bunker Hill）中任英军统帅，但打输了。

25.See J.M.Keynes and Lydia Lopokova, Lydia and Maynard：The

Letters of Lydia Lopokova and John Maynard Keynes, ed.Polly Hill and Richard Keynes（Charles Scribner's Sons, New York，1989）.

26.Skidelsky, John Maynard Keynes, vol.2：Economist as Savior, p.285.

27.Harrod, Life of John Maynard Keynes, p.403.

28.Skidelsky, John Maynard Keynes, vol.2：Economist as Savior, p.314.

29.J.M.Keynes, A Treatise on Money（Macmillan, London，1930），p.vi.

30.Collected Writings, vol.13：The General Theory and After, Part 1，Preparation（Macmillan for the Royal Economic Society, London，1973），pp.19-22.

31.同上。

32.尽管凯恩斯将定义不同利率的功劳归给了维克塞尔，但他独立得出过同样的结论。

33.Keynes, Treatise on Money, p.408.

34.Harrod, Life of John Maynard Keynes, p.413.

35.Keynes, Treatise on Money, p.376.

36.Skidelsky, John Maynard Keynes, vol.2：Economist as Savior, p.297.

37.Collected Writings, vol.19：Activities 1922-9，p.765.

38.Skidelsky, John Maynard Keynes, vol.2：Economist as Savior, p.302.

39.Collected Writings, vol.9：Essays in Persuasion, p.91.

40.Collected Writings, vol.19：Activities 1922-9，p.825.

41.Collected Writings, vol.9：Essays in Persuasion, p.93.

42.同上，p.106.

43.Collected Writings, vol.20：Activities 1929——31：Rethinking Employment and Unemployment Policies（Macmillan for the Royal Economic Society, London，1981），p.148.

44.同上，p.76.

45.Harrod, Life of John Maynard Keynes, p.416.

46.Collected Writings, vol.20：Activities 1929-31，p.64.

47.同上，p.318.

48.同上，p.102.

49.同上，p.144.

50.Robbins, Autobiography of an Economist, p.187.

51.Harrod, Life of John Maynard Keynes, p.429.

52.Skidelsky, John Maynard Keynes, vol.2：Economist as Savior, p.368.

53.Harrod, Life of John Maynard Keynes, p.427.

54.Collected Writings, vol.13：General Theory and After, Part 1，p.185.

55.Robbins, Autobiography of an Economist, p.151.

56.Susan Howson and Donald Winch, The Economic Advisory Council，1930-1939：A Study in Economic Advice during Depression and Recover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U.K.，1977），p.63.

57.Robbins, Autobiography of an Economist, p.152.

58.Norman Mackenzie and Jeanne Mackenzie, eds.，The Diary of Beatrice Webb, vol.4："The Wheel of Life，"1924—1943（Virago, London，1985），p.260.

1.F.A.Hayek，"The 'Paradox' of Saving，" Zeitschrift für Nationalokonomie, vol.1，no.3，1929.

2.后来，琼·罗宾逊说了一句更好的总结。她认为，“马歇尔里能找到一切，甚至是（凯恩斯的）《通论》。” Joan Robinson, Economic：An Essay on the Progress of Economic Thought Philosophy（Aldine Transaction, Piscataway, N.J.，2006），p.73.

3.理查德·费迪南德·卡恩（Richard Ferdinand Kahn），卡恩男爵（1905—1989），英国经济学家。卡恩是凯恩斯的学生，他研究将公共资金注入经济系统的结果，并认为正如凯恩斯所说，增加的资金量将提高总需求，同时提高可测的经济活动量，这个概念被凯恩斯称为“乘数”。

4.Richard F.Kahn, The Making of Keynes' General Theor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U.K.，1984），p.171.

5.琼·罗宾逊（Joan Violet Robinson nee Maurice，1903—1983），国王学院的第一位女性教员，凯恩斯最好斗的弟子，“剑桥马戏团”的著名成员。她后来构思了不完全竞争的概念；与人协力创办了新李嘉图和后凯恩斯主义学派（Neo-Ricardian and Post-Keynesian Schools）；和尼古拉斯·卡尔多一起，建立了经济发展理论，尤以欠发达国家为重；复兴了对卡尔·马克思经济理论的研究。1925年，她和奥斯汀·罗宾逊结婚。

6.皮耶罗·斯拉法（Piero Sraffa，1898—1983），意大利经济学家，凯恩斯

将他从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威胁下营救出来，他成为剑桥大学的经济学讲师和马歇尔馆员（这个岗位是凯恩斯专门为他设立的）。斯拉法也是新李嘉图学派的创始人之一。维特根斯坦说，和斯拉法的讨论让他在哲学思想上有了许多突破。

7.詹姆斯·爱德华·米德（James Edward Meade，1907—1995），英国经济学家，先在伦敦经济学院，后来到了剑桥，1977年和俄林（Bertil Ohlin）共同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他撰写了英国充分就业白皮书（1944）的第一稿，拟定了《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第1版的大纲。1945~1947年，他是克莱门特·艾德礼工党政府的首席经济学家。

8.Quoted in Marjorie Shepherd Turner, Joan Robinson and the Americans（M.E.Sharpe, Armonk, N.Y.，1989），p.51..

9.同上，p.62.

10.Collected Writings, vol.13：General Theory and After, Part 1，p.339.

11.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1883—1950），出生于捷克，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基于庞巴维克及其经济上的“破坏性创造”理论进行研究，补充了奥地利学派的概念。他于1932年逃离纳粹，前往美国，在哈佛大学找到了安全的避风港。

12.Kahn, Making of Keynes' General Theory, p.170.

13.Letter from Keynes to Pigou, quoted in Charles H.Hession, John Maynard Keynes（Macmillan, New York，1984），p.263.

14.Joseph Alois Schumpeter and Elizabeth Boody Schumpeter, History of Economic Analysis（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U.K.，1954），p.1118.卡恩对这句夸张恭维的态度十分冷静，说这是“明显的荒谬”。“或许这句话是出于对凯恩斯无意识的敌意……他和凯恩斯的友谊因为一丝嫉妒的玷污走向了终结。凯恩斯找到了一个基本问题的解决办法，而熊彼特则在同一个问题上徒劳无功耗了一辈子。熊彼特曾对朋友说，‘我年轻时有三个愿望：做个了不起的情人、了不起的骑师、了不起的经济学家。但我只实现了两项。’”Kahn,

Making of Keynes' General Theory, p.178.

15.Schumpeter and Schumpeter, History of Economic Analysis, p.1152.

16.Michael Senzberg, ed.，Eminent Economists：Their Life Philosophie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U.K.，1993），p.204.

17.同上，p.205.

18.同上，p.211.

19.Skidelsky, John Maynard Keynes, vol.2：Economist as Savior, p.703.

20.G.C.Harcourt，"Some Reflections on Joan Robinson's Changes of Mind and Their Relationship to Post-Keynesianism and the Economics Profession，" in Joan Robinson, Maria Cristina Marcuzzo, Luigi Pasinetti, and Alesandro Roncaglia, eds.，The Economics of Joan Robinson, Routledge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Economics, vol.94（CRC Press, London，1996），p.331.

21.Letter from Keynes to Lydia, February 1，1932，King's College, Cambridge, U.K.

22.F.A.Hayek，"Preface to the Second Edition"（1935），in Prices and Production（Augustus M.Kelley, New York，1967），p.ix, http://mises.org/books/prices production.pdf.

23.Kahn, Making of Keynes' General Theory, pp.181-182.

24.Joan Robinson，"The Second Crisis of Economic Theory，"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8，Spring 1976，p.60.

25.Robbins, Autobiography of an Economist, p.127.

26.F.A.Hayek, Prices and Production and Other Works：F.A.Hayek on Money, the Business Cycle, and the Gold Standard（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 Auburn, Ala.，2008），p.197，http://mises.org/books/hayekcollection.pdf.First published by Routledge＆Sons, London，1931.

27.同上，p.198.

28.同上，p.199.

29.理查德·坎蒂隆（Richard Cantillon，1680—1734），爱尔兰-法国经济学家，提出了经济的“自然”行为和经济趋于均衡状态的概念。

30.Hayek, Prices and Production, p.205.

31.亨利·桑顿（Henry Thornton，1760—1815），英国经济学家，议员。

32.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1772—1823），英国经济学家。

33.托马斯·图克（Thomas Tooke，1774—1858），英国经济学家，哈耶克在伦敦经济学院讲座之后获得的教职，即借用了他的名字。

34.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1766—1834），英国经济学家。

35.约翰·斯图尔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1806—1873），英国哲学家、政治理论家、经济学家和国会议员。

36.里昂·瓦尔拉斯（Marie-Esprit-Leon Walras，1834—1910），法国经济学家。

37.哈耶克1931年2月在伦敦经济学院做第一场讲演时，是否读过凯恩斯出版于1930年12月的《货币论》，目前尚不得而知。

38.Hayek, Prices and Production, p.215.

39.同上，pp.217-218.

40.同上，p.219.

41.同上，pp.220-221.

42.同上，p.241.

43.Ludwig von Mises, Theorie des Geldes und der Umlaufsmittel（Duncker＆Humblot, Munich，1912）p.431.

44.Hayek, Prices and Production, p.272.

45.同上，p.273.

46.同上，p.275.

47.同上，p.299.

48.同上，p.288.

49.同上。

50.同上，p.290.

51.同上，p.298.

52.同上。

53.Robbins, Autobiography of an Economist, p.127.

54.John Cunningham Wood and Robert D.Wood, eds.，Friedrich A.Hayek：Critical Assessments of Leading Economists（Routledge, London，2004）p.201.

55.罗宾斯在此次授职中发挥了多大的作用，目前尚有待研究。很明显，罗宾斯很高兴，按一些出处，如Daniel Yergin和Joseph Stanislaw在The Commanding Heights：The Battle for the World Economy（Simon＆Schuster, New York，2002）中的说法，此次任命“是莱昂内尔·罗宾斯特别关照的”。但罗宾斯本

人却在Autobiography of an Economist（p.127）中说，“大大出乎我的意料，贝弗里奇问我们是否乐意邀请主讲人永久地加入我们，出任图克教职……（大家）一致投票赞成。”

56.Robbins, Autobiography of an Economist, p.127.

1.BBC radio, January 14，1931，in Collected Writings, vol.9：Essays in Persuasion, p.138.

2.同上。

3.同上，p.139.

4.Skidelsky, John Maynard Keynes, vol.2：Economist as Savior, p.384.

5.Howson and Winch, Economic Advisory Council, p.82.

6.Royal Commission on Unemployment Insurance, Minutes of Evidence（HMSO, London，1931），p.381.

7.并没有任何证据显示丘吉尔说过这样的话。凯恩斯的传记作者罗伊·哈罗德和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以及丘吉尔的传记作者马丁·吉尔伯特和罗伊·詹金斯都未转述此语。

8.同样没有证据表明凯恩斯说过这句话。同样，哈罗德和斯基德尔斯基都未引述此语。

9.Hubert Henderson Papers, Nuffield College, Oxford, file 21，June 17，1931.

10.Skidelsky, John Maynard Keynes, vol.2：Economist as Savior, p.390.

11.O.T.福克（O.T.Falk, Oswald Toynbee "Foxy" Falk，1881—1972），伦敦股票经纪人，凯恩斯的朋友和投资合作伙伴，曾受邀加入1917年的财

政部团队。

12.O.T.Falk's papers, British Library, London, June 22，1931.

13.Collected Writings, vol.20：Activities，1929-31，p.563.

14.Collected Writings, vol.13：General Theory and After, Part 1，p.343.

15.同上，p.355.

16.昆西·怀特（Philip Quincy Wright，1890—1970），从1923年起就任芝加哥大学社会科学系的教员。

17.Skidelsky, John Maynard Keynes, vol.2：Economist as Savior, p.392.

18.J.M.Keynes, Daily Herald, September 17，1931.

19.In an article for the New Statesman, republished in John Maynard Keynes, Essays in Persuasion（W.W.Norton, New York，1963），p.161.

20.Harrod, Life of John Maynard Keynes, p.438.

21.Hayek, Prices and Production, p.425.

22.同上。

23.同上，p.426.

24.同上。

25.同上。

26.同上。

27.同上。

28.同上，p.427.

29.同上，p.429.

30.同上。

31.同上，p.447.

32.同上，p.430.

33.Robbins, Autobiography of an Economist, p.128.

34.Hayek, Prices and Production, p.434.

35.Hayek, Prices and Production, p.436.

36.弗兰克·西格（Frank William Taussig，1859-1940），美国经济学家。

37.Hayek, Prices and Production, p.436.

38.同上，p.455.

39.同上，pp.455-456.

40.Hayek，"Preface to the Second Edition"（1935），in Prices and Production（Augustus M.Kelly, New York，1967），p.xiv, http://mises.org/books/prices production.pdf.

41.Keynes, Essays in Persuasion（W.W.Norton，1963），p.1.

1.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1872—1970），英国哲学家，数学家，历史学家。

2.Bertrand Russell, Autobiography（Allen&Unwin, London，1967），p.61.

3.肯尼斯·克拉克（Kenneth Clark，克拉克男爵，1903—1983），伦敦英国国家美术馆馆长，艺术史学家。

4.Kenneth Clark, The Other Half：A Self Portrait（Harper&Row, New York，1977），p.27.

5.Harrod, Life of John Maynard Keynes, p.644.

6.Collected Writings, vol.5：A Treatise on Money, i：The Pure Theory of Money（1930）（Macmillan for the Royal Economic Society, London，1971），p.xviii.

7.亚瑟·奎勒·库奇爵士（Sir Arthur Quiller-Couch，1863—1944），英国作家。

8.Arthur Quiller-Couch, On the Art of Writing（G.P.Putnam's Sons, New York，1916），p.281.

9.Collected Writings, vol.13：General Theory and After, Part 1，p.243.

10.同上，p.252.

11.迄今为止，对两条思路最清晰和最有说服力的调和尝试，可见Bruce Caldwell's exemplary introduction to Contra Keynes and Cambridge, p.25，vol.9 of Collected Works（Hayek）。但也可参考Heinz-Dieter Kurz，"The Hayek-Keynes-Sraffa Controversy Reconsidered，" in Kurz, Critical Essays on Piero Sraffa's Legacy in Economic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U.K.，2000），pp.257-304。

12.Collected Writings, vol.13：General Theory and After, Part 1，p.244.

13.同上，p.247.

14.同上。

15.同上，p.248.

16.Quoted by Robert Skidelsky，"Ideas and the World，" Economist, November 23，2000.

17.Arthur Cecil（A.C.）Pigou（1877—1959）.

18.1932~1933年，澳大利亚和英国之间的板球比赛中，有人控诉英国队“打人体保龄球”，将球瞄准对方击球手而非球门。庇古从英国公立学校里学到的终极侮辱就是这个，并认为凯恩斯对哈耶克的攻击不是单纯的“打板球”。

19.Arthur Pigou, Economics in Practice（Macmillan, London，1935），pp.23-24.

20.同上，p.24.

21.Collected Works, vol.9：Contra Keynes and Cambridge, p.159.

22.同上。

23.同上，p.160.

24.同上。

25.同上。

26同上，pp.162-163.

27.Collected Writings, vol.13：General Theory and After, Part 1，p.257.

28.同上，pp.257-258.

29.同上，p.258.

30.同上。

31.同上，p.259.

32.同上。

33.同上，pp.259-260.

34.Hayek, Prices and Production, p.434.

34.同上，p.260.

35.同上，pp.262-263.

36.同上，pp.263-264.

37.同上，p.265.

38.同上。

39.同上，p.470.

40.Don Patinkin and J.Clark Leith, eds.，Keynes, Cambridge and the General Theory（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Toronto，1978），p.74.

41.同上，p.40.

42.Joan Robinson, Contributions to Modern Economics（Blackwell, Oxford, U.K.，1978），p.xv.

43.Collected Writings, vol.14：General Theory and After, Part 2，Defence and Development（Macmillan for the Royal Economic Society, London，1973），p.148.

44.Kahn's 1932 remark quoted by Paul Samuelson，"A Few Remembrances of Friedrich von Hayek（1899——1992），"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 vol.69，no.1，January 2009，pp.1-4.

45.休·盖茨克尔（Hugh Gaitskell，1906—1963），工党领袖。

46.Quoted in Elizabeth Durbin, New Jerusalems：The Labour Party and the Economics of Democratic Socialism（Routledge＆Kegan Paul, London，1985），p.108.

1.BBC radio, January 14，1931，in Collected Writings, vol.9：Essays in Persuasion, p.138.

2.同上。

3.Collected Works, vol.9：Contra Keynes and Cambridge, p.193.

4.同上。

5.同上，p.195.

6.同上，p.197.

7.同上，p.182.

8.John Cunningham Wood, ed.，Piero Sraffa：Critical Assessments（Psychology Press, Hove, U.K.，1995），p.34.

9.Ludwig Wittgenstein,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Wiley-Blackwell, London，2001），preface.

10.Wood, Piero Sraffa, p.34.

11.Ludwig M.Lachmann, Expectations and the Meaning of Institutions：Essays in Economics, ed.Don Lavoie（Psychology Press, Hove, U.K.，1994），p.148.

12.Jean-Pierre Potier, Piero Sraffa, Unorthodox Economist（1898-1983）：A Biographical Essay（Psychology Press, Hove, U.K.，1991），p.9.

13.Bernard Berenson（1865-1959）.

14.1922年圣诞节，斯拉法写信给凯恩斯，谈及了墨索里尼的这封电报。Keynes Papers, the Marshall Library, Cambridge, quoted by Nicholas Kaldor, "Piero Sraffa（1898—1983）," Proceedings of the British Academy, vol.71, 1985, p.618.

15.Terenzio Cozzi and Roberto Marchionatti, eds., Piero Srajfa's Political Economy：A Centenary Estimate（Psychology Press, Hove, U.K., 2001）, pp.31-32.

16.称为投资储蓄/流动性偏好货币供应量（IS-LM）模型，用图表绘出了利率和实际产出之间的关系。

17.John Richard Hicks, Critical Essays in Monetary Theory（Clarendon Press, Oxford, U.K., 1967）, p.204.

18.弗兰克·奈特（Frank Hyneman Knight，1885—1972），芝加哥经济学派的共同创始人，他不情愿地在自由放任和国家干预中选择前者，主要是因为前者的效率不那么低下。

19.Letter from Knight to Morgenstern, quoted in Michael Lawlor and Bobbie Horn, "Notes on the Hayek-SrafFa Exchange," Review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4, 1992, p.318, footnote.

20.Piero Sraffa, "Dr.Hayek on Money and Capital," Economic Journal, vol.2, March 1932, pp.42-53.

21.同上。

22.F.A.Hayek, "Money and Capital：A Reply," Economic Journal, vol.2, June 1932, pp.237-249.

23.Piero Sraffa, "A Rejoinder," Economic Journal, vol.42, June 1932, pp.249-251.

24.Letter from Knight to Oskar von Morganstern, May 4，1933，Oskar von Morganstern papers, Duke University, Durham, N.C.

25.John Cunningham Wood and Robert D.Wood, eds.，Friedrich A.Hayek（Taylor＆Francis, London，2004），p.200.

26.Lachmann, Expectations and the Meaning of Institutions, p.148.

1.迟至1933年12月，对日后名为《通论》的这本书，凯恩斯起的临时标题还是《生产的货币理论》。他大概是担心跟哈耶克同年出版的《货币理论和商业周期》搞混，所以才改了书名。

2.Skidelsky, John Maynard Keynes, vol.2：Economist as Savior, p.459.

3.Letter from Keynes to Lydia, March 5，1933，quoted in ibid.

4.Foreword, in Gerald O'Driscoll, Economics as a Coordination Problem（Andrews＆McMeel, Kansas City，1977），p.ix.

5.Mark Blaug, Great Economists since Keynes：An Introduction to the Lives and Works of One Hundred Modern Economists（Edward Elgar, Cheltenham, U.K.，1998），p.94.

6.Harrod, Life of John Maynard Keynes, p.452.

7.同上，p.453.

8.Kahn, Making of Keynes' General Theory, p.178.

9.Don Patinkin and J.Clark Leith, eds.，Keynes, Cambridge and "The General Theory，" Proceedings of a Conference at the University of Western Ontario（Macmillan, London，1977）.

10.Kahn, Making of Keynes' General Theory, p.106.

11.Austin Robinson，"John Maynard Keynes，1883—1946，" Economic Journal, March 1947，p.40.

12.Collected Writings, vol.5：Treatise on Money, p.125.

13.Kahn, Making of Keynes' General Theory, p.107.

14.Collected Writings, vol.13：General Theory and After, Part 1，p.270.

15.其实，凯恩斯已经充分准备要阐述是什么决定了生产量。在写给财政部经济学家Ralph Hawtrey评论《货币论》的一封信里，他写道，“我没有完整地论述决定生产量的所有因素。因为它会让我走上一条无尽的漫长征途，进入短期供给理论，偏离货币理论（《货币论》的名义主题）……如果我要再写一本书，我大概会尝试更深入地探讨后者。”出处同上，pp.145-146.

16.Kahn, Making of 'Keynes General Theory, p.175.

17.同上，p.178.

18.同上，p.177.

19.Collected Writings, vol.9：Essays in Persuasion, p.106.

20.同上。

21.Kahn, Making of Keynes' General Theory, p.93.

22.同上。

23.同上，p.94.

24.同上，p.95.

25.同上，p.98.

26.Letter from Dennis Robertson to Keynes, in Collected

Writings, vol.29：The General Theory and After：A Supplement（Macmillan for the Royal Economic Society, London，1979），p.17.

27.Kahn, Making of Keynes' General Theory, p.100.

28.同上，p.104.

29.L.Tarshis，"The Keynesian Revolution：What It Meant in the 1930s，" unpublished typescript, quoted in Skidelsky, John Maynard Keynes, vol.2：Economist as Savior, p.460.

30.同上。

31.Quoted in Turner, Joan Robinson and the Americans, p.55.

32.J.M.Keynes, The Means to Prosperity（Macmillan, London，1933），p.6.

33.同上，p.10.

34.同上，p.12.

35.同上，p.15.

36.同上，p.14.

37.同上，p.16.

38.Harrod, Life of John Maynard Keynes, p.441.

39.Keynes, Means to Prosperity, p.19.

40.Harrod, Life of John Maynard Keynes, p.443.

41.Keynes, Means to Prosperity, p.27.

42.同上，p.31.

43.同上，p.22.

1.Collected Works, vol.9：Contra Keynes and Cambridge, p.173.

2.J.h Keynes, A Treatise on Money（Macmillan, London，1930），p.199，footnote.

3.P.M.Toms correspondence with Alan Ebenstein, quoted in Alan Ebenstein, Friedrich Hayek：A Biography（Palgrave, New York，2001），p.75.

4.John Richard Hicks, Money, Interest, and Wages, vol.2 of Collective Essays on Eccnomic Theory（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ss.，1982），p.3.

5.Theodore Draimin correspondence with Alan Ebenstein, August 21995，quoted in Ebenstein, Friedrich Hayek, p.75.

6.Ralph Arakie letter in the LSE archive, quoted in同上，p.74.

7.奥布里·琼斯（Aubrey Jones，1911—2003），英国保守党大臣，1965年当上了工党政府价格与收入局局长，价格调节工资和物价。

8.Joan Abse, ed.，My LSE（Robson Books, London，1977），p.35.

9.F.A.Hayek，"Monetary Theory and the Trade Cycle，" 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 September 27，2008，http://mises.org/daily/3121.

10.Thought, as Milton Friedman was later to contend, this was, indeed, the case.

11.F.A.Hayek, Monetary Theory and the Trade Cycle（Jonathan Cape, London，1933），p.19.

12.同上，p.23.

13.D.H.Macgregor, A.C.Pigou, J.M.Keynes, Walter Layton, Arthur Salter, and J.C.Stamp, Letter to the Editor, The Times（London），October 17，1932.

14.T.E.Gregory, F.A.von Hayek, Arnold Plant, and Lionel Robbins, Letter to the Editor, The Times（London），October 18，1932.

15.Hayek Archive, Hoover Institution, Stanford, Calif, box 105，folder 10.The memorandum is dated "Spring 1933."

16.Hayek, Hayek on Hayek, p.102.Here Hayek dated his memo 1939，but Bruce Caldwell, in Collected Works, vol.2：The Road to Serfdom：Text and Documents, The Definitive Edition（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2007），p.5，believes he was mistaken and that the memo was most probably written in May or June 1933.

17.F.A.Hayek, Individualism and Economic Order（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1948），p.87.

18.Hayek, Hayek on Hayek, p.100.

19.Collected Writings, vol.13：General Theory and After, Part 1，p.492.

20.J.M.Keynes, 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English edition（Macmillan, London，1936），preface.

21.保罗·萨缪尔森（Paul Anthony Samuelson，1915—2009），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教授，著名的后凯恩斯主义者。1970年，他成为第一个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人。著有历史上最畅销的经济学教科书《经济学》（Economics：An Introductory Analysis（McGraw-Hill, New York，1948）。约翰·肯尼迪和林登·约翰逊两任总统的顾问。

22.Paul A.Samuelson, The Collected Scientific Papers of Paul A.Samuelson, ed.Joseph E.Stiglitz, vol.2（MIT Press, Cambridge, Mass.，1966），p.1521.

23.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1908—2006），出生于加拿大的哈佛经济学家，约翰F.肯尼迪的主要顾问。

24.John Kenneth Galbraith，"General Keynes，"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November 22，1983.

25.Harrod, Life of John Maynard Keynes, p.451.

26.J.M.Keynes, 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Macmillan，1936；facsimile reprinted by Harcourt, Orlando, Fla.），p.34.

27.同上，p.3.

28.同上，p.16.

29.按1989年电影Field of Dreams所表达的理念来说，即“如果你盖好了，他们自然会来”。

30.Keynes, General Theory（Macmillan，1936；facsimile reprinted by Harcourt, Orlando, Fla.），p.19.

31.同上，p.21.

32.同上，p.179.

33.同上，p.211.

34.同上，p.129.

35.同上，p.130.

36.同上，p.379.

37.J.M.Keynes, 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German edition（Duncker&Humblot, Berlin，1936），preface.

38.Keynes, General Theory（Macmillan，1936），p.379.

39.同上，p.380.

40.Interview of Robert Skidelsky, July 18，2000，for Commanding Heights：The Battle for the World Economy, PBS, http://www.pbs.org/wgbh/commanding heights/shared/minitext/int_robertskidelsky.html.

41.Keynes, General Theory，（Macmillan，1936），p.378.

42.同上，p.60.

43.同上，p.80.

44.同上，p.214.

1.Harrod, Life of John Maynard Keynes, p.448.

2.Keynes,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Peace, p.84.

3.同上，p.85.

4.同上。

5.同上，p.41.

6.J.M.Keynes，"The Consequences of the Banks Collapse of Money，" Vanity Fair, January 1932.

7.这个词是罗斯福创造的，1932年他在接受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时允诺说，“要给美国人民一套新政。”

8.Jonathan Alter, The Defining Moment：FDR's Hundred Days and

the Triumph of Hope（Simon&Schuster, New York，2006），p.2.

9.阿瑟·施莱辛格（Arthur M.Schlesinger Jr，1917—2007），美国历史学家，研究自由主义由来，肯尼迪家族的“官方史学家”，著有A Thousand Days浪漫表现肯尼迪短暂的总统生涯。

10.Arthur M.Schlesinger Jr.，The Coming of the New Deal（Mariner Books, New York，2003），p.3.

11.费利克斯·兰克福（Felix FrankfurterFelix，1882—1965），美国最高法院陪审法官。

12.Skidelsky, John Maynard Keynes, vol.2：Economist as Savior, p.492.

13.Letter from Frankfurter to Roosevelt, December 6，1933，in Max Freedman, ed.，Roosevelt and Frankfurter：Their Correspondence，1928-1945（Atlantic-Little, Brown, Boston，1976），p.177.

14.Keynes's open letter in full, in Freedman, Roosevelt and Frankfurter, pp.178-183.

15.此处的“教授”是美国用法，仅为对大学老师的称呼。凯恩斯从来不是也并没有当过英国用法里的“教授”。1930年，他对一位电影制片人说，“千万别让他们把‘教授’打在屏幕上。我不想无辜受辱，又没有报酬。” Quoted in Milo Keynes, ed.，Essays on John Maynard Keyne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U.K.，1975），p.249，footnote.

16.Letter from Roosevelt to Frankfurter, December 22，1933，in Freedman, Roosevelt and Frankfurter, pp.183-184.

17.在O.T.Falk和Geoffrey Marks的鼓励下，1919年，凯恩斯当上了伦敦National Mutual Life Assurance Society董事会成员，两年后任董事长，1938年之前，他一直担任此职。1923年，凯恩斯还加入了Provincial Insurance

Company董事会，指导投资政策，并一直在任，直到去世。

18.Letter from Frankfurter to Roosevelt, May 7，1934，in Freedman, Roosevelt and Frankfurter, p.213.

19.Note from Roosevelt to Miss LeHand，出处同上，p.215.

20.Skidelsky, John Maynard Keynes, vol.2：Economist as Savior, p.505.

21.Harrod, Life of John Maynard Keynes, p.20.

22.Herbert Stein, On the Other Hand———Essays on Economics, Economists, and Politics（AEI Press, Washington, D.C.，1995），p.85.

23.Frances Perkins, The Roosevelt I Knew（Viking Press, New York，1946），p.226.

24.同上。

25.同上。

26.同上，p.225.

27.Letter from Frankfurter to Roosevelt, in Freedman, Roosevelt and Frankfurter, p.222.

28.Letter from Roosevelt to Frankfurter in ibid.

29.Letter from Lippmann to Keynes, April 17，1934，quoted in Harrod, Life of John Maynard Keynes, p.450.

30.Ronald Steel, Walter Lippmann and the American Century（Bodley Head, London，1981），p 308.

31.Ted Morgan, FDR：A Biography（Simon&Schuster, New York，

1985），p.409.

32.Skidelsky, John Maynard Keynes, vol.2：The Economist as Savior, p.508.

33.J.M.Keynes, Speech to the American Political Economy Club, quoted in Collected Writings, vol.13：General Theory and After, Part 1，p.462.

34.William Rogers Louis, Adventures with Britannia：Personalities, Politics, and Culture in Britain（I.B.Tauris, London，1997），p.191.

35.John Kenneth Galbraith, A Life in Our Times（Houghton Mifflin, Boston，1981），p.68.

36.对加尔布雷斯来说，这是一次失望的旅行。凯恩斯没在剑桥，因为之前经历了一次心脏病发作，他正在修养。

37.Galbraith, Life in Our Times（Houghton Mifflin，1981），p.70.

38.马里纳·埃克尔斯（Marriner Stoddard Eccles，1890—1977），美联储主席（1934~1948）。

39.U.S.Senate, Evidence to the Senate Finance Committee Investigation of Economic Problems：Hearings，72nd Congress，2nd Session.February 13—28，1933（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 D.C.，1933），p.8.

40.同上，p.9.

41.同上，p.21.

42.Richard Parker, John Kenneth Galbraith：His Life, His Politics, His Economics（Farrar, Straus＆Giroux, New York，2005），p.95.

43.Keynes, Essays on John Maynard Keynes, p.135.

44.William Breit and Roger W.Spencer, eds.，Lives of the Laureates：Seven Nobel Economists（MIT Press, Cambridge, Mass.，1986），p.98.

45.同上。

46.同上。

47.Keynes, Essays on John Maynard Keynes, p.136.

48.Paul A.Samuelson in Robert Lekachman, ed.，Keynes' General Theory：Reports of Three Decades（St.Martin's Press, New York，1964），pp.315-316.

49.Keynes, Essays on John Maynard Keynes, p.136.

50.同上。

51.罗伯特·布赖斯（Robert Broughton Bryce，1910—1997），加拿大财政部副部长（1963—1968）。

52.Galbraith, Life in Our Times（Houghton Mifflin，1981），p.90.

53.Keynes, Essays on John Maynard Keynes, p.136.

54.John Kenneth Galbraith, The Essential Galbraith, ed.Andrea D.Williams（Mariner Books, Boston，2001），p.242.

55.According to JSTOR, quoted in Parker, John Kenneth Galbraith, p.94.

56.Keynes, Essays on John Maynard Keynes, p.138.

1.F.A.Hayek，"The Economics of the 1930s as Seen from London，" Lecture at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1963，published in Collected

Works, vol.9：Contra Keynes and Cambridge, p.60.

2.Robbins, Autobiography of an Economist, p.151.

3.Pigou, Economics in Practice, pp.23-24.

4.Arthur Pigou，"Mr.J.M.Keynes'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Economica（New Series），vol.3，no.10，May 1936，pp.115-132.

5.Collected Writings, vol.29：General Theory and After：Supplement, p.208.

6.Collected Works, vol.9：Contra Keynes and Cambridge, p.241.

7.同上。

8.同上。

9.F.A.Hayek，"The Keynes Centenary：The Austrian Critique，" Economist, June 11，1983，pp.45-48，reproduced in Collected Works, vol.9：Contra Keynes and Cambridge, p.247.

10.Collected Works, vol.9：Contra Keynes and Cambridge, p.251.

11.洛克菲勒研究基金委员已经赞助了一位研究助手E.S.Tucker，是哈耶克与罗宾斯共用的。

12.Minutes of Rockefeller Research Fund Committee meetings of December 14，1933，LSE Archives, London.

13.戈特弗里德·哈伯勒（Gottfried von Haberler，1900—1995），戈特弗里德·冯·哈伯勒（1900—1995），奥地利出生的经济学家，米塞斯的学生，主张自由贸易，1936年搬到了美国哈佛大学，和约瑟夫·熊彼特紧密共事。

14.Letter from Hayek to Haberler, February 15，1936，Haberler,

Hoover Institution, Stanford, Calif.，box 67，quoted in Susan Howson，"Why Didn't Hayek Review Keynes's General Theory？A Partial Answer，"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33，no.2，2001，pp.369-374.

15.Letter from Hayek to Haberler, March 15，1936，Haberler Papers, box 67.

16.同上。

17.同上，May 3，1936，Haberler Papers, box 67.

18.For a fuller account of Hayek's grand scheme, see Lawrence H.White's introduction to Collected Works, vol.12：The Pure Theory of Capital（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2007），pp.xvii-xxi.

19.弗里茨·马克卢普（Fritz Machlup，1902—1983），奥地利出生的经济学家，米塞斯的学生，1933年逃离纳粹德国，前往美国。他引入了“知识”这个概念，这是理解经济学的一个关键维度。

20.Hayek, individualism and Economic Order, p.43.

21.同上。

22.同上。

23.Ebenstein, Friedrich Hayek, p.79.

24.John Kenneth Galbraith, A Life in Our Times（Houghton Mifflin, New York，1981）.p.78.

25.同上。

26.Ebenstein, Friedrich Hayek, p.64.

27.Paul Samuelson，"A Few Remembrances of Friedrich von Hayek（1899—1992）."

28.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1912—2006），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货币主义之父，芝加哥经济学派重要成员。

29.Ebenstein, Friedrich Hayek, p.81.

30.F.A.Hayek, The Pure Theory of Capital（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2009），p.vi.

31.同上，p.viii.

32.Hayek, Hayek on Hayek, p.142.

33.同上，p.141.

34.Hayek, Pure Theory of Capital, p.5.

35.同上，p.374.

36.同上。

37.同上，p.406，footnote.

38.同上，p.408.

39.同上，p.452.

40.同上，p.441.

41.同上，p.410.

42.同上，p.440.

43.同上。

44.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The Pretence of Knowledge，"

prize lecture to the Nobel Awards committee, December 11，1974，nobelprize.org/nobel_prizes/economics/laureates/1974/hayek-lecture.html（accessed February 2011）.

45.Hayek, Pure Theory of Capital, p.471.

1.Patrick J.Maney, The Roosevelt Presence：The Life and Legacy of FDR（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eley，1992），pp.102-103.

2.联邦赤字从1936年的46亿美元削减到1936年的27亿美元。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 FDR's Fireside Chats, ed.Russell D Buhite and David W.Levy（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Norman，1992），p.111.

3.Thomas Emerson Hall and J.David Ferguson, The Great Depression：An International Disaster of Perverse Economic Policies（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Ann Arbor，1998），p.151.

4.Franklin D.Roosevelt，"On the Current Recession，" broadcast April 14，1938，Roosevelt's Fireside Chats, New Deal Network, http://newdeal.feri.org/chat/chatl2.htm.

5.Letter from Keynes to Roosevelt, February 1，1938，in Collected Writings, vol.21：Activities 1931-39：World Crises and Policies in Britain and America（1982）（Macmillan for Royal Economic Society, London，1982）.

6.Murray Newton Rothbard, America's Great Depression（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 Auburn, Ala.，2000），p.xv.

7.同上。

8.同上。

9.F.D.Roosevelt, speech in Boston, October 1940，in Robert

Dallek, Franklin D.Roosevelt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193—21945（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1979），p.250.

10.J.M.Keynes，"Will Rearmament Cure Unemployment？" BBC broadcast, June 1939，reproduced in Listener, June，1，1939，pp.1142-1143.

11.Hall and Ferguson, Great Depression, p.155.

12.Interview of J.K.Galbraith, September 28，2000，Commanding Heights, PBS, http://www.pbs.org/wgbh/commandingheights/shared/minitext/int_johnkennethgalbraith.html.

13.也有人对战争支出和大萧条结束之间的关联表示怀疑，其中有Christina Romer, President Obama's chair of the 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 in 2009-10.See Christina D.Romer，"Changes in Business Cycles：Evidence and Explanations，"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vol.13，no.2，Spring 1999，pp.23—24.

14.Collected Works, vol.10：Socialism and War：Essays, Documents, Review, ed.Bruce Caldwell（Liberty Fund, Indianapolis，1997），p.36.

15.Hayek, Hayek on Hayek, p.94.

16.Robert Skidelsky, John Maynard Keynes, vol.3：Fighting for Freedom 1937~1946（Viking, New York，2000），p.47.

17.Collected Writings, vol.9：Essays in Persuasion, p.410.

18.约翰·西蒙爵士（John Allsebrook Simon，1st Viscount Simon，1873—1954），内政大臣、外务大臣、财政大臣和大法官。他支持张伯伦对希特勒的绥靖政策，所以丘吉尔并未邀请他加入英国战时内阁。

19.Skidelsky, John Maynard Keynes, vol.3：Fighting for Freedom, p.52.

20.Hayek，"Mr Keynes and War Costs，" Spectator, November 24，1939，in Collected Works, vol.10：Socialism and War, p.164.

21.同上，p.171.

22.同上，p.164.

23.同上，p.166.

24.同上，pp.167-168.

25.Hayek, Hayek on Hayek, p.91.

26.同上，p 98.

27.同上，p.91.

28.Hayek took the title from Tocqueville，"who speaks about the road to servitude.I would like to have chosen that, but it doesn't sound good.So I changed 'servitude' to 'serfdom'，for merely phonetic reasons." Collected Works, vol.2：Road to Serfdom, p.256 footnote.

29.Ebenstein, Friedrich Hayek, p.114.

30.Hayek Archive, Hoover Institution, quoted in同上，p.129.

31.Letter from Hayek to Lippmann, quoted in Gary Dean Best，"Introduction，" in Walter Lippmann, The Good Society（Transaction Publishers, Piscataway, N.J.，2004），p.xxxi.

32.Collected Works, vol.2：Road to Serfdom, p.137.For a full account of how Hayek intended The Road to Serfdom to fit into his

broader Abuse of Reason schema, see Collected Works, vol.13：Studies on the Abuse and Decline of Reason, ed.Bruce Caldwell（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2010）.

33.同上，p.67.

34.同上，p.58.

35.指哈耶克引用凯恩斯，"The Economics of War in Germany，" Economic Journal, vol.25，September 1915，p.450，凯恩斯说自己读到一位德国作家呼吁要在和平的工业发展时期延续军队作风，不禁做了“噩梦”。Collected Works, vol.2：Road to Serfdom, p.195，footnote.

36.F.A.Hayek, Preface to the original edition of The Road to Serfdom, in Collected Works, vol.2：Road to Serfdom, p.37.

37.Collected Works, vol.2：Road to Serfdom, pp.148-149.

38.同上。

39.同上，p.214.

40.Hayek, Preface to the 1976 edition of The Road to Serfdom, in Collected Works, vol.2：Road to Serfdom, p.55.

41.Collected Works, vol.2：Road to Serfdom, pp.58—59.

42.同上，p.105.

43.Hayek, Preface to the 1956 American edition of The Road to Serfdom, in Collected Works, vol.2：Road to Serfdom, p.37.

44.Letter from Keynes to Hayek, April 4，1944，LSE Archives, London.

45.Collected Writings, vol.17：Activities 1920-2：Treaty

Revision and Reconstruction（Macmillan for the Royal Economic Society, London，1977），pp.385-387.

46.Chicago Round Table, quoted in Ebenstein, Friedrich Hayek, p.126.

47.Collected Works, vol.2：Road to Serfdom, p.148.

48.Collected Writings, vol.17：Activities 1920-2，pp.385-387.

49.Interview of Hayek by Thomas W.Hazlitt，1977，published in Reason, July 1992，http://reason.com/archives/1992/07/01/the-road-from-serfdom.

50.Collected Works, vol.2：Road to Serfdom, p.118.

51.同上，p.148.

52.同上，pp.249-250.

53.Henry Hazlitt，"An Economist's View of 'Planning，'" review of The Road to Serfdom, by F.A.Hayek, The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24，1944，Sunday Book Review, p.1.

54.马科斯·斯特曼（Max Forrester Eastman，1883—1969），涉猎广泛的美国作家，1923年出访苏联后，强烈谴责苏联的共产主义，但仍持左翼观点。到1941年，他开始为《读者文摘》撰写保守派的评论文章。

55.乔治·奥威尔，英国作家Eric Arthur Blair（1903—1950）的笔名，他还是反对极权主义的政治活动家。

56.George Orwell，"Grounds for Dismay，" Observer, London, April 9，1944.

57.芭芭拉·伍顿（Barbara Wootton nee Adam, Baroness Wootton of Abinger，1897—1988），英国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犯罪学家。1968年，哈罗德·

威尔逊政府正式委托她调查吸食大麻的影响。但政府忽视了她在《伍顿报告》（1969）中所说的“少量拥有此物不应该入罪”之提议。

58.UCLA Oral History Program, p.229.

59.Barbara Wootton, Freedom under Planning（G.Allen&Unwin, London，1945）.

60.哈罗德·麦克米伦在回忆录中写道，丘吉尔“读了哈耶克教授的《通往奴役之路》，不安加剧”。Tides of Fortune（Macmillan, London，1969），p.32.

61.克莱门特·艾德礼（Clement Richard Attlee, Earl Attlee，1883—1967），英国政治家，工党党魁（1935~1955），丘吉尔战时联合政府的副手，英国首相（1945~1951），主持了全面福利国家的建设工作，开展了印度、巴基斯坦、斯里兰卡、缅甸、巴勒斯坦和约旦的非殖民化进程。

62.Quoted in Martin Gilbert, Churchill：A Life（Henry Holt, New York，1991），p.846.

63.罗伊·詹金斯（Roy Harris Jenkins, Baron Jenkins of Hillhead，1920—2003），英国工党内政大臣（两任），财政大臣，欧洲联盟主席。他离开工党后创办了社会民主党，1982年到1983年任党魁。

64.Roy Jenkins, Churchill（Macmillan, London，200n p.791）.

65.Roy Jenkins, ed.，Purpose and Policy：Selected Speeches of C.R.Attlee（Hutchinson, London，1947），p.3.

66.Tony Benn, in Commanding Heights, PBS, http://www.pbs.org/wgbh/com mandingheights/shared/minitext/tr_show01.html.

67.F.A.Hayek, in ibid.

68.Alvin Hansen，"The New Crusade against Planning，" New

Republic, vol.12，January 1，1945，pp.9-10.

69.T.V.史密斯（Professor T V.Smith，1890—1964），芝加哥大学哲学教授，伊利诺伊州议员。

70.T.V.Smith，"the Road to Serfdom，" book review, Ethics（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vol.55，no.3 April 1945，p.226.

71.同上，pp.225-226.

72.Russell Kirk, James McClellan, and Jeffrey Nelson, The Political Principles of Robert A.Taft（Transaction Publishers, Piscataway, N.J.，2010），p.86.

73.同上。

74.赫尔曼·芬纳（Herman Finer，1898—1969），英国政治学家，执教于芝加哥大学和哈佛大学。

75.Herman Finer, The Road to Reaction（Little, Brown, Boston，1945），preface.

76.同上，p.ix.

77.安·兰德（Ayn Rand O'Connor, nee Alissa Zinov' yevna Rosenbaum，1905—1982），俄罗斯出生的美国作家，反集体主义者，辩论家，编剧。她写过两本著名的说教小说，《源泉》（The Fountainhead，1943年）1949年由King Vidor拍为电影，主演是Gary Cooper和Patricia Neal，以及《阿特拉斯耸耸肩》（1957），2010年由Paul Johansson拍为电影，并由他自己主演。

78.Rand to Theodore J.Lowi, quoted in Theodore J.Lowi, The End of the Republican Era（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Norman，2006），p.22，footnote.

79.Rand quoted in Ayn Rand, Ayn Rand's Marginalia：Her Critical

Comments on the Writings of Over 20 Authors, ed.Robert Mayhew（Second Renaissance Books, New Milford, Conn.，1995），pp.145-160.

80.Hayek, Hayek on Hayek, p.90.

81.Collected Works, vol.9：Contra Keynes and Cambridge, p.232.

82.UCLA Oral History Program, p.117.

83.他患有细菌性心内膜炎，因心脏瓣膜感染所致，在抗生素诞生之前的时代，它无药可救。

84.Skidelsky, John Maynard Keynes, vol.3：Fighting for Freedom, p.472.

85.Quoted in Ebenstein, Friedrich Hayek, p.344.

86.Hayek, Hayek on Hayek, p.143.

87.同上，p.103.

1.UCLA Oral History Program, p.463.

2.霍金森（Helen Elna Hokinson，1893—1949），《纽约客》专职漫画家，专门塑造一群上了年纪的拘谨主妇。

3.UCLA Oral History Program, p.463.

4.Interview of Ralph Harris, July 17，2000，Commanding Heights, PBS, http://www.pbs.org/wgbh/commandingheights/shared/minitext/int_ralph

5.Hayek, Hayek on Hayek, p.143.

6.拉尔夫·哈里斯（Ralph Harris，1924—2006），撒切尔夫人封他为男爵（Baron Harris of High Cross），伦敦自由市场智囊团"Institute of

Economic Affairs"创办人。

7.Interview of Ralph Harris, July 17，2000，Commanding Heights, PBS.

8.同上。

9.UCLA Oral History Program, p.10.

10.Collected Works, vol.4：The Fortunes of Liberalism：Essays on Austrian Economics and the Ideal of Freedom, ed.Peter G.Klein（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1992），p.191.

11.雷蒙·阿隆（Raymond-Claude-Ferdinand Aron，1905—1983），法国社会学家，让-保罗·萨特的朋友。

12.迈克尔·波兰尼（Michael Polanyi，原名Polanyi Mihaly，1891—1976）匈牙利出生的英国经济学家、化学家和科学哲学家，1933年为免遭对犹太人的迫害，逃离纳粹德国。

13.威廉·罗普克（Wilhelm Ropke，1899—1966），德国经济学家，认为应当以“经济人文主义”补充自由市场所剥夺的人性，在此思想的引导下，他帮忙确立了战后高度成功的德国社会-市场经济体系，支撑了日后的“德国奇迹”。

14.现名Hotel Mirador.

15.Albert Hunold（1899—1981）.

16.Philip Mirowski and Dieter Plehwe, The Road from Mont Pelerin：The Making the Neoliberal Thought Collectiv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ss.，2009），p.15.

17.乔治H.纳什（1945—），美国历史学家，研究赫伯特·胡佛的权威，著有The Conservative Intellectual Movement in America since 1945（Basic Books, New York，1976）。

18.Nash, Conservative Intellectual Movement in America, p.26.

19.乔治·斯蒂格勒（George Joseph Stigler，1911—1991），为“曼哈顿计划”做过研究，后成为芝加哥大学经济学院的领导成员，弗兰克·奈特的弟子，1982年赢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20.约翰·朱克斯（John Jewkes，1902—1988），牛津大学默顿学院经济组织学教授。

21.卡尔·波普（Sir Karl Raimund Popper，1902—1994），维也纳出生的英国科学哲学家，倡导构建“开放社会”的自由民主传统。

22.维洛尼卡·维吉伍德[Dame（Cicely）Veronica "C.V." Wedgwood，1910-97]，英国历史学家，16、17世纪顶尖的人物传记作家，主要以英国内战和30年内战期间的人物为主。

23.亚伦·戴雷科特（Aaron Director，2001-04），前左派激进分子，在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教书，影响了美国著名的右倾法官，包括Robert Bork, Richard Posner, Justice Antonin Scalia，以及大法官William Rehnquist。

24.Milton Friedman and Rose D.Friedman, Two Lucky People：Memoirs（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1998），p.158.

25.同上。

26.同上，p.159.1957年，弗里德曼的孩子年龄足够，可以独自留在美国了，他便经常和妻子罗斯一起在暑假期间出席佩尔兰山会议。1971年，弗里德曼出任学会会长。

27.Quoted in Friedman and Friedman, Two Lucky People, p.159.

28.同上。

29.Paul Samuelson，"A Few Remembrances of Friedrich von Hayek（1899—1992）."

30.Interview of Milton Friedman, October 1，2000，Commanding Heights, PBS, http://www.pbs.org/wgbh/commandingheights/shared/minitextlo/int_miltonfriedman.html.

31.Samuelson，"A Few Remembrances of Friedrich von Hayek（1899—1992）."

32.Robbins's full Statement of Aims, April 8，1947，The Mont Pelerin Society, http://www.montpelerin.org/montpelerin/mpsGoals.html.

33.Collected Works, vol.4：Fortunes of Liberalism, p.192.

34.Interview of Milton Friedman, October 1，2000，Commanding Heights, PBS.

35.Quoted by William Buckley in his address to the Mont Pelerin Society, Hillsdale College, Hillsdale, Mich.，August 26，1975，in William F.Buckley Jr.，Let Us Talk of Many Things：The Collected Speeches（Basic Books, New York，2008），p.224.

36.Stephen Kresge，"Introduction，" in Hayek, Hayek on Hayek, p.22.

37.UCLA Oral History Program, p.395.

38.同上。

39.Hayek, Hayek on Hayek, p.127.

40.雅各布·瓦伊纳（Jacob Viner，1892—1970），芝加哥经济学派的共同创办人，为罗斯福的财政部长Henry Morgenthau提供咨询，大萧条期间反对凯恩斯主义的补救措施。瓦伊纳教过米尔顿·弗里德曼。

41.Quoted in Ebenstein, Friedrich Hayek, p.174.

42.John Ulric Nef, The Search for Meaning：The Autobiography of a Nonconformist（Public Affairs Press, Washington, D.C.，1973），p.37.

43.Ebenstein, Friedrich Hayek, p.196.

44.F.A.Hayek, 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I960），p.6.

45.同上，p.87.

46.同上，p.13.

47.同上，pp.86-87.

48.同上，p.vi.

49.同上，p.42.

50.同上，pp.46-47.

51.同上，p.397.

52.同上，p.400.

53.同上，p.402.

54.同上，p.401.

55.同上，p.403.

56.同上，p.405.

57.同上。

58.同上。

59.Lionel Robbins，"Hayek on Liberty，" Economica（New

Series），vol.28，no.109，February 1961，p.67.

60.Jacob Viner，"Hayek on Freedom and Coercion，" Southern Economic Journal，vol.27，no.3，January 1961，p.231.

61.同上，p.235.

62.同上，p.232.

63.同上，p.235.

64.同上，pp.235-236.

65.同上，p.235.

66.Robbins，"Hayek on Liberty，" p.68.

67.同上，p.80.

68.同上，pp.79-80.

69.F.A.Hayek in Commanding Heights，PBS，http://www.pbs.org/wgbh/commandingheights/shared/minitextlo/tr_show

70.Robbins，Autobiography of an Economist，p.154.

71.同上，p.155.

72.Ralph Harris，in Commanding Heights，PBS，http://www.pbs.org/wgbh/commandingheights/shared/minitextlo/tr_show

73.Lawrence Hayek，in ibid.

74.Hayek-North/Skouken interview，quoted in Ebenstein，Friedrich Hayek，p.252.

1.凯恩斯在遗嘱中要求将骨灰埋在国王学院，但遗嘱执行人、他的兄弟杰弗里

决定将骨灰撒在苏塞克斯。

2.克伦斯基（Alexander Kerensky，1881—1970），俄国临时政府的总理，该临时政府在十月革命中被列宁推翻。

3.Alan Peacock, Liberal News, February 23，1951.

4.Martin Gilbert, Winston Churchill, the Wilderness Years（Houghton Mifflin, New York，1982），p.31.

5.William Beveridge, Full Employment in a Free Society（Allen&Unwin, London，1944），p.135.

6.UCLA Oral History Project, p.111.

7.同上，pp.111-112.

8.同上，p.111.

9.Articles 55 and 56，Charter of the United Nations，1945，http://un.org/en/documents/charter/index.shtml.

10.Johannes Morsink, 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Origins, Drafting, and Intent（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Philadelphia，2000），p.160.

11.Robert J.Donovan, Conflict and Crisis：The Presidency of Harry S.Truman，1945—1948（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Columbia，1996），p.112.

12.Franklin D.Roosevelt，"State of the Union Message to Congress，" January 11，1944，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 http://www.presidency.ucsb.edu/ws/index.php?pid=16518.

13.詹姆斯·默里（James Murray，1876—1961），加拿大出生的美国人，在蒙大拿州连续五次出任参议员。

14.莱昂H.凯瑟林（Leon H.Keyserling，1908—1987），经济学家，受教于Rexford Tugwell，后者是新政的“建筑师”，罗斯福智囊团的重要成员。见W.Robert Brazelton，"The Economics of Leon Hirsch Keyserling，"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vol.11，no.4，Fall 1997，pp.189-197.

15.Oral history interview with Leon Keyserling by Jerry N.Hess, Washington, D.C.，May 3，1971，Harry S.Truman Library, Independence, Mo.，pp.25-26.

16.Full Employment Bill of 1945，in Stephen Kemp Bailey, Congress Makes a Law：The Story behind the Employment Act of T946（Vintage, New York，1964），p.57.

17.U.S.Senate, Assuring Full Employment in a Free Competitive Economy.Report from the Committee on Banking and Currency, S.Rept.583，79th Congress，1st session（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 D.C.，September 22，1945），p.81.

18.Harry S.Truman（1884—1972），33rd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1945-53）.

19.Full Employment Bill of 1945，section 2（b-c）.

20.Seymour E.Harris，"Some Aspects of the Murray Full Employment Bill，"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vol.27，no.3，August 1945，pp.104—106.

21.Gottfried Haberler，"Some Observations on the Murray Full Employment Bill，"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vol.27，no.3，August 1945，pp.106-109.

22.Employment Act of 1946，section 2.

23.埃德温·诺斯（Edwin Griswold Nourse，1883—1974），农业经济学

家，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1946—1949）。

24.Oral history interview with Edwin Nourse by Jerry N.Hess, Washington, D.C.，March 7，1972，Harry S.Truman Library, Independence, Mo.，pp.24-26.

25.David McCullough, Truman（Simon＆Schuster, New York，1992），p.633.

26.Oral history interview with Leon Keyserling by Jerry N.Hess, Washington, D.C.，May 10，1971，p.117.

27.Silvia Nasar, interview with Paul Samuelson，"Hard Act to Follow?" The New York Times, March 14，1995.

28.德怀特·大卫·“艾克”·艾森豪威尔（Dwight David "Ike" Eisenhower，1890—1969），盟军欧洲战场最高指挥官，1944年领导了收复法国、反攻德国的战斗，后成为美国第34任总统（1953—1961）。

29.John W.Sloan, Eisenhower and the Management of Prosperity（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Lawrence，1991），p.13.

30.阿瑟·伯恩斯（Arthur Frank Burns，1904—1987），艾森豪威尔任内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1953—1956），美联储主席（1970—1978）。

31.Burns speech, June 16，1955，Dwight D.Eisenhower papers, Dwight D.Eisenhower Presidential Library and Museum, Abilene, Kans.，Ann Whitman File, Administrative Series, box 10.

32.Parker, John Kenneth Galbraith, p.319.

33.Editorial，"People's Success Story，" Life, August 1，1960，p.20.

34.整个20世纪50年代，国防开支至少占联邦开支总额的一半。20世纪60年代，联邦预算为922亿美元，国防开支为481亿美元。U.S.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 Historical Tables：Budget of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2006（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 D.C.，2005）.

35.James Oberg, NBC News, April 27，2004.

36.Richard Hofstadter, American Perspective, vol.4（Foundation for Foreign Affairs, Washington, D.C，1950），p.35.

37.联邦国防合同落入多家大公司手里，如Lockheed, Grumman, Hughes, Litton Industries, TRW, General Motors, IBM和General Electric等。

38.Dwight D.Eisenhower，"Farewell Address，" January 17，1961，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 www.presidency.ucsb.edu.

39.Eisenhower news conference, November 5，1958，The American PresidencyProject, http://www.presidency.ucsb.edu/ws/index.php?pid=l 1286.

40.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Milhous Nixon，1913—1994），第36任副总统（1953—1961），第37任总统（1969~1974）。

41.约翰·菲茨杰拉德·“杰克”·肯尼迪（John Fitzgerald "Jack" Kennedy，1917—1963），美国第35任总统（1961~1963）。

42.Stein, On the Other Hand, p.85.

43.John Kenneth Galbraith, Ambassadors journal（Houghton Mifflin, New York，1969），p.48.

44.小威廉·麦克切斯尼·马丁（William McChesney Martin Jr.，1906—1998），在职最久的美联储主席，从1951年4月一直干到了1970年1月，是《联邦储备法》设计师威廉·麦克切斯尼·马丁之子。

45.Leon Keserling曾向肯尼迪抱怨，说他在关键岗位上任命了太多的保守派，肯尼迪反驳说，你没意识到，我当选只是因为选票多了百分之一的一半，

Keserling回答说：我猜，要是尼克松因为多了百分之一的一半选票当选总统，他一定会任命我当财政部部长，好取悦自由派。Oral history interview with Leon Keyserling by Jerry N.Hess, Washington, D.C.，May 10，1971，p.94.

46.沃尔特·赫勒（Walter Wolfgang Heller，1915—1987），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经济系主任。他协助设计了1947年的马歇尔计划，复兴“二战”后的欧洲，还建议林登·约翰逊“向贫困宣战”。

47.克米特·戈登（Kermit Gordon，1916—1976），Brookings Institution后来的主席，负责监管约翰逊“伟大社会”的第一笔预算。

48.John F.Kennedy，"State of the Union Message to Congress，" February 2，1961，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 http://www.presidency.ucsb.edu/ws/index.php?pid=8111＆st=kennedy＆stl=congress.

49.Michael O'Brien, John F.Kennedy：A Biography（Macmillan, London，2006），p.637.

50.Arthur M.Schlesinger Jr.，A Thousand Days：John F.Kennedy in the White House（Houghton Mifflin, New York，1965），p.630.

51.Quoted from various sources in Parker, John Kenneth Galbraith, p.340.

52.Oral history interview with Leon Keyserling by Jerry N.Hess, Washington, D.C.，May 10，1971，p.94.

53.JFK speech to the Economic Club of New York, December 14，1962，John F.Kennedy Presidential Library and Museum, http://www.jfklibrary.org/Historical+Resources/Archives/Reference+D

54.Michael M.Weinstein，"Paul A.Samuelson, Economist, Dies at 94，" The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13，2009.

55.Robert M.Collins, The Business Response to Keynes，1929—1964（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1981），p.192.

56.埃弗塞·多马（Evsey Domar，1914—1997），波兰出生的美国经济学家，研究财政赤字和经济增长之间的联系。

57.罗伯特·索洛（Robert Merton Solow，1924—），美国经济学家，在哥伦比亚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工作，1987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确定了技术创新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性。

58.威廉·菲利普斯（William Phillips，1914—1975），电气工程师，后成为伦敦经济学院的经济学家，开发了初期的模拟计算机，1958年在菲利普斯曲线中假定失业和通货膨胀的变化当中存在联系。

59.Douglass Cater Oral History Interview II, by David G.McComb, May 8，1969，Lyndon Baines.Johnson Library and Museum, Austin, Tex.，Oral History Collection, p.16.

60.道格拉斯·卡特（S.Douglass Cater，1923—1995），约翰逊总统的特别助理。

61."Kennedy Tax Cuts Boosted Revenue，" Heritage Foundation, http://www.
heritage.org/static/reportimages/1326E87331F4B5FC87405FF5ClBFC7EE.g

62.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figures, www.bls.gov.

63.Time, December 31，1965.Uncredited author.

64."President Lyndon B. Johnson's Remarks at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May 22，1964，Lyndon Baines Johnson Library and Museum, http://www.lbjlib.utexas.edu/johnson/archives.hom/speeches.hom/6405

65.巴里·戈德华特（Barry Goldwater，1909—1998），保守派，自由意志论思想家，连续5次出任亚利桑那州参议员，1964年是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

66.威尔伯·米尔斯（Wilbur Mills，1909—1992），阿肯色州议员，20世纪60年代众议院“方法和手段”委员会（House Ways and Means Committee）主席，公认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但在1972年的党内选举中，输给了乔治·麦戈文（George McGovern）。

67.Wilbur Mills Oral History Interview I, by David G.McComb, February 11, 1971, Lyndon Baines Johnson Library and Museum, Austin, Tex., Oral History Collection, p.15.

68.Richard Nixon, "State of the Union Address," January 22, 1970, Miller Center of Public Affairs, University of Virginia, http://millercenter.org/scripps/archive/speeches/detail/3889.

69.保罗·麦克拉肯（Paul McCracken，1915—），美国经济学家。

70.赫伯特·斯坦因（Herbert Stein，1916—1999），倡导福利的自由市场派记者，尼克松经济顾问委员会的主席。

71.乔治·舒尔茨（George Shultz，1920—），尼克松的劳工部长（1969~1970），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主任（1970~1972），财政部长（1972~1974），罗纳德·里根的国务卿（1982~1989）。

72.U.S.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BLS）：Current Population Survey（CPS）[Household Survey-LNS14000000]，http://zimor.com/chart/Unemployment_Rate.

73.Stein, On the Other Hand, p.96.

74.Nixon, "State of the Union Address," January 22, 1970.

75.Stein, On the Other Hand, p.101.

76.同上。

77.同上，p.105.

78.Interview of Milton Friedman, October 1，2000，Commanding Heights, PBS, http://www.pbs.org/wgbh/commandingheights/shared/minitextlo/int_miltonfriedman.html.

79.John Connally，1917—1993，灵活的政治家，在两党之前骑墙。他是肯尼迪的海军部长，后任得克萨斯州州长，1963年11月，约翰F.肯尼迪在达拉斯遭暗杀时，他和肯尼迪在同一辆车上，并因之受伤；后出任尼克松政府的财政部长。

80.Stein, On the Other Hand, p.101.

81.同上，p.102.

82.William Safire，"Do Something！" The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14，1974.

83.Richard Nixon, The Memoirs of Richard Nixon（Arrow Books, London，1979），p.971.

84.George Shultz, in Commanding Heights, PBS, http://www.pbs.org/wgbh/commandingheights/shared/minitextlo/tr_show

85.滞胀一词，据信是英国保守党财政发言人伊恩·麦克劳德在1965年第一次使用，但也有人说是保罗·萨缪尔森首创。

86.杰拉尔德·福特（Gerald Ford，1913—2006），原名Leslie Lynch King Jr.，国会长年议员，后升任副总统，尼克松因水门事件下台后，当上了美国第38任总统（1944—1977）。

87.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1926—），美联储主席（1987~2006）。

88.Greenspan's confirmation hearings were held on the day Nixon resigned.

89."Historical Inflation，" InflationData. com,

http://inflationdata.com/inflation/Inflation_Rate/HistoricalInflatidsInflation_currentPage=2.

90.Interview of Milton Friedman, October 1，2000，Commanding Heights, PBS.

91.Alan Greenspan, The Age of Turbulence：Adventures in a New World（Penguin, London，2008），p.72.

92.Officially known as the "Full Employment and Balanced Growth Act."

93.克努特大帝（Canute，985—1035），丹麦、英格兰、挪威、部分瑞典的海盗国王。

94.Jimmy Carter，"'Crisis of Confidence' Speech，" July 15，1979，Miller Center of Public Affairs, University of Virginia, http://millercenter.org/scripps/archive/speeches/detail/3402.

95.Jimmy Carter，"Anti-Inflation Program Speech，" October 24，1978，Miller Center of Public Affairs, University of Virginia, http://millercenter.org/scripps/archive/speeches/detail/5547.

96.保罗·沃尔克（Paul Volcker，1927—），卡特和里根任上的美联储主席（1979—1987），奥巴马总统经济复苏顾问委员会的主席（2008~）。

1.Aaron Director，"Review of F.A.Hayek, The Road to Serfdom"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35，no.1，March 1945，p.173.

2.Friedman and Friedman, Two Lucky People, p.58.

3.斯坦利·丹尼森（Stanley Dennison，1912—1992），剑桥大学经济学讲师（1945~1957），赫尔大学副校长（1972~1980）。

4.Milton Friedman and Anna D.Schwartz, A Monet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1867—1960（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rinceton, N.J. , 1963) .

5.Friedman's definitive account of his monetary theory was "The Quantity of Money———A Restatement, an Essay in Studies in the Quantity Theory of Money , " in Friedman, ed. , Studies in the Quantity Theory of Mone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 1956) .

6.Milton Friedman , "The Role of Monetary Policy , "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presidential address, December 29 , 1967 , i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58 , no.1 , March 1968.

7.Milton Friedman , "John Maynard Keynes , " in J.M.Keynes, 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facsimile of 1936 edition reprinted by Verlag Wirtschaft und Finanzen GmbH, Dusseldorf , 1989) , p.11.

8.Robert J.Gordon, ed. , Milton Friedman's Monetary Framework : A Debate with His Critic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 1974) , pp.133-134.

9.Friedman , "John Maynard Keynes , " p.20.

10.同上 , pp.21-22.

11.Friedman , "Foreword , " in Fritz Machlup, Essays on Hayek (Routledge, London , 2003) , p.xxi.

12.Friedman , "John Maynard Keynes , " p.21.

13.Barry M.Goldwater, Conscience of a Conservative (Victor, New York , 1960) , p.17.

14.Barry M.Goldwater with Jack Casserley, Goldwater (St.Martin's Press, New York , 1988) , p.140.

15.Goldwater, Conscience of a Conservative, p.44.

16.Milton Friedman，"The Goldwater View of Economics，" The New York Times, October 11，1964.

17.Paul Samuelson, The New York Times, October 25，1964.

18.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1911—2004），好莱坞演员，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美国第40任总统。

19.Rowland Evans and Robert Novak, The Reagan Revolution（E.P.Dutton, New York，1981），p.237.

20.同上。

21.Ronald Reagan，"Time for Choosing，" address broadcast on television, October 27，1964.

22.纽特·金里奇（Newton Leroy "Newt" Gingrich，1943—），原名Newton Leroy McPherson。完成了有关比利时1945~1960年在刚果的教育政策博士论文后，他在西佐治亚大学任教，于1978年当选为众议院议员。后任众议院议长（1995~1999）。

23.Interview of Newt Gingrich, Spring 2001，Commanding Heights, PBS, http://www.pbs.org/wgbh/commandingheights/shared/pdf/int_newtgingri

24.Friedman and Friedman, Two Lucky People, p.388.

25.同上，p.386.

26.同上，pp.386-387.

27.Milton Friedman, in Commanding Heights, PBS, http://wwwZpbs.org/wgbh/commandingheights/shared/minitextlo/tr_show

28.Herbert Stein, Presidential Economics（Simon&Schuster, New York，1985），p.255.

29.Paul Samuelson，"A Few Remembrances of Friedrich von Hayek（1899-1992）."

30.贡纳尔·默达尔（Gunnar Myrdal，1898—1987），瑞典经济学家和政府部长，他在非裔美国人生活条件上的开创性研究工作，引领了“让所有美国人受到教育”活动，并最终体现在了Brown v.Board of Education一案最高法院的裁决当中。弗里德曼在哥伦比亚遇到他数次，认为他“非常迷人和聪明”。Friedman and Friedman, Two Lucky People, p.78.

31.同上。

32.Interview of Ralph Harris, July 17，2000，Commanding Heights, PBS, http://www.pbs.org/wgbh/commandingheights/shared/minitextlo/int_ral

33.George H.Nash，"Hayek and the American Conservative Movement，" lecture given to the Intercollegiate Studies Institute Indianapolis Conference, Indianapolis, Ind.，April 32004，www.isi.org/lectures/text/pdf/hayek4-3-04.pdf.

34.Hayek gave his Nobel address on December 11，1974.

35.F.A.Hayek，"The Pretence of Knowledge，" quoted in Assar Lindbeck, ed.，Nobel Lectures in Economic Sciences 1969—1980（World Scientific, Singapore，1992），p.179.

36.UCLA Oral History Program, p.195.

37.Milton Friedman，"Inflation and Unemployment，" Nobel Memorial Lecture, December，13，1976，http://nobelprize.org/nobel_prizes/economics/laureates/1976/friedma

38.A full account of the leadersh；contest can be found in Nicholas Wapshott, Ronald Reagan and Margaret Thatcher：A Political Marriage（Sentinel, New York，2007），pp.76-82.

39.Ralph Harris对此事表示怀疑，2000年7月17日，他对PBS Commanding Heights的调查员说，“牛津大学的一个理科学生，是否会把《通往奴役之路》列入自己的读书单，我很怀疑。它没那么好找，书评也不多。它只会出现在某些学者的论文里。”

40.John Ranelagh, Thatchers People：An Insiders Account of the Politics, the Power, and the Personalities（HarperCollins, London，1991），p.ix.

41.该共识被称为"Butskellism"，因为它将两种近乎完全相同的方法融合到了政府当中，其一来自保守党的R.A.Butler，其二来自工党领袖Hugh Gaitskell。

42.Nicholas Wapshott and George Brock, Thatcher（Macdonald/Futura, London，1983），p.176.

43.Interview of Ralph Harris, July 17，2000，Commanding Heights, PBS.

44.Laurence Hayek, in Commanding Heights, PBS, http://www.pbs.org/wgbh/commandingheights/shared/minitextlo/tr_show

45.Margaret Thatcher, in ibid.

46.Nicholas Kaldor,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Mrs.Thatcher：Speeches in the House of Lords，1979-82，ed.Nick Butler（Duckworth, London，1983）.

47.Margaret Thatcher，"The Lady's Not for Turning，" Guardian, April 30，2007，full text at http://www.guardian.co.uk/politics/2007/apr/30/conservatives.ukl.Th phrase "The lady's not for turning" was adapted by Thatcher's chief

phrase maker, the dramatist Ronald Millar, from the title of Christopher Fry's 1948 play The Lady's Not for Burning.

48.Thatcher, House of Commons, February 5, 1981.www.margaretthatcher.org/document/104593.

49.撒切尔夫人是公立学校出身，出身于私立学校的保守派对头本来用这样的词来侮辱她，她便借用过来还击对手。故此，她把那些拒绝她强硬经济政策、有着贵族价值观的人称为“窝囊废”（wets），把赞同她的人称为“好样的”（dries）。为确定一名保守派到底站在哪一边，她会问，“他是我们的人吗？”

50.For a full account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atcher's monetarist policies, see Wapshott and Brock, Thatcher, pp.183-212.

51.该智囊团是Centre for Policy Studies，由Sir Keith Joseph and Margaret Thatcher共同创办，由前马克思主义者Alfred Sherman运营。

52.于尔格·尼汉斯（Jurg Niehans，1919—2007）瑞士货币主义经济学家，经济史学家，伯尔尼大学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1966~1977）。

53.Milton Friedman, BBC interview, March 1983，quoted in Hugo Young, The Iron Lady：A Biography of Margaret Thatcher（Noonday Press, New York，1990），p.319.

54.Ronald Reagan, in Commanding Heights, PBS, http://www.pbs.org/wgbh/commandingheights/shared/minitextlo/tr_show

55.马丁·安德森（Martin Anderson，1936—），经济学家，里根总统1976~1980年选举活动期间的高级政策顾问，国外情报顾问委员会的成员（1980~1986）。

56.Martin Anderson, Revolution：The Reagan Legacy（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San Diego，1990），p.267.

57.Paul Volcker, in Commanding Heights, PBS, http://wwwZpbs.org/wgbh/commandingheights/shared/minitextlo/tr_show

58.同上。

59.George Shultz, in Commanding Heights, PBS, http://www.pbs.org/wgbh/commandingheights/shared/minitextlo/tr_show里根坚信有必要来一场经济衰退，但他的财政部长Donald Regan为免总统改变主意，把赌注下在了另一边，对媒体和国会展开了一场"Fed bashing"造谣活动，把糟糕的经济消息归咎于沃尔克。

60.亚瑟·拉弗（Arthur Laffer，1940—），美国财政保守派经济学家，自由意志论者，芝加哥大学商学院教授。

61.Collected Writings, vol.9：Essays in Persuasion, p.338.

62.Interview of Hayek，"Business People；A Nobel Winner Assesses Reagan，" The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1，1982.

63.John Kenneth Galbraith，"Recession Economics，"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February 4，1982.

64.Mondale speech in Springfield，111.，in Steven M.Gillon, The Democrats' Dilemma：Walter F.Mondale and the Liberal Legacy（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1995），p.371.

65.All figures from Arthur Laffer, The Laffer Curve：Past, Present and Future, Executive Summary Backgrounder No.1765（Heritage Foundation, Washington, D.C.，June 2004）.

66.Jerry Tempalski，"Revenue Effects of Major Tax Bills，" OTA Working Paper 81，Office of Tax Analysis, U.S.Treasury Department, Washington, D.C.，July 2003.

67.Milton Friedman, in Commanding Heights, PBS,

http://www.pbs.org/wgbh/commandingheights/shared/minitext/tr_show01

68.Defense figures expressed in constant 2000 dollars.U.S.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 Historical Tables：Budget of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2006（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 D.C.，2005），table 6.1.

69.同上。

70.John Case，"Reagan's Economic Legacy，" Inc.，October 1，1988.

71.Stein, Presidential Economics, p.308.

72.Reagan speech to Gridiron Club, March 24，19＆4，quoted in Lou Cannon, President Reagan：The Role of a Lifetime（Public Affairs, New York，2000），p.100.

73.Quoted in Holcomb B.Noble，"Milton Friedman, Free Market's Theorist, Dies at 94，" The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16，2006.

74.Interview of John Kenneth Galbraith, September 28，2000，Commanding Heights, PBS, http://www.pbs.org/wgbh/commandingheights/shared/minitextlo/int_johhgalbraith.html.

1.据Tom G.Palmer的说法，“你在整个中欧和东欧最常听到的一个名字，就是弗里德里希·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的盗版小册子以及罕见的英文版，流传得非常广。” Tom G.Palmer，"Why Socialism Collapsed in Eastern Europe，" Cato Policy Report, September/October 1990.

2.John Cassidy，"The Price Prophet，" The New Yorker, February 7，2000.

3.丹尼斯·希利（Denis Winston Healey, Baron Healey，1917—），英国

财政大臣（1974~1979）。

4.Denis Healey, The Time of My Life（Michael Joseph, London，1989），p.491.

5.Quoted in "Austerity Alarm，" Economist, July 1，2010，www.economist.com/node/16485318.

6.Alan S.Blinder，"The Fall and Rise of Keynesian Economics，" Economic Record, December 1988.

7.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Emerson Lucas Jr.，1937—），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199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新凯恩斯主义的创始人。他强调指出，在确定宏观经济总量时，个人经济决策和微观经济决策的理性预期非常重要。

8.Quoted in Brian Snowdon and Howard R.Vane, A Macroeconomics Reader（Routledge, London，1997），p.445.

9.James K.Galbraith, The Predator State：How Conservatives Abandoned the Free Market and Why Liberals Should Too（Free Press, New York，2008），p.4.

10.Quoted in Kevin A.Hassett，"The Second Coming of Keynes，" National Review, February 9，2009.

11.UCLA Oral History Program, p.195.

12.Robert E.Lucas Jr.，"Macroeconomic Priorities，" presidential address to the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January 10，2003，http://home.uchicago.edu/%7Esogrodow/homepage/paddress03.pdf.

13.福山（Yoshihiro Francis Fukuyama，1952—），美国政治经济学家。

14.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Simon &Schuster, New York，1992）.

15.本·伯南克（Ben Bernanke，1953—），美联储主席（2006~），乔治W.布什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2005~2006）。

16.Ben Bernanke, remarks at "A Conference to Honor Milton Friedman," University of Chicago, Chicago, November 8, 2002.

17.迈克尔·金斯利（Michael Kinsley，1951—），美国政治记者。

18.Michael Kinsly, "Greenspan Shrugged," The New York Times, October 14, 2007.

19.Greenspan, Age of Turbulence, p.68.

20.乔治H.W.布什（George H.W.Bush，1924—），驻联合国大使，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第41任美国总统（1989~1993）。

21.戈登·杰科是Oliver Stone执导的电影《华尔街》（1987）里的英雄，其台词“贪婪是善”一语，据信来自Ivan Boesky（股票交易员，后因内幕交易定罪）1986年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一次毕业典礼上的致辞。他说，“我认为贪婪是健康的。你可以既贪婪，同时又保持良好的自我感觉。”

22.约翰·泰勒（John Brian Taylor，1946—），美国经济学家，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

23.乔治·布什1945~1948年就读于耶鲁大学。

24.“巫术经济学”一语出自布什的新Peter Teeley，1978年4月，布什在宾夕法尼亚州候选人大会的讲演上用过。

25.迈克尔·杜卡基斯（Michael Stanley Dukakis，1933—），马萨诸塞州州长（1975~1979，1983~1991），民主党总统候选人（1988）。

26.布什1988年在新奥尔良共和党全国大会上所说的这句话，出自里根的讲演撰稿人Peggy Noonan。

27.Milton Friedman, "Oodoov Economics," The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2，1992.

28.Quoted in Greenspan, Age of Turbulence, p.113.

29.比尔·克林顿（William Jefferson "Bill" Clinton，原名William Jefferson BlytheⅢ，1946—），阿肯色州州长，第43任美国总统（1993~2001）。

30.此举随后被称为是“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增税”，尽管增税总额仅为320亿美元，占国民生产总值的0.5%，比里根1982年增税幅度还略少。见Tempalski，"Revenue Effects of Major Tax Bills."

31.Quoted in Tom DeLay with Stephen Mansfield, No Retreat, No Surrender：One American's Fight（Sentinel, New York，2007），p.115.

32.Newt Gingrich, Ed Gillespie, and Bob Schellhas, Contract with America（Times Books, New York，1994），p.7.

33.DeLay with Mansfield, No Retreat, No Surrender, p.112.

34.Interview of Newt Gingrich, Spring 2001，Commanding Heights, PBS, http://www/pbs.org/wgbh/commandingheights/shared/minitext/int_newtg

35.DeLay with Mansfield, No Retreat, No Surrender, p.112.

36.同上，p.115.

37.Collected Writings, vol.20：Activities 1929-31，p.147.

38.Greenspan, Age of Turbulence, p.147.

39.Kelly Wallace，"President Clinton Announces Another Record Budget Surplus，" CNN report, September 27，2000.

40.White House announcement, September 27，2000，

http://clintoni.nara.gov/WH/new/html/Tue_Oct_3_l 13400_2000.html.

41.Alan Greenspan, interview with Tim Russert, Meet the Press, NBC, September 23，2000.

42.Greenspan, Age of Turbulence, p.145.

43.William Jefferson Clinton，"State of the Union Address，" January 23，1996，http://clinton2.nara.gov/WH/New/other/sotu.html.

44.乔治W.布什（George Walker Bush，1946—），第43任美国总统。（2001~2009）。

45.处方药法在10年里额外耗费了5000亿美元。

46.Greenspan, Age of Turbulence, p.233.

47.Ron Suskind, The Price of Loyalty：George W.Bush, the White House, and the Education of Paul O'Neill（Simon＆Schuster, New York，2004），p.291.

48.The Vietnam War cost 9.5 percent of GDP；the Korean War 14 percent.

49.Quoted in Republican senators' newsletter the American Sound, November 19，2003.

50.Gail Russell Chaddock，"US Spending Surges to Historic Level，"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December 8，2003.

51.Stein, Presidential Economics, p.313.

52.Dick Armey，"End of the Revolution，" Wall Street Journal, November 9，2006.

53.Alan Greenspan, testimony before the House Committee on

Oversight and Government Reform, October 23，2008，quoted in "Greenspan 'Shocked' That Free Markets Are Flawed，" The New York Times, October 23，2008.

54.J.M.Keynes，"The Great Slump of 1930"（1930），in Collected Writings, vol.9：Essays in Persuasion, p.126.

55.Alan Greenspan，"Markets and the Judiciary，" Sandra Day O'Connor Project Conference, Georgetown University, Washington, D.C.，October 2，2008.

56.Collected Writings, vol.13：General Theory and After, Part 1，p.349.

57.Peter Clarke, Keynes：The Rise, Fall, and Return of the 20th Century's Most Infuential Economist（Bloomsbury, New York，2009），p.19.

58.Interview of John Kenneth Galbraith, September 28，2000，Commanding Heights, PBS, http://www.pbs.org/wgbh/commandingheights/shared/minitext/int_johnk

59.Justin Fox，"The Comeback Keynes，" Time, October 23，2008.Notes to Pages' 281-288/343.

60.同上。

61.同上。

62.Chris Edwards, on All Things Considered, NPR, January 29，2009.

63.贝拉克·奥巴马（Barack Hussein Obama II，1961），伊利诺伊州参议员，第44任美国总统，2008年当选。

64.President Obama, televised address, February 16，2010，in

"Obama Says Stimulus Halted 'Catastrophe，'" Financial Times, February 17，2010.

65.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1953—），美国经济学家，在普林斯顿大学及伦敦经济学院工作，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66.Paul Krugman，"The Third Depression，" The New York Times, June 27，2010.

67.民粹主义的茶党崛起于2009年，是一个松散的联合体，对支持低税收、小政府、偿还政府债务的共和党派别持认同态度。

1.Robert Skidelsky，"After Serfdom，" review of Hayek：The Iron Cage of Liberty by Andrew Gamble, Oxford, Polity, in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September 20，1996.

2.Milton Friedman, Letter, Time, February 4，1966.

3.Milton Friedman，"John Maynard Keynes" in J.M.Keynes's 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facsimile of 1936 edition reprinted by Verlag Wirtschaft und Finanzen GmbH, Diisseldorf，1989），p.6.

4.Milton Friedman, The Counter-Revolution in Monetary Theory：First Wincott Memorial Lecture, Delivered at the Senate House, University of London, September 16，1970（Institute of Economic Affairs, London，1970），p.8.

5.Interview of Hayek by Thomas W.Hazlitt，1977，published in Reason, July 1992.http://reason.com/archives/1992/07/01/the-road-from-serfdom.

6.Interview of Milton Friedman, October 1，2000，Commanding Heights, PBS, http://www.pbs.org/wgbh/commandingheights/shared/minitext/int_milto

friedman.html.

7.Interview of Hayek by Thomas W.Hazlett，1977.

8.Richard Cockett, Thinking the Unthinkable：Think Tanks and the Economic Counter-Revolution，1931-1983（HarperCollins, London，1994），p.175.

9.吉塔·塞伦尼（Gita Sereny，1921—），奥地利出生的英国作家，曾为希特勒时代的建筑师阿尔贝特·施佩尔（Albert Speer）写作传记。

10.Quoted in Gita Sereny, The Times（London），May 9，1985.

11.Interview of F.A.Hayek, Forbes, May 15，1989，pp.33-34.

12.Collected Works, vol.2：Road to Serfdom, preface to the 1976 edition, p.53.Hayek had described Keynes's General Theory in identical terms.

13.Adam Wolfson，"Conservatives and Neoconservatives，" in Irwin Stelzer, ed.，The Neocon Reader（Grove Press, New York，2004），p.224.

14.Paul Samuelson，"A Few Remembrances of Friedrich von Hayek（1899-1992）."

15.See Jeffrey D.Sachs，"The Social Welfare State, beyond Ideology：Are Higher Taxes and Strong Social 'Safety Nets' Antagonistic to a Prosperous Market Economy?" Scientifc American, October 16，2006.

16.Interview of Hayek by Thomas W.Hazlett，1977.

17.John Cassidy，"The Price Prophet，" The New Yorker, February 7，2000.

18.同上。

19.Bruce Caldwell, Hayeks Challenge：An Intellectual Biography of F.A.Hayek（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2005），p.3.

20.F.A.Hayek, Studies in Philosophy, Politics and Economics（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1967），p.194.

21.Interview of Ralph Harris, July 17，2000，Commanding Heights, PBS, http://www.pbs.org/wgbh/commandingheights/shared/minitext/int_ralph

22.F.A.Hayek, Law, Legislation and Liberty, vol.3：The Political Order of a Free People（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1979），p.147.

23.同上，p.146.

24.同上，p.147.

25.Collected Works, vol.2：Road to Serfdom, p.260.

26.事实上，撒切尔夫人通过财政大臣Nigel Lawson的精妙设计，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哈耶克实现货币供给脱离国家垄断的概念。基于国家主义立场，撒切尔夫人一贯反对欧盟建立单一货币的主张，即放弃英镑，使用欧元：这么做会让英国放弃最高的国家主权，即政府可以通过调整利息，适应英国的经济形势，货币按市场价格浮动，能反映英国经济的走强和走弱。正如Lawson所料，他的提议无人响应。撒切尔夫人在The Downing Street Years（HarperCollins, London，1995，p.716）中解释说，“它完全不是我们欧洲社会合作伙伴们喜欢的中央集中式模型。”但即便撒切尔夫人和Lawson以巧妙的方式顶住了欧盟建立有单一政府、使用单一货币的单一大国的持续压力，仍未能完全通过哈耶克的测试，因为英国仍然使用政府所有的中央银行发行货币。事实上，“通过市场压力自由达成单一货币”这一设想是完全认可国家对发行货币的垄断权利的。把货币发行交到私人手中（如哈耶克所主张的），在政治上很难实现，也令人尴尬。

27.Wblfson，"Conservatives and Neoconservatives，" p.224.

28.Herbert Stein, Washington Bedtime Stories：The Politics of Money and Jobs（Free Press, New York，1986），p.116.

29.F.A.Hayek，"Review of Harrod's Life of J.M.Keynes"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vol.24，no.2，June 1952，pp.195-198.

30.F.A.Hayek，"Personal Recollections of Keynes and the 'Keynesian Revolution，'" Oriental Economist, vol.34，no.663，January 1966，pp.78-80.

31.J.K.Galbraith，"Keynes, Roosevelt, and the Complementary Revolutions，" Challenge（New York University Institute of Economic Affairs, M.E.Sharpe, New York），vol.26，1983，p.76.

谢谢我的朋友兼导师——蓝德岗学院（Rendcomb College）的院长A.O.H.Quick，是他第一个鼓励我研究政治经济学。谢谢我在约克大学的经济学教授Alan T.Peacock和Jack Wiseman，他们否定传统的智慧，告诉我除了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之外还有其他人对经济理论大有贡献。我也要谢谢Enoch Powell，Alfred Sherman，John Hoskyns，Keith Joseph和Margaret Thatcher等人，他们把自由市场的理念带入英国的保守党，让我得以重新评价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的著作。

在撰写本书期间，我要深深感谢Bruce Caldwell，他对哈耶克生平和著作的了解无人可以匹敌，他阅读了本书的最终草稿，提出了修订建议，还准许我看了他对芝加哥出版社《哈耶克合集》（Hayek's Collected Works）最新的编辑整理。我还要谢谢Sidney Blumenthal细致而体贴的评论。Tom Sharpe和Rockwell Stensrud是剑桥“马戏团”成员，也曾和这些人共过事，他为我提供了新颖的批评视角。我很高兴，这次的研究工作让我和Paul Levy的长久友谊焕发了新生。Paul Levy是研究布鲁姆斯伯里小圈子的著名历史学者。我还应当补充一点，对成书中依然存在的事实或判断失误，由我一人负全责。

我要谢谢剑桥国王大学的档案保管员Patricia McGuire和她的同事Jane

Clarke；加利福尼亚州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室的助理档案保管员Carol A.Leadenham；伦敦经济学院的档案保管员Sue Donnelly。还有纽约公共图书馆曼哈顿多家分馆的员工，都积极而详尽地回答了我的查询。还要感谢《纽约时报》的Dominick Harrod, Andrew Gilmour, Philip Zabriskie, Dominique Lazanski, Guy Sorman和David Johns。

W. W.Norton出版社的编辑Brendan Curry聪明而又富有同情心。助理编辑Melanie Tortoroli给了我无数的帮助和指点。Mary Babcock的文字编辑工作做得彻底而恰如其分，还给我提了许多如何将英式英语转换为美式英语的精彩建议。

我非常感谢我的文学经纪人Raphael Sagalyn，他从我们第一次关于凯恩斯的谈话中领悟到，只要我能讲得好，它会是个精彩的故事。他做了很多努力，帮我顶替已故的Giles Gordon，后者是伦敦及爱丁堡一位才华横溢的优秀作者，也是我前五本书的经纪人。

我要再一次向Fern Hurst和Beverly Zabriskie的慷慨好客、热情鼓励致谢。在写作本书的关键时刻，他们为我提供了安逸的田园居处，激发了我全新的思考，让我重振活力。

最后，我要向妻子Louise Nicholson及两个儿子William和Oliver致歉。过去几年，我们在家里召开了好多次即兴的研讨会，讨论凯恩斯和哈耶克各自的优点。谢谢他们无与伦比的耐心、幽默和理解。没有他们，我将一事无成。

尼古拉斯·韦普肖特

2011年2月于纽约

---

[1] [1]马克·安东尼是古罗马政治家和军事家，凯撒坚定的支持者。凯撒遭到元老们谋杀后，马克·安东尼在葬礼上致悼文，并扯下覆盖凯撒尸体的外袍来展示凯撒身上的伤痕。——译者注

[2] [1]Mr.Fluctooation, "Fluctooation"应为"fluctation"，是“波动”的意思，这里指哈耶克英文口音很重。——译者注

[3] [1]这里的原文是"On the one hand, on the other"，意思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这里是为了呼应杜鲁门“一只手”经济学家的笑话。——译者注

[4] [1]Groucho Marx，美国著名电影演员。——译者注

[5] [2]noblesse oblige，也译为“地位高则责任重”或“身在其位即谋其职”，这里取字面直译。——译者注

[6] [3]Phillips curve，菲利普斯曲线是用来表示失业与通货膨胀之间替代取舍关系的曲线，由新西兰统计学家威廉·菲利普斯于1958年最先提出。——译者注

[7] [1]巫术经济学的原文为"voodoo economics"，弗里德曼在这里玩了个文字游戏，将"voodoo"颠倒过来，就成了"oodoov"。——译者注

[8] [2]克林顿是民主党总统，政治立场上倾向于自由派，但典型的民主党自由派人士是支持提税增加政府开支的，共和党大多反对这么做。所以格林斯潘才说，克林顿是最好的“共和党”总统，因为他在经济上实现了共和党力争的目标。——译者注